

天安門之變

八九民運史

本書是最翔實、也最完整的八九民運史。

作者是精研啓蒙思潮的學者，

爲了完成本書，受盡千辛萬苦；

但她終於以大量相關的文獻爲基礎，以親身目睹的民運全程爲經緯，
秉持歷史良心，寫出了這部堪稱「良心的歷史」的傑作！

如果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

八九民運及嗣後的天安門事件，

是導致前蘇聯帝國倏然崩解、後冷戰時代翩然來臨的契機與動力。

然而，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來看，

它的深層真相却被沉重的政治壓力所掩蔽，甚至遭到刻意的扭曲。

因此，人們一直期待有一部嚴謹而公正的八九民運史，

爲中國大地上的風潮與驚雷，留下恆久不磨的歷史紀錄。

現在，大家期待已久的這部書，

終於呈現在您的眼前了！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n
Tien-an-men Square
1989



作者簡介

陳小雅，女，一九五五年生於湖南長沙，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師範大學歷史系。曾經做過工人、幹部、記者。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從事制度建設研究，她所著《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曾於八〇年代(思想啓蒙時期)在大學生中產生廣泛影響。已經發表的作品有《過渡文化的十年》選章之一〈地下熱泉〉。

陳小雅首先為大陸「後文革時期」的思想界走向提供了較完整的線索，為公開重提魏京生事件的第一人，對此後的「精英研究」、「三十三人簽名事件」及以後的簽名事件有觸發效應，並且是一九九五聯合國人權年寬容呼籲書四十五位簽名人之一，被同仁稱為「對重大問題提供最敏銳感覺」的作者。

陳小雅的論文《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是第一篇在大陸公開發表，藉辛亥革命對八九民運的成因與成敗進行系統評估的論著。她由於《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撰寫與聯繫出版，已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解職，目前在鄉鎮企業從事體力勞動謀生。

風雲歷史經典系列 02

陳小雅 著

八九民運史

天安門之變

目錄

序 歷史的召喚與事實的真相／ 1

第一章 殞落，又一顆星！ 33

第一節 紅玫瑰：從盛開到飄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35

第二節 評價問題，弦外有音／ 40

第三節 地火在尋找噴口／ 47

第四節 高低音之間的「串音」／ 56

第二章 第一個回合——尋找交手接觸點 69

第一節 「新華門事件」／ 72

第二節 知識界的第一個聲音／ 82

第三節 「四二二」人民大會堂前的對壘／ 94

第三章 警鐘鳴響——「四二六社論」前後

105

第一節 追悼會以後——第一個調整期／107

第二節 江澤民與北京對表——《世界經濟導報》事件／118

第三節 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127

第四章 走向高峯的學生運動

145

第一節 高潮再起／146

第二節 大遊行／152

第三節 《導報》事件的反響／172

第四節 火上澆油的「對話」——對「結社自由」與「統一戰線」的雙重檢驗／182

第五章 趙紫陽的政治命運與運動轉折

201

第一節 趙紫陽要幹什麼？／202

第二節 黨內矛盾的公開化／212

第三節 新聞界接過「接力棒」／225

第六章 從學運到民運

253

第一節 並非「突如其來」的絕食／254

第二節 斡旋／263

第三節 知識界與社會各界的捲入／281

第四節 鄧小平上街與趙紫陽的眼淚／293

第七章 保衛北京城

309

第一節 戒嚴令／310

第二節 進軍難／321

第三節 廣場的支撐／330

第四節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統一指揮系統／346

第八章 六月腥風

361

第一節 主角的替換——從「旅遊革命家」的佔領到「四君子」絕食／362

第二節 鎮壓前夜／373

第三節 最後的紀念碑／383

附錄

409

中國爲什麼要民主？——中國現行權力系統分析 何凡興／ 411

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 陳小雅／ 420

北京市十萬學生和平請願口號 尚曉原記錄整理／ 429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胡啓立與

《中國青年報》社部分幹部的座談 李大同錄音，陳小雅整理／ 442

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識界人士

《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醞釀經過 陳小雅錄音整理／ 480

二十七軍某副政委關於參加首都戒嚴與

「平暴」經過的報告 陳小雅錄音整理／ 508

柴玲對「六四」天安門廣場清場

前後情況的追述 據《明報》一九八九·七月號／ 517

序 歷史的召喚與事實的真相

「人類不可能兩次涉足同一河流。」

如果相信赫拉克利特的這個判斷，那麼，一切歷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供人懷古，供當事人或更準確地說供勝利者自娛以外，將毫無意義。在文化知識的生產與消費仍處於計畫體制狀態下的時代，即使是歷史的著作，也難免「按需生產」。這種狀態下的生產者，生產（而不是創造）還有另一層的意義，那就是為自己謀得「飯碗」。

如果倒退二十年，寫作和出版此書，第一個收穫必是這後一層意義的消失：我將肯定會因此失去已有的「飯碗」。直到現在我也不能保證這不會成為事實，因為在生存狀態方面，我仍大部分受制於計畫體制。

幸而我是一個市場經濟的贊同者，六年前還曾在《光明日報》撰文，鼓吹文化生產者也要「砸鐵飯碗，捧泥飯碗」。有所言，最好也有所行。也許此次出版《八九民運史》就是的一個機會。

也幸而人生有限，它逼使我時刻考慮，如何把上帝交給我的東西還給上帝。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於是就有一種超然。面對良心，無意取媚於任何人。

本書寫作時所本良心，是一種歷史工作者的責任感。它與我曾經從事過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相

似，那就是讓所有的人知道真相。只有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基礎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選擇，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選擇。一切價值的「重估」才有現實的根據。在這個意義上說，真實是正義的基礎。而我，是蘭克學派^①的信徒。

一／八九民運與十年改革

「八九民運」沒有勝利者，就同「六四」鎮壓沒有失敗者一樣。至今人們提到它時，那種厭惡與消沉的情緒或許可以作為這一判斷的佐證。我的朋友，無論是商品經濟大潮的弄潮兒，還是至今仍堅持科學立場的研究者，或持「政府派」立場的官員，都覺得我選擇這個課題是在與自己為難。顯然，他們對赫拉克利特名言的體會比我深刻。

「八九民運」，就內容和規模來說，是中國人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件，「六四鎮壓」也是中國政府從未有過的事件。這件事情的結局，在共和國記憶中留下的痛楚，與其在每一個公民心裡留下的荒誕感幾乎同樣濃重。所以，對它的回味，對於任何愛國者和民主理想的信奉者來說，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愉悅。人類有逃避痛苦的本能，歷史學者也並非天生的自虐狂。但如果這痛苦的根源將無休止地釀造歷史的苦酒，這荒誕的魔匣將無節制地導演蠢劇，人們就不得不面對之，解析之。「不經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小智小慧是我們民族的致命傷。」傅雷在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一書譯者前言中如此說過。

「八九民運」是失敗的。它打斷了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十年改革的進程。但「八九

民運」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不在於所得所失，而在於這所得所失中提出的問題，正是這個民族前進中無法迴避的矛盾。按照黑格爾「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一命題，它之所以能「中斷」一個事物的進程，必是這一事物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問題恰恰在於，「八九民運」並非外界強加給「十年改革」的事物，而是這種改革路線、模式、目標本身在後毛澤東時代條件下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九民運史」的研究，是「十年改革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十年改革史」又是共產世界運動變遷的一個重要範例。我可以藐視我的選擇，但無法迴避歷史的召喚。

社會沒有參照系，就如同人在大霧中行走。反觀來路，是旅人確定腳下位置的第一個判斷根據。儘管人們的結論會因視野各異而不同，但事實，卻將為判斷奠定最終的底線。

對於「八九民運」的研究也是這樣。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國內由官方不同機構出版的「大事記」紀實文學和述評類作品、海內外當事人的回憶錄，儘管都因為種種的緣故而帶有片面的色彩，但它們的出現，對於「底線」的澄清是有著互補效益的。本書的事實依據，除本人親見、親歷、親訪者外，都是在綜合比較它們提供資料的基礎上，歸納或解析而成。相信這類的概括，籠罩的面積愈大，其抽象就愈是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本書與所有前人做出的努力不但不相排斥，相反，在追求「事實真相」這一基礎上，精神是相通的。所不一致的是，人們對事實的評價將根據各自的信仰和價值準則來作出。

我們首先需要事實，也需要對事實的初級歸納。在這一點上，我不得不感謝那些官方的報告、偵察的證據，和大量的宣傳品。它們之中有許多儘管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別有用心地裁剪，斷章取義的排列，但多少總能反映一些事實。例如陳希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

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就是一例。他說，「這場動亂，首先表現在大量的大小字報、標語、口號、傳單和輓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毀……；有的攻擊老一輩革命家是……；有的指名道姓地逐個攻擊中央領導同志……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這場動亂……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不顧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不經申請批准，連日不斷地舉行大遊行……大量製造謠言，蠱惑人心……這場動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局限於高等學校，也不局限於北京地區，而是向著全社會和全國各地擴散」，並且「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的插手。」

他的這些歸納，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是相當準確，看到了問題的要害。循著他的這一啓發，我們得以看到：

八九民運的第一個意義，就是暴露了執政黨和它的領袖與人民的矛盾。「主權在民」，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原則，也是這個國家的政權持有者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毛澤東和他的一代領導人的權威，建立在他們對中國五億農民的解放這一歷史功績，和他們對人民的「共產主義」許諾基礎上；鄧小平和他的一代領導人的權威，建立在改革開放、重新解放勞動和知識生產力這一事實，以及他們對人民「四個現代化」許諾的基礎上（見本書正文第一章第二節）。曾幾何時，人民的遊行隊伍裡自發地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標語，體現了天心、民心。民族之心，人心所向。僅僅五年不到，在同一個隊伍，同一個地方，人們卻喊出了「打倒……」的口號（見本書正文第六章第四節）。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人民的前一個口號是正確的，後一個口號是反動的。它的出現，迫使執政黨反躬自問，究竟在哪些方面背離了民心，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自己將如何防

止從一個合法統治者，蛻變為一個僅僅靠暴力維持的政治寡頭。

對此，鄧小平是做了反思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與李鵬、姚依林談話時說：「第一，我們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覺到面貌一新……人民是看實際的，否則真正就要永無寧日。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第二條，是真正辦幾個實績，要懲治腐敗，要取信於民……要拿事實給人民，這樣人民的心才會平靜下來。不然就會今天一個上街，明天一個上街。如果不從更深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那麼，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平靜都靠不住。」這個道理，千真萬確！

陳希同的報告告訴我們，八九民運的第二個意義，在於揭示了「十年改革」路線、方針方面的問題。這就是在中共黨的基本路線中，「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在這個特別需要統一行動，特別需要用新的思維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歷史新時期裡，正是由於這條路線的存在，使來自意識形態的詰問，每每成為左右改革探索實踐的震盪之源；「四個堅持」成了一切黨內迫害、齟齬和社會壓制，尤其是對改革者實行清算的罪惡之源。在「六四」鎮壓後的大清洗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組部長宋平說：「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中共元老彭真也指出，八九民運是黨內、軍內（見本書正文第七章，第三節）矛盾，及其他多種社會矛盾的交叉。而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正是這個黨內矛盾的正宗源頭。對此，那個把「四個堅持」寫進憲法的始作俑者，兩代「帝王之師」胡喬木在彌留之際已有所悔悟。

陳希同的報告還告訴我們，八九民運的第三個意義，在於暴露了現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八九民

運中，學生和民衆根據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不斷衝破政府關於遊行、結社和貼大字報的禁令，說明了現行政治原則、法規體系與憲法精神的衝突；暴露了在統治者心目中，法，與幾千年古代社會一樣，是制裁和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現代社會中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守護神；尤其是由「四二六」社論帶來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的事實，暴露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奉行「習慣法」的國度（見本書正文第四章第三節），而非非一個「立憲國家」；憲法的所有條文，由於中共黨的地位、黨的綱領、黨的政策路線的實際高於一切，都不得不以「未來進行式」屈居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

按照陳希同報告的歸納，八九民運的第四個意義，在於它暴露了現行「集中—計畫—動員」型機制的弊病。謠言四起，謠言惑衆，首先是政治缺少透明度，傳播媒介的非大眾化，政治表達與意見傳輸機制功能的退化（見本書正文第四章第四節），社會缺少緩衝機制，以及社會矛盾累積的產物。在八九民運中，趙紫陽曾試圖以增加新聞的自由度，對這一矛盾進行調節，但在未改變「動員型」體制的情況下，新聞媒介的單項改革，不僅無力平息已經發生的動盪，相反只能加劇事態的擴展（見本書正文第五章第三節）。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陳希同等人痛詆謠言之可惡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在政府堂堂皇皇的出版物上，公開的散播和製造謠言。在此，僅舉一例作為佐證：某書刊載的一篇「某學院一名二年級學生」題為《痛定思痛，我悔！我恨！》的「日記」，就偽造了「新華門事件」的所謂背景材料。這篇「日記」說：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星期四

在老IU帶領下，我們班今天有人去新華門，聽說打起來了。我沒去，因為小OU說要呼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沒有共產黨，我們這麼大個國家，誰有資格、有能力來領導②？

而事實是，四月二十日凌晨參與新華門衝突的學生，是四月十九日晚前往請願的。按照一般人寫日記的習慣，記述者要嘛在四月十九日當晚記人：「今晚……」如何如何；要嘛在四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追述：「昨晚……」如何如何；而且，「新華門事件」中所謂「打倒……」的口號，現已有各種回憶和調查資料證明，純粹是在一女生「被強行帶離現場」的情況下偶然呼出的，根本不是並不知道當日會強行清場的學生「有預謀」的活動（見本書正文第二章第一節）。

政府或暫時不能超越政府立場的材料存在這類問題，學生和社會其他組織的傳單、大小字報及回憶材料也存在同樣問題。這就給不可能事必躬親的史書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考證事務。而本書的義務，就在於本著歷史的良心，對那些眾說紛紛的事物進行分析、比較，並試圖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在無法做出判斷的地方，公開存疑不論。

以上根據陳希同提供的思路，所說的八九民運的意義，只是一個方面。當然還不是一個完整的方面。因為，這次運動的一個最重要意義，還在於它對「十年改革」在政治體制方面的進展和成果作出了檢驗：在這個政權下，人們仍需要用肚皮去推銷他們的腦袋——用絕食的方法去闡揚一種觀點、一個思想；它提醒人們重新考察所謂「政治協商」制度的內容；重新審查打著民主黨派和人民

團體旗號分享政權的「多黨合作」的實質（見本書正文第四章第四節）。它使人民再次認識到，那種沒有制度保障的所謂共產黨的「自我監督」、「自我革命」及自身調節的局限性，而最終大大提高人民發揮自身歷史主動性的覺悟，並使這種潛能變為現實的時間大大提前。

恩格斯說過，無情的歷史，應是覺悟了的現代人的史前史。今後的歷史，應該是與文學的精神、道義的精神和人性統一的歷史。

二／八九民運與中國現代化

此外，八九民運還存在另一方面的意義，那就是它對人民，對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因素，以及對適應政治現代化要求的變革理論的檢驗。

如果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剝開八九民運全民性「抗議腐敗，要求公平」的表層，觸及這一「冰山」的水下部分，我們不難看出，它的出現，與知識階層獨立意識及全體人民參政意識的覺醒，以及它對中產階級社會政治要求的自覺適應是分不開的。

無可否認，無論是作為運動的思想提供者，還是實際運作者，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次運動的一個主要角色。他們呼喚了這樣一場運動，但卻沒有能力將它善始善終。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頑固拒絕現代政治思維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知識羣體缺少社會基礎與適用理論及操作方案的結果。從八九民運中他們的行為分析可以看出，這些知識分子進行宣傳介紹和據以操作的思想、理論、技術手段，一部分來自西方啓蒙時代的民主革命理論和歷史經驗；一部分來自近現代西

方保守主義思潮；一部分來自近年來東歐民主運動的實踐；一部分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經驗和毛澤東思想。顯然，如果書寫一部《中國的中產階級革命》，八九民運無愧於它的探索階段的首篇；但指望這場運動，能夠在一面如同西歐中世紀地圖一樣色彩斑斕的旗幟指引下取得勝利，無疑是癡心妄想！

就像騎手聽到戰馬的嘶鳴，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喚一樣，八九民運對於每一個想在中國現代化、民主化進程中留下痕迹的人，都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面對一個如此巨大，布景、燈光看來都一應俱全的舞台，每一個希望成爲歷史正劇主角的人，都響應自己心靈聲音的催促匆匆登台亮相。但是，決定登台的演員，在大幕拉開的一瞬間很少領悟到，自己不僅沒有化好妝，沒有背熟台詞，甚至連劇本都不知道。許多人的主演意識讓他們不停地發表一個又一個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預告著新時代的到來，但腳步卻隨錯亂的羣衆暈頭轉向。在大部分情況下，義氣、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沒於他所從由來的土壤。

不過，在衆多「腦袋跟著鞋子走」的人當中，也有爲數不多的「用腦袋走路」的人。透過對現有資料的分析，筆者認爲，在介入運動的所有知識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論，對事件的發生進行解釋，對學運加以定位，並以之爲指導進行預測，以制定行動方案，付諸操作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處十三年徒刑，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負責人陳子明。

這個以中共政治局委員爲自我期望目標的青年，其理論概括起來，就是屬於認識理論範疇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模式，及屬於操作理論範疇的「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模式。這兩套模式，一套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與政治權力變動的

相關經驗，一套來自中國現代政黨發生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和毛澤東思想。

這兩套理論，如果單純從理論上看，放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都是無可挑剔的。因為，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工人失業，肯定下一步將會引發社會危機；社會出現動亂，政黨必然活躍，執政黨的權力就會發生動搖，由此轉成政治危機。當時，根據有關經濟專家的預測，中國經濟的危機將於一九九〇年到來。陳子明認為，如果到那時再轉成社會危機，將會出現天下大亂，中共的政權將難以承受考驗。而這一次，由於胡耀邦的逝世，引導社會危機提前爆發，實際上是給了中共一個「亡羊補牢」的機會。即在政府經濟還沒有到達極弱，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時候，它可以運用調整政策，擴大政權基礎等方法，繞過「政治危機」這一關。他假設中共與他一樣，是看到了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著「體外精英」與政府合作的機會。他選擇了一種類似「國共重慶談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來推進這一合作的實現，即中共在一九四五年是立足於「打」，用「談」來爭取同情和時間；一九八九年的陳子明是立足於「談」，用「打」來爭取談的資本。

在另一方面，他認為，在中共多年的嚴密防範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沒有滋生的機會。在「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的這個邏輯的鏈條中，每每在「政治運動」與「政治組織」之間就脫節了，每次運動過後，什麼也沒留下。這次學潮引發的社會危機，如果中共無法獨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對學運可能發生影響的社會力量。而社會力量被借用時，就可以進行討價還價：用成立合法政治組織和參政作為平息學潮的條件。所以，就在趙紫陽的智囊們苦於無法收拾，軍隊少壯派磨刀霍霍，激進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鵬政府倒台時，陳子明卻看準了，這對政府和有參政願望的「體外精英」雙方，都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著這種認識和估計，早在四月底，他便設計出一個「三線」計畫，即：一線，由學生組成，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二線，由對學生有影響力的社會知名度的知識界人士組成；三線，由他主持，專司和政府談判。

他的這套方案，看上去是無懈可擊的。在一定條件下運用，對中共政府和學生、「體外精英」三方來說，都未必不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條出路。

但是，放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操作上，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第一，從判斷形勢方面說，中國當時的危機，雖然首先來自經濟，但它與西方的經濟危機有著不同的本質和不同的制約因素。

第二，中國的政治結構不同於西方，是一黨專政；政治邏輯也不同於西方，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質上政權還沒有經過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強權基礎上的。執政人物即使使黨亡國，也不會引咎辭職。而更重要的是沒有有組織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無論是八〇年代還是九〇年代，所謂西方式「政治危機」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會是政黨危機或「接班人」危機。

第三，導致「經濟危機」的直接責任者，按照陳子明的觀點，是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而這派人物，在運動中是與民衆站在一起或至少願意與學生談判的。如果以危機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那麼談判的結果應該是改革派下台，「體外精英」與改革派所依賴的「體內精英」的換位。這種結果如果出現，將正好應驗了《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③中早就警告人們要防止出現的局面：「利用中國的動亂制止改革」，「把中國的困難看作是取得權力的機會，準備收拾殘局」。這

當然就很難為期望和支持進一步改革的運動主體所接受。

第四，「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權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實現的條件，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政治環境：舊政權（軍閥）統治基礎脆弱，各派勢力進行政治與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終勝利有待於軍事上壓倒的力量和戰場上的最終決一勝負。進入八〇年代的中國雖然也有了民主的氣象，但軍隊並沒有經過「國家化」改造，它不同於美國的民主聯軍，也不可能不為共產黨說話。如果希望政府讓步，必須的條件是「壓力」超過軍力。否則，即使政府擴大參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隨時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賜的民主。

第五，實現陳子明的方案，就必須認同把學生當「人質」的做法。由於參與者政治道德的進步，它很難為人們所接受。故而人們在讚嘆他的心思周密之時，無不要補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來！

——這些因素，使陳子明的設計看來完善，但在與實際對接時，難免有錯位的嫌疑和實施的困難。這些，或許也是他所領導的「體外精英」始終未與「體內精英」形成聯盟，就在他已依靠「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基本控制廣場局勢後，「一線」的學生領袖拒絕合作（見本書正文第七章第四節）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無非是想說明，「八九民運史」的研究對於未來中國現代化的意義——它至少可以提供一條底線。它告訴精神和思維仍停留在舊時代的人們：歷史已經進步；也告訴以激情和幻想為食糧的人們：中國的社會發育。「政治人」的理性生長、自組織與應變能力，尚處在初級階段。它期待中國的進步，更期待這進步是切實的。

就像于光遠先生所說，「股票市場是中國人學習市場經濟的課堂」一樣，八九民運是（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中國人學習現代民主的課堂。它不僅為政治精英提供了將民主理想原則付諸實踐的實驗場，也為科學研究工作提供了檢驗這些理論的豐富實例和資料。尤其是對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者來說，它將是一個極有開採價值的「富礦」。在這方面，香港學者或許已走在前面。但是，透過對歷史的了解，人們便會知道，要接受那些人們為八九民運抽象出來的民主制概念背後的事實，將遠不如接受這些概念來得愉快。例如，所謂「集體領導制」，實際上是民運缺少負責任的領袖的產物；所謂「少數服從多數」，每每成為大眾的激進主張否定理性決斷的關鍵環節；而「多元化」又往往是激進分子處於少數地位或權力追求時的堂皇出路等等。它使人們看到，那種詩人筆下競爭長高，一浪高過一浪如火如茶的沸騰景象，正是事物向無序方向發展，並將從它的頂峯跌落谷底的前奏。它警告人們，民主在西方國家獲得的成功，並不意味著它在東方土地上也能無往不勝。（參見本書附錄〈中國為什麼要民主？〉）

三／八九民運與文革

所謂「八九民運」，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起，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出動軍隊大規模鎮壓止，總共只有五十天時間。在此後的幾天內，北京、上海、成都、武漢、太原、西安、昆明、鄭州、長春、南京、哈爾濱、長沙、天津、蘭州、合肥、濟南、杭州、廣州、烏魯木齊、福州等地爆發了相當規模的抗議性活動。這些活動雖然與「八九民運」有著

一定的因果關係，但它的性質和作用已經超出了民運所表現出來的性格，因而，在本書中，不擬作爲探討與描述的對象。值得指出的是，官方材料對這一事件的分期，一般採用了「五十六天」這一說法。這種分期法的算法，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爲起始，以鄧小平六月九日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宣布「我們黨經受了一場嚴峻的考驗」爲止。顯然這個分期法是以中共黨的政權所面臨的一場危機爲視角而提出的一種時間概念，它是不適於拿來作爲描述以民衆爲主體的這本《八九民運史》的。同時，這種分期法，也是爲「從動亂到暴亂」這個鎮壓藉口服務的。可惜的是，他們羅織的所謂暴亂罪名，通通發生在「八九民運」遭到血腥鎮壓以後。這種欺騙的手法，當然只能蒙蔽輿論於一時，而不能篡改歷史於萬世。所以，這也是本書拒絕這一期分法的原因之一。

「八九民運」雖然前後只有五十天，但短短的時間內，卻集中了無數豐富的內容。它們有：對亡者的悼念運動、簽名運動、遊行請願、絕食、自由結社與自由辦報運動，還有史無前例的反戒嚴運動。捲入這場運動的社會各階層也空前的廣泛，涵蓋了學生、市民、作家、知識界著名人士、記者、國家幹部及少數現役軍人和工人、警察……，以至於政府非出動幾十萬軍隊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長久地爲這種措施付出代價。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民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能夠實現如此廣泛的動員，除國家遭受外敵入侵的情況，是很難加以想像的。在共和國的近現代史中，只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比擬。而無論是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對「五四」的研究，還是對「文革」的研究都告訴我們，要找到它們的原因，至少要去研究此前近十年以上的歷史和社會，經濟與思想。八九民運也正是這樣。這五十天，是濃縮了的歷史。寫《八九

民運史》，只不過是將這五十天放在顯微鏡下，但是你透過顯微鏡看到的，已不僅是物體的本身，而是活活的一部現代政治進化史。正因為如此，本書不得不涉及一些文革結束以來，進而至於「十年改革」時期的許多問題，以求為讀者提供一個更開闊的視野。

應該指出，最早對八九民運的成因進行綜合概括的，是在此問題上持「政府派」立場的何新。他關於此次運動的「四大動因」與「三大背景」的論斷，形成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官方新華社五月六日《國內動態精樣》中，刊登了何新寫給中央領導人載有上述內容的信。該信關於「四大動因」是這樣說的：

這次學潮的發生，有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一、學生中不滿情緒和促進民主改革要求的自發力量。二、大學生接受近年激進改革思潮、西方思潮和文化虛無主義三大思潮（如《河殤》派、方勵之、劉曉波）影響而形成的極端的力量。三、因某些激進政治派別（指黨內民主派——引者注）的暗中鼓動。四、海外敵對勢力的暗中策動。」

至於「三大背景」，信中說：

一、由於近年中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現象，使少數官員、新生資產者與多數中下層羣衆的利益對立化，引起廣泛不滿。這一現實，也使人民對現行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產生懷疑。二、由於屢次失誤，使人民對黨的方針政策信任值降低。三、通貨膨脹的發

展，侵害中下層人民生活，引起大家廣泛的不滿。

他的這些天才論斷，因後來服務於中共對知識界和社會民主力量的大清洗、大鎮壓而臭名昭著，但當時光流逝，意義紛爭的大潮退去之後，面對歷史與科學的研究，這些論斷仍能給人們一種水落石出之感。

在探討八九民運發生原因問題時，我們不得不談到與之時間距離最近，規模和形式也最相近的一場運動——文化大革命。進行這樣的聯想，也許是對這場運動持「政府派」立場者所願聞，而「民運派」會引以為痛心的。但問題是這種聯想、比較有沒有根據？其次，才是對它的解釋與評價問題。

毋庸迴避，八九民運和文化大革命在形式上是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除大小字報、遊行集會、總部運動、絕食靜坐之外，串聯全國（當時還沒有「通電海外」一說），指名道姓地要見領導人，搞「百醜圖」等在思路、語言上也有許多類同。對此法國《費加羅報》特派記者曾撰寫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幽靈》說：

從昨天（五月一日）開始，學生運動已進入第三週。某些觀察家（他們不同於當局那樣揮舞文化大革命的幽靈來嚇人）從現在的學生運動中看到了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類似的方面：
大字報、傳單、反對老前輩與政府的口號，反對貪污腐敗和反對派中不同派別的分裂。

五月十八日，香港《快報》更是把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講話與「倒鄧狂瀾」（見本書正文第六章，第四節）聯繫起來，說「現在的情況，有點像文革時期毛澤東藉紅衛兵的力量把劉少奇鬥倒的翻版」，稱趙的此舉是「活用毛澤東的高招」云云。

凡此種種形式上的比較，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它雖然可以說明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文革還深深地印在人們的意識中，但這種政治文化只不過是傳統政治結構和「兩極社會」（參見本書附錄《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的一個現代標本而已。從東西方政治運動比較可以看出，所謂文革特色，其實就是「揭竿為旗，斬木為兵」的「造反型」特色。它是「動員型」而不是「協商型」政治偏離常規的產物，同時也行使其再造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特色並非造反派的創造，它的最終製造者還在國家和政府。

我們在考察八九民運與文革的關係時，當然應該著眼於這些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八九民運與文革確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從表面上看，它們似乎闡揚的是人類價值對立的兩極：一個是爲了「神」，爲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個人專制權力；一個是爲了「人」，爲了人民民主的權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後者是自覺革命。但是，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澤東與自己發動的文革不斷地進行搏鬥中行進的；它的不平凡的樂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響中譜寫而成的。毛澤東，這個被壓迫階級的「守護神」，在那場運動中，實際上只是被各種心懷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們借助「打鬼」——各級政權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權階層、文化貴族——（正如他對江青所說）的鍾馗而已。八〇年代是一個神滅的時代，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旗幟，他們不再以某個人的名義，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義要求兌現自己的權利。這是時

代的進步所賦予兩個運動不同的性格，但是它們的內在動力，在廣大人民來說，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從而，在指向特權階層及其「制度性腐敗」這一問題上，兩者表現出驚人的一致！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廣義的文革造反派，不論其個人具體經歷如何，從社會階級構成來說，主要是處於社會下層人民的一個政治派別。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革命後處於受壓抑地位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後裔。與工農大眾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義不同，他們的「造反」大多不是出於對物質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議，而是對發展機會與政治際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說，前者的行為（按毛澤東的說法）是一種「經濟主義妖風」的話，後者的行為在當時和後來的特權階層眼中，則帶有典型的「階級報復」色彩。他們是按照階級秩序新建立的「專政」國家的受害者，他們的後代是前代階級鬥爭的犧牲品。在階級本質上，他們與工農大眾本不屬於同一共同體。但當控制著社會全部資源和分配權力的掌權階層迅速「特權化」並「血緣化」時，得不到充分發育從而也無從展示階級特色的這兩個處在社會下層的階級，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輾成了一個整體，形成了不同於「老紅衛兵」的造反派（或所謂逍遙派）。

為了重建一九四九年奠定的階級秩序，尋找鄧小平時代的社會基礎，與文革上台派華國鋒進行政治鬥爭，需要徹底地否定文革，打掉文革造反派；為了實現經濟建設的新承諾，也需要重視知識文化和重用知識分子。於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權階級與知識階層在鄧記「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④撮合下的短暫蜜月。但在這個貌合神離的「婚姻」中，知識分子只是拉磨的驢，特權階級仍是磨坊的主。這一方面表現為，在大量中青年改革的積極分子當中，不論你有何德、何能、何才、何幹，只要是「三種人」⑤就絕不提拔。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知識階層要求擴大參政權利，

並使之不再是一種「優惠知識分子」的政策，而是一種民主制度的要求，予以通透的拒絕。針對知識階層「政治多元化」的要求，一九八九年春，中共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在與民主黨派座談時重申：「在中國搞多黨制，搞反對黨，搞西方的那一套，我們不同意。在座的民主黨派也不會同意。不合國情……如果主張多黨制，不是別有用心，也是書生之見。」

正是這種新的壓抑，及片面改革帶來的社會不公，又一次把知識階層與人民大眾輾成了一個整體。他們本質上仍有區別的訴求，共同組成了八九民運的抗議聲浪。

人們普遍感覺到，階級鬥爭理論在十年「淡化」之後，八九民運中突然又變得好使起來。一位在八九民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青年幫」成員（見本書正文第二章第二節），筆者的朋友，也曾與本人大談革命暢想之後，鄭重其事地宣布：我們就是要「革」你老頭子這種人的「命」。一份署名「全國工農羣衆聯合行動指揮部」題為《看準目標，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國工農羣衆南征北戰的輝煌成果》的傳單說：要「牢記階級恨，莫忘血淚仇」，中國農民兩千年來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現在要反抗無產階級專政下滋生的紅色資產階級和官僚階級^⑥。

讀一讀鄭義的書信體傳記文學《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八九民運對於文革這一主題的繼承性。作為文革前的一位地位受歧視者，文革初期的受迫受害者，以後的造反派，他以「人權」的名義聲張了那種「造反」的合理性；繼而解釋了作為八九民運的重要「黑手」，他的思維與文革造反依據的一脈相承性。他的「反特權階級」的靈魂，代表著在八九民運中構成左翼激進主義呼聲的全部「理性」。由他擔任主要起草人的《五一六聲明》，可稱之為這種意識的集中體現（見本

書正文第六章第三節）。

但是，八九民運絕不是八〇年代再版的文革。它的一個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造反運動的顯著特徵，就是大多數參加者所持有的對法制與秩序的要求。這一首先由第一階段學生運動表現出來，並貫穿運動始終的特點，曾帶給知識界人士極大的感動（見本書正文第六章第三節）。後來與陳子明一道被判處十三年徒刑的王軍濤，在四月下旬與本人的一次見面中也談到：「過去的學運是北大挑頭，口號是自由、民主、人權；這次的運動以法大為核心，口號是法制。過去那種口號，政府很容易接過去，他們給你擺歷史，劃階段，然後是闡明『代議制』的合理性，把抽象變成具體；而這一次講法制就要與憲法對條文，回答不了的問題就要有承諾。」「這次運動使我對前段大眾文化有了新的評價，一是它對於人的個體的自我覺醒的意義，從非理性中看出理性；使人變得無畏，無宿命感，認識命運就在自己手中。他們不能再指望別人。那些自稱有歷史責任感，被青年們視為精神領袖的人，在這個時候爲了忙出國，差一點寫了悔過書。二是在一片悲觀失望之後，人的心靈得到了淨化。自我犧牲、崇高、廉潔的東西，仍然能得到人們的尊重。」的確，青年學生雖然提不出更多的理論、方案，卻爲這次運動樹立了一個不可動搖的精神主體。他們所倡導和努力加以實踐的「和平、民主、法制」原則，得到了除政府中少數人外的全社會普遍的尊重。

沒有什麼理由懷疑八九民運是一場羣衆自發的平等要求，與學生和知識階層的民主追求相結合，而共同參與發動的運動；沒有什麼理由把一場有著社會心理廣泛基礎的運動，歸結於「極少數極少數人」惡意煽動和陰謀策劃的結果；也沒有什麼理由把同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知識階層與學生羣衆的合法權利區別看待。如果不是深懷階級偏見和本能地對知識階層懷有仇恨心理的話，至少應該承認，黨的領袖、普通黨員、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工人農民、待業青年，一切擁有這個國

家的公民權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遺憾的是，在八九民運中，我們屢屢聽到政府官員與共產黨的領導們，站在全體公民為之築起的講壇上，對學生和知識分子進行離間，對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進行離間，甚至毫無自責、毫無愧色地把地位低微、生計無靠但絕對擁有公民權利的北京市民中的一部分稱為「社會渣滓」。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一些民運領袖為了博得人權輿論的同情，也把那些與自己一樣參與了推動民主運動的有責任能力的公民稱為「孩子」。假如真是那樣，他們，就需要別人替他們負責任。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識界內部，在八九民運問題上，也有人以難以置信的歧視對待自己曾經混迹其中的同類。請看「六四鎮壓」後大清洗期間何新給某中央機關刊物的上書云：「至今仍有人把一九八九事件看作『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殊不知這純粹是欺世之論。在我看來，八九動亂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學生追求民主的運動……在這個事件中，天真無辜的青年學生早已成為被國內外複雜政治力量，無情加以利用的可憐政治工具。」他接著說：「這場運動的政治目標，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體的（見諸其標語口號）。其第一步目標是顛覆以李鵬為首的國務院。更深一步的目標，則是顛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整個政治領導體制（即所謂『結束垂簾聽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從政治的直接目標看，八九事件實際是一次未遂政變運動。」他還說：「事態進程表明，他們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敗，唯一真正的目標就是權力。他們需要讓形勢進一步亂下去，直到他們最終接管權力。」「這場運動的後期目標，是掀起兵變和全面內戰。而一旦這種局勢形成，屆時外部勢力即將大規模而公開地插手，從而徹底推翻現制度。」他急切地提醒李鵬政府說：「對於一九八九事件，我們必須注意這一事件的這種非自發性，這有助於揭露和認識其真正的性質。」「一九八

九事件，在極大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後的策劃者所導演的，是被種種謠言和蠱惑煽動起來的……這是一部超大型的現代化妝、居心險惡的醜劇，而絕不是什麼悲壯史詩。它那濃重的陰謀色彩，使學生的純真、民衆的輕信，顯得更加輕率荒誕。這個事件乃是對歷史和人類的一次大愚弄。」「翻案必將引發動亂。」「遺憾的是，至今（一九九一年——引者註）尚未全面揭露這場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質，因此，這一事件的虛假道義形象依然存在。這實際是一個隱患。只要這一隱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而導致新動亂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對此當有清醒的認識並保持高度警覺。」

誠然，八九民運不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或「史詩」性事件，不應是以當事人的判斷為標準的；甚至當代人所作出的結論，也難免有歷史的局限性。當二十世紀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側畔千帆過」的風發意氣，宣布「洋務」與「改良」作為政治路線的最終破產時，他們不會想到，當革命高潮過去之後，在社會河牀底部滾滾湧動而推進歷史的，正是那些點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勢力在起作用。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暴民叛亂」或是人類進步的樞紐，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決於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決於丹東、羅伯斯比爾等人的行為是否純正，它取決於歷史的走向！取決於人類作為總體的價值追求！而當人類的這種追求目標發生轉換，人們將對一切價值進行重估時，他們也不妨對自己昔日膜拜的偶像棄之如糞土。所以，對於八九民運的評價，是一件人類的事情，是一個關乎人類總體的價值追求的問題，是歷史的事情。它與那些蠅營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憐私利毫不相干。

在何新的立論中，「權力」，似乎是一個類似試金石式的東西。他的邏輯彷彿是，為民主、反

腐敗，就不應該有權力訴求；以權力為目標的運動就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為了引起李鵬等人的注意，這個「著名文字學家」一再使用了「顛覆」這個詞彙。顛覆者，權力也。這種做法，正好不打好招地道明，「權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鵬等人的一個實在的字眼。不管民運是否以奪取權力為目標，反正當權者把權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這一點恐怕要因為何新的這一強調，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麼，人們自然會反問：既然權力如此骯髒，以維護權力為目標的政治行為又有什麼正義可言呢？也許是顧及到讀者並不愚鈍，他注意在現「政權」前面冠以了「合法」的定語。但這位「著名歷史學家」恰好忘記，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恰恰在於它的人民的擁護。人民的革命，是當今世界一切憲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機器，並不需要「依法」行事，就猶如上帝永遠無需加入教會一樣。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本人同意「八九民運是一場人民革命」的觀點。如果尊重事實，就應該看到它的參加者既沒有要發動一場革命的意識，也沒有奪取權力的跡象。對此，這「學運——民運」的學生領袖王丹，有一個清楚並符合客觀實際的表述。他說：

從根本上講，我們這些組織者和發起者在內心中是將這次運動當成一種政治表達的，當然不會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則和「理性、和平」的口號一直作為我們的一項基本原則，為我們所反覆申明。一旦事態惡化，我們面對赤裸裸的暴力，首先在心理上就感到無法也無力接受……六月三日在北京街頭有不少槍枝彈藥流入民間，「高自聯」如果真的「陰謀暴亂」的話，為什麼非但沒有號召把武器集中，組成一支專門的武裝力量，反而通知各個路

口的學生將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機關呢？」「民主化的最終目的也不是爲了得到政權，而是爲全國確立一個健全的政治運行機制以及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環境。

作爲學生，我們始終沒有認爲自己在從事一場政治運動，而只是簡單地認爲自己投入的僅僅是學生運動，學運的目的就是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代表人民提出問題與答案，要求政府接受。因此，在整個運動中，即使是激進的學生也從來沒有考慮過採用一般政治鬥爭的通用策略，比如聯繫上層權力鬥爭，發動下層民衆，與投入運動的其它政治力量結成同盟。

當學運發展成爲全民民主運動之後，……知識界總認爲目前進行的主要還是學生運動，爲了保證學運的『純潔性』，應該由學生起主要的領導作用，他們只起諮詢、參謀作用^①。

顯然，在十年改革創造的社會精神文化環境下，透過進一步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完全有條件走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八九民運，恰好是人民以非常方式表達這一願望，表達自己的急切心理與擔憂，期望親手參加這一變革的集體行動。而拒絕人民的這一要求，漠視人民的這一願望，對人民的合法合理要求以暴力進行回答，恰好是導致矛盾向敵對化——即改良向所謂的「革命」轉變的導火線。因此，要回到真正的改革軌道，要給人民新的信心，不僅如鄧小平所說，要有新的領導羣體有新的面貌，政治家無可迴避的一個課題，就是對八九民運進行重新解釋。

四／鮮血與糞污

王珞、楊小凱曾經爲八九民運爲何沒有產生自己衆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尋找原因。他們說，這與中國知識分子認同於「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國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成果得不到累積，無從產生像華勒沙、哈維爾、曼德拉、金大中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領袖人物有關^⑧。

本人以爲，八九民運沒有產生自己的領袖是真，但中國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見運動」，這仍然是一個值得疑問的問題。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四十年中，除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煽動的「大鳴大放」中出現過「體制外選擇」（即制度和國家選擇）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運在內的其餘羣衆性運動，提出的大都是「體制內選擇」的要求（即政策、領導人、黨派、政府的選擇）。這一方面與中共「一元化」領導下，「二元經濟」使現代社會各階層得不到充分發育，社會政治制度使得各種社會利益集團長期以來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政治生活、自己的輿論工具和經濟實體有關；另一方面，中國政治社會中的所謂「體外精英」，雖經過十年改革寬鬆環境中的成長，到一九八九年爲止，仍然是一個混合體——主要是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意見不同而被排出體外的共產黨人和「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羣體組成。他們之中，或許有些人身具華勒沙、哈維爾、曼德拉、金大中的素質，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忍尼辛、沙卡洛夫，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更傾向於作戈巴契夫。一九八八年，本人在《地下的熱泉——〈過渡文化的十年〉選章之二》中曾判斷，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懷著「第二種忠誠」但被誤解的，布爾什維克的「屈原」和「岳飛」。其實，一年以後，因胡耀邦「含冤去

世」而引發的這種壓抑和不滿的爆發，雖然從客觀上講，有助於推動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從主觀上說，卻是一種「失散了的自由電子」渴望回歸「原子家族」的運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學者座談時局（詳見本書附錄）時，劉再復的一段話曾贏得滿場笑聲和掌聲。劉再復說：「我們黨四十年來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自我批評的時候還可以，但不允許別人的批評。比如大躍進，過熱，我們自己說說行，但彭德懷站出來批評就不行，知識分子站出來批評就不行。這樣我們黨就只有一個正反饋的機制，而缺乏一種負反饋的機制……由於我們不習慣於負反饋，我們就不斷地把批評當作異端，就會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這幾年，我們連續對政治界、文化界、理論界一些同志的處理，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最後連總書記也蒙受冤屈（眾笑，鼓掌）。個人受冤屈，不能視為小問題，不僅是對人的尊重問題。另一個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見的渠道。」很難說參與鼓掌的人中没有比華勒沙、哈維爾、曼德拉、金大中更適合當領袖的人物，但很明顯，他們並不認同於「持不同政見運動」，哪怕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政治社會中的這種「戈巴契夫夢」，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來得更長更久！

也許，事情從一九八六年的方勵之開始有了變化。但他最終托庇於美國大使館的行爲，說明他没有曼德拉等人的勇氣。一九八九年李鵬政府的一紙「戒嚴令」，也許把更多人推上了一條不能回頭之路。但從此開始，華勒沙、哈維爾、曼德拉、金大中等人的成長過程，如果他們不改變路向的話，不能不說將是漫長的。

任何一場羣衆運動，哪怕是肯定會以正面形象彪炳於史的革命運動，它本身的情況與它遠播的名聲，總是不相稱的。義大利著名女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的一個判斷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

說：

所有的旗幟，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都沾有鮮血和糞便。當你瞻仰陳列在博物館和教堂裡的光榮旗幟時——在理想和希望的名義下，人們像崇敬珍寶那樣跪拜在它們面前——你不要產生錯覺，因為那些褐色的斑點不是銹斑，而是血跡和糞污，糞污還往往多於血跡。失敗者的糞污，勝利者的糞污，好人的糞污，壞人的糞污，英雄的糞污，帶著鮮血的普通人的糞污。哪裡有鮮血，哪裡就有糞便。前者需要後者……如果鮮血超過了糞便，人們就唱起頌歌，豎起墓碑；如果糞便超過了鮮血，人們就高喊恥辱，並舉行贖罪罪禮。^⑨

八九民運也不例外，它的旗幟上鮮血與糞便同在。有目的的糞便、手段的糞便，學生的糞便、知識分子的糞便、北京人的糞便、外地人的糞便，甚至鮮血背後也有糞便。對此，我們只能感嘆上帝的仁慈——它總是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提供同樣的機會；但我們也感嘆上帝的吝嗇——它總是不使人滿足，給人類一個完美。對於一部史書來說，辨別鮮血與糞便的大致比例義不容辭，但它不可能像文學一樣，肩負起在人類精神一切領域中道德法警與審美教師的責任。史書，只給這種審視提供一個大致的背景，為它的判斷免於狹隘和獨斷，拓展一片環顧的空間。

在八九民運爆發七週年之際，向讀者獻上這本《八九民運史》，我的本意，並不是要在政府尚未替民運平反，尚不允許在國內出版對這個主題作正面論述的書籍的情況下，充當所謂八九民運的代

言人。我也並不認為此時是重新議論這件給中國人民留下巨大感情創傷事件的最適宜時機。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將對人民生命帶來重大變化的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需要穩定。在這種時刻，人民的感情將是敏感而脆弱的。作爲一個受這個民族養育，深深熱愛它的人民的知識分子，決不希望陷同胞於水火。同時，從技術上來說，在大量當事人滯留海外或處於有形無形的監禁，公開調查或徵詢意見則乾脆有半途夭折的危險的情況下，本書所敘述的事件難免有極大的局限性。本書之所以最終決定於此時推出，正如本文開頭提到的，是我感到了生命的有限；其次，是考慮發行人的利益，「七週年」這個時間似乎變成了我的最後期限；第三，正如我相信人人都有著史的權利，一個史事不妨有上上百部史書一樣，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將爲後來的有識者提供一種框架性基礎。歷史是螺旋型上升的，總有一天，政府和這場民運的參加者，都將站在一個新的高度、新的起點上，來重新審視他們的過去，他們「合作失敗」的傑作，並引以爲戒。由於歷史所呈現的加速度發展趨勢，我相信這一天的到來已經爲期不遠。而它進入史書與科研領域的時間越早，它成爲「過去式」的時刻就越快到來。我最後的自信還在於，真正的強者，面對歷史不需要自欺欺人；而對於真正的智者來說，成功和失敗，都是他們的老師。

在八九民運中，我並非一個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時至今日，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檔案裡，仍存放著我在這一事件中的「四大罪名」：其一是在嚴家其起草的《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見正文第四章第二節）上簽名。我本於新聞工作者良心要求（而非同意嚴家其、戴晴的發言）所作的這一舉動，因江澤民後來成爲中共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而被認爲是「性質嚴重」的事情。其二是列名發起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籌委會。其三是戒嚴令頒布後，參與起草致人民解放軍

士兵的一封信。（其實兩年後我找出那封信看時，才發現自己「認賬」太輕率，當時參與起草的只是一封動員市民「掀起一場感化士兵運動」的信而已，其中無非講了一些「人民軍隊愛人民」的道理。）其四，則是參加過兩次遊行。

另外，還有一條使我被置於重要監控對象的原因，就是曾作為記者的我，從八〇年代中期起，就開始關注那些新聞禁止報導的人物與團體，與他們不得不處於「地下」的活動，並與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朋友。在我的眼中，他們純粹是一些被毛澤東傳奇和民主化理想驅動的報國無門的有志青年。令我意外的是，這些人物和團體在後來的八九民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了叱咤風雲的人物，並成為海外同行和國內公安、安全部門追逐的對象。這些選擇和經歷，自然決定了我的政治命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我對此並無絲毫遺憾。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或許還會重複這條道路。但遺憾的是，我在領受黨對我生平的第一個「處分」之時，自己的內心竟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覺。我於是理解，什麼叫「第二種忠誠」。

寫作此書時，第二個遺憾接踵而來：那就是由於以上原因，我無法真正地保持蘭克學派要求的「置身事外」的態度。我的「第二種忠誠」與我對自己參與或同情的運動的辯護，每每交替出現，常常自覺有進退失據之感。向讀者交代這一點，或許可以發揮某種「免疫」的作用。

本書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動筆以來，歷時半年，終於一九九四年三月脫稿。這一寫作過程，使我深刻地體會到寫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史著之不易：有時，大量的材料會勾起你那沸騰的回憶，尚未沉澱的激情會使你失去史家應有的「冷眼」；有時，理性的、有歷史感的思考，會使你看不見事物在人們精神——現實可見的將來的潛在能動因素——方面的意義。例如，當我嘗試以批判的態度來看

待八九民運時，我們在感嘆它的激進主義色彩所帶來的歷史的循環和歷史的倒退時，我們可能正好忽視了每一個個人，每一個時代的具體的權利主體，他們有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權利；我以本能的超現實的「潔癖」譏評政治家或精英的手腕、機謀時，我發現自己實際上在引導讀者陷入理想政治的泥沼；而當我想給人們一種高尚正直而又全面現實的標準之時，我正好在重複「愚民政治」的慣用伎倆……陷阱幾乎無處不在！

最後，我發現，如果我不能戰勝自己的懷疑主義，那麼，我便永遠不能前進一步！為什麼要告訴人們什麼呢？你說出你知道的，你想的，這就夠了！而意理，永遠是與個性同在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歷史，確如一條混濁的河流，畫家能畫其勢，音樂家能鳴其心音，而只有在科學家的實驗室裡，才會被分離為各種成份的液體。顯然，液體已不是河流，因為它已經離開了河牀，離開了跳宕的走勢，離開了澎湃的喧響。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不能不囑告真誠的讀者：我期待您的理解，但不奢望您的接受。

註釋

- ①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創立的學派。該學派主張治史不帶成見，持純客觀態度。
- ② 見《京都血火》，第三四六頁。農村讀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 ③ 載《經濟學周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十一日，《新華文摘》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轉載。
- ④ 即十年改革中共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是改革開放，一是堅持四項

基本原則。

⑤指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爲的人。這是八〇年代中共爲解決接班人問題，提出「第三梯隊」戰略時，同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其實質是決不與文革中的造反派分享政權。

⑥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八十頁。

⑦見王丹《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和歷史意義》、《永遠不要忘記——紀念「六四」五週年》。載一九九四年四月《華盛頓郵報》。

⑧見《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秋季號。

⑨〔義〕奧里亞娜·法拉奇《人》，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一章 殞落，又一顆星！

四月十五日晚

有幾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為一個沉默了兩年多

終於走向最後沉默的人送行……

——某詩人

時間，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均勻分布的，或許它也有節奏，在心跳，在呼吸，但只要地球不毀滅，當今的宇宙秩序不改變，它就會均勻地存在著。人類的個體，出生與死亡，對於地球和時間來說，不過是一次呼吸和心跳吧！

但人類社會歷史的時間，卻不是均勻分布的。有時，人們在一年中所實現的進步，可能超過他們過去的一千年；有時，他們在一天裡遭逢的變故，可能使他們倒退幾萬年。所以，在這裡，時間的單位價值，絕不是相等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對於中國來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平常的日子。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了。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天從地球上消失了肉體的這個人，並不是如同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甚至孫中山、毛澤東式的政治巨人；也不是如同耶穌和教皇那樣的，精神王國裡的過去救主與現世領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來也可以是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平常的日子。但是，由於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內累積的矛盾、危機，以及這種矛盾危機的交叉，使千百萬人的目光集中到這個日子。就像太陽光通過顯微鏡觀察含碳物體一樣，這一天終於燃燒了！

一個共產黨前總書記的逝世，居然成了這個黨領導下的共和國有史以來罕見的，人民運動和政府鎮壓運動的起點，這難道不有點奇怪嗎？要解剖這場運動和這次鎮壓，不能不從這位死者說起

……

第一節 紅玫瑰：從盛開到飄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出身於湖南瀏陽農村一個殷實家庭。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揭竿而起，發動著名的秋收起義時，他還是一個小學生，據瀏陽文家市認識胡耀邦的老人回憶，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將攻打長沙的農民軍拉上井崗山前，在文家市里仁學堂的操場集會時，作為兒童團員的胡耀邦與他的好友楊勇，趴在學堂的矮牆上目睹了集會的全部過程。一九二九年，他在地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兩年以後，十五歲的他，便滿懷少年壯志，走上了他心中崇敬的革命前輩走過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胡耀邦來到中共中央蘇區所在地瑞金。據稱，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某通訊部隊的號手^①。不管他獲得這個職位是否出於偶然，但它卻預示了這個少年人今後的道路和角色。不久，在這個已具後來的共和國雛形^②的小政府之下，他開始負責青年工作，擔任中央蘇區反帝總同盟青年部長，以後又轉任該同盟的宣傳部長。一九三三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秘書長。年末，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他跟隨中央參加了中共黨史上以艱苦和漫長而著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出發，到達陝西吳起鎮的七千個倖存者之一。在著名的婁山關戰役中，他曾身負重傷。長征結束後，他又參加了進軍山西的「東征」，擔任石樓縣工作組組長。其發動羣衆，徵兵、徵糧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並被指名作報告^③。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對共青團中央重新任命時，胡耀邦仍為中央局成員，並先後擔任祕書長、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一九三七年，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次年，被任命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隊政治委員。一九三八年，胡耀邦又以開展中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④而聞名延安。一九三九年，在毛澤東親自提名下，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一九四五年四月，胡耀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擔任過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和第三縱隊政治委員，任華北人民軍第一兵團（後又改為直屬中央軍委的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參加過保衛張家口、解放石家莊、太原和寶雞的戰役。此後，與進軍西南的第二野戰軍匯合進入四川，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兼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他與鄧小平的工作關係，始於這個時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五六年，當選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在一九五七年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及一九六四年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均當選為第一書記，並一直持續到文革。一九六五年還同時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胡耀邦均被山東選區選為代表，並被第二屆人大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時作為四川代表參加大會，繼續被選作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團中央擔任領導期間，是他親自發動了席捲全國的「學習雷鋒運動」^⑤。

這些經歷表明，胡耀邦在革命陣營中，是屬於那種經受過長期考驗，有著特殊資歷和專門經驗的黨員，即使在他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之前，也是為領袖們信賴和依靠的基本骨幹。在延安整風直

至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得以免遭整肅，也沒有出現政治上的波折。尤其是在「反右」運動——這個置五十五萬名知識分子於受迫害地位，而胡耀邦也曾嚴重捲入的運動中，得以脫身，這不能不意味著，不管他的個性傾向和工作作風有多少特殊性，在黨的這架龐大而殘酷的機器中，他始終是一個忠實而得力的部件。中國共產黨為共青團規定的性質和團章均表明，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備軍和有力助手。團的書記，如果不發生重大的歷史轉折，自然也就是黨的中央領導接班人。

但是，由於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代領導人經過精心安排的政治結構中的接班人，不少在那場風暴中熄滅了生命。胡耀邦能夠倖免於難，除了他為人誠懇、正直、開明、樹敵不多、年輕等原因外，也純粹可以看作是一個偶然。

文革後，胡耀邦的復出始見於參加一個追悼會的領導人名單。這個名單表明，他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的身分仍然有效。一九七五年，他正式工作擔任的職務，是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黨組成員、副院長。在鄧小平組織的對文革第一個撥亂反正的高潮期間，他主持起草了題為《關於科學技術的若干問題》的報告，並與鄧小平一道，第二次被打倒。胡耀邦在此一階段的工作表明，他已經開始成爲一個對過去路線有獨立思考，並決心扭轉黨的錯誤的政治家。在公開的言論中，他曾反對毛澤東倡導的科研與勞動生產的緊密結合，反對時髦的開門辦學，反對空談政治以及對知識分子無休止的「階級鬥爭」。在這個過程中，與「文革下台派」達成的政治共識和果敢的言行，爲胡耀邦日後的政治命運鋪平了軌道。

胡耀邦從政治上進入中國歷史，是在毛澤東時代之後。

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十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後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進入政治局，並兼任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宣部長。一九八〇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與他後來的搭檔趙紫陽一同進入政治局常委，並在新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中任總書記。在次年六月召開的六中全會上，取代華國鋒，擔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黨的十二大廢除了主席制，採用總書記制，胡耀邦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

在這些年月裡，胡耀邦的足跡從工廠、農村到學校，遍布中國大地。就像文革中對毛澤東表示崇敬的一首歌詞中所唱的：「到處都有你的聲音，到處都有你的光輝，你的思想哺育我們……」就連達賴喇嘛也為之所動^⑥。

在趙紫陽代表黨中央為胡耀邦所作的悼詞中，對於胡耀邦這段時間的貢獻是這樣評價的：

「……十一年來，他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的結合。他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他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

「——他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

批受到迫害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羣衆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他重視調動八億農民的積極性，主持制定和執行了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推動了我國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

「——他重視調動我國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參與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推動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他爲擴大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黨的科學工作、教育工作、文藝工作和新聞工作。他在關於當代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講話中，滿腔熱情地鼓勵他們到基層去……」

在這篇悼詞中，趙紫陽稱胡耀邦爲「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胡耀邦同志作爲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他始終如一地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心耿耿，嘔心瀝血，艱苦奮鬥，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對於我們的黨和人民，對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外電稱，胡耀邦「在七〇年代末幫助鄧小平獲得權力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是在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問題的時候，所需要的那種精力充沛的人。」「他是「鄧提出經濟改革後，最直言不諱的擁護者之一」，他的「主要政績之一，是在十年動亂後協助鄧重建中國共產黨」。

然而，就像一朵盛開的玫瑰突然離開了枝頭^⑦，就在死者接到這番讚譽的兩年前，胡耀邦一夜

之間突然從他的政治頂峯飄落了。而且程序並不複雜，政治局只開了一次民主生活會，胡耀邦便遂人心願地提出了辭職。

如此輝煌的業績，如此悲劇化的下場！用《紐約時報》記者克利斯托弗的話來說，胡耀邦「那不尋常的政治生涯，由於其不尋常的結局而罩上了一層陰影。」但問題在於，這兩個「不尋常」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

顯然從這些悼詞中，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理解這是怎樣發生的。就像從報紙和黨的公告上，你無從真正了解中國政治一樣，在中國的政治辭典中，「當選」並非真正產生於投票結果，政治領導的辭職從來沒有過「自願」的事情，黨對一個黨員的悼詞，也並不完全反映黨對他的看法。在前者，他是黨的一個工具，他的「升空」，除了他個人的優越條件外，背後，是那個根據本國政治定理而組建的龐大的官僚機器的槓桿——一隻力大無邊、絕無情面的看不見的手，在托舉他；在後者，同樣是這隻力大無邊、絕無情面的看不見的手，在拋棄他。在這種情況下，渺小的個人意願皈依於政治生活的固有磁場，猶如自由落體之服從於地心引力，選擇只能是唯一的。

第二節 評價問題，弦外有音

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的政治生命結束於他去世的前兩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但是，在這個月份裡，甚至在這一年裡，並沒有出現黨的分裂，更沒有爆發抗議性的羣衆鬥爭。而胡耀邦的逝世，卻使他的政治命運突然從他平淡的隱退中凸顯出來。這其中的事端之一，就是在對胡

耀邦的評價問題上出了毛病：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中，沒有出現「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稱譽。訃告稱胡耀邦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按照中共的規矩，「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稱號，是屬於去世的黨的領袖的。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均獲得了這個稱號。據傳，在關於胡耀邦治喪工作的一個彙報會上，談到評價問題時，鄧小平說：我們在座的人當中，也沒有有一個稱得起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據此認為，鄧小平要把這個「最高級」稱號留給自己。為什麼「在座的」沒有稱得起的，不在座的就不能稱呢？

一個人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是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本來是無關緊要的。馬克思者，十九世紀德國學者，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也！然而，在一個共產國家，馬克思已不是學者馬克思，甚至也不是導師馬克思、領袖馬克思，而是聖人馬克思、教主馬克思、上帝馬克思。被否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一個信仰馬克思的人來說，無異於被革出教門，必然深懷被上帝遺棄之痛苦；而爭取這一名譽，不亞於爭得生命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陣營中爭奪「正統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地位的鬥爭，其激烈程度往往不次於宗教的「聖戰」之原因。從胡本身的情況來看，他只是在延安抗大時期才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常識，而且是從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開始啓蒙的。儘管他文革後拋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想，在被迫退休期間，他有閒暇博覽羣書，但他思維的特點和興趣，顯然不在邏輯嚴密的理論問題，而是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現實問題。他具有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一貫作風，是一切科學所必然要遵循的原則，

也是有作爲的政治家不可須臾偏離的準則；他在哲學上合二而一的色彩^⑥，掌權期間淡化了無產階級專政及鬥爭哲學，創造了中共歷史上少有的令人身心舒暢的局面；他天生具備的人道主義傾向和古代賢相親民下士的作風，在位期間使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雖然是有限的）程度。等等這些，馬克思或馬克思式的聖賢或許也具有，但與馬克思主義卻沒有什麼相關。正如胡逝世時外電所評論的，「胡在中國離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胡耀邦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對於自己的黨的忠實，絲毫沒有妨礙他思想的活躍和對事實、對人民選擇的尊重。如果胡耀邦在世，預知有人會在其身後爲他打一場「馬屬」問題上的聖戰，或許會學魯迅先生一樣，說：與其坐在金碧輝煌的殿堂裡啃馬克思的墓碑，不如到野外去，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痛則大哭吧！

當歷史已經進入到八〇年代，逐漸從過去階級鬥爭造成的意識型態迷信中甦醒的中國人，也不會因爲自己的領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妨礙對他的尊敬。但是胡耀邦的追隨者，特別是理論工作者中，有許多人對於這種「正統」位勢的確比胡耀邦看得更重。在他們的理解中，這個「是」與「不是」，不是一個「真」「假」問題，而是一個「善」「惡」「美」「醜」問題，「是」「非」問題。他們更理解這種位勢的涵義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在聽說鄧小平關於「評價問題」發話之後，胡派重要的改革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便公開撰文，稱胡耀邦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⑦；在四月二十日中國科協舉辦的「紀念五四」座談會上，中國科協常委、中宣部副部長龔育之，也發言稱胡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人民日報》四月二十一日頭版的報導中，用副標題加以冠明。作爲胡耀邦主政時期，新聞戰線上的一名幹將，

與胡耀邦並稱為「五胡」之一^⑩的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兼社長胡績偉，也同時撰寫了以《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胡耀邦》為副題的文章。對此「作為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第一級『火箭』的經濟學家」，胡耀邦的私人朋友于光遠直言不諱地說：「這（指是否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本來是沒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觀存在。黎澍去世的時候^⑪很反對表現八寶山靈堂裡面的等級主義，但它是存在著的。」^⑫

這種「存在著的」等級主義意味著一種秩序。在正常情況下，它是集團中人用自己的經驗、才華、貢獻、自我犧牲換來的一種有價證券，持有者據此來展示社會對他的承認程度，並由此而獲得對相應社會資源或相應的活動空間的支配權與使用權。但人死之後，這種等級對他個人的意義則不存在了。而對它的承認的意義，也就更多地表現在對他的事業的表彰與承認上。而這一切，對於他的同志與親屬，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類似的事例，我們還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為劉少奇平反的問題上。從法理上說，劉在政治上的去留，與中國人民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在中國，國家主席不是大選的產物。所以，文革中的劉少奇並不像「九一八事變」中的葉爾欽，他的權力發生的動搖或竊奪，不會引起人民為保衛「自己的權利」而進行反抗。一九六七年一月，劉少奇向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請為延河邊上一稼農^⑬的做法正好證明，他的權力來自於黨，由黨收回，也是沒有什麼疑問的。而且，由於文革中由黨控制的社會輿論對劉的大量醜化宣傳，使得本來就生活在政治透明度極低情況下的人民，對劉根本談不上什麼好感，在這種情況下，是否為劉平反，對於他們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但作為一派政治勢力的代表，劉少奇退出歷史舞台，意味著整整一派人的退出歷史舞台。故劉的政治名譽，也就是其

所有政治追隨者的政治生命。一九八〇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重新做出為劉平反的決議，其意義決不止於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而在於解放大批的「文革下台派」，為鄧小平時代提供政治基礎，為在組織陣容上壓倒文革中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而無處不在的「陌生面孔」，同時，也為劉少奇路線在新時期的推行廓清道路。

而對於胡耀邦的評價問題，在一九八九年，正好關係到由他代表的改革路線的存廢，關係到改革派政治力量的沉浮的問題。因為，在衆人心目中，是胡耀邦——而不是親自發起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在新時期繼續推行毛澤東「整人路線」的鄧小平——更配稱為中國改革派的代表。「改革」這個名詞，在八〇年代，也同「馬克思主義」這個稱號一樣，早已超出它原有的內容，成爲了一種融合道德理想於一體的準宗教。

從大的歷史範疇來說，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八〇年代，是可以稱作「鄧小平時代」的。但是，從中共黨內力量格局的配置來看，鄧小平居於「保守派」與「改革派」之中。在他的左面，有以陳雲、王震、鄧力羣為政治與精神的核心，行繼承之功能；在他的右面，有萬里、胡耀邦、趙紫陽為行動的代表，主發展之事業^⑭。鄧小平之所以能獲得實際上的最高權力，與毛澤東透過強力「一邊倒」的方式不同，他是透過兩派之間的平衡來實現的。正如同文革後人們慣於把一切好事歸於劉少奇，把一切錯誤歸於毛澤東一樣，改革時代的人民，把一切獲益和災難也統統歸之於鄧小平。而所謂改革派代表的稱號，人們也更願意送給胡耀邦、趙紫陽，而不是鄧小平。

這種政治的格局，是毛澤東以後的七〇年代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按照政治生態原理^⑮，毛以後領導人的個人威信均無法達到其前代的水平。要彌補這個缺陷，繼續保持黨的核心凝聚力，

後者政治權力的來源必須有幾個方面的保證：(1)與毛相同或相當的政治經歷所奠定的在黨內、國內的威望。這是一種獲得性權力，但是從性質上看，卻是一種舊時代的權力。(2)由於毛澤東的認可所奠定的組織者的地位。這是一種繼承性權力，從性質上說，也是舊時代的權力。(3)比毛澤東更高明，更符合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的新型權威。這是一種獲得性權力，也是屬於新時代的權力。

——三項綜合，接班人必須是集獲得性權力與繼承性權力於一體，熔舊時代與新時期於一爐的代表人物，既有本質的體現，又有處變的能力。

從第一項看，優勢顯然不屬於「文革上台派」的四人幫和華國鋒，而在屬於「文革下台派」的鄧小平、陳雲。前者既無深遠雄厚的資歷，也無經邦治國的政績。在富有正統觀念的中國，他們為一時之「僭主」可，為長久之統治難。而在與文革「上台派」沒有聯繫的人中間，政治資歷較淺的胡、趙顯然也不能單獨成為四人幫與華派勢力的對手，他們的背後，還需要老人「掌舵」。

從第二項看，毛澤東生前對四人幫的批評——四人幫為之深惡痛絕的「小道消息」，最終把他們送上了歷史的審判台；華國鋒拿得出手的，也只是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草書便條，和一個沒有具體內容的「按過去方針辦」的所謂「遺言」；而在過去漫長共事歷史中，毛澤東送給他的老夥計們的讚揚與詛咒雖然同樣的多，但是，只要「完整地、準確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它們就會變為一筆財富。因為，毛澤東畢竟也給鄧小平留下了「人才難得」、「柔中寓剛，綿裡藏針」的評價，和「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指示。對於這些政治遺產的利用，毛澤東在生前就已經有所預見：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文革走向高潮時，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就說，他斷定「右派」肯定會利用他的話「得勢於一時」，而左派也肯定會利用他的另一些話起來將右派「打倒」。可惜的是，毛澤

東的這個政治咒語，在十年過去以後，只應驗了一半，因為，正是他的這個警告提醒了鄧小平，使他決不能給「左派」這個機會：他決不當「短命的」赫魯雪夫^⑥。如果歷史需要，他將找另一個人來代替！

從第三項看，華國鋒等人炮製的「十年規劃綱要」具有明顯的，中國人既沒有嘗到甜頭又已經厭倦了的蘇式色彩。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口號，也不及在政治上、經濟上亟待翻身的實際利益來得更迫切，更符合羣衆心理。尤其是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原先那個生氣勃勃地把蔣介石政權趕到海島上去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近三十年不停頓的階級和路線鬥爭，政治威信流失殆盡，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留給後代經營運作的政治資源已薄如蟬翼。在這種條件下，如不改弦易轍，重登「大寶」，至多不過是落個替他的前代來接受歷史審判的命運。在這方面胡耀邦等人年輕的形象，銳意改革的決心，就比毛澤東的前朝「老臣」鄧小平，更加能喚起人們新的時代感，給人們信心與希望。同時，也給予希望擺脫成見、尋求國與國之間更實際利益關係的世界新的期盼。

——這一切，就是歷史選擇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左右兩翼平衡結構的原因。但歷史在給他這個格外的關照的同時，也爲他設定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從權力的合法性（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念，往往落後於他們對實際利益的覺悟，而具有傳統的頑固性）角度考慮，他要尋找自己與過去那個黨和領袖（哪怕是犯下罪行的前輩）的聯繫，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從政治社會基礎考慮，又要與受害者站在一邊，大舉平反冤、假、錯案，取消地富反壞身分，徹底否定文革，高唱改革開放的進行曲，並給百姓以真正的實惠。而這種兩難境地，不僅是中國的十年改革走過的「秧歌步」路線的謎底所在，也是胡耀邦悲劇命運的根源所在。

也正因為如此，在胡耀邦評價問題上的「等級」問題，才會使人們聯想到改革的去向與一派政治勢力的沉浮問題；並使胡耀邦的逝世，成為大規模社會不滿爆發的火山口。

在這一節裡，還有一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雖然胡耀邦是否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假問題，但胡耀邦確有一個思想體系的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如果胡耀邦不是一個「無主義者」或「帶有民粹傾向的現實主義者」的話，在諸多主義中，他與毛澤東主義是最接近的。胡耀邦與毛澤東一樣，都是極具浪漫主義政治氣質的人。在敢於「反潮流」方面，他們的勇氣不相上下，儘管他們反的是「對著幹」的兩股潮流；而在善於運用搞運動的形式發動羣衆方面，很難說是毛影響了他，還是他影響了毛。直到對毛的錯誤進行清算以後，胡耀邦仍然將過去那套作風用於搞改革開放，致使制度建設屢屢落後於羣衆的「突圍」實踐，自上而下的改革每每變成由下對上的推動。十年過去，那種「人治」社會「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規律仍未改變。這種狀況與毛澤東當年黨政不分，四處點火，使劉、鄧工作往往處於被動地位，不無相似之處。而認清這一點，對分辨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與作為總理的趙紫陽的矛盾分歧，確定在胡耀邦評價問題上「抗議派」的性質，以及「八九民運」初期政府與黨的觀望態度，尤其是趙紫陽的觀望態度，我想是不無益處的。

第二節 地火在尋找噴口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謠傳」開始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的哀樂傳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後，

社會輿論的第一個反應是感到意外：幾年前還經常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的胡耀邦，他那講演時不住揮動的手，給人民留下的印象是那樣的鮮明活潑，怎麼會頃刻之間就撒手人世而去呢？有消息傳來，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發作後，入院搶救無效去世的。但人們並不相信！在胡耀邦離職問題上為他一直抱屈的人們，寧願把這位「苦星」的犯病歸結為受到一場圍攻，他的去世肯定出於一場有預謀的「醫療事故」。因為當今醫藥科學的進步已經達到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步，它怎麼會對胡耀邦這樣一個年輕生命束手無策呢？特別是在此前聽到過「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輪的中央全會上復出，擔任中紀委職務」的謠傳者，更相信是有某種勢力在阻撓他的出山。這種謠傳還描繪了胡在下野兩年中如何走遍全國，大量搜集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內以權謀私、「官倒」等不正之風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間，他還與他的「宿敵」——鄧小平安排在左面對胡耀邦行制約功能，並在胡耀邦離職後同被「狡兔死，走狗烹」的——鄧力羣會談反腐敗問題，歷時數小時……到底是誰在謀害胡耀邦？誰有這個能力和權力？誰有利害相關？

來自民間的謠言，是政治懸念的產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開性，則是懸念得以累積和謠言得以流傳的基礎。但是，人們沒有證據，沒有能力去澄清事實，而嚴峻的現實又迫使他們不能再沉默。他們，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只能用他們的方式表達不滿和疑惑，給假想的敵人施以某種心理壓力。當一個人去世時，有誰能阻擋人們對死者的悼念呢？輓聯、悼文，在這時，是一種合情、合理、合法的宣傳品。

在胡耀邦去世後的兩天中，悼念基本上限於中央明令劃定的機關和單位內部。在知識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學生聚集的校園裡，已有自發的羣衆性悼念活動。據《中國青年報》四月十六日報導，在北

京及全國各地，廣大羣衆舉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儀式和活動，一些學校和單位裡，羣衆自發地爲胡耀邦設立了靈堂。北京高校學生和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

在北長安街會計司胡同二十五號——胡耀邦坐落在中南海一側的寓所裡，他的家人爲他設置了一個開放的「家庭靈堂」。這裡，迅速地成爲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與追隨者憑弔與寄託哀思的地方。

據當時的人們回憶，這個「小靈堂」的情況是這樣的：

「客廳改成的靈堂已撤去坐過無數各界朋友的沙發，此刻安放著一個小小的骨灰盒，上面覆蓋著鮮紅鮮紅的黨旗，骨灰還一息尚溫，一片低低的啜泣聲，沒有了往日耀邦叔叔和大家交談時那爽朗的笑聲。

「小小的家庭靈堂正中懸掛著耀邦叔叔的最後一張生活照：飽經憂患的面龐，背後是一片綠綠的、綠綠的冬青。

「十四天前的早晨，他離開家去參加政治局會議。臨走前還談笑風生，洗了一遍頭，穿上那套人們熟悉的咖啡色外套，精神飽滿地告別家人。幾分鐘後，他健步走入懷仁堂會議廳。

「他還沒有回來時，他的衣服已經回來了，就放在那張小牀上，那件舊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細條紋的舊襯衫，領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檯曆仍翻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①

「黑紗環繞著他的遺像，置於蒼松翠柏和君子蘭之間，更被層層疊疊的花圈輓聯花籃簇擁著，每一朵小花都是一隻淚眼，每一句悼詞都是發自內心的呼叫：耀邦同志，你去得太急了！……」

「幹部、工人、學生，一個接一個無言地走過這裡，只有輓聯上的字留下了他們的心聲：

「『一生正氣深得人民敬愛，

兩袖清風堪稱爲人楷模』；

『至大至剛』

『高山仰止拓荒總履險，

飄（漉）漿甘兮飲水長思源』。

「小屋裡，第一只花籃是王光美送來的。當她去花店選購時，店員們聽說這只花籃是爲了弔唁胡耀邦同志的，執意不肯收錢，說這花籃也代表了我們店人的心意。

「老部下張黎羣與耀邦同志的小兒子德華抱頭痛哭，噩耗傳來，他夜不能寐，伏案疾書：一盞多麼明亮的智慧卓絕之燈熄滅了！一顆多麼偉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動！一個多麼仁義正直的人民的兒子離去了！一位多麼忠貞的共產黨人停止了戰鬥！

「老紅軍賴大超拄著柺杖匆匆從廣州趕來……」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幹部來了……有的在靈堂裡嚎啕大哭，有的跪在遺像前悲痛欲絕，喊著：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平反哪！」

……

「十幾條雪白的哈達是中國藏族語系高級佛教學院的學生獻上的，幾個大學生將自己紮的小小的花圈奉獻在靈前；街坊鄰居老少幾代人聯袂前來弔唁。從山西趕來的種棉能手，八十歲的吳吉昌，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

「留言簿上還有許許多多動人的題詞：

「『說真話人民知音，辦實事一代偉人』；

『代表人民的領袖，真正的漢子』；

『民主先鋒』。」^⑬

在普遍壓抑的氣氛下，這個小小靈堂的存在，對那些抱有不平心理的人們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安慰、平衡與鬱悶的釋放作用。

在中共領導者中間，歷史上可稱為「人民的領袖」的，在七〇年代以前，只有毛澤東一人。但毛澤東最終在自己錯誤的累積下，逐漸失去過去由人民衷心贈與的這個稱號。而在此同時，「人民的領袖」一詞，也逐步賦予了「與人民同受苦難者」的涵義。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園的民族往往是偉大宗教的搖籃一樣，「人民的領袖」一詞，重音也從後面的「領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之上；「領袖」這時也由政治的首領轉變為精神的教主。在這方面，一九七六年在民族危機中去世的周恩來和一九八九年中國改革危機時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耶穌。

不過，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人民，幾乎是在他們的「領袖」離開時才發現他們的價值的。他們的英靈，藉助對亡者的追思與悼念的莊嚴氣氛飄離塵世，在高天張揚開去……雖然看不見，摸不

著，但每一個人透過感覺都知道，它聚合著一股能量。而且，這能量因政府為它限定的空間所造成的壓力，密度在不斷地加強。

學生的反應是最迅速的。四月十五日，中央電視台關於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剛播出十分鐘，北京大學的校園裡便貼出了大字報。其中有一幅對聯是「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七十未全，中華四十不興，看天下興亡，北大亦哀。」一份大字報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當晚，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的索鏈上出現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上的紙條上寫著「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個字。據目擊者說，當下就有人拿出對講機報告了這一消息，並問怎麼辦。大概是對方問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徵，報告者說：「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軍人。」據《北京日報》編輯的《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載，紀念碑前出現的第一個花圈，是署名顧保忠敬獻的。它的輓聯上寫著「真正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胡耀邦同志千古」。據官方統計，截至十六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華、北師大等二十所高校共出現標語、輓聯、大小字報三百多份。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有花圈六個、白花十五朵、條幅五個、黑紗一個。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照片。紀念碑上放置五個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同日，一份由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部分師生的《幾點建議》在各校貼出，內容包括：號召花圈、輓聯向天安門廣場集中；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責成政府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作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當天，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八十六級學生抬著製作的花圈遊行到廣場，並跨過圍繞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禁止

通行的索鏈，將花圈送上了紀念碑的基座。緊接著，北京航空學院動力系八十七級研究生製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廣場。法大花圈的白布輓帶上，蒼勁的墨跡寫著：

問歷史真正無私有幾人，耿耿丹心，錚錚鐵骨，人民之友人民懷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長空當笑，笑天下醜陋之人

大地當悲，悲地上英雄之傑

獻給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輓聯上寫著：

倡民主興科學精神不滅

哭導師憶先驅心隨魂走

還有一位署名「年輕的共產黨員」留下的貼在紀念碑上的字跡是：

新時代的開拓者

中國改革的旗幟

此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北京氣象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農業大學的師生都陸續來到廣場。其中北大送來的一條白練，上書「中國魂」三個大字；北京師範大學湘籍同學的輓聯，上書「三湘慟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氣，兩袖清風；耀邦千古」、「青年摯友，民主鬥士」；中央美術學院繪製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畫像，被安放在花園的最高處，旁邊配有黑底白字的醒目輓聯「何處招魂」；中央戲劇學院送上的，則是一幅「打鬼」鍾馗的臉譜畫……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中最早送花園到紀念碑的，有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等單位。

由此，原來封閉在校園和機關單位內的悼念活動終於衝出院牆校門。他們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為由，向北京市政府一九八六年反自由化運動期間訂立的禁止遊行集會的《十條》規定表示抗議，為那一年遭到鎮壓的學潮向北京市委示威報仇；並藉助遊行，把對胡耀邦的緬懷和繼續推進改革與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決心，展示於社會，最終還是要展示於黨。

就在首都北京學生開始悼念活動的同時，全國各大專院校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

四月十五日，率先走上農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學學生貼出了「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懷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橫幅。次日，貼出了「悼念您，激進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懷念您，學生運動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橫幅。中國科技大學及合肥工大也有類似的悼念活動。同日上午，位於中國近代第二都城的南京政治學院掛出了悼念的輓聯，寫有：「國威軍威再看西南，黨心民心向書記」；「敬愛的胡總書記，泰山是您的忠骨，長江是您的脈搏」等內容。四月十七日，南京大學哲學系八十八級研究生開始在校園募捐，籌辦悼念活動資金。

有一名同鄉校友的對聯曰：「革命六十載，心瘁膽摧，一心卒爲民主死；英名九萬里，內貞外達，曠世難逢天下才。」有大小字報也對社會政治問題展開了討論，如《論中國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學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說中國的「民主患了軟骨症」、「自由聾啞了」、「教育嚴重營養不良」、「科學成了棄兒」、「真理在牆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問「中國還有什麼？」上海復旦大學還貼出標語，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民主自由是興邦之本」。

與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上街遊行的同一天，四月十七日上午，天津南開大學一千學生也高唱《國際歌》、《國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專制」的口號走上了街頭。十八至十九兩日，湖南師範大學也貼出了「經濟體制改革走入死谷，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沒動」，「反獨裁，要民主」的大字報。桂北山區融水苗族自治縣也出現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無處不悲歌」，「肥了貪官，閒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內容的標語。西安交大，南京大學，上海復旦的學生均上街遊行。復旦大學還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顧委」、「整頓中紀委」內容的行動綱領。南開大學則貼出了《新五四綱領》^⑬。

據報導，上街的羣衆在最初的幾天裡有數千人、圍觀者上萬。在衆多的觀衆中，大都懷著一種對事態的關注心情，議論著幾個話題：(1)事態會如何發展；(2)事情會有什麼結局；(3)議論胡耀邦的爲人；(4)對黨和政府的領導作風的不滿。一般以幹部與知識分子對開頭兩項較爲關注。這說明他們一開始就認爲所有街頭行動都是在追求一種政治目標的，而且也較爲理性地考慮了結局。而後兩項則多爲一般羣衆議論的焦點。他們到這兒來，大多不過是要發洩一下胸中的鬱悶而已。

第四節 高低音之間的「串音」

在這個階段，街頭的運動與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派的活動，基本上是互相關切，並行不悖，互不來往的。就像是一個由高聲部和低聲部組成的合唱，但在這兩個聲部中，不可避免地也要發生一些「串音」。這裡的一個例外，是北大「中國魂」白練的製作與學生拿出的第一個具有「綱領」意義的文件——七條。這「七條」的內容是：

- 一、要求黨中央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
 - 二、要求新聞立法，開放報禁；
 - 三、要求公布中央領導及其家屬的財產和收入；
 - 四、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 五、要求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 六、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 七、要求政府肯定學生此次自發舉行的悼念活動。²⁰
- 關於「七條」的產生和北大四月十八日遊行的背景情況，一位北大教師曾向筆者進行過描繪：

四月十八日凌晨一時左右，慣於「夜戰」的北京大學學生，開始聚集在學校的廣場上自由辯論。隨後有四千人湧出校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當他們步行到達廣場時，將一幅

北京大學師生及校友敬獻，書有「中國魂——永遠懷念胡耀邦同志」，長十五米，寬五米的白練，搭人梯掛上了紀念碑基座的頂端。隨後便開始到紀念碑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靜坐請願，向政府提出了「七條」要求。

爲了把此次爆發的學運與所謂「黑手」的干預聯繫起來，北京市的有關材料把「七條」的產生歸結於方勵之夫人李淑嫻與王丹的密謀，而事實上，在整個學運期間，王丹只到過方家一次。從天安門廣場打電話，請李淑嫻「搬兵聲援」，純粹是因爲王丹只知道北大教師中他家的一個電話號碼而已。至於「七條」的產生，王丹對筆者的陳述是這樣的：

我是參與起草者之一。因爲我搞「民主沙龍」，在學生中比較有名氣，所以大家推我出來。那天（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和幾個同學在校園裡散步，事先並不知道要遊行。大家覺得，根據當時的情況，應該向政府提出幾條要求，於是就你一言，我一語地湊起來，湊了七條。我們走到學校的五四廣場，看見大家都聚在那兒，不知誰拿來了白布，反正就見張炳九在那兒親手縫製「中國魂」的條幅。後來大家說要遊行，我們就跟著去了。

關於這次請願活動，十九日有一份張貼在建國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門前的傳單，是這樣寫的：

十八日上午，以北京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爲主體的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

門外廣場，高舉寫著「中國魂」的巨幅標語，在大會堂前靜坐請願，要求人大常委會接受學生擬定的七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是：為在「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受打擊的人士平反；實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公布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及財產；實現真正民主政治；廢除關於禁止集會、遊行的《十條》規定；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如實報導此次學生運動……然而，十幾個小時的靜坐，政府竟毫無反應。這時，紀念碑下人越來越多，學生把「中國魂」大標語掛在紀念碑上，有的學生向羣衆宣讀七條要求……原定在校園內舉行追悼大會的人大學生因受到官方阻止，只好扛花圈於（晚）九點到達廣場。十點，萬名學生匯集在一起來到新華門前，要求政府領導人出面對話，但毫無反應……十二點，新華門前人越聚越多，前排學生被擠到了新華門口，少數進到門裡，他們把花圈放在那裡，但立即被武警折斷，然後拋回來……

這份貼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門口的傳單，把「七條」中與知識界訴求有關的條文置於首要位置，表明作者希望學生運動與知識界建立某種聯繫的願望。但他在把信息傳遞給知識界時，做了一些誇大處理。至少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政府並非完全「不理」：早上八點，北大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峯得以把「請願書」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負責同志；晚上七點五十分，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出面與北大、人大代表座談。但因學生方面的原因，對話沒有實現。另外，上述傳單關於在新華門前活動的記述也是有欠真實的。下面是兩個目擊了十八日午夜到十九日凌晨二時新華門請願情況的當時記錄：

……許多人堵在新華門前的長安街當中。街心站著兩行交通警察，不時地招呼過往行人不要逗留，但似乎並不認真。當新華門前傳來一陣振奮人心的呼喊時，他們也伸長脖頸朝聲源探望……靠近新華門前的地上坐著黑壓壓的一片學生，人圈中兩根竹竿挑起一幅橫幅：繼承耀邦遺志，促進民主進程。學生們有節奏地呼喊著：

李鵬，出來！

李鵬，出來！

之後是一片「出來嘍！出來嘍！」的勝利歡呼聲。但隨著一個「進去嘍！」的聲音，歡呼聲又低啞下去。

新華門前九個警察手挽手站成三、四排。最靠近學生的是一排便衣。他們的前面赫然站著兩個花圈，隨著一聲聲「加油！加油！」的鼓動，花圈被舉起，傾斜。接著便有「衝啊——！」的呼喊聲，在一陣爭持之後，第一個花圈被門裡的人接進去了。又是一陣「哦——進去了！進去了！」的呼聲。大約十二點二十五分時，第二個花圈也「衝」了進去。但等到進去時，基本也被揉碎了。學生撿起掉在地上的小白花，一朵一朵往人牆裡扔，有的被擋回來，再撿，再扔。如同遊戲一般。

又有「李鵬，出來！」的呼聲一陣陣傳來。人羣閃開，一個人民大學的學生拖著疲憊的步子，抱著捲起的橫幅從閃開處出來。上前問：「爲什麼撤？」回答：「我們是來悼念胡耀邦的。現在，我們的目的達到了，要李鵬出來幹什麼？」

他走了。人圈裡的學生堅持要把寫有「中國魂」的條幅送進去。相持一陣以後，警察

的手放下，門裡面有閃光燈迅速地閃了幾下，可能是「取證」。

一時以後，警衛換人。新換上來的沒有戴白手套。之後，門裡閃出一個官員模樣的人，朝外掃了一眼。但抱拳拱拱手，又進去了。說有點像胡啓立。

一個戴白手套的學生指揮唱起了《國歌》。接著領呼「民主萬歲！反對獨裁！」天安門方向又來了一隊送花圈的隊伍，走進圈中。一個中心是一面鮮艷國旗的小花圈很快被接進門內。人們又帶來新的口號：「反對反自由化！」「反對反精神污染！」……一輛灑水車停在南長街路口，沒有對新華門前的大街進行清掃。

「中國魂」飄來飄去，終無所歸^②。

——這是十九日凌晨的新華門。

爲什麼要李鵬出來呢？胡耀邦的評價問題是黨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單爲這一點，應該找趙紫陽，而不應該找李鵬。從個人來看，李鵬的工作能力的確有一個學習的問題，他還不是一個很壞的人。但是，在政府中，李鵬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顯然是爲老人政治所犧牲的。點李鵬，就是指向他的後台，學生的這一行動看似不好理解，但卻是絕不冤枉的。而人大的學生中途退場，說明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學生究竟要達到何種目的，以及爲達到目的採用的口號和方式上，此時還沒有形成共識。

「七條」的內容確已超出一般的悼念和學生利益範圍，在多數條款上表達了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派的政治要求。其中要求公正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爲在清污和反自由化運動中受打擊的人

士平反，是知識界與黨內民主派的切身利益所繫；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則是他們在漫長歷史中的不懈追求。它與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一條，都是當年二月中國科學院四十二名知識分子《致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的公開信》中的內容^②。因此，它如果不是在知識界人士的幫助下形成的話，至少也是因受知識界及黨內民主派的思想影響而形成的。但是此時此刻，他們從整體上說，仍在沉默。

就在這一天的上午，由《新觀察》雜誌社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持的一個座談會，反映了這種「沉默」的感情和思想。到會者是與胡耀邦有過共事、共謀經歷，在現實政治中帶有「胡派」色彩的黨內中、高層幹部，也受到過胡耀邦關注、保護的知識分子，以及他的開明政策的受惠者及改革路線的贊同者、追隨者，共計五十人。會議由老資格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女士主持。

會議開始時，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代表家屬向到會者表示，「父親雖猝然病逝，但是我們所有的家屬都不會墜入自毀性的悲哀中去。我們希望在悼念活動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種祥和的環境和心態來度過。祝祖國吉祥！」因喪事在身，胡德平提前離會。

胡耀邦的老戰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李昌首先發言。除了同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以外，他還與胡耀邦有過三次共事經歷：第一次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晉察冀軍區，李昌任第四縱隊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政治委員；第二次是建國初期在團中央，李昌屬於胡耀邦前任團中央書記馮文彬的班底，胡則是新任總書記；第三次是文革後期，鄧小平主持工作時，任命胡耀邦、李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從這些共事經歷中，李昌感到，胡耀邦「確實是我們黨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許是由於黨性的作祟，他沒有去碰「馬克思主義者」這個

敏感問題。但接著發言的法學家于浩成、前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兼社長胡績偉、秦川、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研究員張顯揚、中顧委委員、經濟學家于光遠、國務院農研中心副主任吳象與青年理論工作者章典華，都沒有諱言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于浩成說：「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敬佩愛戴的領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們一個沉重的損失。」秦川說：「三中全會以來的這十年，正是勇敢的馬克思主義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氣勃勃的、最輝煌的時期……他是最好的人，最純潔的人，最寬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麼仁愛，不是那樣純潔，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與會者回顧了胡耀邦生涯中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的重要貢獻，指出他早在延安審幹時期，就以實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識分子主持了公道，影響毛澤東做出了「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的決定^②。文革後期，在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期間，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注重培養鼓勵青年，對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際隔膜，重振科研氣氛發揮了有力的推進。中共十一大後，在鄧小平尚未站穩腳跟，大多數復職者政治上仍在觀望，不少人還「腳踩兩隻船」的情況下，他英勇無畏地擔當起大舉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黨內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任，在危機時刻挽救了黨。之後，在思想戰線、組織路線上進行了堅定的撥亂反正，反對任人唯親、人身依附，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親自點燃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輿論準備。他提出的「創作自由」解放了文藝生產力，開創了創作繁榮的新時代。他積極支持理論上衝破思想禁區，大膽探索，明確反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農村及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符合經濟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

型生產關係，使改革者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與社會成果得到有效保護。他正直誠懇、胸襟開闊，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光明磊落、謙虛好學，深入羣衆、勇於自我批評，對黨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與會者回憶，他下台後曾說：「有四種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來對待：一種人是青年學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愛護他們，關心他們成長；一種人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要理解、寬容；一種人是少數民族；另外一種是民主黨派。」^②與會者暗示，這段可視作胡耀邦政治遺言的話，在當前是有現實意義的。顯然，在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黨和政府依法執政的社會裡，這種對某類人的「關照政策」不免顯得有點煞有介事，但在一個沒有建立起民主與法制秩序的國家，在一個從思想到觀念都十分陳舊的黨，在政府於很大程度上還扮演著「民之父母」的社會裡，無疑是極其明智，難能可貴的。

年輕的參會者對老一輩在哀悼中把胡耀邦的悲劇歸結為奸佞所害，歌頌其雖大屈而無怨的個人品格表示了不滿。中央美術學院張朗朗說，黨史不再應該是好人和壞人的歷史；如果那樣，事情倒簡單了。如果一個民族和國家，沒有民主的、正常的秩序，這個民族和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女士也認為，「我們今天悼念胡耀邦，不僅僅是懷念他的偉大人格，而且應該按照他的心願，把他已經開始的事業推向前進，很多問題不可以再迴避了……對黨內不正當的事情，不能坦然處之。要使得黨內好的作風不僅僅是由個人好的品格來保證，而要靠建立一套機制來保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章立凡說，在改革處於困難階段，黨的威信下降的時刻，胡耀邦的逝世應該成爲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凝聚力，振作精神糾正錯誤的歷史機會。他警告說：「歷史的時

機稍縱即逝^②。」

座談會在論及當前局勢時，大部分人使用了謹慎的措辭和態度。在老人中，只有秦川明確地提出，希望學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重新再發生天安門事件」^②，但又強調「絕不能錯誤地對待年輕人、絕不能整學生」。與衆人的這種謹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嚴家其的發言。作爲一個與「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②有淵源的人物，他開門見山地把話題引向了天安門廣場。他說：「有人說中國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門廣場看了以後，感到中國的凝聚力是非常強的。大家對胡耀邦同志這種悲痛的心情，中國人民的正義感，說明中國有強大的凝聚力。說中國沒有凝聚力，我看他們是離開了人民……人民對這種不公正的意見一定要表達出來，所以，在中國的天安門廣場第二次出現這樣一個羣衆性的悼念，並不是偶然的。我們就希望有這樣的人，在未來的年代裡，對錯誤的做法能夠公開的進行重新評價。」「我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時，發現都在講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悼念耀邦，第二句是中國缺少民主，中國需要民主。在一九七六年的時候，幾乎也是叫這兩句話……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下，就知道無非是要對耀邦作出公正評價，對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作出公正評價。如果只是少數人議論議論，不能夠公正評價，我想今後還會有嚴重後果。」他奉勸公安部的一些人，不要重蹈一九七六年的覆轍。因爲他們每做的一件壞事，都會被記在歷史上。他以一個政治家的口氣預言，「在天安門廣場上，我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②。」

顯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人們會因爲一個得民心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去世，再一次匯聚在天安門廣場，並不是因爲那兒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也不是因爲那兒有人民英雄紀念碑，而是因爲有了一個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那兒原本是黨的領袖俯瞰人民的廣場，是執行

國家功能的莊嚴領地，是執政黨合法性來源的標記²⁹，但是當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改寫了它的歷史，使它成爲中國現代歷史上，民衆以自發的運動成功地干預了歷史進程的搖籃之後，它便獲得了新的功能。儘管一九七六年反自由化運動以後，北京市政府以實現交通現代化爲由，用鐵柵欄將其與道路分割，使人們只能經由地下通道抵達廣場，但它寫在覺醒了的人民心目中的意義，是鎖不住的！

但是，問題在於：歷史，是否可以重演？

註釋

①〔日〕和氣弘著《胡耀邦》稱「通訊隊」，見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版，第十五頁；楊中美著《胡耀邦傳略》稱「通訊團」，見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第二十一頁。

②瑞金政府的全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③見和氣弘《胡耀邦》，第二〇頁。

④斯達漢諾夫，蘇聯三〇年代社會主義競賽運動中產生的勞動英雄。他創造了日採煤量超過定量十三倍的驚人紀錄。這一以新技術與勞動競賽相結合爲特徵的運動，在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全國全面開展，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⑤見楊中美《胡耀邦傳略》，第九十八—九十九頁。

⑥一九八二年九月，胡耀邦再次當選爲總書記時，達賴喇嘛發來賀電「當胡耀邦於一九八〇年訪問拉薩時，我便

開始信任他了，因為他敢於承認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是值得稱讚的坦率態度。」「我現在仍然對胡耀邦抱有信心並希望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同他會晤。」同上書，第一二八頁。

⑦八〇年代初期，中共幹部中流傳胡耀邦講過的一個故事：在納粹統治下的一個歐洲國家裡，一天，一位政治家來到鄉間，看到滿目淒涼的原野中，一個小屋裡的桌子上，花盆裡竟然靜靜地開放著一枝紅玫瑰。於是政治家感嘆，這個民族仍然有希望，因為他們的人民仍熱愛生活。

⑧同⑤，第一五一頁。

⑨見《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三九期（查封版），第六版。

⑩八〇年代初期的「撥亂反正」時期，中共黨內有「五胡亂華」之說。「五胡」指胡耀邦的「胡說」，胡喬木的「胡寫」，胡績偉的「胡編」。另有胡耀邦的「團派」人物胡啓立、胡克實，也忝列其中。

⑪中國歷史學家，于光遠的好友。一九八八年去世。他生前說過：「進八寶山，死了還要排座次，何必呢？再說那裡的人並不都喜歡我，我也並不都喜歡他們，又何必擠到一起呢？」（見于光遠《古稀手記》，中國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一三頁）。八寶山靈堂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存骨灰之處。其存放序列與死者生前官職的排名序列一致，是為一種陰間等級。

⑫同⑨，第三版。

⑬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四七頁。

⑭中國現代史中的「左派」與「右派」稱呼是一對依時間條件為轉移的概念。在毛澤東時代，激進的「社會革命」主張由「左派」代表，保守的穩健改革由「右派」代表，後者又稱「黨內民主派」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鄧小平時代，保守派更多地代表了對毛時代政治經濟秩序持維持狀態的觀點，所以成了「左派」，

而主張改革的激進分子由於其歐美化傾向，而得名「右派」，或援蘇東成例，稱為「自由化分子」。

⑮從生態規律來看，在一個山坡上，如果第一代生長的是高大的喬木，繼之而來的第二代就只能是很矮的灌木。將此理運用於政治歷史分析，可以看出，繼強大權威之後到來的，一般是一個「弱權威時代」。

⑯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同⑬，第七頁。

⑰見張凱、章立凡《送耀邦叔叔》，載《新觀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

⑱見孟曉雲、王楚《十一億中國人為你送行》，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⑲見本書附錄。

⑳關於「七條」當時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稱為「六條」，教委本《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所載為「九條」，於「七條」之外，還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釋放政治犯，反對以言定罪」、「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穩定提高」，但沒有「七條」中的「取消北京市公安十條」的內容（見該書的二十一頁）。本人採用的，是當時在廣場的速記稿。

㉑這是本人十八日午夜與前《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所目擊的新華門請願實況記錄，部分為筆者隨時手記，部分由張站在自行車後架上口述，本人記錄而成。

㉒見本書附錄。

㉓同⑨，第三版，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的發言。

㉔同⑨，第五版，《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的發言。

㉕同⑬。

②⑥ 天安門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節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廣大幹部、青年工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藉悼念已故的周恩來總理之機，反對四人幫為代表的極左統治，呼籲鄧小平出山的自發性羣衆運動。又稱「四五運動」。運動遭到當局的武力鎮壓。

②⑦ 西單民主牆，原位於北京市西單的長安街邊。一九七八年一些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在此張貼大小字報，開設民間刊物專欄，探討文革後的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後因官方禁止而推倒。

②⑧ 同⑨，第四版。

②⑨ 一些文章誤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地點——老北京大學的「五四廣場」，當作天安門廣場。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城牆尚未拆除。現在的廣場是一九四九年後，打通北京東西城擴建的。原「五四廣場」在東城區五四大街沙灘北街二號，今已面目全非。

第二章 第一個回合

——尋找交手接觸點

……社會中那些不同的對立，就像不同的波紋拍打著湖的對岸，如果一個波紋的波峯與其它波紋的波谷相遇，它們就互相抵消；但如果波峯與波峯相遇，波谷與波谷相遇，它們就互相加強……

——E. A. ROSS

在歷史的長河中，當人們來到一個似曾相識的渡口時，運用曾經成功的泗渡經驗，是很自然的。但假若這個渡口並非真正是他曾經經過的，他只是在想像中誇大了它們的相似性，那麼，等待他的，將是平靜的潮流下看不見的暗湧。

一九八九年四月的宮廷裡，坐著的已不是積十年動亂之民怨的「文革上台派」，而是積十年改革之榮譽，有四十年統治經驗的中共「正統派」；一九八九年四月的街頭，走動的也不是十三年前同一個月份裡出現的人羣。新人們幻想著再造「四五英雄」們可歌可泣、銘刻史書的壯舉，卻對六〇年代英雄主義培養出來的，使英雄成其為英雄的「煉獄」不感興趣。他們習慣於輕鬆的、帶遊戲色彩的生活，當然也不把政治看得過份沉重。與他們的前代以集體主義和無名英雄為追求理想的價值準則不同，他們把參與政治與塑造個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學潮初起時，他們並不準備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代價：胡耀邦僅僅逝世三天，《七條》已經在要求肯定「學運」的性質了。這就如同體育比賽中，一個形體動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評分一樣。然而，之所以會這樣，正好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在中國的政治賽場上，始終沒有建立起比賽的規則。在這個選擇了「專政」，即獨裁^①形式的國家中，統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的範圍也是根據這個意志富有彈性的。當統治者在本質上還有一些「人民性」的時候，他可以對人民施「仁政」，有時甚至也希望人民對它提出批評改進建議，幫助它保持新鮮。但一旦人民的意見觸怒了「逆鱗」，它就會宣布這些「人民」是「敵人」、「反動派」、「反革命」，將他們（包括代表人民這部分意見的黨員）狂暴地打翻在地，以「無產階級」或「人民」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專政」。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一

九六六年文革都是典型事例。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方面雖然有了很大的改進，但那還只是思想和政策層次的改變，遠遠未落實到法律和制度層面，所以，它在不斷地「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又不斷地製造出新的不公正。有趣的是，中共黨內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都習慣地把實際上只是持不同意見者稱爲「壞人」。即使是主張「政治民主化」的黨內民主派，對他們的「政敵」也決不寬容。在一九八四年清理所謂「三種人」^②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證明，這個黨內哪怕是最優秀分子，至多只會從政治上看問題，而沒有批判自己所選擇的制度的能力。

學生之所以一開始就要「討個說法」，正是畏於這種「專政」的無常性和殘酷性。這也說明，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如果對自己的信念的真誠與堅定性方面可與「四五」青年媲美，那麼他們在對無畏方面，則不可同日而語了。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說，他們更願意演出的是一場喜劇^③。

第二，學生之所以要向政府尋求「公正評價」，說明他們心目中還是把政府放在權威地位，並至少相信政府是有「公正」的可能性的。試想，孫中山當年沒有向清政府討「公道」，毛澤東當年也沒有和南京政府講「公平」，那是因爲他們所從事鬥爭的性質是革命。而今日學潮的溫和色彩，它所昭示的改良性質，恰恰是從政府最難啓齒的地方表現出來。

然而，就像巫術中所說的那樣，你越怕越想什麼，什麼就越是要來。

第一節 「新華門事件」

歷來戰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是革命，是暴亂，必以暴力相鎮壓；是改良，是請願，當以談判相調解。對於前者，中共經驗豐富，手到擒來；對於後者，中共不習慣，也看不慣。中共黨總書記胡耀邦曾說，我們要學會適應現代社會中的學生運動，學習用現代政治的方法解決問題；但這正好成爲其政敵把他歸入「自由化」陣營的把柄。對於這個信奉，也長於用「槍桿子」打天下的政權來說，政治藝術家本來就是罕有之物。當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到來時，它不得不因爲政治藝術家的紛紛離世，而實際上可用的武器愈來愈少。

就在前述四月十九日凌晨新華門請願聲浪正高，總理李鵬千呼萬喚不出來之際，中南海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正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辦警衛局、北京市委、市府和市公安局有關人士會議，研究決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名義發布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由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④。

望眼欲穿的學生沒有等來他們希望一睹尊容的領導人的會見，卻等來了其「宿敵」——北京市政府一紙冷冰冰的《通告》。這份《通告》說：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領導人胡耀邦同志的不幸逝世，全市人民十分震驚和悲

痛。我市羣衆開展了各種悼念活動，以寄託哀思，反映了人民對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懷念。但是，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廣大羣衆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布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更爲嚴重的是，他們在四月十八日晚，公然煽動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打傷維持秩序的警衛戰士，提出種種與悼念活動無關的無理要求。這些人的所作所爲，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而是蓄意製造和挑起事端，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正確方向。

爲使悼念活動正常進行，嚴防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搗亂和破壞，確保社會秩序的安定，特通告如下：

一、要動員羣衆通過悼念活動，化悲痛爲力量，以實際行動學習胡耀邦同志的獻身精神，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一心一意地搞好治理整頓，深化改革，在各自的崗位上，爲振興中華做出貢獻。

二、悼念活動主要應當在本單位內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北京是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所在地，每個公民都要自覺地維護黨政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維護首都交通、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絕不允許任何人藉悼念活動之機，進行搗亂和破壞，對那些搞打、砸、搶、衝、燒的違法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

——這個《通告》，把幾天來發生在校園和廣場等地的學生活動分爲兩類：一類是出於對耀邦的

「深切懷念」，為「寄託哀思」而舉行的悼念活動；一類是「別有用心」的造謠、蠱惑、攻擊、謾罵。並根據這個分野，亮出「底牌」。但是，這個充滿教條主義精神的《通告》沒有分析，人們為什麼會對耀邦的逝世感到「悲痛」，為什麼要對他「深切懷念」。正是因為耀邦是作為「民主」先鋒，在改革過程中被用「非程序」的手段拉下馬，人們才有這麼多的悲痛和這麼多的懷念。既然如此，人們藉耀邦逝世之機，發洩不滿和平，表一表平日不敢有的懷疑、義憤，以及推進耀邦未完成的民主事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通告》把這些統統不加區別地歸之於造謠蠱惑，不能不說是表現出一種專橫，說穿了就是一句話：只能按照一種方式、內容悼念，其它行爲都是不能允許的。

但耀邦既然是人民「自己的」耀邦，人們就可以選擇自己的哀悼方式。即使與悼念活動完全無關，人民要求見自己的總理，也並非什麼「無理要求」。世界上任何一國政府，有誰會因為幾個無寸鐵的學生坐地請願，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呢？難道學生的事情，不也是它工作的一部分嗎？好像在它專心致志地關心「治理整頓」時，其它政府工作的要求就是犯罪一樣，殊不知學生所代表的人民的要求，正是「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不起，既然你不敢說胡耀邦是反革命，不敢說悼念胡耀邦是反革命行爲，你就沒有正義在握，你就不敢以「法」的名義；而《通告》中所說的將繩之以法的「打、砸、搶、衝、燒」等行爲，當時根本沒有發生，而恰恰是在這個《通告》以後，在西安、長沙等地「肆無忌憚」地發生了！

北京市的這個《通告》，是在十九日白天見報的。也許正因為它所透出的那種冷冷殺氣，這一天舉行的《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座談會上，才有那麼多的憂慮和警告。而事實也證明，這個《通告》非但没有制止新華門前的行爲，反而在第二天釀成使學生抗議性活動升級的「新華門事件」。

「新華門事件」是八九民運形成期間的一個著名事件。是它，第一個使悼念活動染上了「血」的色彩。為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事件略加解剖。

目前，對這次事件作有公開記述的有如下版本：

新華社的報導說：「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近三百名學生圍聚在新華門前並衝擊中南海，他們有的發表煽動性演說，有的呼喊反動口號，有的向維持秩序的警察投擲磚塊和汽水瓶。據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介紹，有四名警察被人羣中擲來的磚塊、瓶子打傷。」「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衝擊新華門，擊傷維護秩序的民警，是嚴重的違法行爲。希望圍觀的人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離開現場。《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數人，如果繼續一意孤行，一切後果由他們自負。」^⑤

由國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編寫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對這一天新華門前的活動僅作了如下反映：

三時四十五分，新華門前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希望圍觀的人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離開現場。並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數人，如果繼續一意孤行，一切後果由他們自負。四時許，公安幹警、武警戰士在新華門前清場，將廣播公告後仍留在新華門前的一百多名學生強行帶上公共汽車。其間，一些學生將汽車玻璃打破，還有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⑥

軒彥編的《京都血火》是這樣表述這一過程的：「據現場維持秩序的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說：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數百名學生圍聚在中南海新華門前，有的發表煽動性演說，有些人向警察投擲磚塊和汽水瓶，當場有四位警察被打傷。有些人還多次衝擊中南海……警察耐心地對這些學生勸說了約兩小時。到二十日早晨三點四十分左右，廣播要求在場學生二十分鐘之內離開新華門。但他們不離去。到四點四十分左右，一部分學生被學校來的領導勸走，但快到天亮仍有二百多人不肯走。有人喊『誰走就是叛徒』。爲了維護秩序，使即將大量運行的公共交通車輛能正常行駛，警察依照治安管理條例，只好挾著這些學生，將他們送上大型送車回學校。有的學生極力掙跳著不肯上車，又吵又罵，有人喊：『打倒共產黨！』已經送進車裡的學生在車上又砸破了不少車窗玻璃。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和警察之間發生了互相推拉和廝打的現象。」「市公安局的同志說，外界傳說公安局抓人了，根本沒有這回事，沒有抓一個人，也沒有傳喚過一個人。在這次強制學生離開新華門時，學生和警察互相推推搡搡是確實有的，雙方也都有人受了一些小傷。」⑦

那麼，當時的學生爲什麼要對「強行帶離」作如此的抗爭呢？顯然，他們以爲是要將他們送進監獄。這裡有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記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新華門清場時的心態：「……到十八日午夜之後，實在支持不住，就走出新華門前的學生隊伍，到門側一個樹叢中坐下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好久，突然覺得有人推我，推得不重，但很有力。我睜眼一看，面前站著三個警察……戴上眼鏡，才發現新華門前已空空蕩蕩……在兩個警察扶持下，走進路邊停放的一輛公共汽車。」「我剛進車，就有人說，『可能會把我們送到公安局去。』我一驚，馬上溜下汽車。」⑧

北京市委編印的小冊子有一段記錄，也可以反映「四二〇事件」中學生的這種心態：「四：〇

○，東西兩側圍觀的人逐漸散去。在新華門前仍不肯散去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採取措施，將少數人拖上調來的公共汽車。有人呼喊「打倒共產黨」。「五：〇〇，市公交總公司在武警、公安人員的協助下，將一百三十多名滯留在新華門前的學生疏散上車。學生邊上車邊砸，將五塊玻璃砸碎。當車行至南禮士路口一帶，有些學生從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劃傷。司機減速，學生硬扒開車門全部下車……」^⑨

以上記述大體反映了「新華門事件」的梗概，但是，由於官方禁止刊登與自己口徑不一致的消息，它們在披露真相時，或多或少地有意隱去重要環節，或故意含糊其詞。按照新華社的報導，學生似乎是在作「煽動性演講」時，無故呼喊了「反動口號」，而且不僅不存在什麼「血案」，相反，是警察被人打傷。教委本和軒彥本的記載客觀地反映了所謂呼喊「反動口號」的情節，實際上是學生被強行帶離現場的爭吵和廝打過程中發生的；但是，卻把學生所說「警察施暴」，描繪成警察和學生互打。而警察身上的傷痕（相信這是真的），究竟是被身分不明，別有用心的人用磚塊或汽水瓶擊傷的，還是在與學生推打中受傷的，則不清楚。市委本雖然承認所謂「反動口號」是在強行帶離的情況下發生的，但不僅隻字未提學生被「協助」時受傷的情況，反而暗示學生是在無故逃離汽車時，自己被自己打碎的玻璃「劃傷」的。總之，按照官方說法，根本不承認有學生被打一事，而所謂「血案」更是子虛烏有。對中國政法大學王志勇被警察痛毆一事，有的還以譏諷的口氣說，學生喊得震天價響的「新華門前，警察施暴」，原來只有一個「在前門附近被人打傷」的學生，他的那件「血衣」是這個事件中的唯一血跡。彷彿學生要把一個毫不相關的事件，與新華門清場硬是

拼接在一起。

官方在宣傳上做的手腳，當然瞞不過在場目睹了實況的羣衆，他們之中有大量的各報記者。事實上，不僅有「推搡」，而且確有痛打。據說，中宣部一幹部，奉命到廣場做學生的工作，被警察一腳把臉踢腫。《經濟日報》一女記者，在新華門拍照時也被毆打。西單一下班的飯店工人，路遇學生經過，被警察從後面擁打。《中國青年報》的一位實習記者，於二十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左右，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不問青紅皂白地痛打，並兩次被打倒在地^①的事實也證明，當日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警察打人事件。據學生組織的統計，被打學生約四、五十人。以互毆而論，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與專門學過擒拿的警察相比，當然不是對手。當場有學生手腕被扭脫臼^②。事後，學生還強烈要求組織新聞界進行專門調查，因為據說，強行運送學生的公共汽車被打碎的玻璃不是掉在車外，而是掉在車內。而這顯然不是學生可以做到的。

原國家體改委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在《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一書中，對「新華門事件」是這樣描述的：

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十九日夜裡……十一點多鐘，上萬的學生和民衆在……新華門前，反覆呼叫「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學生計畫在二十日五時撤離新華門，以免妨礙交通。但是，到凌晨四點二十分時，在剩下三百多名學生和一、二千羣衆的情況下，一批武警包圍分割了學生，大打出手，很多學生被打。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氣憤地喊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當時一批警察就上來抓她，學生們把她保護

走了。在廝打過程中，很多人受了傷。

關於中國政法大學王志勇被打一事，我們只能透過四月二十一日出現在北京街頭的這張政法大的傳單加以瞭解：

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四·二〇」慘案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被打真相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二十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穿過長安街南側街巷走上人民大會堂南側街道準備直達地鐵。走到一半，迎面來了兩排武警。帶隊警官一聲令下：「什麼人？打！」幾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來，幾名警察不問青紅皂白，蜂擁而上，專用帶鐵扣皮帶抽打王的頭部，並輔以拳打腳踢，致王志勇頭顱破裂，縫三針，多處淤血，兩眼充血，眼眶發烏，左眼無法睜開，當時無法作任何醫學鑑定，慘不忍睹。王被打後，拚力跑至地鐵口，昏坐在那兒，後被兩個好心青年護送回校。

據悉，二十日凌晨其他離校的一些學生也遭到無辜的毆打。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武警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和人性，難道是共和國法律允許他們這麼幹的，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兄弟姊妹？難道這是黨紀、軍紀允許的嗎？

我們全體師生對此事的發生無不憤慨萬分。各系學生會聯合決定於二十一日、二十二

日實行罷課，堅決要求懲辦兇兇，有關方面公開道歉，新聞媒介披露該事件的全部真相！
司法機關依法嚴懲兇手！

（王志勇同學是國際經濟法系學生）

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

對此，新華社當時有內參記者採訪過政法大學黨委宣傳部負責人，該負責人說明：三名學生於四月十九日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活動，當晚十一時三十分許，乘二十二路汽車回校，由於長安街交通擁擠，後決定乘早班地鐵回校。走到大會堂南側街道時，被迎面走來的兩排武警衝散，學生王志勇被包圍並被武警用皮帶抽打頭部暈倒，後被魯藝學院的兩位學生送回法大。王回校後在校醫室包紮、縫針，後轉北醫三院就診。北醫三院出具的證明為：「頭皮裂傷，輕度腦震盪，眼外傷。」

學生被打，官方把持的新聞媒介的公開報導卻隱瞞真相，不僅為八九民運提供了「新聞體制改革」要求的依據，也把本來就有委屈和平平的學生激怒了。四月二十日當天中午，中國政法大學便掛出王志勇的血衣，夜間貼出了罷課通告。通告內容有：(1)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罷課兩天，抗議警方這種非法行爲；(2)要求政府嚴懲兇手；(3)警方必須在報上公開對這種行爲道歉，如實報導傷案經過；(4)第二、三條要求必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五時前給予答覆，否則進一步採取行動。四月二十一日開始，該校一千三百多名學生進行了罷課。中午十二時，法大校園內有學生點火燒毀了登有新華社評論員文章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報紙。

據說，四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警告不要在新華門前鬧事的《通告》發表的當天，曾有過北大學生

拒絕清華同學邀請再去新華門的事情^①，前一天在新華門前扮演過組織者角色的王丹，在「新華門事件」發生之夜，正亟亟於總結前一天行動不利的教訓，籌備北京大學的學生自治組織。但「四二〇事件」及法大同學行動的消息傳開，他們與原來「各自為政」的學校一起，立即作出了聲援的反應。四月二十日中午，北京師範大學維吾爾族學生吾爾開希在校園裡「三一八紀念碑」前發表演講。北大、人大、清華都分別貼出了《新華門血案》、《血》、《「四二〇」慘案》等大字報。北大三角地貼出了清晨剛剛誕生的「北大籌委會」的通告。通告說：「爲了抗議軍警對學生的殘酷毆打，爲了抗議輿論的歪曲報導，我們籌委會代表北大廣大同學決定，自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時起，開始全校罷課。並要求：(1)新聞公正報導；(2)嚴懲慘案製造元兇。請每一個真正的有熱血有良心的北大師生進行罷課抗議，不達到目的絕不復課。」中午四校同學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學生一起，走出校門，上街遊行。雖中途遇雨，仍有一千多名北大、航大學生高舉「和平請願」、「反對官倒」、「反對暴行」的標語，步行到天安門廣場。

四月二十一日，各校學生罷課付諸實施。已在醞釀籌備的學生組織也迅速成長起來。於此之前，學潮基本上是没有統一組織，沒有形成統一綱領，與社會各界基本隔離，也沒有顯現出大的發展形勢的自發的、分散的活動。而透過「新華門事件」，學生的組織化程度迅速增強，自我約束的理性大大提高，運用宣傳手段擴大與社會各界的聯繫，並尋求社會——特別是知識界——支持的意識也隨即覺醒。

第二節 知識界的第一個聲音

就在學生的悼念活動因「新華門事件」轉出第二個主題時，原來在近處觀望，或只是以出出點子給學運「敲邊鼓」的知識分子也按捺不住，走到了前台。四月二十一日，他們聯名發出了「八九民運」中知識界第一封《公開信》：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胡耀邦先生是當代中國民主進程的象徵，為政清廉的典範，人民大眾的朋友，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他堅決反對保守倒退，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在人民羣衆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對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們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來，各界羣衆通過各種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於胡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學生們在悼念活動中提出了許多加快民主進程的要求，他們對領導人的批評，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不能視爲非法。新聞媒介應予客觀公正的報導。

我們理解，學生們在這次悼念活動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 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
- 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黨政機構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

會不公問題。

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責任制，不得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

四、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

我們認為，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實實現上述目標，也是造就長期安定團結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平等對話，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引起學生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

敬禮！

此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就在政府中的某些人竭力想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政府的行爲，以便匆匆對之加以處理的時候，知識界的這封聯名信卻明確把它定位在法律和公民權利的範圍內，意在保護學生，儘量不使之在較低的層次上與政府交手。在「同心同德地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的精神觀照下，它一方面警告政府不要以「殺死對手」的方式逃避這場比武，另一方面，也以婉轉的形式勸籲學生不要犯

規，使學潮爆發以來學生提出的口號、綱領，進一步系統化、條理化。而最終也是將知識界、黨內民主派想說而無法說出，這次藉學生之口提出來的政治願望與政治要求公之於衆。

這封《公開信》的出現，使原來僅有兩方參加的比賽場上，出現了第三方。

但這個第三方的出現，並沒有構成戰線上的三角格局。因為第三者雖然表現了某種「仲裁人」的姿態，但它卻沒有公然地站到前台，而僅僅以學生的同盟或智囊的面目出現。這一方面適應於知識界本身無組織、無前台經驗、無擔當責任的心理準備等狀況，另一方面，也適應了中共對知識分子懷疑、輕視的傳統。試想，中共什麼時候害怕過知識分子？哪一次運動不是從知識分子開刀的呢？這一次，知識分子若跳到前台，堂堂皇皇地將它收拾，頂多不過是在無數舊例中，再增加一個新例罷了。而知識分子如果站在學生後面，以學生的名義說話，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青年人是祖國的希望和未來，他們人數衆多，又有廣泛的社會關係，是國際人權社會首先關懷的對象。連目空一切的毛澤東都說過：「誰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文革中的劉少奇，不就是這樣翻船的吗？

知識界的加入，無疑加重了學生一方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他們的智慧與政治經驗的幫助，也使政府中「草斬」學運的企圖增添了實施的困難。但這一舉動，並沒有使處在危境中的學潮化險為夷。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

其一，「三十三人簽名信」與鄧結怨。

其二，「大鬧一九八九」得到了印證。

所謂「三十三人簽名信」，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由青年詩人北島發起，知識界、文化界

人士響應，有三十三人簽名的一封《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其內容是：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

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三十三人簽名）

該信提到的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內容也很簡單：

中央軍委

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著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

鑑於此，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

人道的，是會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週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謹頌

近祺

方勵之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

在一般不了解歷史背景的人看來，無論從語言、立意，還是態度上看，方勵之給鄧小平的信都沒有什麼直觸「逆鱗」的地方。北島發起的「三十三人簽名信」，更沒有當政者理解的那層「惡意」。據魏京生本人後來說，北島是「民主牆」時期唯一公開宣布過「與政治興趣濃厚的諸團體劃清界線」的人。他的文學刊物《今天》，是以「追求文學解放」為目的的。當時，在一個以法國「德雷福斯」案件為援例的「民辦刊物聯席會議」上，他公開了自己的這一觀點。

但是，方勵之卻在兩個致命之處犯了「大忌」：一是《公開信》的形式。它極不符合中國「太極拳」式的政治傳統，使接信對方沒有迴旋餘地。在鄧小平看來，這無異於一份公開戰書，一紙「最後通牒」，它的發出無非是要給鄧小平一種公開的「壓力」，而這本身就是不準備讓他接受的。在歷史上，鄧小平是以打「硬」仗著稱，在與蘇聯的「赫魯雪夫叛徒集團」的鬥爭中，他曾留下過一句名言：「你可以把我壓扁，但不可以把我壓彎！」當人類歷史進入八〇年代，他本能地感覺到，

對於世界潮流要有更多的適應，但是外面世界映入其眼簾的優越性，更多的是經濟生活的現代化，而不是所謂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至少，他從未欣賞過西方方式的多黨民主制。在這方面，他或許也覺得，有務實形象的趙紫陽，比具有浪漫氣質的胡耀邦離他要更接近。而方勵之的這種做法，無異於要在唯一的領導核心之外，另樹一幟，迫使他領導的黨和政府就範。

第二個「大忌」，是把一封涉及司法權限，屬於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主席職責範圍的信，寫給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這無異於在全世界面前再次揭觸鄧小平一直想避諱的「獨裁者」的問題。把魏京生實際上是因觸犯了他的政治權威才得以繫獄，被判刑十三年這件事，在世人面前抖落，讓人們再次回味，所謂「改革開放」和由鄧小平創造的「復興時代」，不過也是建立在一種「專制」基礎上的東西。而這，當然是不能容忍的。

方勵之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出黨的中共黨員之一^⑬。他們在政治上與胡耀邦有著共同沉浮的命運。但與胡所代表的黨內民主派不同，方勵之從一開始就以西方方式的民主政治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楷模。因此，在中共方面，他這樣的人早就是內控的敵人。他們沒有什麼理由不認為，這個裝模作樣的「政客」拋過來的「繡球」裡，包裹的是一枚定時炸彈，他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三十三人簽名信」眼看著會把事態進一步擴大，所以，自一九八九年二月到三月，中共有關部門連續組織了所謂《司法部有關負責人發表談話》^⑭，《對魏京生定罪判刑理由很充分》^⑮，《知情者談魏京生》、《陳軍發起簽名信前後》^⑯等文章，在大陸與香港報紙上刊登，以消弭《公開信》造成的影響。為此，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還曾專門組織過對於「大赦」與「特赦」在法律上的區別的文章。但因胡啓立有令首都及全國新聞單位皆不得報導此事，此事真相終於不得不在

《美國之音》和中共的雙重歪曲下，不了了之^{①7}。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知識界的《公開信》，與「三十三人簽名信」並無任何聯繫。據領銜簽名的包遵信回憶，他就此事所經歷的過程是這樣的：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左右，《中國青年》雜誌記者魏羣給我打電話，說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到學生們請願示威以及凌晨警察與學生衝突的情況，還說學生現在對知識界感到很失望……我說，我對學生的愛國熱情是欽佩的，對他們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們支持只能是道義上的。如果站出來說話，反倒會給他們惹麻煩，使事情複雜化……下午兩點多，遠志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給我來電話，奇怪的是，他說的話，和魏羣上午在電話中講的一樣，只是沒有說他曾經目睹昨晚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當他提出要我站出來公開表態時，我還是照上午對魏羣講的重複了一遍。遠志明聽了我的說明以後卻提出，我們可以建議中央領導與學生對話，這樣總是行的吧。我一聽覺得有道理，這倒是個好主意。他說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來拿。我說還是你起草吧。遠說，那也行，不過你要第一個簽名。我說：行。

……我們到了遠志明家，遠的妻子說：他們在謝選駿家。進了謝家的門，一看除了遠志明、謝選駿，還有王潤生、陳宣良、榮劍也來了……遠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幾句，大家就覺得不怎麼滿意，我對一開始稱「胡耀邦先生」不贊成，遠卻堅持稱「先生」不稱「同志」……我見其他人也不表態，就沒有再堅持。接著我講了幾條意見：（一）首

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象徵，他的逝世表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受挫。(二)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問題不表態。(三)我們這封信的落腳點是放在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王潤生還提出應該明確要求新聞界對學運客觀公正報導。王潤生和榮劍還把學生的要求概括成爲四條內容。大家覺得這樣很好，接著就由王潤生口述，遠志明執筆起草……^⑬

從包遵信的這番回憶看出，這封知識界的《公開信》實際上是由與「三十三人簽名信」毫無聯繫的，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後因他們多以青年政治學院為活動地點而被稱爲「青年幫」）爲核心醞釀和發起的。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見和名義，但並非此事的組織者。

儘管知識界這封《公開信》與「三十三人簽名信」沒有任何聯繫，但它所採取的，是與之一脈相承的形式，即公開的、以宣言面貌出現的、跨單位的形式，而後者不僅是中共統治絕對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實行多久的活動形式。況且，在簽名者中，有包遵信、吳組緬、嚴家其、高舉、李澤厚、宗璞、北島、朱焯、劉東、王焱等十人是重複簽名者，其中北島是「三十三人簽名信」的組織者。另外，「青年幫」中的遠志明、謝選駿因援手蘇曉康撰成《河殤》第五集^⑭，而《河殤》的主要作者蘇曉康也參加了「三十三人簽名信」，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公開信》平添了某種「三十三人色彩」。

此外，參加《公開信》簽名的許良英、蘇焯、戴晴、吳組光、于浩成等人，是繼「三十三人簽名信」之後，就大致相同的問題另外發起的「三十四人簽名信」、「四十二人簽名信」^⑮的組織者和

參加者。據稱，參加「三十三人簽名信」的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曾經說過，中國將形成三個集團，即知識分子、企業家和政治家，而前兩集團應對後者構成壓力，以起平衡作用，促進中國向前發展。與湯教授的這番言論如出一轍，方勵之在年初也曾大談過「壓力集團」概念。當局有理由認為，這些事件與當前發生的知識分子的聯合行動，是構成所謂「壓力」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決定中共對八九年學潮一開始就採取嚴厲防範和極其反常的敵視態度的另一個因素，是他們以為由此可以證實他們的「眼線」所羅織的所謂「自由化分子要藉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紀念日大鬧一九八九年」的材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長陳希同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我們得以發現這個事實。

陳希同的報告第一節的標題便是「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其中說：

……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如，去年十二月七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分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①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蘇紹智、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搞了一個所謂「新啓蒙沙龍活動」^②，……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現在需要

行動」，「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勵之、陳軍等又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所謂的「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²³，方勵之主要就所謂「民主」和「人權」兩大問題發表了演講，陳軍把「四五運動」同「西單民主牆」作了類比。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民主而鬥爭。」二月十六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三十三人致全國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大赦，釋放嚴重觸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二月二十三日，台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湧。」……此後，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和集會……與此同時北京一些高等院校，所謂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曉叮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與民主政治」，散發了許多謬論。他們曾在塞萬提斯像前舉辦討論會，公開宣稱「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他們還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裡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所有這些，都為後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香港《明報》載文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運動，已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醞釀在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

裝滿火藥的桶裡扔了一根火柴。」總之，在極少數人的預謀、組織和策劃下，當時已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初的中國，的確是理論界空前活躍的年頭。這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第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理論界「放」和「收」的輪轉，幾乎形成了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環的規律。在兩年一輪的週期中，一九八八年正逢「夏季」：一年前因反自由化運動而致使有人「皇冠落地」，被開除黨籍的驚悸幾乎被人遺忘；中共黨的十三大重新肯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變，公開宣布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加強黨和人民羣衆的「對話」聯繫；中共黨內「左派」精神領袖鄧力羣落馬；這些，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一個理論的「春天」已經來臨。第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暨「改革十週年」的紀念日，在中國人的——不論是政治習慣還是生活習慣——中，都有逢十「大慶」的傳統。而對於思想理論界，這莫過於一個總結反思，向新的里程邁進的極好時機。作爲關心政治的青年學生或學者，問一問，十年了，我們有什麼進步？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第三，改革已走入「深水區」。許多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已認識到，十年改革，在經濟方面基本上是以「放權讓利」爲特徵的「解放」過程，但真正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符合規範的新經濟體系尚未建立。微觀層次可改的已經改完，宏觀層次的改革基本未動，特別是城市體制改革。國營大中型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困難和徘徊，政府所採取「治理整頓」措施帶來的停滯，更是使人感到形勢嚴峻，前景莫測。在政治上，中共在完成「撥亂反正」，鞏固鄧小平集團的權力後，改革進展不如人意，在某些方面還有倒退的跡象^②。特別是「太子黨」接班以

來，其素質低劣、不負責任的表現，使中共統治基礎日漸狹窄，人心浮動。加之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使得廣大民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尋找著研究、探討和發洩的時機和場所。正是這些因素，匯成了八八—八九年思想理論界空前活躍的局面。這其實也是政治家尋求與人民溝通、對話，吸取智慧，頓開茅塞的良機。

但是，中共黨內極少數與人民爲敵的分子，看不見人民羣衆、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的國家」的命運的珍貴性，看不見他們關心社會的前途和個人命運的合理性、合法性，把人民的解放、自由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本能地當成自己的危機，四處設置「密探」監視人們的言論，挖空心思地東拼西湊了一些所謂「反動言論」，作爲下一輪整肅的根據。這就是陳希同等人立場的根據，及其「材料」的由來。

在此，當然也沒有必要否認他的「材料」確有出處。在雨後春筍般的大小會議上，在各種層次的「沙龍熱」裡，衆多的議論中自然有各種觀點。尤其是在人民羣衆客觀存在著不滿情緒的情況下，講演者的「語出驚人」是他們獲得掌聲的一個重要方法。另外，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與組織整肅，使得早就該超越「啓蒙水平」，超越「主義」而進入「問題」的中國理論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從頭開始；再加上中共黨的體制決定的意識形態霸權的爭奪戰爭，自然要引起一些激越言論。由於開放的不徹底，人們對西方民主的朦朧認識造成的嚮往，更因爲政治上的人爲壓抑而扭曲爲一種富有刺激力的探尋「真理火種」的獻身活動，這種狀況，在青年學生中是最普遍的。但是，所有這些，在八八—八九年的活躍空氣中，都不是主流，筆者以見證人的身分斷言，那種「大鬧一九八九」的意向，要不是胡耀邦的逝世，特別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判斷和選擇，

很難說是會有多少人響應的。因為中國人民是務實的，他們已經嚐過了所謂「大民主」的苦頭，有政治頭腦的人，尤其是到了八八—八九年，大多已認同了有秩序的、漸進的推進歷史的方式；有見識者也知道西方式的校園民主可以鍛鍊知識青年，但街頭政治畢竟不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必經途徑。

然而，遺憾的是，這個政府中日益變得保守、僵化，堅持以「家長制」方式治國的人，寧肯相信這是危機的徵兆，而不是機會的降臨。由於他們控制著政治的主導權，他們也就自然而然把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最後也把人民——逼到對立的位置上，同時也引導著自己來到真正危機的邊緣。

第三節 「四二二」：人民大會堂前的對壘

「四二〇新華門」的拳頭，打醒了一盤散沙的北京高校學生。由政府一方掌握的宣傳工具，抓住學潮中的不理智行為大作文章的「輿論」壓力，壓出了學潮中第一個統一組織和第一個聯合行動。

還在「新華門事件」爆發以前，四月二十日的凌晨，北大已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從其取名來看，是模仿波蘭團結工會的產物。籌委會的綱領擴大為十一條，在原有七條外，又增加了：(1)要求懲辦元兇；(2)要求新聞界公開報導學生運動；(3)釋放魏京生；(4)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誤向人民檢討；(5)科學理順物價；(6)強烈要求鄧小平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去掉了「要求提高知識

分子待遇」和「公正評價學潮」兩條。倡議各高校能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一領導目前已形成聲勢的學運。當晚，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委員熊焱（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在北大三角地，宣讀了《全國高校聯合會宣誓書》。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十五所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下設糾察部、聯絡部、信息部，辦公地點在北大二十八樓四樓。當日上午，各校都貼出了這個委員會的通告，通知當晚十點集合到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要求學生穿球鞋，帶足水和乾糧，集隊前往天安門廣場，給第二天出殯的胡耀邦遺體送行；並要求有條件的學校要組織糾察隊，以防止壞人破壞，給政府鎮壓提供口實。

這個行動的提出，多少與北京市公安局預先發布的一個《通告》有關。這個《通告》說：「爲了保障四月二十二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的順利進行，現將天安門地區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一、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天安門廣場及大會堂西側路，除持有大會車證的車輛外，停止其它各種車輛和行人通行。二、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半至十二時，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東、天安門廣場東側路，除允許公共汽車甩站（編按：過站不停）通過和持有大會車證的車輛通行外，停止其它各種車輛通行。」同時，電台還廣播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通告》：「爲了維護東西長安街交通的安全暢通，所有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輓聯的同志，請不要走東西長安街（東單至西單），可繞行前三門大街和其它街道。」未雨綢繆，從廣播到戒嚴僅剩二十四小時的緊迫時間，促使醞釀還極不充分的新生的學生統一組織迅速運轉起來，並展現出空前的凝聚能力。

晚七點，北大、清華、人大、北京科技大、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及北京外語學院，都有人數不等

的學生開始行動，糾察隊一律佩戴紅袖標。他們由北京郊區的西北一線，步行來到正北面的北師大，撞開校門，與師大內已聚集的萬名高校學生匯合。九：三〇左右，「全市高校學生誓師大會」提前舉行，參加者約二萬人，會議由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主持。他提出要以演講的形式控訴「四二〇暴力事件」，講了二十二日晨遊行的目的和路線。

九：四五，隊伍離開北師大，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沿途高呼「反對暴力」、「愛國無罪」、「剷除官倒」、「社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貪官污吏」等口號。隊伍打出的標語、橫幅有「聯合起來」、「耀邦千古」、「耀邦精神不死」、「民主鬥士，青年摯友」、「科學興國，教育為本」、「爭取民主，尊重人權」、「民主萬歲」、「反對專制」、「反對獨裁」、「反對腐敗」、「打倒貪官污吏」、「打倒暴力」、「愛國無罪」、「新聞要講真話」。中國政法大學還抬出了一塊木牌，據說是某青年教師準備結婚做家具用的木料，現在，它行進在望不到頭的學生隊伍中，上面赫然書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三十七、四十一條。隊伍中，學生們五人一排，手拉手前進。每隔幾十米，就有一人領呼口號。糾察隊員手拉手走在隊伍的兩邊，形成隊伍與圍觀羣眾及尾隨者的屏障。他們沿途向背有照相機的人詢問是否為記者，向他們講述「新華門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經過，請記者到學校去看血衣和醫院證明，要求新聞界為他們說公道話。沿街羣眾不時對他們的口號和嚴整的組織報以掌聲，學生則以「人民萬歲！」、「理解萬歲！」相回報。許多羣眾將茶杯、開水放在路邊，供學生飲用。過街天橋上那幅「高高興興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的交通宣傳標語，被捲起了前半句，剩下「平平安安回家來」。

四月二十二日〇：二〇，隊伍經過新華門。北京科技大學的隊伍第一個進入廣場，隨後到達的

是前一天赴京的天津南開大學的「請願團」。一：五〇左右，清華、北航、北京郵電大學、北京農業工程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政法大、北師大、北大、人大、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京理工大等二十所高校，三萬人的隊伍全部進入廣場。三：〇〇左右，他們按排定的位置在廣場打出校旗，就地坐下，糾察隊員負責維持秩序，檢查進出人員的校徽或學生證。

學生突然出現在廣場上並秩序井然地就坐，給管理當天天安門廣場秩序的治喪辦公室提出了新的難題。但他們迅速判定，學生們風塵僕僕而來，為的是與胡耀邦做最後告別；認定他們的合理要求應該得到滿足，但所佔據的位置應予調整。五：〇〇左右，他們開始與學生組織者交涉，要求他們把隊伍從紀念碑西松牆以西，調到西松牆以東至西華燈一線，為參加追悼會的車輛騰出停車場地，但保證不會影響學生的視線。

清晨，當華燈熄滅時分，學生的全部隊伍按要求完成了調動。同時，他們也提出三點要求：(1) 無條件保證學生人身安全；(2) 瞻仰胡耀邦遺容；(3) 客觀報導「四二〇事件」。這些要求如不答應，將每隔十分鐘調一所高校隊伍向西移動。在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進行時，他們全體起立，與播放的音樂聲一起唱起了悲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許多人禁不住熱淚盈眶。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還沒有意識到，此刻，他們已踏上了一條不能回頭之路。

治喪辦公室答應，只要學生隊伍不亂，即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將透過音響轉播追悼會實況；「客觀報導」問題非其所轄範圍，答應轉達。但不久，就有一隊士兵從廣場西北角跑步來到大會堂東路，緊貼學生隊伍，由北向南站成一線。面對這種侮辱性行爲，七：五〇左右，學生在一聲命令之下，整齊地開始向西推進，前鋒越過隔離墩，上了大會堂前的廣場西路。那條由軍警組成的象徵

性的綠色警戒線，即如沸湯中的幾顆綠豆——立刻化為烏有。

各種應邀參加官方追悼大會的人士，乘著大小車輛紛至沓來。他們中有黨魁和政府首腦，有各單位的頭頭，與中共同舟共濟但在大多數時候充當花瓶的民主黨派人士，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左派和右派……在這個國家誕生以後，參加這樣的認識不認識，喜歡不喜歡，有感情無感情，有仇恨無仇恨的人的遺體告別，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當他們走出與各自身分相稱的車輛時，或許感覺到有點不虛此行，因為，這時，他們有機會目睹學生靜靜的方陣，而這種景觀在共和國歷史上之罕見，與內參、外刊按身分級別權力大小擁有知情權的多少而分配不同，並非每一個有權力者都有幸能看到。

到來者的中間也有另一種人。也許與爲了安撫各方有關，追悼會邀請參加與耀邦遺體告別的四千多人中，儘量照顧了黨和國家機關及大專院校的中青年幹部與知識分子。這些對幾天來學運一直抱密切關注態度，後來終於成爲「八九民運」中風雲人物者，此時從飢寒交迫、疲憊不堪，被認爲是「沒有資格」進入悼念大廳的學生身邊走過時，懷的是另一種感情，另一種態度：有人僥倖，有人痛苦，有人因此而泛起一種使命感。因爲他們所在位勢的優越，使他們相信，自己能做比學生更多的事情……

十時正，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準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了追悼會。他胡里胡塗地將「奏《國歌》」講成「奏《國際歌》」，但立即又進行了更正。當廣播將大會開始的消息轉到廣場時，學生們全體肅立，跟著唱起了《國歌》。大會堂內，鄧小平沒有接受胡耀邦夫人李昭的建議不來參加追悼會，站在第一排的他，與同耀邦共同開基立業時相比，在人叢

中顯得更加蒼老、矮小，臉色極為難看。默哀三分鐘時，有三個老人暈倒（據說有人當場死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耀邦權力的繼承人，不甘心從總理位置被「擠」上這個「寶座」的趙紫陽致悼詞。在他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悼詞中，加上了《訃告》中沒有的「胡耀邦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這樣的詞句。這可以看作是自耀邦逝世以來，民心的反映，當然也是鄧小平面對有可能擴大與升級的學運的一種讓步。但是，悼詞對胡耀邦為何在任滿之前離開總書記的位子隻字未提。這種躲閃的動作，雖然是對敏感問題的一種迴避，甚至也可以看作一種讓步，但同樣使許多人大為不滿：因為，一個如此「完美」的人，你們為什麼要叫他下台呢？

平心而論，胡耀邦的葬禮，是按照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等級，與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同等的待遇進行的。胡作為一個黨魁，在政府中沒有任何任職，他的待遇，本是其黨內的一件事務。在正常條件下，這也就罷了。但是，當這一天的份量在歷史上加重，人們的希望都賦予了這個時刻的時候，一切的一切，都顯得不夠了！

站在後排的人，在大會進行過程中，有的不時地走到面對廣場的落地窗前，看看學生的動靜，體味著兩個營壘的氣氛。《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事後說：「今天北京有兩個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地方，一個在人民大會堂內，一個在人民大會堂外，這兩個地方我都參加，我感到前者太小太小，而後者是太大太大。」香港《九十年代》的總編輯李怡，則對會內會外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區別：「大會堂內高度讚揚胡耀邦一生，獨獨是迴避了八七年一月他下台的事；大會堂外則緊盯著八七年一月的事，要求為當時的決定改正……大會堂內強調胡對黨的忠心耿耿，強調他顧全大局，這兩年來仍不辭勞苦地到處鼓勵幹部『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大會堂外則強調他的自由、開放、寬鬆的政策，他

在兩年多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以及他兩年多來的沉默……」

向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後，大會堂外的學生開始喊話：

「對話！對話！」

「李鵬，出來！李鵬，出來！」

他們選出北大國政系研究生郭海峯、張智勇，政法大政治系學生周勇軍三位代表，到大會堂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以「七條」為內容的「請願書」，並瞻仰胡耀邦遺容。十一：四〇左右，治喪辦公室回答學生不能瞻仰遺容；而李鵬是否能夠接見，要等追悼會開完以後才知道。十二時，廣場戒嚴解除，上萬羣衆向請願學生擁去。經過一晝夜等待的學生得知運送胡耀邦遺體的靈車，不再按慣例繞行廣場一周，而已由西門開走時，也羣情激憤地向大會堂擁去，衝破了由警衛部隊組成的第一道警戒線。替學生抱不平的圍觀羣衆也壓向軍警，不時發生局部摩擦。在紛亂之中，有謠言說李鵬將於十二：十五與學生見面^⑤。時間到了，李鵬仍無蹤影，又有人說可能是十二：四五接見。郭海峯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會堂台階後，淚流滿面地雙膝跪下，雙手高舉「請願書」，長跪達三十分鐘之久。

下午一時，當他們終於明白根本不會有什麼李鵬接見時，他們徹底失望了。在中國政法大學的隊伍率先退出後，各校學生也有秩序地撤離廣場^⑥。懷悲壯而來，負恥辱而去的他們，臨行留下了「爲民請命，萬死不辭」，「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當日，各校出現了一片「無限期罷課」的呼籲，北師大、張署名「一愛國者」題爲《衆目睽睽的欺騙》的大字報說：「鑑於對學生運動的不理睬、鎮壓立場，北師大、北大、清華、南開、北航、理工大、北郵、

鋼院、中科院、政法（大）、音樂學院等十多所高校決定統一罷課，直至政府接受十條。」清華大學出現以「物理系學生會」名義貼出的標語：「今日人民大會堂前最可恥的一幕，強烈要求罷課抗議。」^⑦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的《告同學書》，則提出了下一步學運的行動綱領：

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面對李總理哄騙十萬學生，答應見學生代表卻不露面的行徑，決定採取新的策略：

第一，號召北京所有高校，實行總罷課，七條建議不被接受，絕不復課，希望各校學生寫信給外地的親人、同學、朋友，衝破新聞封鎖，揭露事實真相。

第二，聯絡全國大專院校，實行全國總罷課，壯大學生運動，使七條早日得以接受。

第三，採取散發傳單、發表演講、舉行遊行等形式向工人、農民、市民及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宣傳，說明我們的目的和要求，爭取他們的支持，實行罷工罷市。

來自天津、上海、武漢、湖南的學生，也於此時集中到北京大學，醞釀成立全國團結學生聯合會，並擬在「五四」將組織建立起來。把憲法賦予，但一直停留在一紙空文的權利變為現實。

至此，四月中旬以來，以悼念胡耀邦為中心內容的學潮基本結束。八九民運經過一週的錘煉，也基本走出了它的醞釀和起步階段。學生與政府的對立格局已經形成。從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有關政治要求，不必在別人的名義下求得自己的伸展，而是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姓氏了。

註釋

- ① 在政治學的國家分類中，「專政」是與「民主」相對的一種政體。又稱作專制或獨裁政體。毛澤東說：「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版，第一三六四頁。
- ② 這裡指黨內民主派的政治代表胡耀邦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
- ③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版。
- ④ 見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二十三—二十四頁。
- ⑤ 見一九八九年六月《半月談》刊載的《北京新聞錄》，第六頁。
- ⑥ 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
- ⑦ 農村讀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 ⑧ 李雲、岳風等編著《顛狂的蛇年之夏》。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版，第十六頁。
- ⑨ 同④，第二十七—二十八頁。
- ⑩ 見本書附錄《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胡啓立與〈中國青年報〉編輯記者座談記錄》。
- ⑪ ⑫ 同⑧，第二十頁、第十七頁。
- ⑬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與方勵之一起開除出黨的還有著名記者、報告文學家劉賓雁、理論工作者王若望。

- ⑭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版。
- ⑮載《北京日報》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第一至二版。
- ⑯載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與三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
- ⑰在「三十三人簽名信」中，最後一個簽名者陳軍，曾在被中共宣布為「反動組織」的「中國民聯」主辦的刊物《中國之春》上撰文。由於他將簽名信交海外傳播媒體發表，海外和中共均藉此將「簽名」與海外持不同政見運動聯繫起來。有些簽名者亦稱不了解陳軍，被人盜用了名義。
- ⑱引自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我與八九民運》。
- ⑲《河殤》是一部反映中華文明危機觀點的電視政論片。一九八八年播出後，轟動一時。
- ⑳據許良英在《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中稱，該信是他與施雅風聯合發起的。載《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
- ㉑金觀濤只是「北京大學未來學會」的顧問之一。他說的「二十世紀的兩大遺產」是「西方中心論的破產和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失敗」。戈揚當時並不是立即站出來應和，而是在輪到自己發言時說了那番話。
- ㉒「新啓蒙沙龍」並非蘇、方「搞的」。它是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為創辦「新啓蒙叢書」，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兼新聞發布會和組織稿會兩種功能的座談會。該會未正式邀請方勵之，方是隨朋友而去的。
- ㉓該聯誼會不是方、陳主辦的。其主辦單位是中國企業家協會和中國文化書院。
- ㉔見本書附錄《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學者座談時局經過》。
- ㉕據當時傳說，是一個在場的記者誤傳了這條消息。但後來市委版《平暴紀事》中說成是「一學生隊伍的組織者」（見三十五頁）；教委版《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沒有確定此人身分，但認定其事的性質為蓄意造謠（見三十五

頁)。筆者認為，可能是當時有記者議論追悼會何時結束，被學生誤聽為接見時間，於是作為新聞發表。筆者的推測，是根據後來民運中多次作為新聞傳播的「謠言」產生情況，及人們當時的反常心態可能發生的錯覺而作出的。

⑳關於學生行動的各個環節的時間，有許多不同說法。此處採用市委版《平暴紀事》中的說法。估計該書在時間問題上有監視器為忠實依據。

㉑《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第三章 警鐘鳴響

——「四二六社論」前後

……肌肉活動是人體產生熱量的一種方法。發抖，也是一種增加熱度的肌肉活動。

生命在於運動。當社會發展停滯時，社會衝突和階級間的鬥爭，是社會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徑。社會學家的這個理論，猶如一個中性的瓶子，既可裝入意理的毒液，也可以容納意理的甘露。馬克思主義者迷信它，所以堅持階級鬥爭學說；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承認它，所以創造了現代的議會。然而，社會學家亦指出：「當人們的分歧是建立在一致基礎上的時候，共有衝突會隨之發生；當人們的一致是建立在分歧基礎上的時候，非共有衝突就隨之發生。」「非共有衝突被認為是破壞性的和分裂性的。相反，共有衝突，即以共同承認的基本目的為基礎的衝突，是整合性的。」^①

當「四二二」追悼會結束以後，大會堂內與大會堂外的兩撥人馬，原先共有的目標開始消退，或者更確切地說，後者憑藉以與前者對抗的遷就世俗的、公允的依據開始消失。透過一周的摩擦，政府在悼念胡耀邦問題上的確有了讓步：(1)在胡耀邦的悼詞中，加進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字樣；(2)在追悼會召開時，沒有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例行的清場，並容忍了學生對警戒線的衝擊。在另一方面，學生也開始總結「新華門事件」的教訓，規範了自己的口號和抗議方式，力圖把自身的行為約束在法律範圍之內。當這種情況到來時，事物存在著兩種前途：

第一種前途：衝突結束，雙方關係恢復原狀。這取決於兩個因素：(1)學生放棄隱含目標，以在胡耀邦悼念問題上獲得的階段性成果為滿足；並在行動上對遺留問題採取從長計議的態勢，使這次因胡耀邦逝世提出的問題，在不破壞既成秩序的條件下，按常規方式解決。(2)政府承認現狀，不搞「秋後算賬」。如果這兩個條件均同時滿足，那麼，歷史上就不會有「八九民運」這個名詞存在了。但是，中國社會無疑地已在「悼念風潮」的名義下，取得了切實的進步；社會學家們也可把這段歷史，歸入「共有衝突」之列。

第二種前途：衝突繼續。這也可分為兩種情況：(1)衝突持續，既不加劇，也不消失。它取決於雙方在枝節問題上的爭持不休——前者不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後者為保全面子，既不對前者發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認其合法性。(2)衝突擴大。在學生方面，可能因為有了新的動力。這種動力，可能是一種新的，在有限時期內可以看到結果的鬥爭目標或口號，即獲得「新戰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組織形式或同盟軍方面有了新的增強，即在力量方面帶來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憤怒下滋生出的勇氣。而這種原因造成的反應，其激烈程度會超過前兩者，但它發起的衝擊卻沒有前兩者來得那樣有後勁，一般在情緒發洩完畢之後，也就偃旗息鼓。另外，衝突的擴大也有可能來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縮小與衝突方的「一致」與「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對「壓力」逐漸失勢的事實，把先前的「讓步」作為殺「回馬槍」留下的轉身餘地，對學生實行秋後算賬，那麼，它也就必然會招致學生們的反彈，衝突由此得以擴大。

在這方面，讀者將會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它翻來翻去，也不能逃脫歷史為人們劃定的領地。

第一節 追悼會以後——第一個調整期

三雙支撐男子漢尊嚴的膝蓋

在你面前悲壯地跪下

撞開了共和國自尊的傷痕。

一份血寫的諫書

在國徽前高高舉過頭頂

牽動著陣陣悲楚的哭泣。

哀樂低徊 悲風凝滯 春日暗淡 長空悲泣

你 睡意猶濃 夢眼迷離

吞吐著幾縷渥濁之氣息

默默不語。

邪惡的皮帶 抽紅了長安街的黎明

抽碎了中國人善良的夢境。

陰險的鐵蹄 踢殘了四月的鮮花

踐踏了人權的綠意。

卻喚不醒你淪落風塵的輿論工具

玷污了學生的清白 蒙騙了市民的感覺

傲慢的官吏 強姦了純樸的民意。

人民將理想砌進你公正的石壁

希望公正在你這兒誕生；

人民用愛心爲你栽花種樹

希望博愛永遠溫馨碧綠；

人民用信任爲你鋪成世界最大的廣場

希望自由像風一樣開明

你卻酣睡不醒。

……

浩蕩的春潮

震醒了夜寒凜冽的大街

乾枯的老眼

漲滿了灼熱的義憤

失望的桅桿

重揚起斬浪的風帆

你卻酣睡不醒。

純情少女

寫下了無淚的遺書

孱弱的書生

擎起了罷課的新旗

V形手勢

在英雄樂章中找到了新的和諧

平平安安回家

是慈母凝煉的祝願

你卻酣睡不醒。

莫非你威嚴的大理石已被貪婪蛀空

你正直的台階已被特權踏破

你豁達的胸襟已被淫慾填滿

你耀眼的國徽已被卑鄙腐爛

人民將忠誠注進你平等的地基

希望平等 從你這兒發源。

……

醒來吧！人民大會堂

假如你還屬於人民。

醒來吧！

假如你願意

一代精英用堅強的膝蓋支撐

中華的信心 民族的榮譽

在世界上永遠自豪地屹立！

醒來吧！

假如你還屬於人民！

——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師範大學大字報欄裡新增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醒來吧！人民大會堂》，署名「野夫」。它用詩人的語言，表達了學生的心願、純情、意志、不平與疑惑。

「四二二」以後，傷心、失望、悲憤與尋求發洩的情緒在校園裡空前地聚集著。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師大、化工學院、郵電學院、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農大、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二外等十所學校的學生均舉行了校內遊行。天津南開、天大、外貿學院、紡織工學院等學校也有一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要求「嚴懲『四二〇』慘案兇手」，「打倒官倒」、「消除腐敗」，「公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示威遊行自由」。在人大校園裡，貼有記述「四二二事件」經過的大字報，宣布「對當局徹底失望」。北大貼出了《北洋軍閥尚且接見北大請願學生代表》的大字報。

在罷課繼續的情況下，各校還各自提出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廢除原學生會和研究生會，及搶佔校廣播站的要求。同時，北師大、清華、北京經濟學院、中央美院學生也開始了募捐活動。下面是一位新華社記者記述的一個募捐場面：

在積水潭地鐵出處，牆壁上貼著一張大字報和一張四月二十三日的《科技日報》（《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大字報寫著：「我們團結必勝，援助我們！！我們早已欲哭無淚，現在只有一腔熱情和無限勇氣。我們現在血也流了，跪也下了，但我們絲毫沒有使統治者麻木的神經得到一點刺激。我們決不罷休，我們已經罷課，用你們的錢和我們的勇氣和行動結合在一起……」

有一位女青年從摩托車上下來，拿著面值一百元一張的人民幣，塞進募捐箱。從十八：二〇到十八：五〇，半個小時內三十七位圍觀羣衆捐款。除那位女青年，最多的給了五十元，最少的一元，大部分是五元或十元，旁邊賣飲料的小販不時送汽水、雪糕給學生。

有羣衆問學生，衝擊新華門到底是怎麼回事？清華幾個學生說：衝擊新華門時我們沒有去組織，是一些圍觀者硬推著我們向新華門擁去的。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到新華門是爲了讓當權者知道學生強烈反對政府的腐敗。

另有羣衆問，爲什麼要募捐？清華兩學生說，我們用募捐的錢來買喇叭、紙張和油墨，以便向羣衆宣傳我們遊行的實際情況。另一學生說，我們已經印了幾百份傳單，現在

已經沒錢了，希望羣衆理解和支持。當天下午二：三〇，人大校園還出現一則「最新消息」，稱「當局已調王牌軍三十八軍入京」。

在進行上述活動的同時，學生對一周以來學運也進行了反思，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目標和手段的重新認識。四月二十四日，北大「五四」操場上甚至發生了學生領袖互相攻擊的事件。師大也貼出了《當心被收買的學生貴族》的大字報。「四二二」以後，作家鄭義也明確向郭海峯、王丹、熊焱提出，儘可能不要與方勵之先生夫婦接觸，一是爲了「保護」方先生夫婦，二是爲了學生的自我保護^②。同時，在新聞界的圈子裡也有謠傳，方勵之曾到廣場去過，但被他的兩個朋友架走。

與這些因素相關聯，新成立的北京高校統一組織由歷來學運的中心北大移向了中國政法大學。這是自「五四運動」以後七十年來第一次發生的現象。從一周以來北京各高校的自發自覺行動中，北京高校的學生運動開始醞釀出多個中心，其中最顯著的是中國政法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雖然前者也有很深遠的「北大淵源」，但這一次它畢竟不再在「北大」的名字下，而是自己充當起今次學生運動的脊梁骨。有人因此而評論說，以往的學運旗幟是「自由」、「民主」，而這次的旗幟卻是「法制」，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學生將他們的專業精神灌注到現實政治生活中去，是不無關係的。

至於北師大「紅杏出牆」的原因，有人也曾作過玩笑式的回答：北師大的教師、學生要爲被評上國家教委的「先進單位」一事「雪恥」。因爲，國家教委被昏庸頑劣的何東昌把持，是當時中國

最黑暗的、散發著殭屍氣息的衙門。至於北大為什麼暫失「龍頭」作用，可能與各種政治勢力對它的滲透，主見太多有關係。因為，就行動的優劣而言，一百個將軍組成的隊伍，往往敗北於一個團長率領的軍隊。作為思想、意見的自由樂園，當然不會產生良好的軍士。

二十三日晚，前北大研究生、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兼職人員劉剛，與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政法大學生王志新等二十九所高校學生代表在圓明園召開會議。會上總結了二十二日請願的情況，認為學運發展到這一步，應該產生一個自己統一的組織。當場決定成立「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簡稱「臨時學聯」），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宗旨；近期目標是把學運繼續下去，長遠目標是爭取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化。會議選出政法大學生周勇軍為執行主席，北大王丹、師大吾爾開希、清華張銘、人大胡春林、民院張啓才、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馬少方等六人為常委。

此前成立的北大學生自治組織「北大籌委會」表示服從「臨時學聯」的統一指揮。臨時學聯選出當日，就決定派出三百名學生，到上海、南京、廣州、蘭州、長沙、太原、濟南等地，與這些地方的高校取得聯繫^③。

從同期的一些大字報，我們可以了解到新的共識是如何形成的：
北大一張署名「地球之子」，題為《伯樂相驢——與政府聯合起來》的大字報說：

政府其實是頭叫驢，我們本是用它來拉車的。可它現在變得好吃、貪睡、懶做、脾氣還倔，動不動還刨蹶子。把它賣了，重新買一頭吧，還不成。市場上還產不出別的驢。把

它殺了吃肉，更不成，而且太酸。只好用胡蘿蔔加大棒，把它馴好。胡蘿蔔是人民的擁戴，而大棒，則是人民的抵制和抗議……我們所作的就是讓人民覺悟，去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的目標決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督促它，乃至幫助它前進。我們的統一戰線也可以包括它嘛！……中國有句話，叫惱羞成怒，很有幾分道理。我們要它著惱，要它識羞。但要把握分寸、火候，要有階段性，不能讓它成怒，否則，這驢子來個驢驚了，豈不糟糕！……

當然，這驢很不好馴，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耐心。至少得比這驢更有耐心吧！而且，驢畢竟是驢，不能指望它太通人性，所以要講策略。別指望一夜之間它就能到馬戲團去表演、賺大錢了。動作，要一個一個地學嘛！特別是不能讓踢著，它肥得很，有的是力氣咧！

下面，也是一份來自北京大學，誕生在同一時刻的理性思考的清單：

思考：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應該怎樣行動？

連日來，愛國的民主運動使我們備感振奮。但我們不應光有熱情，還應有冷靜的頭腦。我們的愛國運動的宗旨是什麼？我們的目的顯然不是否定黨的領導，也不是否定現有政府。我們的目的是推動民主，推動改革，清除腐化現象，使我國早日富強。由此，我們

在近期内所能達到的目標又能是什麼呢？我們認為：

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學生利益的，並為法律認可承認的學生自治組織。

二、該組織應具備：

- (1) 有為法律可承認的號召組織罷課、遊行的權力；
- (2) 能有自己為法律所承認的公開出版物。

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權力的取得，是推動愛國民主運動的最基本條件，為達到這些目標，我們是否應該這樣做：

- 一、必須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權威領導；
- 二、整個這次活動的目的，不宜太分散，要考慮實現的可能性；
- 三、要有嚴格的糾察組織，提防別有用心的人從中搗亂；
- 四、在任何情況下堅持非暴力原則；
- 五、在嚴密的組織下，以嚴格的方式多作宣傳，爭取廣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 六、與全國高校取得廣泛密切的聯繫；
- 七、學生自治組織的活動經費，難道只能靠募捐嗎？考慮西安、長沙發生的暴力事件，應引為借鑑。希望我們考慮事情應該慎重，不要為壞人所利用，更不要讓社會與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對立起來。我們有義務維持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安定。

這張大字報的署名是「部分研究生」。另有一張寫在同日的大字報，則告誡學生不要為別有用

心的人所利用：

學生運動與拐杖——再談策略

……歷史上，學生運動極易成爲政治投機的工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學運本身的弱點決定的。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具有最大的狂熱和失控性，但只有毛一個人能駕馭它……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學潮的大方向本來是「民主」，但最終導致胡耀邦下台和反自由化，成了不利於民主的結局。單從這個意義上講，學潮幫了倒忙……學生運動無數次成爲政客們手中的拐杖，被得心應手地用來打擊一些人，扶植另一些人，那麼這一次呢？……我們不能等到再出現一個胡耀邦時才來反省。

我很想知道那些率先把矛頭對準李鵬的人真實身分和動機，我從那種仇恨性的煽動和挑唆性的叫囂中，覺察出一種似曾相識的陰謀，一種旨在改變民主運動大方向，並把它引向換湯不換藥結局的陰謀……我們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而不是撤了張三，再換上李四，一切都依然故我，隨意打倒的危險性還不只此，它還會成爲惡毒攻擊的罪證，並爲大規模鎮壓做鋪墊，從而半路斷送我們的事業。

同學們，隨時警惕陰謀家和騙子！

我們決不做任何人的拐杖，我們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在這張大字報的下面有一個批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字報。請同學們讀後三思。署名「北

京市教育局一幹部」。

「這一次呢？」這個問題現在看來，人人都會感嘆事情不幸被他言中了。但當時處在中國高層政治局外的人，並沒有什麼察覺。因為，就在這張大字報問世的前一天，可能也正是作者書寫之時，我們的總書記正坐著專用列車，去訪問東方一個世界上僅存的左得可愛，並對中國有忘恩負義行爲的小國。在這次悼念他的前任的活動中，他似乎看準了要吸取亡者的教訓。在「四二二」學生請願時，他從大會堂樓頂俯瞰過這支如同深淵一般的隊伍，然後同幾個「智囊」一起打高爾夫球去了。這一次，他想做到萬無一失！

第二節 江澤民與北京對表——《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就在趙紫陽慎之又慎，以圖身免之時，他未來的接班人卻陷入了新的微妙之中。他所轄地區的一份報紙，迫使他從沉默中登台亮相了。事情發端，就是「八九民運」中新聞界的第一件大事——《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創辦於一九八〇年六月，是由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共同主辦，經上海市委宣傳部批准的一張報紙。創辦期間，得到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錢俊瑞的支持，在北京有老資格的經濟學家宦鄉、陳潮笙、薛暮橋、許滌新、于光遠、馬洪、徐雪寒、孫懷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級顧問。在改革開放的八〇年代，它以思想解放和理論探索方面的大膽，積極配合中央改革派領袖人物的言論，不斷主動開拓新聞主題，在中國的新聞界獨樹一幟，尤其受到

改革派及思想理論界人士歡迎。在人們痛惡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中，它堅持獨立的立場，巧妙頂住上方的壓力，被譽為「善打擦邊球」的能手。為此，它也早就成為上海和北京保守派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一九八三年，《導報》因發表南京一經濟研究者的探索文章，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某學者狀告中央意識形態權威胡喬木。他所列舉的經濟理論界二十四條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論文摘要，其中有十八條出自《導報》。《導報》因而被指控為「犯有方向路線性錯誤」。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運動落馬，一系列的人事更動對《導報》也極為不利。但該報同仁抓住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改革方面的競爭心理，用外電綜述形式刊登了《克里姆林宮頻頻吹出改革之風》的消息，又被意識形態權威批了「別有用心！」四個大字。官司由外交部一直打到當時任總理的趙紫陽辦公室。由於報紙為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在國內形成較大影響，故上海市委雖於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兩度派員對其進行整頓，也未能對其最終下手。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導報》又以刊登蘇紹智在中宣部、中央黨校和社科院聯合舉辦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摘要而獲罪。這篇發言中講到，在十年前「真理標準討論」和改革開放理論探討方面立下過功勞的人為什麼受到不平等待遇；「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改革中的兩次重大失誤；目前理論界仍存在禁區和宗派把持；以及學術自由是改革成敗的生命線等問題。該次會議未准許《導報》記者參加，但他們從蘇的手裡獲得了這份發言稿。該文發表後，有關報紙便接到中宣部的電話通知：不准轉載《導報》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三版上刊登的蘇紹智的文章。此後，總編輯欽本立的命運一直是個未定之數，外界紛紛謠傳，他可能會被免職。但到底

是採取免職形式，還是採取「離休」方式，當局顯然還舉棋不定。因為該報上下團結一致，已形成一種高度認同和協同整體，外人派進來無用，新選拔上來的可能比「老闆」更不好對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導報》還公然發表了與李鵬《政府工作報告》「治理整頓」方針唱反調的千家駒的文章——《走回頭路不是沒有可能的——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上海市委尚未及處理這件事情，學潮已經爆發了。因此，直到胡耀邦逝世，對於上海市委來說，《導報》問題懸而未決。

四月十七日，香港有報紙登載了《導報》將開闢專欄紀念胡耀邦的消息後，政治嗅覺敏銳的上海市委立即引起警覺。為此，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派出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宣傳部長陳至立找欽本立談話，要求其將最近的一期報紙清樣送審。欽答應第二天一早送到，但經再三催促，方於該日下午送到。這就是第四三九期的A版。在審閱過程中，市委領導覺得該期報紙用整整六個版面報導的「四一九座談會」發言記錄，有些內容在報上公開會造成「思想混亂」。確切的說，主要是嚴家其和戴晴的發言不宜見報。還指出，小範圍座談會上發表個人意見可以，但有些不符合事實的東西，一旦見報，就會成爲一種宣傳，產生「輿論導向」的作用。有些發言記錄未經本人審閱，是「不慎重」的。之後，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和《導報》名譽理事長汪道涵找欽談話，要求四三九期部分内容須經刪節後才能發行。

據說，欽本立當時答應照辦，並打電話給有關部門，要求停印、停發這期報紙，待修改後再印發。而電話打出時，報紙已按照與印刷廠的協議，「十六萬份已全部印完了。」^④

按常規，上海的讀者每個星期天的下午才能讀到《導報》，但汪道涵在那個星期天（二十三日）的早上就發現，未經刪節的四三九期《導報》已經送到他家。而香港《南華早報》等海外的一些報紙卻在

第二天刊出了《導報》被「沒收」、被「查封」的消息。《美國之音》等外國電台也相繼報導了這個消息。

在中國的地域文化中，有幾個明顯可以進行對照的現象，這就是廣東人買香港人的賬，內地人買北京人的賬，江、浙、贛人買上海人的賬，而上海人買外國人的賬。這種狀況的形成，是與地域經濟與文化的輻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正因為買外國人的賬，所以，上海市委對《導報》藉海外輿論的壓力來迫使其改變決定尤其惱火。星期天當天，上海市委召開書記辦公會議，仍然責成《導報》提出版面處理意見。欽本立雖然主觀上保留意見，但面對組織的壓力，也只好決定改排後再發行。

但是，上海市委的「書報檢查官」們，並沒有等來四三九期的新版本（B版），卻等來了《世界經濟導報》編委會的一份「緊急報告」。它談到四三九期A版已流散於世的情況。其解釋是：「當市委四月二十二日發出四三九期停印前，該報已因各種因素流失數百份之多。（據《導報》駐北京辦事處張偉國說，當人們聽說這期報紙有可能被查封時，紛紛從印刷該報的《解放日報》印刷廠將報紙偷走，並大量複印。據稱，有三百份報紙被一報販就便車批發帶走，只追回二百份。當郵局的報紙被查封時，交換和贈送管道的傳輸齒鏈並沒有停止轉動。）鑑於這種情況，報告指出，如果另行發排，第四三九期《導報》將會有A、B兩種版本流傳於世，勢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它說：「據了解，美國各大報紙已相繼做出反應，以《導報》脫期事件做為頭版消息，引起了人們對我報A版內容的普遍關注。四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內，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英國《衛報》、路透社、美國《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日本時事通訊社等九家海外新聞機構的工作人員，以此事到我報北京辦事處證實。其它國內外新聞機構在上海、北京，利用多種方式接觸有關知情人員，以證實他們得到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圖文傳真機的普

遍使用，海外報刊隨時可能刊出我報A版文章，而海外的原文必然很快流傳到學生手中，使得關心此事的學生很快可以拿到兩種版本的導報，從而可能觸發新的矛盾。」「據聞，北京一些高校已在流傳有關《導報》被「查封」、「停刊」的消息，在學生可能已實際知道A版內容的情況下，改出B版很容易引起學生包括上海學生新的更大反應，從而使事態難以控制。」另外，報告還說：「據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對胡耀邦同志重新作結論，在這種情況下，B版中改掉發言人要求重評價胡耀邦的內容，會給人造成對上海領導人的看法。」該報告在力陳發行B版害處同時，還警告這樣做可能「違反中央、國務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電〔中發電（一九八九）四號〕通知的精神」。根據二十三日市委副書記曾慶紅「三種方案都作參考，由《導報》自己決定」的精神，「緊急報告」的意見是，仍然堅持發行原版本。也許是編委會認為這樣做並不需要通過市委領導批准，因此，在報告的結尾處寫下了「專此奉告」的字樣。

這份「緊急報告」與其說是一份報告，不如說是一份「宣言」。它的功能有三：一是把《導報》與上海市委在四三九期問題上的矛盾，定位在大方向一致，僅在技術層次不夠協調的位置上。既不承認有「反黨」的企圖，也不給對方戴上一頂「干涉言論自由」或「違憲」的大帽子。二是挽回他們的「老闆」欽本立的道德名譽，由於問題出在技術環節的疏漏，老闆當然不存在對黨「陽奉陰違」，或聲言要與之絕交的「老朋友」汪道涵所說的「不守信用」。三是將上海市委對嚴家其、戴晴講話的意見擴大為「對胡耀邦的評價」問題，利用海外傳播媒介和已經興起的學潮的壓力，以及上海市委不了解京都政治內幕的矛盾心理，試圖在新聞自由方面衝開一個缺口，迫使接受既成事實。

此時，已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遠在上海的江澤民其所處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四月八日，胡耀邦犯病當場，是他緊急掏出了「急救盒」對胡耀邦進行搶救。不論政治觀點有多大的差別，至少他與胡耀邦個人之間不存在利害關係。他也許更關心另一個問題：趙紫陽會在這次學運中有什麼動作。這次學運中，之所以趙紫陽態度十分消極，黨內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輿論，要防止高層權力發生「非程序更迭」，對經濟上的「治理整頓」抱抵制態度，呼籲要防止「走回頭路」，防止「改革形勢逆轉」等等等等，這些在外界看來摸不著頭腦的事情，在江澤民看來卻洞若觀火一般。前一年年底以來，香港等地突然興起的所謂「倒鄧保趙」並非空穴來風，此「風」倒鄧是假，因為從來沒有什麼海外幾個文人的唱和能使中國改變最高權力的。中國政治奉行的原則，歷來是毛澤東的那一句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幾十年來，港台自由傳播媒體對中國政治權力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幫助中共發現和清除黨內的「異己分子」，誰被它們作爲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誰的「大限」已到。此番港報「倒鄧」是假，利用鄧對趙的不滿「倒趙」是真。胡耀邦下台時，羅列的罪狀中不是就有「疏遠兩位老人家」嗎？衆人也許對胡耀邦的上台還記憶猶新吧。那時，胡耀邦說：「雖然我擔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職務，但有兩點是沒有因此而改變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沒有變。」而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說：「胡耀邦剛才的講話證實了他是黨的主席的合適人選。」^⑤有消息說，趙的命運，在今年二月老人在上海過年時已定，而下一個接班人不是別人，正是江澤民自己。這一點也許別人不清楚，除幾個政治牌桌上的老人外，全黨都蒙在鼓裡，但有兩個人是不會不清楚的，一個是要上的人，另一個是要下的人。黨內民主派之所以

急不可捺地放出風聲，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問題向中央施加壓力，試圖透過幾個學生喊喊口號就撥轉中央的既定航向，說明他們也有所耳聞。這種局勢，對於江澤民來說，無疑是很值得他琢磨的。

現在，江澤民面臨的是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環境。第一，他在中央沒有什麼根基，不像胡耀邦那樣，做過那麼多的好事，有如此廣泛的社會聯繫。雖然他被認為是犯了錯誤，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就決定，他是絕不能在悼念胡的問題上走錯一步棋的。第二，對待學生如果過激，就立刻會引火焚身。南開大學的學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就捎帶有請校長母親光辭職的要求。現在，學生緊緊盯著李鵬，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使他有一種局外觀察的優勢，而一旦攪了進去，便難免會騎虎難下，弄個兩敗俱傷。

但是，自四月十五日以來，上海的學潮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胡耀邦逝世當日，華東政法學院就有人貼出標語「耀邦你死得太慘了，中國太慘了」。十六日，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校出現輓聯、標語、大小字報。三百餘名學生在校園周圍街道遊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十七日，兩校匯合華東師大學生共七千人走進市區，喊著「斬奸除霸」、「爭取民主」、「打倒官僚」的口號，有近千人到達市府。十八日，復旦出現大字報，要求重新評價八六年學潮，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恢復名譽，重新評價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的功績，追任他為終身總書記；並要求言論、新聞自由，公開兩會內幕。十九日，又有上千學生上街遊行。華東化工學院有中字報說「改革正處在危難中」，號召人們「像莫斯科市民支持葉爾欽那樣支持我們的改革家」。二十二日，有數百名學生在市府前靜坐，說明「四二〇慘案」，聲援北京學生。復旦有中字報稱李鵬的政府工作報

告」是向改革派發出猛烈反擊的檄文」。二十五日，上海各高校內傳播北京「四二〇」、「四二二」情況的大小字報抄件、傳單、照片明顯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導報》第四三九期上的有些內容若公之於衆，勢必把原來目標泛泛（有的「反官倒」、「反特權」輿論明顯本來是針對趙紫陽的改革思路的）的學生運動，引向黨內民主派嚮往的軌道。而這，勢必給他的接班人前途帶來險情。

但是，不論人們相信不相信這是真的，《導報》在多年中確實表現出自己是趙紫陽的「嫡系」部隊的姿態，凡是趙提倡的，不論根據如何，都是要緊跟並大張旗鼓地應合的，而凡是與趙的思路相悖的，不論其後台多硬，又必是要鳴鼓而攻之的。至少在公衆眼裡，它是趙的「鐵桿」保皇派。考慮到這層關係，動《導報》就有可能牽動趙的神經，作爲一個他的權力的未來的繼承人，這樣做是否太過猖狂？是否採取後發制人的方針更能爲中國人所接受？……

他不斷地與北京的政治時間對表。終於，他等來了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和《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這使他下決心徹底解決《導報》問題。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召開了有一萬四千多人參加的黨員幹部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的學習「四二六社論」的《通知》，除重複了社論給學潮定性的那幾句惡狠狠的話以外，還說明了上海所處的「嚴峻情況」及《世界經濟導報》四三九期報紙處理經過。江在報告中說：「市委認爲，《導報》在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在改革、開放中發了不少好文章，許多同志爲辦好《導報》作出了努力，市委許多同志對《導報》的工作是支持的。爲了讓《導報》健康地辦下去，爲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發揮積極作用，市委作出了對《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整頓的決定。決定說：「鑑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市委決定：停止欽本立同志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職務；並向世界經濟導報派駐整頓領導小

組，由劉吉同志任組長，孫恆志、張家俊同志為成員，馬達同志任顧問。《導報》整頓期間，由整頓領導小組主持《導報》工作。」同時，報告還號召「積極行動起來，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在「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題目下，規定「絕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機關串聯」，「對內容出格的大小字報、標語，要用適當方法，堅決揭去；對內容反動的，要做好取證工作」，「對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等等。

據稱，上海市委做出這一決定之後，從韓國回京的趙紫陽頗為惱怒，說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⑥。究竟是真惱還是假惱？這當然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雖然趙一直透過他的祕書對《導報》有所關切，在歷史上幾個重要的時刻有過很好的配合，但此番江澤民被動，不恰恰是為他贏得了主動嗎？

工作組進駐《導報》後，遭到普遍抵制。在它的主持下，直到四月二十七日，第四三九期B版才付印發行。在B版中，撤去了A版中刊載的「四一九座談會」發言記錄的二至六版，換上了趙紫陽代表黨中央所致的悼詞。這篇悼詞被冠以《趙紫陽號召學習胡耀邦》這樣不倫不類的題目，讓人感覺到兩個政治命運類似的人之間那種惺惺相惜的淒涼。此外，還刊登了《十一億中國人為你送行——耀邦家庭靈堂弔唁活動紀實》、陳退之的《要引導輿論，首先要開放和活躍輿論》、錢辛波的《輿論監督是新聞的職責，不是恩賜》，及《上海高校教授評估教育形勢》、《公民討論修憲，維護憲法權威》，和海南問題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接任者不想太大地改變《導報》已經樹立起來的報風，但是，在這個已經到來的無比活躍的形勢面前，它已經不能再發揮其敏捷的特點了。

第二節 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

就在上海的江澤民靜觀形勢，等待中央的反應之時，他在北京的競爭者卻加緊了動作。「四二二追悼會」以後，北京市委頻頻召開會議匯集與分析高校形勢。在四月二十三日六十七所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向與會者提出要求：對學生中流傳的謠言要堅決予以澄清；做好教師、黨、團員、積極分子的工作，以穩定局勢；各校黨委、校長、學生會、共青團對學生的一些錯誤做法，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對學生與校領導對話的要求可以答應；屬於國務院部委的學校要主動爭取各部領導^①。可惜的是，他們錯誤地把這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認作是學生聽信了一些「謠言」所致，而不認為謠言惑眾本身就是社會疾病的一種徵候，而學生此番胃口很大，並沒有什麼人要求和校領導對話而得不到滿足的情況。在李、何再次想祭起所謂「黨、團員、積極分子」這種中共在幾十年統治中搞階級鬥爭，挑起羣衆的「法寶」之時，他們也不了解：黨，在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自己的優秀分子、持不同意見者、非同一般宗派的活躍人物排出體外後，廣大黨、團員對它的核心的失望，以及對這種體制的憎惡。他們更不了解所謂「積極分子」的成分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實際上成了一羣思想保守、目光短淺、不學無術、唯利是圖，圍繞著權力打轉或依仗權勢為生的羣體代名詞。

這樣的決定，當然有了等於沒有。事實上，它也根本沒起任何作用。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召開黨的「常委會議」，認為北京市的學潮形勢已十分嚴峻。雖然胡追

悼會得以順利進行，但動用上萬名軍警保衛黨的領導人舉行追悼會，是中共建國以來史無前例的。其結論是，目前的事態並非偶然，而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地下組織、非法組織猖狂活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大量確鑿的事實證明，儘管大多數學生有推進民主的善良願望，但就實質來說，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鑑此，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出建議：一、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對當前事態表明態度；二、中央報刊等「宣傳輿論工具」，必須堅決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大力配合，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聲勢，扭轉當前的被動局面；三、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羣衆，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四、建議黨中央、國務院儘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解決羣衆長期以來議論最多、反映最大、意見最集中的一些問題，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羣衆，贏得黨心民心……當晚，在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建議下，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了北京市的彙報。據稱，「會議一致認爲，當前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決定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⑧

中央同意了北京市委爲學生運動的定性。爲什麼沒有同意北京市委的請戰？這始終是個謎。這也許與觀點上的細微差別有關，也許與複雜的權力分配事務有關，但其中也與趙紫陽始終尚未公開表態不無關係。但後來北京市委和李鵬之流一再強調是趙耽誤了「制止動亂」的時機，甚至認爲是趙在縱容「動亂」，那純粹是出於權力鬥爭需要，嫁禍於人的一種說法。因爲，從權力範圍內應有的職責來看，北京市本來就負有安定一方的責任，即使上交中央，那也是政府的事。趙紫陽已於一

九八七年「十三大」把總理職位讓給了李鵬，雖然他當時並不情願，但無論是從黨政分工還是個人道德的角度而言，他也沒有一輩子要為李鵬「擦屁股」的義務。北京市委和李鵬之所以對趙的確存在的「曖昧」恨之人骨，說穿了是恨趙沒有胡耀邦那麼「憨厚」，他不是一個願意讓人輕意拉下馬的人。而北京市的「二X」（希、錫），也許正在為下一輪政治局常委的交椅而發愁呢！

關於對「八九民運」定性的這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前後背景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參閱當時身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成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的一段回憶：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趙紫陽按原定日程離京去北朝鮮訪問。他啓程時還對李鵬講：對同學們要採取疏導和對話的方針，不要激化矛盾。但是，李鵬一夥早已另有打算。趙紫陽前腳離開北京，他這裡後腳就開始了進一步的行動。

四月二十四日夜裡，李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由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個早就準備好的、系統的長篇講話。其講話集中起來就是兩點：第一點，學生是被少數壞人操縱的，他們的矛頭是對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對準老同志，特別是小平同志的。最惡毒的是，他拿出一些青年學生為了發洩氣憤和不滿所畫的一張「關係圖」，圖中寫到，李鐵映是鄧小平的私生子^⑨，竊據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要職。同時，他又縮小事態，說只有一、兩萬人參加運動，人不多。他的第二點的主要意思是說，而對這樣的局面，中央主要領導人卻軟弱無力。壞人已經在攻擊我們老一輩革命家了，攻擊小平同志了，怎麼能縱容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當時，胡啓立說：「我建議我們還是聽聽羣衆

的意見。」王震馬上說：「爲什麼不聽聽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其他人就都不開口了。實際上，從四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三日之間，中顧委、中紀委的老人已經進行了非常廣泛的活動。他們把學生在不滿、激憤的情況下喊出的一些口號拿出來，作爲學生運動的代表性口號，企圖否定整個學生運動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在這次會上，李錫銘講完後，國務院新任祕書長，李鵬的親信羅幹又出來講了話^⑩。

——從陳一諮的回憶可以看出，即使是主張嚴辦學生的黨國要人（鷹派），他們也仍然不可能承擔責任。他們裝好了槍藥，卻需要尋找一個扣動扳機的槍手。這個人是「老同志」，但又必須不同於那些被改革開放「幹部年輕化」政策削奪了權力的「老同志」，他應該既有承擔責任的威望，又有實際控制的權力。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國家主席楊尚昆與總理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向「退居二線」僅保留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的鄧小平作了關於學潮情況的彙報。根據他們提供的材料和觀點，鄧作出指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⑪。」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地反對和制止動亂。

鄧小平講話的當天下午，中央各新聞單位負責人被召集到中南海，由政治局常委胡啓立傳達鄧小平講話。同時宣布，中央已成立兩套班子，李鵬、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喬石、胡啓立、李鐵映分管制止學潮和動亂。當晚，鄧的講話被傳達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要求第二天（二十六日）傳達到本單位，二十七日傳達到北京市民^⑫。

當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出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篇「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羣衆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羣衆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誣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

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有的在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爲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認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爲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會變爲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爲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污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

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這篇社論有四個要點：第一，是把學生和羣衆在悼念胡耀邦期間和之後，凡與悼念活動無關的行爲與純粹的悼念活動區別開來；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議行爲與刑事犯罪活動混同起來；第三，是把對黨的領導人的個人攻擊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第四，是把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的具體要求與「民主與法制」的抽象概念對立起來。然後，以一個「有計劃」的「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的帽子，強加在這場學運身上。雖然，在事後看來，它關於「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反對腐敗，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爲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不幸被言中，但它對其中道理的諱莫如深，對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在追求這些目標時合理合法的參與權力的避而不談，都表現出一種難以令人接受的「獨斷」與「專橫」的色彩。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難道不可以反問：一個沒有人民參與意見的「民主與法制」社會，是健全的民主社會嗎？一個排除了人民的意志自由，所建立起來的現代化，是全面的現代化嗎？如果反對

共產黨內確實存在的「專制」、「腐敗」就是否定共產黨，共產黨在本質上與這些東西難捨難分的話，它還有什麼權力來領導中國人民？如果社會主義就是他們所要維護的極少數人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的話，它又有什麼理由要在這個地球上永世長存呢？

當然，社論播出之日，人們並沒有細究其中的道理，大多數中國人的第一個感覺是「似曾相識」。的確，當思維被禁錮之時，記憶就顯得愈發的敏感；當推理不能遠行之時，經驗便成了最可靠的的朋友。人們僅僅根據條件反射，便從這篇社論中嗅出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鎮壓前的空氣，那段剛剛過去十三年的歷史對他們來說仍然記憶猶新：

先是有「謠言」^⑬，然後又有所謂「誣告信」^⑭，接著，「四人幫」斷定這些都是「矛頭對著毛主席的」；再然後就是有人「藉悼念」總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人幹的呢？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看來有個司令部」^⑮；當四月四日，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時，姚再次給魯打電話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當晚，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的活動，有人說，「在紀念碑前送花圈二千零七十三個，單位一千四百多個單位次，……詩詞、悼詞、小字報，有四十八起是惡毒攻擊主席、中央的。」會議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鎮壓前（四五），天安門廣場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北京市長吳德的講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其實只提到秦始皇），指向黨中央（其實只指向竊取中央權力的四人幫中的張、江、姚三人）……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全市革命羣衆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

破壞活動……」四月八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所謂「工農兵通訊員」和該報記者的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說「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⑩

——從過程、思路到語言，都如此地相像。只不過上一次用的是「一小撮」，這一次用的是「極少數」；上一次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這一次是以「社會主義法制」的名義；上一次是要保衛毛主席，這一次是要保衛鄧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革命羣衆和革命幹部，這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細微的差別，多少表現了時代的進步，同時也表現了這個黨在兩個時期的社會基礎的差異。但它們本質上都是蔑視人民的權力，壓制不同意見，絲毫沒有現代政治的氣息（後者只是在利用現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褻瀆其精神和實質）；都是迷信武力，採取惡劣的高壓、恫嚇和「鐵腕政策」；都是在企圖用莫須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敵……不過，上一次還賺得了各地黨政軍以上街遊行爲形式的「支持」，這一次的效用就遠遠不及了。誰要鄧小平一上台就爲「天安門事件」平反呢？人們不再相信那個經常叫喚「狼來了！」的孩子了。

「四二六社論」以「法」的名義，爲武力鎮壓製造了輿論。但在當時，按「法」的要求它所提供的證據中，只有西安、長沙兩起與學生運動完全無關的刑事犯罪活動；而且在這兩起活動中，新華門《通告》中警告過但並沒有發生的，要依法制裁的打、砸、搶、燒行爲一應俱全，時間恰恰發生在政府「容忍和克制」的時間下限^⑪。這些因素，以及報導中提供的一些現象之不合情理，使人們不得不想起另一個故事，那就是半個世紀前，在西半球另一個與中國同樣具有邏輯思維傳統的國家裡發生的「國會縱火案」^⑫。下面，是關於西安、長沙動亂中的一些疑點所在。

先看西安：

「四二二事件」實際上發端於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一日那天，少數不法分子藉青年學生和廣大羣衆在新城廣場悼念胡耀邦之際，開始起鬨鬧事。下午六時許……推倒省政府大院臨街鐵柵欄，衝到辦公大樓門前。晚十點三十分左右……××、××、×××、×××、×××用三輪車拉走掛在廣場中心旗桿上的一個花圈，邊走邊喊，狂呼亂叫，行至鬧市區東大街時，尾隨圍觀羣衆超過千人。此時，混雜在圍觀羣衆中的一些社會渣滓，開始對過往公共汽車、電車、出租小轎車投擲石塊，磚頭砸碎車窗玻璃，推翻路面隔離墩和人行道上的垃圾箱，砸壞三個交通崗亭……（「砸」已有確鑿證據了，接著）晚十一點十五分，不法分子在解放路企圖搶劫西安金店，因店門結構牢固而無法下手，便轉而衝向對面的解放百貨大樓，砸碎三個櫥窗和裡面陳列的化妝品；晚十一點三十分，一些不法分子衝入火車站廣場，砸碎十二個夜間商店的營業櫃台，哄搶了價值一千多元的商品和二千多元營業款，還破壞了旅客接待站、出租汽車調度亭。晚十二時許，一些人衝入候車大廳，砸爛六個營業櫃台，搶走高級香煙等商品。由於公安幹警採取果斷措施，當場有十八名罪犯被抓獲（「搶」也有了證據了。於是當夜無事）。

四月二十二日，從上午十點開始，不斷有人扔皮鞋打執勤人員，繼而又向武警和公安幹警投擲磚塊、石頭，並反覆衝擊政府大院西門，（這是「打」的證據，接著）執勤人員只好開來兩輛卡車（為什麼要開來有易燃物的卡車？），堵住西大門，阻擋人羣衝擊。下午一點三

十分，不法分子……點燃了一輛卡車上的篷布，縱火焚燒省政府信訪室、傳達室。下午三時許，歹徒們再次（！）點燃了封堵在西大門的卡車，前往滅火的消防車被砸壞，消防戰士被打傷。隨後，一夥人又推倒西門圍牆燒毀一輛卡車，執勤人員迫不得已進行驅散（不僅有了「燒」的證據，還有「毀」的事例了）。下午六時十分，一輛乘坐台灣同胞的旅遊車路經廣場時，車窗玻璃被砸，個別台胞受了輕傷（造成海外影響）。

晚七時以後，少數不法分子又推倒臨街圍牆和鐵木大門，衝進省檢察院和省高級法院辦公院內，燒毀了停放在院內的一輛豐田越野車，並把車庫內的三輛汽車推進烈焰中，還縱火燒了存放汽油、煤氣罐等物資的庫房……並衝進辦公樓，瘋狂毀壞辦公用具、砸電器、燒文件、搶財物。

晚九時以後……砸碎雅園商店門窗，燒毀一輛公共汽車，衝擊電訊大樓。

當新城廣場的打砸搶事態基本得到控制後，被驅散的少數不法分子從……向……逃竄，一路推圍牆（！），砸商店，燒汽車。到九點四十分左右……天天時裝店遭到雨點般石塊的襲擊……幾十個不法分子……從窗口跳進店內，打傷值班人員，將成捆的時裝扔到窗外，搶走……一家僅有八十平方公尺的高級服裝店被砸搶一空，損失約二十多萬元……

在這次打砸搶燒事件中，不法分子共燒毀、砸壞汽車十三輛，摩托車二輛，燒毀房屋二十間，破壞商店十四家，還毀壞了不少辦公用具和其它物品，直接造成經濟損失一百二十多萬元……打傷武警和公安幹警二百一十三人，其中重傷三十八人……事後公安機關共逮捕五十七人，其中主犯王軍……判處死刑。

——筆者相信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由李雲、岳風等編著的《顛狂的蛇年之夏——八九：學潮、動亂、暴亂紀實》對於「西安四二二事件」的記述，是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事實上，在大約同時出版的關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國內諸材料中，此書在編排的周密性，事件敘述時的盡可能客觀，以及佔有資料方面，均超過其它版本（教委本也比較詳細，但它的特色在於對學校情況的掌握）。正是他們細緻周密的勞動，為我們下來的分析提供了基礎。

顯然，「西安四二二事件」是不法分子幹的。不論幹這些事情的人，其原來身分是工人、農民，還是幹部，因為他們的行為直接觸犯刑律，我們都不可能把他們看作「無產階級」或「可靠的同盟軍」幹的；同理，如果原來身分是學生的人，一旦觸犯刑律，他也立即成了不法分子，他的行為由他個人負責，如同前者的行為不代表他出身的階級、階層、集團一樣，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上述報導表明，這些犯罪活動與學生無關。這就在法律事實上排除了學生運動與事件的關係。但是它卻與政府和警察有關。因為，據說，「陝西省政府在大批學生未離開現場之前，為了避免激化矛盾，一直保持忍讓、克制的態度^⑧。」請注意，「忍讓、克制」，這是中央對天安門廣場上悼念胡耀邦的學生所採取的態度。因為這是政治。但陝西省委面臨的是另一個問題——法律。法律是不能容許對犯罪活動的「容忍」和「克制」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對犯罪的容忍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就是瀆職！這是人類社會通理。

另外，前面講到「避免矛盾激化」，誰和誰的矛盾呢？常識告訴我們，矛盾是一對一對的，守法和違法是一對矛盾，護法和違法也是一對矛盾。在對待違法問題上，守法與護法是一致的，它們與違法是一對矛盾。無法理解的是，守法者與護法者怎麼成了一對「矛盾」呢？但是，在「西安四

「二二事件」中，這一荒謬絕倫的邏輯竟成了事實。而且只有理解這一事實，才能理解：為什麼在長達三十個小時（從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到二十二日晚十時）的犯罪分子活動中，警察的影子卻很少見到？世有犯罪，然後有警察，他們是作為一對矛盾而存在的。但此時他們到哪裡去了？是放假了？還是只注意學生去了？根據記述，到了二十二日「下午二點三十分，當事態趨於惡化」時（省政府起火以後），西安市公安局才「先後發出通告和緊急通告，在新城廣場反覆廣播，要求圍觀羣衆迅速離開現場，嚴正警告不法分子立即停止破壞活動」。直到「下午四點三十二分，爲了制止犯罪，保護人民利益，省政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採取了平息事態的果斷措施」。但是，我們仍然看到，就在「果斷措施」之後，不法分子在象徵法律權威的檢察院、法院內肆虐橫行，仍然如入無人之境！

從四月二十一日的犯罪事態來看，主要發生地點是作爲每一個省府警衛要地的市中心廣場和火車站廣場，在這些地方，是不應該有警力不足的問題的。我們假定在市中心有許多悼念的學生和圍觀羣衆，晚上因照明不足怕誤傷無辜，「激化矛盾」。那麼，火車站廣場呢？總不會也是人山人海，遍布學生吧！但是，記述表明，不法分子在「衝」進去以後，至少痛痛快快地砸、搶了半個小時。後來一舉被殲，但記述未標明時間。

這就使我們原先假設的「政府愛護學生」，以至於「愛屋及烏」的猜度失去了根據。而且，在這方面，記述者也未給我們留下遐想的餘地，請看下文：

第一，「四二二」事件事實上是從四月二十一日晚就開始。當晚，不法分子拉著學生放在廣場的花園，沿街打、砸、搶，直到火車站。在這個過程中，廣大學生並沒有在場。

第二，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不法分子就開始尋釁鬧事……大專院校的隊伍是下午一時半左右才陸續進入廣場，他們有組織地集中在廣場正面（根據坐北朝南的習慣，我們理解「正面」為南）和東側……而滋擾鬧事，主要發生在廣場西側……

第三，學生看到打砸搶燒的不法行徑後，許多人表示震驚和不满……於下午三時半和五時左右……先後有秩序地退出了廣場。^②

此外，記述者還告訴我們，有三十一名學生因圍觀與不法分子混在一起，也被執勤人員強行帶離現場，可見，「容忍和克制」與學生不學生的並沒有什麼關係。

二十一日彼「抓獲」者有十八人，佔總被捕人數五十七人的百分之三十一，那麼，第二天，當這些人的贓物被追回後，他們是被放了還是沒放呢？如果沒放，那麼，第二天作案要犯落網者僅三十九人，我們能相信三十九人有那麼大的能量，幹出那麼多高强度、高體力的犯罪活動嗎？我們如不相信他們個個有氣功武術，就只能相信，由於政府的「容忍、克制」，許多不法之徒已逃之夭夭了。另外，有三十八名武警和幹警受重傷，他們如果不是一對一地在搏鬥中光榮負傷，那麼，他們有許多人挨打也是白挨了。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要理解以上事實是有困難的。我們只能假定西安城市太大，人口太多，交通極為不便，通訊設備因經費不足而不能更新，或警察隊伍青黃不接，未受過訓練不敢貿然拉出與極端殘忍（不斷有案例表明陝西犯罪的殘忍）的對手相搏。我們還可以假定省政府的西門圍牆是泥土築的（黃土高原特產），省檢察院和法院的圍牆，不法分子「一路」所推的圍牆也均為土築！但是，這合情理嗎？！

實際上，只有一個假定是符合政府的前後邏輯的：那就是他們有能力制止不法行爲，但在這之前，它要讓學生受到教訓！

長沙的情況也如出一轍，地點同樣是在市中心廣場和火車站廣場，不過歷時稍短，只有六個小時（二十二日晚七時至二十三日凌晨一時），但直到二十三日零時，廣場的歹徒仍「亂打亂鬧」，如入無人之境。「凌晨一點，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緊急出動，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戰鬥，共擒獲百名不法之徒」。長沙事件的損失是：「二十一名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被打傷，五輛汽車被砸壞，三十二家商店被搶劫……經濟損失達五十六萬餘元^①。」據稱，白天上街遊行請願的學生在事發前的下午五點三十分返校，但在被「帶離現場」的百名不法分子中，「有三名大學生」^②。

令長沙市民不解的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目擊武警和公安幹警在出動前兩個小時就整裝待發了，但奇怪的是遲遲沒有行動命令下達（假設這種機械的治安原則是合理的）。直到長沙最繁華的街道——黃興路被洗劫，事件終於蔓延到數里以外的火車站廣場。不過，透過國防科大版的詳細記述，我們可以找到某些例外：一是當一名女大學生要遭暴徒凌辱時，「三位壯實的漢子排開人羣衝了進去，挾起那位女子……衝進蝴蝶大廈……掏出證件：『我們是公安局的』」。另一件是凌晨，一夥歹徒試圖把一輛載有婦女兒童的汽車推翻點火時，「十名公安幹警及時趕到」。

——這些事件又使人感到：到底還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公安是有力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③。於是，問題就在於：誰命令他們拖延？

長沙與西安的情況如此相似，但我們不能設想前者與後者之間有一種命令關係。因為它們是平級關係。它們只可能接受上級的命令。但是，僅有這樣的判斷也是不夠的，因為，設計此事的動機

未必與效果統一，中間可能會有來自執行的偏差，其結果也完全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揭開此謎，還需現在位的人物開口。

但是，不論如何，西安的學生運動因「四二二事件」遭受了挫折，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停頓：從四月二十二日起到四月三十日，國家教委編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中，都沒有出現「西安」這個地名，表明沒有什麼「情況」。新華社直到四月三十日，才又有關於「西安大字報開始增多」的內參報導，該報導還透露，「四二二」動亂之後，各個高校都將大小字報「全部撕掉」^④。所以，不論政府如何說，他沒有說是學生在搞「動亂」，他謹慎地把學生與不法分子區別開來，客觀後果是，學生運動因此而遭到粗暴鎮壓！他們的合法權益被無理踐踏！

長沙的「動亂」時間沒有西安長，學運也沒有出現如此明顯的停頓，這也不排除可能是「具體執行時的差別」。

註釋

- ① GEORGE SIMPS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NEW YORK: T. S. SIMPSON, 1937), P. 4.
- ② 鄭義《歷史的一部分》，第二十四頁。
- ③ 市委版《平暴紀事》，第四十一—四十二頁。
- ④ 見《光明日報》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第二版文《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真相。
- ⑤ 見楊中美《胡耀邦傳略》，第一二五頁。

⑥同④。

⑦同③。

⑧同③。

⑨事實是：李鐵映為中共元老李維漢與金維映之子。金為鄧小平的前妻。在三〇年代瑞金中央蘇區鄧小平遭左傾路線整肅時與之離異。

⑩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⑪引自市委版《平暴紀事》，第四十三頁。教委版《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中無「制度」二字。國防科大版《顛狂的蛇年之夏》中在定性語句前還冠有「有預謀、有組織、有準備」的判斷。見四十七頁。

⑫《顛狂的蛇年之夏》，第四十七頁。

⑬指毛澤東批評江青「開帽子工廠、鋼鐵工廠」，打擊異己，拉幫結派的傳說。參見壬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三篇。

⑭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劉冰等人，委託鄧小平轉交給毛澤東的告遲羣、謝敬宜的信。見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遲、謝為「四人幫」派駐清華大學的軍代表。

⑮⑯同⑬，第五七七—五八四頁。

⑰「四二六社論」說，「考慮到廣大羣衆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包括呼喊「打倒共產黨」？），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態度……但是，在追悼大會後……其實，追悼會後沒有任何一件事比「打倒共產黨」更嚴重。在此使用「但書」，只能使人把「追悼大會後」看作一種重要時限，即在此之後的行為就不能寬容了。但是，因為他們的事先警告，學生已經大大地成熟起來，所以，鎮壓的時間到

了，但應有的證據卻沒有了。

⑱《辭海》「國會縱火案」條說：「國會縱火案 德國法西斯陰謀陷害共產黨人的案件。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

日，希特勒黨徒焚燒國會大廈，嫁禍共產黨人，大肆逮捕和迫害進步人士……」

⑲⑳㉑㉒㉓同⑫，第三十一—三十三頁，第三十七—四十頁。

㉔教委版《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三十八頁。

㉕新華社記者王焯彥報導。

第四章 走向高峯的學生運動

後生教先生

先生趕後生

生生不息

——北大對聯

當衝突在道義的領域展開時，有道勝無道；當權力介入道義的領域時，道義便成了犧牲品。但是，如果浮在虛空中的道義藉助有組織的力量，加上它悲劇性的懾服人心的色彩，它便可以與權力作一番較量了。

在悼念胡耀邦活動中產生，藉「新華門事件」的壓力而凝聚的北京市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自誕生以來，就使零散無節奏的學潮開始轉變為有規模、有氣勢的學生運動。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領導了「四二二」和平請願；接著，又實現了北京市高校六萬人的統一持續罷課；隨後，「四二六」社論又對它提出了新的考驗。它將如何表現呢？它說，它沒有辜負歷史！

第一節 高潮再起

「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當即引起了兩方面的緊急反應：

其一，是作為「核心力量」的各級黨政領導與作為依靠力量的「積極分子」。他們比廣大學生更早地得知了黨中央的決定和鄧小平的講話，當日下午就進入了緊張與興奮的狀態。依照行政系統，這部分人洋蔥瓣似地聚集在北京市委與國家教委的「蔥心」周圍，陀螺般地旋轉起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三〇，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市委書記李錫銘主持。何東昌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要點」……當晚，市委召開區縣局、高校黨委負責人會議，傳達了政治局常委指示、鄧小平「講話精神」及市委向中央彙報的提綱^①。同時，國家教委也召開了部分高校黨委書記座談會，教委所屬高校和其它一些重點高校的黨委書記及京、滬市委教育部門負責人也出席了會議。會

議強調，要透過艱苦的工作，「用中央的精神來提高（！）和統一廣大黨員和師生的認識，團結一致，堅決反對動亂，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要旗幟鮮明，不能讓步。」^②晚七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四二六社論」後，僅過了兩個小時，「二十一時，國家教委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認真學習和領會好這篇社論的精神。同時要發動黨支部組織幹部、黨員、教師和中學生的積極分子學習社論，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該《通知》還以高度的階級鬥爭警覺性警告人們說：「有跡象表明，有些罷課學生已開始向中學串聯，值得嚴重注意。要記取文革中的教訓，決不能讓他們把娃娃鼓動起來。必須採取措施加以預防和制止。」^③

二十六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萬名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號召反對動亂」。李錫銘在大會上講話指出：「部分學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以後進行的貼大字報、搞串聯、組織『戰鬥隊』、成立非法的學生組織等活動，是在製造混亂……我們對這場動亂不能再容忍了。不堅決制止這場動亂將全國無寧日。」他要求全市共產黨員和全市人民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發動全市羣衆同少數打、砸、搶、燒的人（北京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人）進行堅決鬥爭；嚴禁在街頭等公共場所張貼標語、演講和進行其它非法活動；要堅決取締非法組織，各單位不得爲這些組織提供進行非法活動的場所；要嚴格禁止串聯，特別要注意保護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並以「父母官」的口吻要「全市黨員帶頭做好家屬及子女的工作，以防上當受騙。」^④同日，上海市委也召開了「制止動亂」和處理《導報》事件的萬人大會。

其二，是被作爲整肅對象的廣大學生的強烈憤慨和旁觀羣衆的不滿。

二十五日當晚「新聞聯播」結束剛一個小時，「二十時三十分，北京農業大學貼出《有感於中

央對學生運動的結論》的大字報，稱「哥們兒、姐們兒、爺們兒，趕快把書扔到火爐裡去吧！去當倒爺吧！去醉生夢死吧！去放縱淫蕩吧！」

北師大中文、歷史、教育、心理、經濟、數學、哲學、生物八個系（各系百人左右）的學生，聽完社論後在校園裡高呼口號，然後數千人在校內舉行了遊行。

政法大五百名學生到街頭演講。

二十時三十分，北大學生於當日下午剛剛改選完畢，由孔慶東、王池英、封從德、王丹、沈同等五人組成的自治會籌委會也開始工作，他們第一次用設在二十八樓的自己的廣播站向全校廣播了三點聲明：(1)我們學生運動一不反黨，二不反憲法，我們的目的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學生運動決不是所謂動亂；(2)我們將繼續罷課，讓新聞界作出公正報導，嚴懲打人兇手，要求新聞立法，實現新聞自由；(3)我們反對打、砸、搶，希望同學們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搗亂破壞。一位演講者指出，「我們只要翻翻歷史就很清楚，《人民日報》曾發過無數社論，但是有幾篇社論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呢？特別是在每個歷史的重大關頭，《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社論幾乎無例外地成爲反面教材！」

⑤ 二十一時許，民院、人大有二千多名學生在院內遊行、演講。北航有三千名學生集會，聽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演講。就在國家教委的《通告》發出兩個小時以後，各校學生也收到了自己的組織的《通知》：爲抗議「四二六社論」二十七日決定舉行全市大遊行！

當晚，西安、長沙也出現反駁「四二六社論」的大字報，稱社論「謊言連篇」，並醞釀新的抗議運動。

據官方統計，二十五日晚，自社論廣播後，北京市高校有七千人頂著高壓的政治空氣上街遊行。學生們呼喊的口號主要是：抗議誣衊；反對鎮壓學生運動；堅持罷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教師罷教，學生罷課；學生愛國，愛國無罪；中央電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北京日報》胡說八道；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為求自由，為求民主，絕不動搖。五十八所高校貼出一千二百七十多份大字報^⑥。

下面是一些大字報的摘錄：

也談動亂

不知是誰家喉舌的CCTV螢幕上，一個滿臉正經的女人莊重地宣布中國出現了一次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也許是恫嚇，也許是一場血腥鎮壓拉開了帷幕，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首都幾十萬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和上百萬的工人、市民和幹部參與和支持的愛國、愛人民的行動，以及他們最純潔、最高尚的感情，被這個女人和她背後的某些大人物用「動亂」這個邪惡的字眼粗暴地姦污了。一個政黨和政權的領袖們，撕掉最後一塊遮羞布，赤裸裸地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他們自恃有槍，有警察，有監獄，認定了中國的老百姓是貪生怕死的羣氓，在強權的大棒下一定作鳥獸散。

你要民主嗎？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物說過，拿幾百萬人頭來換。或許今年的此時是付諸實施的時候了，駐保定的三十八軍怕是已經到了吧？（批注：四二進京，有六萬人）然而，今日之中國已不是八〇年、八三年和八六年的中國，老百姓的遮眼罩與神靈們身上的

金粉在一年年風雨的沖刷中脫落。也許會再來一個百花凋謝的嚴冬，但權勢者被血淚淹沒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

評《人民日報》社論

我們並沒有違憲。第一，《人民日報》沒有權力決定我們這次學生運動是否違憲，根據憲法六十七條，由人大常委及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的關於違憲的決定和判決，才有法律效力，《人民日報》社論只是一家之言，有誹謗之嫌。

第二，《人民日報》社論認為學生違憲必須以具體事實為依據，以具體法律條文為準繩，他們負有舉證責任，否則即為造謠誹謗。

第三，並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學生是違憲的。

1. 根據憲法四十一條，公民對政府和任何國家機關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力，十幾萬公民的和平請願，違憲在哪裡？同樣根據四十一條，對公民的申訴，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抑和打擊報復，這又是誰違憲呢？社論以極個別人呼喊反動口號否定大多數人的正義行動，這無異於以少數共產黨員的腐化來證明共產黨的不可救藥！

2. 根據憲法第三十五條，公民有結社自由。在沒有結社法的情況下，試問根據何法認為廣大學生自動選舉出的學生籌委會是非法社團？

根據北大學生會章程第三十四條規定，不承認不能代表廣大學生正當權益的「學生

會」是全體學生的權力（編按：應為權利）。

根據憲法第三十五條，公民有言論、出版、遊行、示威、集會的自由，如果把以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為目的的有組織的學生和平請願活動認為是動亂，那麼憲法的權威何在？

……

第四，在爭取憲法權力（編按：權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履行憲法義務，我們建議開展護憲運動。

1. 維護憲法尊嚴，切實贏得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
2. 在憲法允許範圍內開展運動，根據憲法第三十八條，公民人格尊嚴不允許任何人加以侵犯。

一首題為《我曾經愛過的女人》的詩歌寫道：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妳／妳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可昨夜的風／吹掉了妳溫情的面紗／露出了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地上所有冤屈的淚水／沖掉了妳濃濃的脂粉／妳女妖般的淫威／讓我顫慄地感到／天空中滾動著黑色的太陽／月亮早已成爲烏鴉的翅膀／吸血蝠一樣吮吸所有的光／只有苔蘚植物／才能瘋狂地生長／於是我終於相信／四十年時間足夠了／連大理石也會腐爛

顯然，這些校園輿論充分表明，「四二六社論」不僅沒有對學運和知識分子發揮彈壓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會後由於失掉初始依據而勢頭漸弱的學運重新煽動起來。這一判斷的另一個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在「四二六社論」見報的第二天，學生運動為自己書寫的最偉大、最精彩，同時也最令人廣為傳頌的一筆。它徹底扭轉了社會輿論中開始還對之抱懷疑、輕視態度的部分，它使自己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歷史中，而勝利者的形象又為之贏得了更廣泛的社會。這，就是「八九民運」中唯一的一次，被所有傳播媒體不約而同地稱為「大遊行」的一次學生遊行。

第二節 大遊行

關於這次「大遊行」是如何「出籠」的？中共的新聞兼情報機構——新華社，早已對學生組織密布下「暗探」的北京市和學校的「家長」國家教委，都留下了可供查索的文字，事情的大致經過是：

四月二十五日晚，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召開會議，決定了二十七日舉行遊行。當晚，消息便傳達到各個學校，從有關記錄看，這個通知發出的時間是在當晚十一時以後。《驚心動魄的五十天》說：「二十三日，首都高校學生聯合會發出通知：『二十七日全市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匯合』，抗議『四二六社論』」。《平暴紀事》稱之為「新學聯一號令」。

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根據四月二十五日晚全體委員會決議，於「四二六」社論正式見報的當天，在政法大學主樓召開中外記者會。會上，周勇軍宣布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的成

立。該會的宗旨是「民主、科學、自由、法制、人權」。臨時學聯採取的鬥爭方式是「和平請願」。

在這次記者會上，新學聯還公布了北京高校決定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大遊行的消息。宣布遊行的統一口號十條：(1)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2)民主萬歲；(3)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權；(4)維護憲法；(5)愛國無罪；(6)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7)人民萬歲；(8)物價穩定；(9)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0)人民警察保護人民。」到廣場後的口號是「要求對話」，遊行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

⑧。臨時學聯為這次遊行制定的路線，有意避開了繁華的西單商業鬧市區。二十六日，就在北京市召開萬人大會，動員「反動亂」之時，各校學生自治組織也開始了廣泛的動員。同時，五十二所高校貼出八百六十份大字報，抗議「四二六社論」。

政府當然在一開始就得到了這一行動的消息。於是，各校遵命對學生做工作，企圖把事件平抑下來。二十六日深夜十二點，北京大學校廣播站反覆播送校長辦公室的一個通知：「……爲了同學們自身的安全和家庭幸福，請大家謹防上當，明天不要上街遊行。」

據稱，在臨時學聯內部，對原有的遊行決定也產生了分歧。鑑於軍警出動的消息，吾爾開希、馬少方主張取消原來的決定。執行主席周勇軍甚至也宣布了這一取消的決定^⑦。不少學校的學生已收到更改的通知。

但是，一場由飽滿的憤怒孕育的行動，這時已如離弦的箭頭無法收回。

《新觀察》有一篇目擊記，是目前可以查閱到，當時留下的一篇較爲真實和全面的報導，爲使後人能了解這次「大遊行」的全貌，筆者在此摘要錄之：

一、四月二十七日八：〇〇—八：三〇

每天，當太陽和國旗幾乎同時升起來以後，天安門廣場就已布滿了遊人。而今天，空空蕩蕩，隱隱透露出一種異常的氣氛。鐵鏈緊張地圈住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的台階。上面只有一個值勤的武警戰士和兩個清潔女工，花園不翼而飛，胡耀邦的畫像失去了蹤影……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廣場四周的警察逐漸增多。歷史博物館停著幾輛麵包車和大轎車，裡面坐滿了警察，似乎在等待什麼。廣場東側有一隊剛剛開來的警察，一位領導正在隊前布置任務：「第一，如果有零星的學生入場我們就讓他們進來；第二，如果有人搞打、砸、搶，我們就採取行動……」

八點半鐘以後，軍警一隊接著一隊，沿著廣場兩側的道路快跑……東西兩側的軍警排成了一個個方陣，每個方陣中都有幾個女軍警。歷史博物館前的小樹林中，掩藏著許多正在休息的軍警……小樹林北端，某報記者C趁機採訪一位年輕壯實的軍警：「今天學生會來嗎？」記者問。「說是要來。」「你是武警嗎？」「我們是公安大學的。」「你們其實也是學生啊！全校都來了嗎？」「二年級以上的。」「要是今天學生不來了呢？」「我們反正是聽命令。」這位穿警服的大學生說。

人民大學，喇叭裡傳出臨時學生自治會的通知：原定於二十七日上午八時進行的遊行因故取消。但仍然有一些學生打著校旗、橫幅標語，慢吞吞地正在集中。北京大學南門外，門衛嚴格檢查每一個入校者的證件。外國記者的攝影機、照相機鏡頭，緊緊盯住了校

門，在等待著學生出來的那一瞬間！校園內，校方廣播喇叭正在大聲疾呼：現在有少數人仍然在鼓動部分學生上街遊行，我們感到震驚，希望學生不要出去遊行，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二十八樓學生的那個小廣播站則針鋒相對地廣播「對話的條件」。學生們三三兩兩地到三角地集中……終於集合了兩千多人的隊伍，向校門口走去。

二、八：四五—九：三〇

北大的隊伍走出了校門……八點四十五分。

早已等候多時的社會各界人士歡聲雷動。坐在牆頭上的年輕人用盡氣力呼喊著支持學生的口號。學生只有兩千人左右，和歡呼的羣衆差不多。隊伍最前面是一面光輝的旗幟，紅底黑字：北京大學。這四個字的威望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確立的。從此就像是有一種遺傳基因似的，七十年來的學生運動北大始終走在前列。

緊跟著校旗的是兩條橫幅標語：

「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擁護社會主義！」

……

隊伍向東，到了中關村丁字路口。清華大學的隊伍從北面過來了。兩校會合後停下來商量，決定讓北大先走。隊伍向南，走到科學院的那個丁字路口時，迎面一堵人牆攔住了去路。人牆是由人民的警察組成的，一、二百人的樣子，手挽手排成了五、六道防線……一名警官走出來與學生交涉，機敏的外國記者立刻把警官和學生代表團團圍住了。外國記

者很多，有的扛著攝影機，三人一組，起碼有三、四組。更多的拿著照相機、錄音機和記錄本。

（三十日，一位香港出版界的女士在北京對某報D記者說：二十七日這一天，她在香港聽廣播，電台每半小時報一次遊行隊伍走到哪裡。她特別緊張，當時香港輿論都認為要鎮壓學生……）

……中國記者有自己嚴格的紀律，沒有經過批准是不准隨便採訪的！在這個地方有一名中國記者，某報的A，他只能在圈子外面聽。只聽清了大概的意思，那位警官讓學生停止遊行，學生讓警官讓開道路。雙方交涉了十幾分鐘，都比較客氣，但誰也說服不了誰。大學生們所表現出來的紀律性決不亞於訓練有素的警察，隊伍穩穩地立在原地，與警察的人牆相峙著。

一、兩千名（？）羣衆插入警察與學生之間，他們有節奏地喊著：「讓開，讓開！」學生們也在喊：「人民警察愛人民……」

沒有猛烈的衝擊，只是一步步地往前壓，羣衆在前面，學生跟在後面。街道雖寬，但一邊是民房，（一邊是）街心隔離帶、欄杆，人都往中間壓，因而街心擁擠，如同高峯期的公共汽車上一樣。有人被擠掉了鞋。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往前拱。警察頑強地抗拒著人流。雖然不是猛烈的撞擊，但從人流中發出的緩緩的潛力如同大海的湧浪，一波接著一波，即便是堅固的大壩，也會倒塌的。大壩決口了！第一排的警察胳膊鬆開了，人牆倒塌了；突然失去了阻力，人流呼啦啦衝了過去……

此刻，大約是九點三十分。

人流中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歡呼聲。北大校園內又有許多學生趕出來加入了隊伍。人數從一、兩千（加入清華的隊伍後應不止這個數）猛增到六、七千……警察顯得有些沮喪。人牆被攔腰截斷，他們待在路旁，無可奈何地看著學生的隊伍走遠了消失了。

三、十：〇〇—十一：四五

人民大學的學生剛一走出校門就楞住了：街道上空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他們擔心北大學生受阻，便決定向北迎接北大學生。人大的隊伍有一百米長，大約兩千人左右。人大有幾棟宿舍是臨街的，許多學生趴在窗口上觀看。因為幾乎所有學校都傳達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關於取消當日遊行的通知，所以許多學生持觀望的態度。遊行隊伍中的學生揮手高喊：「下來，快下來！」樓上下來了不少人。

在附中門口，人大的隊伍和北大、清華的隊伍相遇。在雙榆樹北三環路口，與北京外語學院的隊伍相遇。據說原計畫是向東，朝北太平莊走，去北京師範大學。也許因為看到了一百多米外友誼賓館的軍警防線，四所學校的負責人協商了大約有二十分鐘之後，決定隊伍繼續向前，迎頭撞向軍警的防線！

警察排成了六排，像一把大鎖似地牢牢把住了路口。警察勸學生停止遊行，學生也不想多說什麼，反正就是要走：「請警察讓開！」

正如鎖不能自己打開一樣，沒有接到讓路的命令，這些忠實的警察手挽著手，他們絕不讓路。據一位警察說：「上級命令我們誰也不准後退，除非被抬下來！」

圍觀的羣衆聲勢浩大，和學生一起高喊：「讓開！讓開！」喊聲未落，隊伍擁過去，

像一把大鉗似的一下就把警察的大鎖擰斷了。

這時，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學院從南面折了過來，與北大、人大、清華、北外的隊伍連接起來。接著，北京農業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氣象學院、理工大學、中國科學院博士、碩士生的隊伍也先後加入了大隊。記者D在魏公村第一皮鞋廠門前看了一下時間：從十一點十分到十一點四十五分，隊伍仍然沒有過完。

四、十一：三〇—十三：三〇

白石橋，在學生隊伍到來之前，警察已經築起了堅固的防線。從紫竹院到首都體育館，幾十米長的路面上，手臂與手臂像鐵索般地緊緊扣在一起。遊行隊伍緩緩蠕動著過來了，學生之前是羣衆，人流越逼越近，在幾十米外就能感到沉重的壓力。警察們挺起胸膛，準備承受幾千人的撞擊。壓力是緩緩地壓到警察的人牆上的，逐漸加大，人牆向後彎曲凹陷，猛力反彈，人流嘩啦退下，緊接著又撲上去，潮水般地忽退忽進……

經過幾個反覆，鐵鏈斷開，人牆倒塌。軍警主動撤離到路旁，大約有四、五百人，列隊整齊，注視著學生隊伍通過。中央民族學院的隊伍高喊：「人民警察保護少數民族！」也有人唱起《便衣警察》主題歌。此時，白石橋路兩旁，僅圍觀羣衆就有近萬名。許多人也跟著學生唱：「幾度風雨，幾度春秋……」⑨

隊伍繼續向南往四道口行進。然後轉向東，經過大都飯店，在國誼賓館前稍停了一會兒……繼續向東……上了二環路。無論怎麼繞圈子，目標是明確的。如同盤繞曲折的河流，終究要流向大海。

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門前，學生們開始背誦《鄧小平文選》第一三四頁上的語錄：

「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一聽到羣衆中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毛澤東同志歷來說，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車公莊，北航、北師大和政法大學的隊伍被軍警攔住了。本來這支隊伍要從豁口一直向南到西單。道路被封鎖了，有的學生要衝，但許多同學不同意。他們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隊伍轉向西直門，再向東，在車公莊又被攔住了。學生們向警察呼喊：「提高警察社會地位，提高警察工資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學生，專打官倒！」

政法大學前列是一條橫幅：「誓死捍衛憲法尊嚴！」那個黑色的「死」字，被紅墨水潑成血淋淋的樣子。學生們早已做好了流血的準備，有的寫了遺囑，有的寫了血書。臨出校門時，三位學校領導攔住了隊伍。校長抱住旗桿，指著那個「死」字，含著眼淚說：「你們不能出去，不能讓你們這樣流血，如果流血了，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政法大學，對不起你們的父母。」

經過反覆交涉、衝擊，警察終於讓路了。這時候，許多女同學哭了……
警察隊伍中，也有人落淚了。

天安門廣場被圍得水泄不通。只許出，不許進……廣場中心已空無一人，在明媚的陽

光下顯得很尷尬。

五、十三：三〇—十四：〇〇

天安門東側的南河沿路口已被封鎖。三、四排警察緊緊地挨在一起。受阻的人很多，自行車混成一團……

此時，景山公園前開過十六輛軍車。每輛車上坐著四排士兵，每排九人，加上軍官，大概近四十人，一個排的兵力；十六輛車，估計將近兩個營的兵力，往西開，開到北長街向南拐彎。前面三輛軍車剛拐過去，紅燈亮了，夾在三、四輛車中間的一輛摩托車緊急煞車，車上是一對中年男女。第四輛軍車緊急煞車，而第五輛軍車煞車不及，重重地撞在了前車尾部，聲音很大，車上的士兵嚇了一跳，行人也發出一聲驚呼。

天安門西側，中山公園。有一些學生從公園的另一個門跑進來，往南門外跑。門口有兩便衣大喊：「別跑！」嚇得他們縮回去了。兩點鐘以後，廣場前的路也不准公共汽車通過了。天安門前，長安街上，人們都在慢慢車道中間的欄杆後面。有兩次紀念堂前有一點騷動，人們登上欄杆看，有人正跨越欄杆，被警察一吆喝，就嚇回去了。從西邊，遠遠地傳來了學生隊伍中的鼓樂聲，在安靜的廣場上聽起來像是戰鼓。

……從中山公園裡出來了十幾隊士兵，步伐整齊，似乎要去接受檢閱，指揮員不時喊著：「一二一，一二一，……」廣場上也出現了軍車，滿載著士兵向西疾馳！看樣子，學生的隊伍接近了廣場。

六、十四：一〇—十四：四五

復興門立交橋（編按：高架橋）。學生的隊伍過來了！

在前面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旗幟，晃動了幾下，在警察的防線前停住了。幾乎沒有什麼衝突，只聽見警察中一聲喊：「撤！撤！」防線就垮了。學生和觀眾向警察鼓掌、歡呼。遊行隊伍摩肩接踵，旌旗招展，一眼望不到頭。寬闊的馬路變成了一條洶湧澎湃的人的河流。有幾百名羣衆，在遊行隊伍前爲學生開路。在人大前面打頭陣的是「研究生院」。學生組織的糾察隊邊走邊喊：「請市民往兩邊走，請讓一讓，請協助！」

隊伍中豎立著一些標語牌。還有一組寫有「目擊者」的照片專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塊巨大的版幅，這是一張模擬「起訴書」：

原告：首都高校全體學生

被告：人民日報

起訴理由：誹謗誣蔑罪

案情：（略）

人大後面是建工學院、外語學院、理工大學、北方交大。北方交大的那個操東北口音的學生拿著喇叭向羣衆宣傳：「我們是人民養大的，我們願意爲人民流血犧牲，我們代表的是十一億中國人民，十一億中國人民都是腐敗官僚分子的受害者。我們要求清除腐敗的官僚分子，我們要求有一個廉潔的政府，你們和我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沒錯兒！」一女青年喊道。人羣中響起熱烈的掌聲。

圍觀的人中有拿錄音機的，同學們認爲這些人是新聞記者，有人便向喊話的東北人耳

語了幾句，於是他又高聲喊道：「需要廣大的、正直的、有良好的、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者支持！向中國及世界各國一切有良好的正直的新聞工作者致敬！」掌聲又響成一片。

學生們表示了對《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強烈不滿。「抗議人民日報、中央電台任意歪曲學生運動」、「請願不是動亂」等標語口號布滿了整個遊行隊伍。有的措辭更加激烈：「新聞界遮羞布多種層次一中的確良」、「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沒有光明；北京日報，胡說八道；科技日報，為民開道。」

在大學生中流傳著一個政治笑話：江青看了「四二六」社論後，一口咬定姚文元被釋放了，要求把她也放了。藉以諷刺那篇社論^⑩。

大學生普遍對《科技日報》和《農民日報》表示歡迎。一條極長的紅色橫幅上寫著：「向正義的農民日報致以崇高的敬禮——首都高校全體正義的愛國學生」。

北醫大口腔學院只有一、二百人。人數雖然不多，但是都穿著白大褂，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後是中央民族學院，舉著漢藏兩種文字的「尊重人權，反對暴力」、「愛國不分先後」等標語。領呼口號的男同學嗓子已經嘶啞：「民院民院，為民請願！」還有一隊呼口號全部用四川口音，路人聽了，忍俊不禁^⑪。

然後是氣象學院、北京商學院。商學院的學生向建築大樓腳手架（編按：鷹架）上的工人呼喊：「向工人階級致敬！」工人們高舉雙手，不停地揮動。這時有個人影張開雙臂，好像要工人們下來，但沒有人理他。

十四點十七分左右，北大的隊伍開過來了。他們有節奏地呼喊：「北大大大，人民養

大，爲民請願，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國際政治系舉著的橫幅是「忍痛罷課，平等對話」。

有同學喊：「官倒官倒，愈倒愈胖。」^⑫

在北大的隊伍中間，夾著北京林業大學的校旗。北農大的橫幅言簡意賅：「官倒富，農民苦」、「減輕農民負擔」。還有一句帶有自我批評的成分：「北農大不再沉默」。據說，二十二日追悼胡耀邦大會前的深夜急行軍北農大沒有參加。

十四點三十五分左右，清華大學過來了。同學們高唱著用「打倒列強」的曲子填寫的新歌：「打倒官倒，打倒官倒，爭自由，爭自由。我們要做主人，我們要做主人，向前進，向前進……」

開始遊行隊伍最後的是郵電學院，後來又續上了戲劇學院、音樂學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二環路上，隊伍基本上是學生，站在高處看，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旗幟、標語；到了長安街後，羣衆就匯入了，形成了三股洪流，鋪滿了整個長安街，街中間是學生，兩邊是羣衆。三股人流齊頭並進，滾滾向前。當然，學生兩側有手拉手的糾察隊，與羣衆保持著明顯的分界。西單路口的崗台上站著五、六個警察，……一個五十歲上下，手持對講機，顯然是在彙報情況。路口亮著紅燈，隊伍停下了。三個學生手提小型擴音器向警察交涉：「學生要過去，你們能不能放個綠燈？」「不行！」警察說。學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們過去，我們的目標就是天安門廣場。」警察始終就是兩個字：不行。

隊伍受阻。學生們有節奏地喊：「學生代表，大會堂前，跪下請願，無人理睬。人民

大學忍無可忍，團結起來，打倒官倒。」

十多個學生齊唱：「……再大的風雨我們同經過，再苦的日子我們同熬過，就是民族的氣節，從來沒變過……。」

……警察兩側的羣衆開始擠了。羣衆對警察說：「你們不要再堵了，你們堵不住的！」一擁而上，防線就被衝開了。一陣歡呼，隊伍繼續向前，把一支動人的歌兒留給了人民警察：「幾度風雨，幾度春秋……」

八、十五：四〇—十六：三〇

開始學生是三路並進。東邊最前列的橫幅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羣衆把警察衝開後，自動留出了大約三米寬的通道讓學生過去。警察從馬路北側向西撤走，單行列隊，步伐整齊，凱旋般的。羣衆夾道歡送，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隊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軍警手臂挽著手臂組成了厚厚的人牆。隊伍停下來，原地休息，如同兩個浪峯之間的短暫的平緩期。糾察隊員迅速跑向前面。一會兒，隊伍向前挪動了幾步，又停住了。學生們好像早有這種思想準備，誰也不著急，你不讓我過，我就休息，反正遲早得過去。就這樣走走停停，差不多有四十多分鐘。

這時，人流已經從四個方向把路口完全塞滿了。長安街上全是人。有不少自行車卡在人縫中動彈不得。有一種要把空間撐破了的感覺。人流被擠得向上漫溢，街道兩旁的樓上和樹上、交通標誌燈上、南北兩側的廣告牌上，也全站滿了人。有人爬上廣告牌頂端，雙手敲著牌子的板面，「咚咚咚」的像是擂響了的戰鼓，隨著響聲，千萬人有節奏的同聲高

呼：「不許打人，不許打人，」沒有打人，這只是一種警告，爲了起一點威懾作用。後來又喊：「加油！加油！」中南海的紅牆牆頭上，隔著濃密的綠葉兒，有三、四個穿便衣的人在向外瞭望，其中有一個人的手彎在嘴前，像是對著對講機說話。

這是一個光輝的歷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馬路南側貼著牆壁站立著，雖然表情不那麼自然，但顯得比較輕鬆。有的警察還向學生招手。學生一路喊著：「人民警察愛人民！」「警察萬歲！」深情的《便衣警察》主題歌，把警察也唱得高高興興。這時，一個年輕的警察，把手舉起來向學生敬禮。動作很小，有點兒猶豫的樣子，舉了一下看看旁邊的人又放下了。見沒人注意，他第二次舉起手來……

九、十六：四五—十九：〇〇

隊伍在南長街又遇到了一道封鎖線。雙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鐘，隊伍就衝過去了……轉眼軍人就被包圍在中間，如同一座孤島。忽然，許多人像大夢初醒，呼地就往廣場中心跑，如同要去火車上搶佔座位。有人大聲說：「趕快些，去晚了就沒有好位置了。」廣場當時還不讓進，人們就站在交通隔離線的墩子上。有幾位警察拉、推他們下來，羣衆就圍過去高喊：「不許打人，不許打人！」

革命博物館處有二十五輛軍車調過來增援。開走了兩輛，後面的軍車一下子就陷入了人羣的包圍之中。雖然是對立的雙方，但不知爲什麼，人們反而向軍人歡呼。有些大膽的人爬上軍車與軍人聊天。一個戴白帽子的外國記者，爬上車頭給士兵拍照，士兵木然以對。羣衆高喊：「解放軍走開！走開！走開！」「丟人！丟人！」「回去！回去！」^⑬

駕駛室裡，一個中尉面有難色，拍拍司機的肩膀，不知是讓進還是讓退。汽車稍稍往後移動了一點兒，頓時羣衆中就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呼喊：「解放軍萬歲！」

中尉把帽子扔在一邊，和下面的羣衆握手。士兵們也向羣衆招手。旁邊一輛部隊救護車想開過去，羣衆一用力，把它推了回去。車右邊的一塊玻璃碎了，裡面有報話機，急救器材。坐在最後面的一位士兵激動地向羣衆揮手。學生們向爬上軍車的羣衆高喊：「下來，下來，讓解放軍過去！」車上的士兵全都站了起來，看樣子想和羣衆交流些什麼。軍官大聲喊：「坐下！」士兵尷尬地坐下了。有兩個軍人下了車，拿著步話機，又生氣又焦急地跑著，邊跑邊喊：「讓開！讓開！」他們往故宮裡跑，像是去彙報。

人民大會堂邊，密密麻麻的軍警坐在地上護衛著人民大會堂。當學生隊伍接近廣場時，警察突然拐過來，向北突擊，學生隊伍受阻。馬路南側被堵住了，但北側可以通過。這時，學生糾察隊像是幫助警察維持秩序那樣，說：「同學們，繞過去，往這邊走。」他們和警察緊緊貼著身子，指揮同學們通過。

……隊伍繼續向東，根本沒有進入廣場。

在東單，學生隊伍已經是一段段的，不連貫了。每當隊伍稍停時，都有人坐下來。許多人顯得疲憊不堪的樣子，但依然喊著「加油」。堅持走著。經過《北京日報》附近，不知為什麼情緒一下子又調動起來，振臂高呼：「北京日報，胡說八道！……！」

建國門立交橋北面路西一座樓房上^①，有人放鞭炮，引來一陣歡呼。

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五輛軍車被圍住了。羣衆情緒激動，喊：「你們當兵的回好好好

想一想吧，你們要敢動學生一根毫毛，我們決不饒你們。」……有個學生掏出北大學生證，不斷地向羣衆作揖，嘶啞著嗓音說：「讓他們過去吧。士兵是無辜的，讓他們過去吧。」他反覆地重複著這樣的話。許多羣衆眼睛裡含著淚花，閃開了道路。大學生送走了兩輛軍車，在返回來送第三輛。這時過來一個交通警察站到學生中間想指揮，「噉——」羣衆把他哄下去了。

一羣個子不高，滿面稚氣的男女學生，看樣子都是不到二十歲的大孩子，他們拖著沈重的腳步，艱難地走著。有的臉上帶著淚痕，一拐一瘸的。但他們依然倔强地昂著頭，一條橫幅在他們的頭上挺著：

「媽媽，我們沒有錯！」

……^⑮

當隊伍行走到北面的安定門高架橋時，橋上橋下，圍觀者如潮如海。「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的呼聲從高樓羣到大街上，彼此呼應，形成共振。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舉著自己不到三歲的孩子在頭頂揮舞，嬰兒樂極，持續整整半個小時。許多學生都上前去摸孩子的頭。一個領隊的學生用乾得泛白的嘴唇聲音嘶啞地喊著：「水！水！」於是，有人也提了水桶，站到了遊行隊伍前。

路過的車上，有人朝學生隊伍裡扔下十元一張的人民幣數十張。北新橋一帶的冰棒、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搶購一空送往遊行隊伍。後來的人買不到，就成箱地買可口可樂，排在後面的人夠不

著，直嚷嚷「我全包了！」一輛給學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輪車，由一位模樣挺標緻的姑娘蹬著，兩旁有自行車開道護送，神氣活現地叫著「閃閃閃開！」儼然當年的「支前模範」一般。

豁口一帶，一夥個體戶在一起議論：這些學生年齡小，又沒錢，累成這樣，還不是爲了我們？一個開飯館的說，讓我去給他們炒幾個菜！菜炒好以後，他硬是從外面拖進來一個頭上纏紅布條的學生，要請這個客。那個學生推託半天，說「絕對不能吃」，才被放了。

走在這支遊行隊伍中，聽著旁邊人山人海的呼聲，有些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裡。當隊伍行進到一處時，一女生問：「到哪兒了？」有人答：「北太平莊了」。那女生說：「啊！已經到了這兒，快到家了！」另一女生問：「往人大怎麼走？」人羣裡登時發出嗡嗡的憐惜聲：「看！人家小姑娘，連家都找不著了！」

從早上八時出發，到晚上十一時最後一支隊伍（北京農業大學）返校，這次遊行歷時十五個小時，行程三十公里，以和平、勝利而告結束。

從此，北京的輿論爲之一變。自胡耀邦逝世以來，籠罩在學運頭上的疑惑、哀傷、憤怒、高壓的空氣，一變而爲自信、開朗、輕快的空氣。政府，不論其在四月二十七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個西安、長沙事件，但到此爲止，不論其立場是否有所動搖，它不得不暫時收起了「四二六社論」的腔調。四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家人的勸說下去了北戴河。據說，「鄧辦」人員還發出通知，要求收回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得知此講話較遲的省市，只傳達到廳局級。^{①6}

一位學運出身的《中國日報》負責人目睹這一天學生的遊行，斷定它的後面一定有「高手」指揮。「一下子就把南朝鮮給『斃』了！」人們的評估不謀而合。從此，「四二七遊行」便以「大遊

行」載入了人們的記憶。而且，人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這樣稱呼發生在這一天的事件的。沒有任何權威或新聞媒介的提示和倡議，也無須經過什麼人承認。即使是在後來又出現過「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從人數、規模到捲入的方面，以及聲勢都大大超過「四二七遊行」的情況下^⑩，人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改變這個說法。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第一次給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鮮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僅學生沒有過如此規模的大遊行，就是全社會，也沒有過如此浩大的自發組織的遊行。所以，它至少是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首例。其次，它的組織性，合法色彩，與前一天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當羣衆看到政法大學的隊伍時，他們議論說：「你看，搞法律的也遊行了，這回打官司，學生準贏！」當人們看到穿白大褂的北醫學生和她們的紅十字旗時，人們說：「就這，國際戰爭也打不起來！」雖然像糾察隊一類的組織，在「四二二」已經出現，但它一半由於處在夜間活動，一半由於遊行路線較短，所以未被廣泛知曉。而這次時間長達十五個小時，路途長達三十公里的遊行，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一樣，「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是以對手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告終的，所以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鑑於歷來的羣衆運動往往為「非理性」情緒所左右，許多知識分子得出結論，認為「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戰勝「非理性」大勝利。

作為一個親歷者，筆者認為，「四二七大遊行」雖然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有許多獨到的優點，但是，我以為，它對於廣大公眾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於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飾」的真誠和純情。慷慨赴義，是它的真正靈魂，不論是「誓死捍衛……」，「民

不畏死……」還是「人生自古誰無死」，都體現著「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這樣說，「八九民運」之比不上「四五運動」可愛，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參加者在面對各種海外傳媒時的表演心態，它因濃重的油彩而分外地凸顯於歷史，但它也正如油畫一樣，只可遠觀，不可近睹。因為，近觀者必然會為某種程度的失真感所困擾。但是，「四二七大遊行」卻沒有「八九民運」的這種缺點。在那些過分工整的格律詞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詩。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在學生自覺接受了「新華門」和西安、長沙事件教訓，對此次學運取得高度認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們自由地發揮和創造出來的。這也許是時至今日，不少民運人士為生計而歷數自己在「八九民運」中的光輝業績之時，卻沒有人來「認領」這次偉大的遊行的緣故。因為它的確是集體的創作，是學生與人民羣眾共同迎來的勝利。

承認這一點，當然不是說沒有人為學生出主意，提供經費，購買小型廣播器材。學生糾察隊的產生，就是他們採納有關人士建議的證明。但是，他們當時並不像官方大多數人想像的那樣，已經成為操縱、控制學運的力量。這種狀況正如一位北大女學生所說：

「誰也不能操縱我們。我們有自己的頭腦，不像有些當官的，生怕丟了自己頭上的烏紗帽，有腦袋不敢獨立思考，有嘴不敢講真心話，對上唯命是從，活著卻不是獨立的人，像個機器人似的被操縱著。胡耀邦逝世後大家都很悲痛，上面不重視學生的意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我們激怒了；校園裡響起了《國際歌》，我們熱血沸騰，這就是凝聚力！」^⑮

對於這次遊行，外電也給予了相當熱烈的反應。香港《明報》四月二十八日有一篇社評《可喜的「四二七運動」》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與一九一九年的

『五四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這篇社評還說：「這四次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它們發生的地點都在北京。其次，它們的主要參加者都是大專院校學生^①。再其次，它們的本質都是愛國運動。而最要緊的是，它們都是由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甚至可說緊迫的危機感所促成。」它說，四二七大遊行「使中國的政局豁然開朗，透出希望的光芒。」在後來知識界公開站到前台的日子裡，包遵信也在各種場合主張對「四二七」大書特書，指出它是一個「劃時代」事件；五月下旬，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甚至建議把這一天作為中國的「民主節」。

持樂觀態度的人們認為，「八九風波」因為四二七大遊行的出現，一場可怕的危機一變而為一個可喜的轉機，但是，也有不容樂觀的聲音存在。四月二十七日，路透社發表一位六〇年代曾在中國工作過的西方外交官的評論說：這次學生抗議的結果很可能只是稍有收斂而不是驟變。「中共在拖延時間，就像他們對待經濟問題——通貨膨脹——以及腐敗現象的做法一樣。他們對這些問題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中國是反對驟然行動的。」香港虎報四月二十八日的一篇評論說，「當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認為是一個奇蹟。」而「無畏的人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次奇蹟」。

這些議論提醒了人們，昨日的勝利，在極大程度上是以政府的「寬容」為前提的。其中當然也有「鴿派」的作用。但這種「寬容」並不表示它突然間受到民情的感動或是民主思想的啓迪。正如毛澤東早就諄諄告誡全黨所說，一個事物的本質是很難改變的，你「刺激它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而在四月二十七日，它的態度是與警力不足，無責任政府，及體制內的離心離德分不開的。而這些現象，也可能為下一次專制極權行動鋪平道路。

第二節 《導報》事件的反響

「四二六社論」登報當天，江澤民在中國的第二大城市上海也採取了響應的行動：召開萬人大會，撤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黨內及行政職務，對導報派駐工作組。這一行爲，客觀上對在「四二六社論」中仍含糊其詞地所稱的「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進行了創造性的詮釋，把整肅重點避開了廣大的、難以應付的學生，而對準了新聞界。新聞界的背後，自然是黨內民主派和知識界。這些人有一個弱點，他們不像學生，是吃自己父母親的飯的。他們全是捧共產黨控制下的國家的飯碗的人。對待他們的有效辦法，一直以來是「殺雞儆猴」，屢試不爽。然而，這一次江澤民有點兒失算了。

上海的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世界經濟導報所在地，一夜之間變成了一條名巷。七十一歲的欽本立，也突然之間舉世聞名：

在欽本立的辦公室裡，他專用的那把圈形座椅，被他的同事們當作文物，高高地放在了電視機櫃架上。《導報》駐京辦事處破爛不堪的平房裡，兩台電話晝夜不停地嘶鳴，傳達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問候。慰問信、致敬電使郵電局突然大發其財。平日只有來去匆匆的記者編輯的報社，宛如一座市集。

設在紐約的「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就導報事件於四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八日兩次向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發來呼籲書。呼籲書說：作爲

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董事會的成員，他們深切關心上海市世界經濟導報因「在一篇關於已去世的胡耀邦的文章中對當局的批評，及官方新華社提供的已明令限制報導學生動亂的消息」，「最近一期被禁止出版」的事件。書稱：「本委員會意識到你們政府目前遇到難以應付的局面，但我們作爲維護世界同行的一個無黨派的新聞工作者組織，尊敬而急切地請你們政府停止妨礙我們同行得到各種國際協定包括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保證的，報導新聞和意見的權利。」二十八日再次發出的呼籲書，對欽本立被停職表示「深感不安」。指責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和欽本立的行爲，「嚴重違反國際公認的新聞自由準則」，並請中國政府重新考慮。該書還再次重申了其組織的「非黨派」性質和「支持同行」的權利^②。

在北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農民日報、文藝報、華聲報都有編輯記者前往慰問。在送來的致敬信中，有的是同行寫來的：

親愛的《世界經濟導報》的同仁們：

也許我的敬意與你們的勇敢相比是那樣的微不足道，是那樣的軟弱無力。但我們還是要告訴你們，雖然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名義來支持你們，但我們在用我們的心支持你們！

在這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在沸騰的長安街和火熱的校園，我們揣著記者證愧疚地站在那裡，看著學生們打出的「新聞要說真話」，「新聞要立法」的標語，感覺著學生和市民對新聞界極度不信任的目光，傾聽著對新聞界的不滿及憤怒……我們已經沒有勇氣申

辯，我們只想流淚。

我們的心聲由學生們喊出，而我們還在沉默，這是我們新聞界的恥辱。

你們的勇敢行動猶如夜色中一顆璀璨之星，給我們以慰藉，甚至支持了我們繼續做記者的信心。我們向親愛的《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向欽本立總編輯表示衷心的敬意。歷史會記住你們！

（署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這封信的作者，顯然是一位青年女性。另一封信，則出自一個癌症患者之手：

敬愛的欽本立先生：

《導報》是全國編得最好的一張報紙。它是我的良師益友。

開放改革、公開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勝無疑。

全國數千萬知識分子都尊敬您。

請多保重貴體！

祝健康長壽！

他把對於他來說最寶貴的祝願，送給了一個從未謀面的熟人；也把與自己的身體狀況極不相稱

的信念寄予了他理想的事業。

電報，也像雪片似地飛到了欽本立身邊：

正義為本民主為道 本立則道生 欽老闆安康

（北京 戴晴）

真正的猛士 青年問候您

（衢州）

人民不希望十一億中國只有一個聲音

民主遲早會代替專制

真理最終將戰勝強權

（黃埔 讀者）

赤子心 華夏魂 憂國憂民憂黨 四十餘載報涯 坦蕩無瑕

請接受一個讀者對老報人的問候和致意

（石家莊 盼民科）

一時強弱在於力 千秋勝負在於理

歷史會公允地評價你們的

（復旦 一讀者）

怒聞貴報橫遭強暴 願同諸君勇豪悲歌

上訴法庭 駁回對報社的粗暴整頓壓制 維護新聞自由

(徐州 礦大三君子)

國家需要民主聲音 期待整而不頓

(湖南岳陽城陵磯)

真理經得住時間考驗 望欽本立保重

(北京 六名女記者)

請接受一位工人中共黨員對您的敬意

正義的聲音是誰也擋不住的

(河南駐馬店鄉鎮企業管理局 ×××)

人民需要你

(陝西留壩 ×× ×××)

深表同情 望堅持您的辦報宗旨

(哈爾濱建工學院 忠實讀者們)

縱觀今日大陸衆多報刊，敢爲天下先，並能不囿於一黨或階層之利益，而爲民族利益

和未來吶喊者，唯《導報》而已。

(寧夏平羅縣二中 一讀者)

您是我們心中的普羅米修斯

真理的聲音是無法封鎖的

骨頭萬歲

(導報忠實讀者)

《中國日報》七十四名編輯記者簽名的致敬信說：

威武不屈 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 真理不死 導報乃十年改革先鋒

向欽總及導報全體同仁致敬

——欽本立成了胡耀邦之後，在這個月份裡收到信電最多的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總經理王家禎給《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的來信說：

陡聞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宣布撤銷先生之總編輯職務，並下令停頓世界經濟導報，我們香港新聞界的老朋友不勝駭異。近十年來，世界經濟導報堅定地貫徹執行中共三中全會的路線，循著以經濟改革為黨的中心工作的軌道，為十年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在思想上，理論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這個貢獻和你的勇於破舊探新，勇於冒險犯難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處於知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的嚴峻關頭，你的去職和導報的改組頓然令人憂慮這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信號……^②

與他們的感覺相同，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因「反自由化」運動而去職的一位青年官員說：「《導報》在中國政治走向全面反動之際第一個倒下，這是《導報》的光榮。」

更多的人也對於上海市委這種干預表示出深遠的憂慮，有些信電甚至寄到上海市委宣傳部所在地上海高安路五號。北京宣武區一讀者去信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上海市委的頭頭根本不懂什麼叫民意，是想讓人民民主徹底成爲有名無實的軀殼。」浙江省金華市一讀者也去信說：「表面上的安定團結猶如活火山，後果更難設想。」長沙井灣中學一讀者說：「只要黨還凌駕於憲法之上，憲法就是一紙空文，更不要說新聞自由了。」

中國的公民，按憲法的精神要求他們的領導黨，應該是這個黨在近十年中強調「法制」的一個必然結果。就在政府有意把「法治」這個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偷換成一個可爲歷代封建或專制君主接受的「法制」內容時，他們的人民卻依然執著於心嚮往之的「法治」。這種法治，與人治和黨治，是有著截然不同的本質的。但是，歷史表明，法治，作爲一種高級的社會政治形態，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國雖自一九五四年起，有了第一部憲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重要的歷史關頭），它都表現出不是一個依照「成文法」處理政治事務的國家，而是一個依照「習慣法」處事的國家。曾有一則笑話說，某中國憲法專家到國外講學，第一章講的是《中國共產黨黨章》。這其實沒有一點可笑之處。這表明這位憲法專家不僅熟諳法律史，而且了解中國社會的實質。不僅中共黨章，黨的會議的決議和某一時期黨的領導人的講話，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真正的、最後的和最高的「憲法」。後者是前者運用時的真正根本約束，也隨時賦予前者彈性和張力。所以，中國社會的兩極——了解中國政治的人和那些政治生活中腐朽的墮性力量，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有時

也表現出驚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在中國社會中並無真正可靠基礎——民衆覺悟和軍隊支撐——的「成文」憲法要求他們的領導黨，而更多的是談黨的政策和領導人的講話精神。

下面，是發生在《導報》事件中的兩個典型事例：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幹部在給欽本立的信中說：

欽總：我不知該向您慰問，還是該向您祝賀。對您來說，在您各種離職的方式中，這是最好的方式了。您失去的，是總要失去的；您得到的，卻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您應當欣慰，受損失的是作者與讀者，是黨的聲譽，是改革事業。活到您這種歲數，還能讓生命放出異彩，還能開創一項讓世界矚目的事業，還能有如此的勇敢精神加旺盛活力，應該算奇蹟了。人不一定創造奇蹟，人本身就是奇蹟。我這樣寫並不暗含否定加於您的解職行為，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價值理性……您忠於您的職業，政治家也可能認為解您的職是忠於他自己的職責。我們不能把您和政治家對立起來……這裡當然有手段和價值判斷問題，這有歷史去做結論。中國需要的是更多的忠於自己職守的有理性的人。不同的職業要互相尊重，不必用自己的職業要求否定別人的職業要求。有時政治上合理，未必價值上合理；有時價值上合理，未必政治上合理。解您的職，不應被視為報人從來可以味著自己的職業良心，如果那樣，中國還有什麼希望？有不怕解職的，就應當有不怕被解職的。如此，則祖國幸甚。最怕的是一聽說解職，一些人就嚇得一身虛汗，大氣不敢出，雙手捂住頭上的烏紗帽，沒有多餘的手去做事情。中國人的『官情』，壞了我們不少事情。祝您無官一身

吳家祥

輕，益壽又延年！

這位作者，後來終於在自身追求的「價值」與他所服務的「政治」無法平衡的時候翩然掛冠，並身繫囹圄，實踐了自己對欽本立的祝願。但他當時的這番話，可以說是反映了相當一部分黨內較開明、有民主思想的幹部，對《導報》事件的真實思想的。他們深知，哪怕是在號稱「法制健全」的西方國家，有時，法律也是不得不服從於政治的。

與這位對「職業」角色有深刻體會的青年不同，往往在「宮庭樞密顧問」和「街頭政治家」兩個角色之間徘徊的嚴家其，卻抓住了上海市委的行為中既不合價值理想，又違反政治原則的把柄。在包遵信徵求其於知識界「四二一公開信」簽名時，嚴家其曾要求在信中加上避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重演的內容^②，對他在「四一九座談會」上的講話採取「收」勢，但此刻，就像職業軍人聽見戰馬的召喚，他又一次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要上場廝殺了。

四月二十八日，嚴家其起草了給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今天，《人民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的決定，我們認為：

一、中共上海市委無權撤銷一家報紙（非上海市委機關報）總編輯職務，這種做法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關於「黨政分開」的原則的，也是對憲法和法律的漠視。

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負責人說《導報》四三九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內容」，「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這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經導報》出版面處理意見「和其它干涉《導報》編輯工作的行為違反憲法第三十五條，侵犯了新聞自由，是一種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行為。

對此，中共上海市委應收回「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這一越權的和錯誤的決定，應對誹謗四月十九日座談會參加者進行公開的賠禮道歉，保障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新聞自由。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名的五十八人中，部分是「四一九」座談會的參加者。其他為知識界、新聞界著名人士及青年學者、記者，簽名者或出於對上海市委處理導報行為的抗議，或出於對自身權益的要求，或有感於自身職業領域的保守狀況，但他們無一不是受到了「四二七大遊行」的勝利的鼓舞，抱有趁勢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的幻想。據說，在胡耀邦悼念活動結束後，黨內民主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曾收到過來自鄧家的招呼，希望從改革大局考慮，不要捲入當前事件。其中不乏念及他們為鄧王朝立過功勞的相惜之意。但他們中的人物，在這件事情上，顯然沒有聽招呼。

有深諳中國政壇黑暗權術者，認為迫於「四二七大遊行」後的輿論形勢，鄧小平一定會尋找機會「轉彎子」，按其一貫作風定會採取「捨卒保車」的措施，而此時，在他一邊的棋盤上，可捨者一為北京，一為上海。捨北京難以自圓其說。上海的事情與鄧並無多少聯繫。所以，捏住上海，可能坐收一箭雙鵰的效果。

配合這一公開信，《導報》的真正上司之一——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也致信江澤民，指出欽本立「是受本學會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委託，主持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停止他的職務，應由本學會及上海社科院負責人協商後解決。」該信指責上海市委的決定「違背了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有關精神（黨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政分開等），不符合幹部任免的法定程序」，宣布上海市委的決定「無效」^②。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的特定形勢下，《導報》事件激起了中國新聞界尋求自我解放的空前浪潮，它與學生「四二七大遊行」闖開的新境界一起，創造出了一個建國四十年罕見的局面。當時，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類似海市蜃樓的景象。但中華全國新聞學會會長錢辛波以其職業的敏感性預言，中國從此起「要嘛進十年，要嘛退十年。」

進入五月，北京傳來有人要起訴江澤民的消息。被指派到《導報》任整頓小組領導人的馬達^③，也開始向老朋友問計了。老朋友提示：「你既然身體不好……」「四二七」之後，官方的輿論轉而開始允許正面報導學運，國內國外的同聲一致，加之趙紫陽回京後有責怪上海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一時間，江澤民與北京「對表」，也感到有點兒「對」不準了。

第四節 火上澆油的「對話」

——對「結社自由」與「統一戰線」的雙重檢驗

「四二六社論」把此次學潮置於非法地位的企圖，因學生自覺的調整和統一行為而終於落空，

但學生內部新生組織和原有組織的對立卻成爲不可避免。

受東歐改革風潮沐浴，特別是在波蘭團結工會的勝利感召下，天真的學生以爲，在八〇年代的中國，只要憑藉憲法上「結社自由」的條文，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成立自己的組織，並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了。而只要擁有組織，就擁有了與政府談判的地位。談判一經開始，中國通向民主的大道就從此洞開了！所以，自「新華門事件」以來，除統一成立的北京高校臨時委員會（又稱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外，各校先後不一地成立了一些學生自治組織。如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又稱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四·二〇）；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四·二三），社會主義民主進步領導小組；人大學生自治會；北師大學生自治會，青年教師自治會（四·二二），中華知識分子聯合會；北京高校聯合會北化分會（四·二三）；中央民族學院民主愛國會（四·二三）；北外聲援委員會；中華學生民主同盟；陝西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浙江大學民主科學促進會；天津南開新「五四」綱領起草組（四·一八），新覺悟社——臨時學生會（四·二〇），天津學生自治會（四·二八）；上海高校團結學生會，上海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四·二八）……

受中共「一元化」政治文化影響，他們有的也提出廢除「原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一切權利」的口號^⑤。有的則考慮是否透過重新選舉改造原學生會，或將學運中產生的「臨時學聯」與原學生會合併。這種意見雖遭到學生中具有「多元民主」思想的同學的反對而沒有付諸實施，但立即引起了官方學生組織和國家教委的注意。反對學生運動者以此抓住了學生內部的矛盾，並認爲有可能透過激化這種矛盾造成「分而制之」的結局。

四月二十一日，國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門和委直屬高校發出《通知》，通報了北京、天津高

校成立學生自治組織的消息，說「這些學校內或跨校的組織，既沒有經過學校或政府有關部門登記批准，又沒有經本校或有關學校廣大學生按民主程序選舉產生領導成員，因此是不合法的。這些組織的存在，分裂了學生羣衆，會嚴重干擾和破壞學校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必須依法予以制止。」並聲稱，「有跡象表明，這些組織少數頭頭背後還有人參與並成立爭取和串聯工人農民參加的組織」²⁶。

原各校學生會的「頭」——北京市學生聯合會也感到了某種威脅。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學聯發出《公告》宣布自身的「合法」和對手的「非法」。《公告》說：

鑑於北京市部分高校中，在近期相繼成立所謂「團結學生會」等組織，本會特發表如下公告：

一、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是依照《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經過各校學生代表大會（研究生代表大會）按合法程序民主選舉產生的，都經過正式註冊，獲得全國學聯和本會的承認，是各校合法的學生組織，是本會的正式會員。

二、所謂「高等學校學生聯合會」、「團結學生會」、「學生自治會」等組織，違反全國學聯章程，不經合法程序，未得到政府批准，是非法組織。

三、本會號召全市廣大同學，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同學們的長遠利益出發，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以理智的態度，現實的選擇，共同維護改革開放所必需的安定團結局面

27。

某校學生會的一位幹部說：「他們可以一腳踢開我們，到時候，我們也可以一腳踢開他們。何況，他們沒有政府撐腰，別看他們今天鬧得歡，遲早都得解散。」

一個學生組織（我們姑且不論它是否經「真正的」民主選舉產生）因為自己是「合法的」，於是就有權力宣布另一個學生組織為「所謂的」或「非法」的。這在一個號稱已進入「立憲」水平的民主國家，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中國，確乎是合於常情的。就在北京市學聯發出這個頗為令人奇怪的《公告》前不久，號稱已經實現了「多黨制」（正確的解釋是「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中共，曾本著「政治協商」（據說這就是「中國式的民主」）的原則，令某部門召集過一個由現有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領導人參加的會議。會議的議題，是討論中國有無必要實行多黨制問題。會議結果竟是：這些「民主黨派代表」一致認為，中國現有的黨已經夠了，沒有必要再成立其他的黨，所以不必實行「多黨制」。這次會議居然還形成了紀要，文件下發各黨政部門，以示黨的「十三大」後在「公開性」方面確有進展，同時也證明中國的現有政治制度，是經過「民主程序」決定的。有了這樣的事例在前，北京市學聯的那些小動作，當然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但是，本來就是靠學生運動起家，靠在執政黨（國民黨）之外組織不同政見黨起家的共產黨，為什麼就沒有有一點兒雅量，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青年學生給予一點兒理解，一點兒同情呢？單純用它的感情已經老化凝固來解釋，我們將不得要領。他們所堅守這種制度，是它的前輩在創立這個國家時創下的。這個制度規定，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權，必須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聯合各革命階級和革命黨派的聯合陣線組成的政權。這個陣線，長期以來，是由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有席位的「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人士」代表的。其代表產生

的辦法，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及（包括工會、青年團、婦聯、學聯在內的）人民團體「協商」而定（其實是中共指定）的。各黨派團體之所以「安心」於這種在中共面前的「乞食」狀態，除他們根本不具備競爭的實力以外，承認現狀能使各人分享政權的利益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設想，就如同分餅一樣。有限的政權席位代表著有限的可分配資源，多增加一個黨、團參加分享，他們的既得利益就會減少一份，改變現有這種穩妥的制度，就會有新的競爭者的出現。而這種競爭一旦展開，那些幾十年來靠阿諛奉承、追名逐利、明哲保身和養尊處優來保全官位者，勢必在生氣勃勃的後來者面前敗北。出於這些考慮，他們當然不歡迎什麼新的黨、團出現，更反對所謂「多黨制」。這就是中國國情。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政權才能如此穩固。還是在戰爭年代，中共黨的主席毛澤東就看出了「統一戰線」政策的奧秘所在，並把它稱作與「黨的領導」和「羣眾路線」並列的「三大法寶」。而被看成是這個黨的「聖人」的周恩來，則是運用這種「統一戰線」技巧的大師。

但是，在共和國建立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黨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特別理解，在打倒了蔣介石之後，還有什麼必要繼續當年的「權宜之策」（他們從骨子裡就沒打算與別人分享政權，所以總把自己偉大領袖的深思熟慮理解為一時的策略），但是，一九八九年的風潮再一次使人們看到了這種制度的實用性。因為，在中共面前，各民主黨派雖然處在卑賤的地位，但是，它卻可以發揮代中共「整合」黨外羣眾的功能。一個青年學生，他不僅為所在學校的黨政機關管轄著，同時也為青年團或學聯代表著，如果她是女性，她同時還為婦聯所代表著。走出學校，你或為單位，或為居民委員會的黨政組織管理著，如果你成了一個教師，「九三學社」就成了你的代表，如果你轉行從商從事實業，也已

經有工商聯代表你了；如果你說你不信仰共產主義、你是國民黨的遺老遺少，那麼，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著你，——總之社會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這樣一種結構的社會中，你的每一個自然的和社會屬性，都分別被相應的機構和團體管理著，「代表」著，必要的時候，無需你發言，就有數不清的機構團體以你的名義講話，——在這種情況下，黨、團當然不是太少了，而是足夠了！所謂政治的「協商」，就是在神不知，鬼不曉的情況下，在這些機構和團體的上層之間，進行的。而它們，都是靠共產黨用國庫的撥款而養活的。這就是堅不可摧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生存奧秘所在。六屆人大期間，作為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胡績偉先生曾就憲法修改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而採用「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幾經周折，條文最後落實為「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人民民主專政」，老先生頗覺言不及意，殊不知那話是千真萬確的！當無產階級被共產黨代表，共產黨被它的領袖代表著的時候，人民也同時被種種與他們並不相干的黨派團體代表了。而且正是由於後者的存在，及其與執政黨的特殊關係，這個政權才享有了「人民」和「民主」的稱號。所以，在共和國裡，它們是有功之臣，是萬萬不能沒有的。不過，它們的另一個功能，確實是直到「改革開放」已不容置疑地取得了偉大勝利的八〇年代才被發掘出來的，那就是：扼殺別人生存的權利。

也許是意識到「消滅」原學生會是一種缺少現代民主的寬容精神的行為，為了不與原學聯發生正面衝撞；也許是為避「四二六社論」中「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指控，為政府的鎮壓提供藉口，「四二七大遊行」勝利結束後，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臨時學聯」正式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又稱「市高聯」、「高自聯」），這一方面表現出它仍然勇於改正缺陷，有自我約束和政策調整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繼續堅持鬥爭的決心。在這次會議上，市高聯撤銷了臨

時學聯原主席周勇軍的職務，選舉北京師範大學吾爾開希擔任新的主席，並決定常委五——七天換一屆。為回應政府已透露出來的「對話」信息，市高聯決定：各高校不能單獨與政府對話，必須以整個聯合會的名義，原則上平等，由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對話的時間、地點，要得到學生的同意。政府方面出面的，應該是學生要求的人員。關於對話的具體內容，次日（二十九日）繼續開會商討決定。本次會議還對罷課和下一步鬥爭形式及目標作出決定：專業性、藝術性、外語院校明日可以復課。其它學校繼續罷課到「五四」。今後是否遊行，以政府的態度而定。鬥爭的目標，是要爭取「聯合會」的合法地位。

但是，接下來的事情表明，學生為爭取憲法權利所做出的努力，並不取決於他們單方面的願望。而取決於這部憲法的「實在性」。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實在性，一九八九年四——五月的事件可以提供的例證不勝枚舉。除了《導報》事件可以證明「言論自由」的虛妄以外，緊接著出現的「四二九對話」則揭開了「結社自由」的虛偽面紗。

就在各大學校園熱烈討論即將與政府所作的對話應如何進行時，政府與學聯共同策劃的「對話」卻搶先登台、擊潰了「市高聯」制定的對話戰略。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政府方面有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參加，學生方面有來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林業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建工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等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位學生參加的「對話」，在團中央會議室舉行。其時間、地點既未經學生運動的組織者認可，參加者也不是經過學生推舉產生的代表。在「對話」過程中，政府代表明確表

示，他們「是來同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的學生進行座談、對話的，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針對市高聯提出的政府代表應經學生同意，袁木說：「對話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層次可高可低。對話，不是對手之間的談判。政府與學生之間不存在談判問題，而是爲了互相交談，溝通思想，增進理解，只要大家有誠意，願意坐在一起談，就不應該有什麼先決條件。」

緊接著的四月三十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又與北京市屬十七所院校的二十九名學生「對話」，同樣是由市學聯出面組織，把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撤在一邊。

這兩次「對話」雖然幾乎涉及到此次學運關心的所有方面^②，如「官倒」及黨風問題；教育危機問題；對胡耀邦的評價問題；「關係圖」問題；新聞自由問題；學生運動的定性問題；「四二〇」新華門事件與「四二二」請願問題；以及與此次學運產生的組織——市高聯對話的問題。但由於學生參加者方面缺少統一的部署與研究，所提問題不是空洞的概念，便是缺少充足的論據，再加上無政治上提出問題和公開辯論的經驗，輕而易舉地就被政府發言人巧妙的詭辯糊弄、搪塞了過去。

這就使此次學運創造的與政府對話的機會，不僅沒有發揮宣傳學運主張，促進政府改革的目的，相反，利用這兩次「對話」，中央和北京政府藉機宣傳了自己在反貪污腐化、懲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頓」事業中所做出的業績。而此次「對話」中學生集中提出的「官倒」、黨風、教育及改革決策失誤等問題，也或明或暗地指向了有關的趙紫陽和胡耀邦，這恰好與本次學生運動的另一目標——防止改革形勢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形成對立。而政府方面的人也不再聲稱，在這方面，他們的目標與學生是一致的。只不過爲了這種「一致」，人們必須放棄憲法給

予的言論、遊行、結社的自由。

「四二九對話」透過電視轉播公布全國後，袁木、何東昌之流的表演雖然招來了大眾輿論的憎惡，但「對話」的效果，卻表現出學生不僅在氣勢上略遜一籌，就是在道理上，也顯得勁道不足。它讓人疑惑：「所謂學運，是否就是在這樣一大堆互相矛盾和牽制的問題中盲目衝撞的自生自滅的運動？」儘管如此，政府所取得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和表面的勝利。因為它雖然欺騙了輿論，但是卻根本違背了對話的宗旨：化解矛盾，把對立變為一致，由被動變為主動。相反，當他們在「對話」問題上所作的小動作一旦公諸於眾，立刻就威信掃地了。

四月三十日，自「大遊行」後漸歸平靜的北京各高校校園，又掀起了了一個評價「四二九對話」的高潮，人們紛紛公布「對話真相」，不承認這次所謂「對話」。也有人咒罵參加者是政府的「走狗」、「學賊」，並把攻擊的矛頭指向袁木、何東昌等人。當時一幅流傳廣遠的對聯是：

避實就虛政府言哈立本

裝瘋賣傻國家何日東昌

袁（緣）木求愚（魚）

人們揭露，大家在電視中看到的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會」實質上是政府與政府表演的一個「雙簧」。其中，「學生代表」中絕大多數（四十五人中有四十一人）是官方指定的官方學生會代表，而不是從這次學生運動的參加者中，由廣大同學共同推選出來的，他們不能代表廣大學生的意見。在對

話的時間上，政府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時給各校發出通知，而會議下午二時就召開了，根本沒有給學生準備的時間。人們還揭露，市高聯副主席在前往參加對話時，被阻在門外，讓他進入會場的條件是放棄市高聯的身分和對話條件。他因拒絕了這一要求而未能參加「對話」。在所謂「對話」過程中學生只能提問而不能反駁，因為提問之後甚至提問之中他們的話筒就被搶走。而且電視播出時作了大量的刪節，迴避了許多尖銳的問題。

人們問：「政府之所以進行這場對話是因為這次運動，但為什麼不與領導這次運動的學生代表對話，而與自己選定的並沒有參加運動的學生會成員對話，其用心何在？」他們感到，「除了何東昌小丑般地自作聰明外，除了袁木哼哼哈哈鬼一般精巧地推託責任和袁立本關於『大頭鞋』與『皮鞋』的狡辯外，從對話中，我們什麼也沒得到。這場對話純粹是養猴人與猴子的對話，他們在默契的配合下，僅僅把對話的內容壓縮在細枝末節，遠遠沒有深入到這場運動的本質。」

他們憤怒地呼喊：「學生不容欺騙！人民不容欺騙！」

也有的大字報和傳單對於「對話」中政府發言人的講話內容進行了批駁。有文章說，「關於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政府發言人屢次支吾，回答總是所謂所作結論是針對『一小撮壞人』，但我們學生的運動完全是自發的民主愛國運動，根本不存在『一小撮壞人』的操縱和利用。而且，根據所謂極個別人的行為對全局定性的做法也是極其荒唐可笑，完全不合邏輯的。廣大同學對所謂『對話』的內容深表不滿，我們堅決要求政府對這次學生運動作出正確的、合乎民意的評價。」「袁木說：『本次運動與文革有驚人相似之處』。衆所周知，文革是自上而下為權力之爭而引發的動亂，本次學運是自下而上有著廣泛羣衆基礎的愛國民主運動，與『五四』倒有驚人相似之處。把文革與學運聯繫在

一起，那是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人們對動亂年代的恐懼心理混淆視聽。」

對於這次「對話」中的袁木的形象，著名雜文家舒展當時就有一個很中肯的描繪：

你忽而黨員，忽而導師，忽而政府發言人，忽而老新聞工作者，忽而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種種身分變幻莫測，於是產生了怪誕奇詭的喜劇效果，使人感到你是在作戲。同時由於同你對話的四十五名大學生，其中四十一名的代表性和四名的合法性都使人懷疑，更增強了一場滑稽戲的劇場氣氛……你明知你的對話對象中有非法組織的代表，作為國務院發言人竟然與他們侃侃而談，要嘛你承認他們是合法的，要嘛就是你犯了一個錯誤——不該參加這場既無代表性又無合法性的對話。

整個實況轉播，你的鏡頭最長最多最大，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既然名之曰對話，那就多少要給大學生哪怕很短的正面鏡頭，作戲也得有陪襯的配角呀！可惜有幾個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影子片段，一時使對話變成了袁木講演會。

……您的大智大勇、能言善辯比起以前談物價什麼的是表現出長足的進步，說服力之強令俺拍案，感染力之深令我心酸……^②

此外，舒展還批駁了袁木發言中的觀點：

黨風不正是對外開放後才有的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依著你袁木，該怎麼

才堅決呢？更多地開除一些黨員？在各條戰線一切領域來一個橫掃？形成一個大規模的人人自危的新的政治運動？難道黨中央有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正確部署，你還覺得不過癢嗎？

在你批評黨中央、趙紫陽和胡耀邦不堅決的三者之中，矛頭顯然是對準胡耀邦同志的。

一篇《就教於袁木、何東昌先生》的大字報，則就所謂「長鬍子」的「一小撮」問題駁斥了袁木、何東昌，它說：

在二十九日的對話會上，何東昌先生一再暗示有鬍子的一小撮人在背後煽動，操縱學生運動；袁木先生在後面補充說，這些長鬍子的人，比西安打砸搶分子更陰險。對此，我想向袁何二先生提出疑問：有鬍子的一小撮到底指誰？有何證據，務必拿出來讓大家看看。要有點法律概念，無中生有或不實之詞是違法的……不錯，是有不少長鬍子的人同情和支持學生，他們和學生有共同或近似的政治觀點。根據憲法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條款，他們有持有並發表自己政治觀點的權力，這和背後煽動、操縱完全是兩碼事……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是向中央、國務院、人大寫了「公開信」、簽了名的。他們是在學生運動勢不可擋、七條請願早已提出、報紙把學生誣蔑成一小撮壞人，並揚言

要鎮壓的情況下，挺身而出的。許多院校的教師，也是寫了聲明和呼籲書的。他們的確是長了鬍子的人，但不是一小撮，他們代表了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也沒有搞幕後活動，而是公開了自己的觀點和姓名。

一個負責教育的部長，對自己的老師、同窗、學生如此狠毒，令人心寒，把他們看作比打砸搶分子更壞的政治陰謀家，更是別有用心。目的是製造口實，打擊敢於說話的知識分子，再一次向知識分子開刀……

我呼籲，知識分子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為保衛自身的人身安全和羣體利益聯合起來，再也不能讓每逢運動必受凌辱的局面繼續下去了。

——男性成年有鬍鬚

五月一日上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北大球場召開中外記者會。會上宣讀了市高聯關於「四二九對話」《聲明》，對話要求草案，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高校同學書，以及由一些知識分子簽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美國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致國內學生的公開信》。

在內部，北高聯把「四二九對話」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慘敗」。鑑於政府已把北高聯看作「非法組織」，北高聯想到採取民主選舉的方式，另外成立一個組織與政府對話^⑩。

五月二日，在各校學生廣泛參加的選舉中，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成立。該團派出代表向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了《請願書》：

在「四二七」遊行之後，政府通過新聞媒介表達了願意與學生對話的願望，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歡迎，為促成儘快達成實質性的對話，我們作為大家推選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廣大同學，向政府和黨中央提出我們對話的要求如下：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鑑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發揮任何正確的引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絕不同意由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絕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鑑於同學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組成學生代表團。在代表團內部經充分討論磋商後，從中推舉出若干名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務及決策權利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允許雙方邀請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

由拒絕或阻攔。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三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十一—十五分鐘之內，允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均有攝影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速答覆，可商定在限定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護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布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盡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點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具體答覆的基礎上，附註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五月三日中午十二點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五月四日繼續遊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五月四日上午八點半，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五月三日上午，在學生請願書指定的時間之內，袁木等在全國記協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就《請願書》發表了答中外記者問。在答問中，再次重複了只與原學聯組織的代表對話的立場，嘲笑《請願書》企圖讓學生代表與黨和政府平起平坐，甚至高於黨和政府的設想。並對用再次遊行相威脅的做法嗤之以鼻。此外，卻對所謂「極少數」幕後操縱者，進一步給予了細緻和具體的描繪。

自此，政府組織的「對話攻勢」宣告全面破產。黨內強硬派失去了處理學運的主動權，權力轉而交給了開明派。

對於「四二九對話」的諸種批評，在當時仍然局限於技術層次，在眼花撩亂，轉瞬變遷的形勢面前，人們還不可能對之作出政治上的評價。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政府與學運對話的嘗試，是以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精神為依據而出發的，由於它發生在具有武力鎮壓信號象徵的「四二六社論」之後。它似乎是對於「四二一」知識分子《公開信》的一種響應，同時，它又發生在學生的「四二七」勝利大遊行之後，

因而，它也就染上了一些現代民主政治的信息。它使某些迷戀西方政治形式的人們產生了某種朦朧的希望，認為透過和平鬥爭的方式，中國這個具有古老專制傳統帝國政治通向「圓桌會議」的大門由此可以逐步打開，而忽略了它其實是在根本沒有憲法保障的情況下，中共運用傳統的「統戰」手段的本質。只不過，此時的中共既沒有了周恩來式的能熟練地運用這一武器（關鍵是不失原則）的大師，又增加了一個過去統戰政策造成的「既得利益階層」，使有心在新時代為這一祖傳武器創造新紀錄者，不能不前後掣肘，讓所謂「對話」流於有名無實的形式。與中共前輩們善於運用這一政策，實現政治的整合或戰略的準備，並無往而不勝的結果相比，一九八九年的「對話」，只能為這個神奇的發明增添幾頁無往而不敗的事實罷了。

註釋

- ①⑥⑧《平暴紀事》第四十三、四十五、四十七頁。
- ②③《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 ④⑤《顛狂的蛇年之夏》第五十、五十一頁。
- ⑦參見《明報》記者採寫的《北高聯的四十日》、陳啓明《學運領導問題淺析》。
- ⑨電視連續劇《便衣警察》主題歌，為當時流行歌曲。
- ⑩此政治笑話應是在知識分子中流傳的。因為大學生文革時年齡尚小，對姚文元的文風體會不深。當時許多文章為躲避「散布謠言」之嫌，均假託學生之口。因世有「童言無忌」之文化，可以免於追究。

⑪鄧小平為四川人。

⑫此是與當時流行的「教授教授，愈教愈瘦」對應的口號。

⑬中國百姓有「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由於多年的閉關自守，即使在政治鬥爭中也難免恪守「內外有別」的原則。

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

⑮見《新觀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李石《北京四二七遊行目擊記》。

⑯《鏡報》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號，穆望《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

⑰關於「四二七大遊行」的人數，北京市與國家教委均統一用「三萬」這個最低數。這個數字是根據各校報送的數字統計的。當時因囿於「四二六社論」的壓力，為保護學生和自身利益起見，各校都儘可能把這個數字縮小。所以不足為憑。給這一天遊行報出最高數目的是香港《明報》月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號的一份大事記中稱「四二七 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根據一目擊者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用碼錶大致掐算為十萬人左右。但這種算法沒有考慮到各校之間後來愈來愈拉大的距離，及行進速度的遞減等因素，所以仍為樂觀的人數。而五一六遊行官方報導的是數十萬，五一七遊行為「四十萬」，雖然這個數字與他們企圖給趙紫陽「分裂黨中央，促使動亂升級」羅織罪名有關，但與事實基本差距不大。

⑱同⑮。

⑲「四五運動」例外，其主要參加者為青年工人。

⑳該呼籲書的署名者為勞里·貝克隆特；勞倫·傑格萊昂；柯曼·麥克卡賽。

㉑見《世界經濟導報》信稿摘編，增刊三。

- ②② 見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中《贊成與猶豫》。
- ②③ 同②①。
- ②④ 原上海《文匯報》總編輯。
- ②⑤ 北大團結學生會王丹和北師大吾爾開希均發出過「廢除原學生會」的號召。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二十八、三十二頁。
- ②⑥ 同上，第三十九頁。
- ②⑦ 見《顛狂的蛇年之夏》，第四十四頁。
- ②⑧ 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一一二版；五月一日二版。
- ②⑨ 見《新觀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舒展《致兩個袁木》。
- ③⑩ 同⑦。

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卡爾·馬克思

第五章

趙紫陽的政治命運

與運動轉折

201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掀起這場運動的學生在「告一段落」的期望中，度過了富有象徵意義的一天。七十年後的「五四」，人們以它光輝的精神為動力，勝利地歡聚天安門廣場，這無論如何，也是少男少女們浪漫激情和理想主義藉以寄託的一個完美結局。

設想，如果運動就此結束，歷史在書寫這一年的重大事件，抑或是這四十年的重大事件時，該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可以肯定，它也會同人們在「五四」這一天的感受一樣，它的名字將會是與「勝利」聯繫在一起的。它或許會成爲接下來中國健康民主運動的首篇，而不是歷史中斷後的一個遙遠的回想；它或許會成爲一次歷史的傳奇，雖不留下現實的成果，但卻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中流傳下去。

但是，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一改其神祕的沉默面孔，帶著「收拾殘局」的架勢公開亮相，並積極干預這場運動時，它的命運就變化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趙紫陽結束了對韓國的訪問，乘專車回到北京。緊接著發表了被大多數人看作是對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撥亂反正」的「五四」講話與「亞行講話」，並創造了一次共和國有史以來的「新聞維新」的奇蹟，最後，公然與他的政治「恩師」拜拜而去。

人們不禁要問：趙紫陽，到底要幹什麼？

第一節 趙紫陽要幹什麼？

趙紫陽作爲中國改革的「功臣」，與他的搭檔胡耀邦相比，性格中正好缺少了一點優柔，而多

了一點自負。一句剛愎自用來形容他，雖然有失武斷，但那卻也恰好是他的魅力所在：當胡耀邦以他的真情打動人們時，他可能卻在用他的雷厲風行征服著世界。他識時務而無宿命論，絕不放過機遇卻也能等待機遇。從骨子裡就不會允許自己像胡耀邦那樣，甘心被敵手拉下馬的。他肯定要在適當的時候有所動作。而時機，也必須是他自己選定，而不能是對手安排的。

我們還記得，還在趙紫陽出訪韓國之前，學運形勢已經形成一定規模了。如果打算就事論事，及時處理，也該是領導黨的領袖們作出明朗決策的時候了。然而，這時，我們的這位總書記的態度卻是模糊的。據說，在新華門事件發生後，政治局討論學運時，李鵬曾說：「這少數學生是被壞人操縱的，他們的矛頭是對準黨和政府的，特別是對準老同志的。」趙紫陽曾有過反駁意見：「我不相信這麼多學生會被少數人操縱。當前，還是以疏導為好。要透過對話解決問題，不要激化矛盾。」政府最初發出的「對話」信號，應該是依據總書記的這一精神作出的。至於如何看待學生的請願，他卻表現出少有的嚴謹。試想，如果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前（距胡耀邦逝世有十天的時間，距學潮初起有一周的時間，應該是足夠他調查、觀察和作出判斷的了），這位黨的總書記有一個明確的指示，以後，就很難說會發生眾常委「請示鄧小平」這齣戲了。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就在學生長跪等待之時，趙紫陽也並未因剛剛追念過戰友的英靈而思緒沉浸在傷感中，更沒有因宣讀那冗長的悼詞而顯示出疲倦，而是很有興味地登上了人民大會堂樓頂，以俯瞰的姿態思考著眼前的局勢。當時，北大校園裡就貼有一首《念奴嬌·權貴問答——四二二大會堂紀實》對他們的行為進行過嘲諷。詞云：「李鵬紫陽／牽萬里／翻上會堂屋角／倒背雙手斜眼看／都是請願隊伍／喊聲震天／人羣遍地／嚇倒檐上雀／哎呀／怎麼得了／要翻天

囉／小平問有何方／尚昆答道／有百萬軍隊／不見「四五」春月朗／廣場遍地鮮血／還有預備的／警察不夠了／再加軍隊／不用擔心／天地不會翻覆。」（四月二十三日）這首詞意味著，不論當時趙紫陽心中作何感想，在廣大師生的眼中，他們是一類權貴的嘴臉，一色權貴的作為。據說，從大會堂下來之後，他就同他的智囊們一起打高爾夫球去了。此後無話，第二天，他乘專用列車去了北韓。

四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將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電徵在北韓的趙紫陽的意見，得到的回覆是「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①。就在北京市和中央為「四二七」大遊行造成的尷尬局面進退維谷，鄧小平不得不避居北戴河，首腦們倉皇打出「對話」牌時，趙紫陽一行，正風光於平壤的光復大街、青春大街，觀看雜技和大型歌舞《幸福之花》，並沿著已故總理周恩來的足跡，訪問了中韓友誼合作農場……

顯然，比較趙紫陽的四月行跡與五月的主動出擊，人們明白無誤地會感到，一種不協調或稱之為「飛躍」現象，在趙紫陽這個行事一貫老辣的政治家身上出現了。我們不必認為，是秦始皇當年派數百童男童女要尋找的「仙藥」，對二十世紀末的這位中共領袖發生了作用。但從邏輯上看，在從四月二十日（我們假定這是一個表態的最佳日期）或四月二十二日（假如考慮到治喪活動期間，不便抽身解決重大的國事問題）到五月三日之間，肯定有一件事情，阻礙了他的公開亮相？而歷數這些天中趙紫陽的重要活動，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北韓之行對此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這樣評價北韓之行，並非筆者認為總書記在朝期間有機會得異人指點，也不意味著身在國外的總書記，可以有機會從較遠的距離觀察和更準確地評估國內的形勢，有機會冷靜思考自己的角色定

位問題。NO！趙紫陽的沉默，並非他對形勢的評估沒有把握，相反，學運的形勢對他來說，並不是最要緊的事情。對於一個東方政治家來說，最要緊的事情永遠在中央，而不可能在社會。

趙紫陽對學運並無許多人所說的那種「感情」可言。把一個從數十年互相傾軋的中共官僚機器中脫穎而出的「鐵腕人物」，一個本身並無學運經歷，又不太接近（至少不像胡耀邦那樣）同情知識分子，對思想文化事務的價值取虛無態度的「治國者」，一個被國際社會看作「務實派」的典型人物，當成是一個「羣衆運動的尾巴人物」，或一位感情豐富的「多汁」的詩人，是不符合趙紫陽的實際情況的。但是，他顯然也不是一個有著李鵬們「貴族意識」，一切從維護既得利益出發，並天生以階級鬥爭理論為行動指南的「骨董人物」。他的身上，實事求是的精神往往能夠幫助他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他從一開始就並不同意黨內頑固派們對學運作出的評價。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始終如一的。但是，他之所以拖延至五月初才作出公開的姿態，是因為他可能考慮到：在無法更動的出訪之前，公開表示與李鵬等人的不同意見，正好會為存心「倒趙」而在黨內高層的力量對比中擁有絕對優勢的保守派所利用，趁其出國期間發動「政變」，也就是人們早已警告的「非程序更迭」。

我們無法了解趙對「宮廷政變」是否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以至特殊的戒備，也不能得出結論，自「倒胡」得手以來，「宮庭陰謀」已如毒菌一般，開始滲透這個黨的政治思維。但是，人們的確可以查到，胡耀邦下台以後，趙對「出訪」一事，總是要預作雙倍的「保險」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任「代總書記」期間出訪西歐，他一方面公開宣布「總理的職位比總書記更適合於我」，表示無心中國的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鄧小平長子鄧樸方任會長的民間團體——殘疾人聯合

會——下的康華實業公司（經過改頭換面）^②定為中國唯一的一家部級公司。

若說趙紫陽無心無力於黨務，那恐怕是低估了趙的能力的。第一，在調中央之前，他就屢任地方黨的第一書記，經歷使人相信，他既能治政，又能治黨；第二，還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他已經接受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任務，有理由相信，這其實也是他繼胡耀邦之後任黨的總書記的一個信號。因為，作為一個政府總理，是不可能沒有權力來制定和實施這一大型方案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在黨的十三大上，不是別人，正是他作的報告公布了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三，在對待胡耀邦下台問題上，趙紫陽曖昧的態度，除了他對胡在黨政不分，用搞運動的方法搞經濟改革的作風不滿以外，並不排除他知道自己是繼承者一事。如果這些分析是可以成立的，我們就可以認為，趙在那次出訪前的表現，實際上是一次「恐變症」的流露。

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前腳登上東去的列車時，早有準備的北京市委與李鵬一夥便蠢蠢欲動，賺得了無冕皇帝鄧小平的親自講話。這一方面為按照他們的意願平息學運，重建思想政治領域乃至經濟領域的極權統治打下了重要基礎，同時也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鋪平了道路。另一個能說明問題的重要跡象是，曾當過趙紫陽的「智囊」的陳一諮提供的情況，他說：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會議就沒有讓通常應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參加。甚至在此之前，「鮑彤的車也被跟蹤」。在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召開的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就已經斷言，作為趙的「嫡系」的「兩所一辦」（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國務院農研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簡稱發展所；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辦公室，簡稱政改辦。）是「操縱運動的三隻黑手」^③。可見，他們不僅把趙當成了想像中的敵人，對趙的人馬，早

已採取了監控手段。

所以，可以認為，當徵求趙紫陽對鄧小平講話意見的電報打到北韓時，一張捕趙的羅網已經形成了。趙的充滿謊言的回答，不過是一個緩兵之計而已。他的戰場在北京，如果命運是不可避免的，他也要親手安排自己的葬禮！

可是，當趙紫陽終於結束了他的充滿驚險的旅行，雙腳踏在自己國家堅實的大地時，歷史給他留下的騰挪的餘地，已經不多了。

自一九八六年起，他領導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由於沒有整體改革設想的支撐，已經連連碰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一九七九），「減稅讓利」（一九八二）到「利改稅」（一九八四），再到「企業承包制」（一九八六），在他和他的「智囊」們的想像力和實力所及的範圍內，能改的都已經改完（實際上是能「放」能「讓」的已經放完讓完），當他的智囊班子正準備歡呼十年改革創造出了幾百億的財富時，這個數字與財政部報告的赤字剛好相等。國家面臨的金融危機的局面，已經不可能支撐下一步更加深入的、全面的、傷筋動骨的改革。而由於他的改革思路所養出來的企業，由於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沒有配合的市場機制，在眼看著農民「老弟」已經「先富起來」的情況下，企業把增加的利潤多數用來滿足工人「老大哥」們的收入慾望，不能盈利的企業，藉口設備陳舊，競爭無力仍然靠在國家的「大鍋飯」體制上，向高收入單位的分配水平攀比，不少企業甚至用國家貸款發獎金，否則就要滋生不滿情緒，危及社會安定。於是，放權讓利，「放」出了一個投資膨脹；「讓」出了一個消費膨脹。社會其他階層在經濟收入沒有相應增長的情況下，因通貨膨脹而生活品質下降，人心不穩。

一九八四年，乘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刮起的「改革春風」，趙派理論家提出了價格改革「調放結合」的戰略^④，帶來了價格領域的「雙軌制」局面，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新生企業，爲了獲得優惠的資源，不得不捲入這種機會的競爭中去，一時間，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大量的滋生，嚴重腐蝕和毒化著整個社會空氣。

一九八八年，鄧小平企圖在仍不觸動產權問題的條件下，實行「價格闖關」，在「保守派」提供的闖關方案實施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搶購風潮。闖關失敗，十月，治理整頓經濟秩序的方針出爐。

這樣，就在改革派理論家大聲疾呼要防止「走回頭路」，提出「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時，人們實際上已經面臨「由誰來領導改革？」「以什麼思路統領改革？」「誰有能力領導深化改革？」等問題了。但是，由於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干擾，爲「深化改革」服務的宏觀的整體改革思路，在趙紫陽任政府首腦期間，他的「智囊」班子一直沒有能力提出來。在有些時候，當有人提出時，卻被適應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領導人斥爲「不切實際」的幻想，連提交研究的機會也沒有。甚至在有些時候，還被新聞、理論工具當作「倒退的」和「計劃經濟的」思路受到批判。由於這些原因，在趙紫陽任內，他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深化改革」這一歷史任務。

在政治上，趙紫陽曾有過一帆風順的時候，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趙紫陽給鄧小平打報告，建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並由他本人（包括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在內）領導成立一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經鄧同意，開始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這些以「一黨專政」、「黨政分開」爲前提的設想，經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後，又經黨的十三大確認。但在強大的

既得利益集團的無聲抵抗下，無疾而終。不僅如此，由於趙紫陽容忍了保守派對改革「難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層領導中日益面臨形單影隻，唇亡齒寒的局面。一時間幾乎要「黨政雙肩挑」的趙紫陽，不僅失去了主管經濟的權力，甚至連人事權也旁落^⑤。一九八九年二月，終於傳來了他要下台的信息。

此時此刻，趙紫陽還剩下什麼呢？

顯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層的優勢。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層黨政幹部中仍具有威望。這就形成趙紫陽「眼前失利，但還有將來」的政治前途。

在地方，被視為改革的社會基礎的各方諸侯，實際上是胡趙「放權讓利」政策的受惠者，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權益，但卻不關心整個國家的利益，每次省長會議都變成了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的討價還價的場所。因而，他們可能會支持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微觀層次的改革，卻把國家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秩序而進行的宏觀的整體改革視為畏途。他們可能成為趙的有條件的同盟，但這個條件是趙不能放棄其從前改革路數。

在社會上，被視為改革的另一社會基礎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們一方面由於理性支配，總是著眼於改革的未來，願意把眼前的不如意看作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與政府改革派共度難關；另一方面又為越來越嚴重的「體腦倒掛」和分配不公現象及每況愈下的社會地位而困惑。特別是對於趙表現出來的與鄧的一致：「摸著石頭過河」的小農式政治思維，及對思想文化方面的現代化問題的漠視，中青年學者尤其不滿。自年初傳出趙有可能下台的風聲以後，他又藉壓制「三十三人簽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大拋媚眼：指斥這一行為是對中央的挑戰與對抗，是一種與國

際大赦組織遙相呼應的「有計畫，有預謀」的行動。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啓立還通知各報刊電台，半年之內不得隨便發表三十三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電視、廣播中出現其鏡頭和名字。時間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計是在預期的中蘇高峯會談之前不會出現大的人事更動，半年之後，鹿死誰手必有結果。同時，為對付經濟危機可能出現的社會騷亂，趙還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揮中心、戒嚴、軍管等手段在內的「緊運」政策。其中的一項傑作，就是在各大專院校加駐警力。這些，都使知識分子產生了新的不滿。

而在當前運動中充當主幹的青年學生，則較普遍地反映著處於競爭中不利地位的下層社會的呼聲。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反官倒、反貪污腐化這些反映平等願望的口號，正是針對新出現的不平等而發出的。

而趙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在這十年的特殊政治經濟環境培育出來的特殊利益階層，既不希望出現徹底的經濟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來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去，因為後者會使之失去他們在不平等競爭中的優越地位，兩者都會損及其依賴「雙軌制」帶來的種種大量的化公為私的優惠。

面對上層權力結構中的劣勢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會基礎的四種勢力的要求，趙紫陽能作些什麼呢？他既不能滿足地方諸侯的願望，也無力實現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期待和要求。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個要求不進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階層。而他們，又正是八九民運不滿、抗議中人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淵藪——「官倒」及大公司階層。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趙紫陽，成了八〇年代末期社會政治中最尷尬的人。所有的期望與不滿，

前進與倒退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衝突，國家與集團利益的對抗，政治權謀與黨風的背道而馳，這種種事務和價值之間衝撞、矛盾、擠壓下，無能政府解決問題的唯一可見的希望，就是將趙紫陽擠出政治舞台。

陳一諮對趙的這種尷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但他把這些東西用毛澤東的「兩分法」熟練地歸結為「兩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們」定義為「既得利益階層」以後，他認為：

民衆的失望與這批老人的失望從總體上來說是根本對立的。這樣的對立表現為：一方認為改革不夠，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認為改革過頭了，改革導致政局不穩；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要求改革煞車甚至後退^⑥。

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二分法」雖然可以大致描繪出歷史的主動脈，但卻無助於人們了解分析趙紫陽對學運的初始態度，以及五月以後的調整；既無法解釋其努力所遭到的兩方面的反對或冷漠，也無法讓人對其「五一六」那天對戈巴契夫所作的「自殺性講話」的動機有更準確的理解。因為，按照「二分法」，事情就變得極其簡單：既然學運是人民要求深化改革的產物，趙紫陽又是黨內改革派獨一無二的代表，那麼，八九民運就是一場保衛總書記的運動。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第二節 黨內矛盾的公開化

在趙紫陽公開表態之前，黨內高層關於學運的看法分歧就已存在。就在北京市委組織人馬，準備那個給學運戴上「動亂」帽子的報告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知識分子出身的閻明復，也在請人準備另一個「鴿派」奏本。但這個奏本並未發生效力，在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召開的研究學運問題的會議上，人們一致通過的是北京市委李錫銘那個充滿血腥味的報告。

趙紫陽從北韓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是錯誤的，並提出學運是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一概念。五月四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又提出這一看法，並要求為「四二六」社論承擔責任，再重新寫一篇社論對學運作出評價。他的意見遭到李鵬的反對，也沒有獲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黨內高層沒有獲得多數（甚至秘密的）贊同意見的情況下，趙紫陽就決定將矛盾公開，打起自己的「開明牌」來了。

五月三日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簡稱「五四講話」），五月四日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的講話（簡稱「亞行」講話），趙紫陽公開了黨內的這一矛盾。

五四講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官方公認的中國近代史權威、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祕書之一胡繩起草的。稿件也經過政治局和楊尚昆事先傳閱，所以說，不可能容趙紫陽有太多的「出格」發揮的餘地。應該與「擅自行動」及「分裂黨中央」無涉^⑦。但是，在傳閱中有一個插曲：楊尚

昆、李鵬、喬石、姚依林、李錫銘均提出，應在文章中加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李鵬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補充後，給楊尚昆過目。楊尚昆拿著修改過的稿件親自找趙談過^⑧。但是，參加了五四紀念大會的李鵬、楊尚昆等人，卻眼睜睜地看著趙紫陽原稿念過，並無隻字提及「反自由化」問題。

分裂由此被公開了。但它只是一個象徵而已。因為，這件事當時並未被廣大聽眾發現。在這份長達五、六千字的報告中，至少講了「五四」運動的性質，中國革命「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轉變，今天發揚「五四」精神的新內容、新要求，堅持黨的領導與信任依靠青年，改革對青年素質的要求等五大問題。雖然對於當前學運有明顯的警策意義，但論述並無牽強附會、大出大人的痕跡，大多與歷史紀念要黏帶點瓜葛。

如果五四運動本身就有反對自由化的涵義，趙紫陽故意省去不提，那當然馬上會被向來愛在字裡行間找政策的大小知識分子和幹部們發現。但七十年前的這場運動，不僅沒有什麼「反自由化」的意思，相反，正是「全盤西化」論調在中國的濫觴之時。按照五四精神中反傳統、反專制、反對腐敗的賣國政府的主題，在當時的政府眼中就是極「自由化」的。中共等無數小組織，也算得上「準非法」的民間團體，就是在那種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所以，無論李鵬當時用他「躍躍欲試」的字體，在文章中是如何加的，在紀念這樣一種運動中提「反自由化」，都會給稍有歷史常識者以畫蛇添足之感。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大多數是爲了做樣子的大會上，人們對它的長篇大論的報告根本不可能細聽細想。除了知道內情的人以外，根本談不上會造成什麼影響。

儘管如此，這篇講話還是公開了一個事實：它的苦口婆心的說理態度，它提出的「清醒、理

智、堅毅、沉著、實事求是」等要求，以及它對七十年前這場運動開始了較爲切合原意的評價，甚至在強調黨的領導時沒有忘記黨六十八年來「犯過大大小小各種錯誤」，說明黨是勇於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並再次聲明，人民羣衆和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治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也正是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它還暗示「黨也正在經歷深刻的改造」，等等這些，都透露出一種開明的氣象，都與「四二六」或「四二六」式的社論文章橫蠻霸道，指鹿爲馬，以勢壓人的作法大相逕庭。這當然也是一種新的信息。但它還不足以說服人們相信警報已經解除。中共一貫的行爲早已證明，它的局部的、政策性的調整向來是極富彈性的。到什麼山唱什麼歌，此時此地說是對的，彼時彼地就不一定對了。朝令夕改，翻手爲雲覆手雨，更不鮮見。所以，事情到底如何，還要以觀後效。

趙紫陽的「亞行講話」比「五四講話」更進一步表明了他對當前學運的態度。他對客人們說：

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爲，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同學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

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正在繼續。可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在談到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時，趙紫陽說：

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工資低，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入，更沒有什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時，趙紫陽說：

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

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了解。

當時，在報紙上讀到趙紫陽的這番講話的人，還沒有覺得趙紫陽的「樂觀」和預言欺騙了在座的尊貴客人，而是覺得這一番「介紹情況」實在是一篇文不對題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著足夠的「理智」和「冷靜」的亞洲銀行的闊佬們，換成雜色衣衫的黃臉青年學生，它的喜劇效果將不會那麼濃烈。但有經驗者也正是透過這齣喜劇看出，中國的致命的不穩定因素並非來自下層社會的動亂，而是來自執政黨的中央。十年以來，這一點從未改變過。

這個「亞行講話」是由趙紫陽的祕書鮑彤起草的。因此，不僅可能盡量多地表現出趙紫陽的個性與對待學運的獨特立場，而且簡直可以說完全表達這位神秘祕書的個性和立場。與領袖的鮮明的

務實風格和對意識形態問題無興趣不同。他的秘書鮑彤是一個有頭腦、有理論、有才華並且有激情的知識分子型幹部，在趙來到中央後，他一直扮演著頭號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據知情人士稱，趙的改革領袖生涯中，這位幕後英雄始終是最能影響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這一角色，與他的出身無關係。鮑彤的祖父曾參加過十九世紀末晚清的「戊戌維新」。他多次與人談到，他願為前輩沒有完成的，中國二十世紀末的改革成功貢獻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譚嗣同的選擇就是他唯一的選擇。他行事幹練，講原則卻又較少衙門習氣，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幾次遇險中，他都毫不猶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響。

有許多人認為，自胡耀邦出局以後，趙紫陽因其年輕和潑辣，在當時中共高層確屬「稀有動物」，但從思想基礎，改革思路來說，他與鄧小平、萬里並無多大區別。並且，他的一生不僅沒有過什麼傳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為什麼在一九八九年，他會做出既與他的幾位同盟、同道、同黨截然不同的選擇，也與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筆者以為，他的身邊有一個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國命運，在這樣的家史國史中熏陶，以敢於殺身成仁的譚嗣同為偶像的鮑彤，是分不開的。

趙紫陽講話帶來了普遍緩和的氣氛。大部分與這場學運關係不大的人都認為，既然黨的總書記已作出姿態，那麼，學生也應該見好就收了。因為一場以改良為目的的羣眾運動，最終還是要透過執政黨內的變化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此次學運與趙紫陽達成配合，不僅可以使前段紛亂局勢進入可以把握的軌道，使之有利於處於不利大勢下的「改革派」，就是更进一步的民主要求，也會因今次已開的中共按民意改變決策的先例，和平實現。

按照鮑彤的要求，趙紫陽講話以後，中央的宣傳機器一改往日對此次學運的灰色基調，在開足馬力宣傳趙紫陽講話的同時，也緊鑼密鼓地組織了來自校園方面的積極的報導。就在刊登趙紫陽「亞行講話」同一天同一版上，五月五日的《人民日報》同時報導了政法大、北大、人大、清華師生對「亞行講話」的反應。標題是《首都高校師生歡迎趙紫陽講話》，副題是「希望黨和政府切實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增加透明度」。消息說：

當晚（五月四日）十時許，中國政法大學校園裡，正在廣播趙紫陽講話，同學們邊聽邊議論，講話播完，響起一片掌聲。經濟法學系八十六級的一位學生說：「趙紫陽講話比較客觀，比較實際，我同意他說的八個字：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這的確是目前我們必需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確是最明智的。」另一位同學補充說：「我們真誠地希望黨和政府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設，依法辦事，增加透明度。」北京大學在廣播趙紫陽講話時，上千人圍在一處聽。一位教經濟的青年教師對記者說：「這是一個溫和的講話，表明黨和政府的誠意，會對解決目前的問題起積極的作用。」一位在遊行中比較活躍的同學說：「我們歡迎政府這種處理問題的態度，但關鍵還要看下一步如何對話，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宿舍二樓裡，幾位研究生與記者攀談起來，他們剛參加遊行歸來，已得知紫陽講話內容，認為講得不錯。一位同學說：「領導人和學生都要理智，紫陽這個講話就很理智。」計統系一位研究生提出：「讓我們用正常渠道反映問題，但首先要保證正常渠道真正暢通，否則我們如何反映？」記者今天看到的清華園是平

靜的。參加遊行的學生已經返校，四個教學樓燈火通明，不少學生正在溫習功課，汽車系八十七級一位同學說：「趙紫陽的講話，我們能接受。學生們的愛國熱情需要理解。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們走了十七個半小時，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我們爲了什麼？今天遊行我沒有去，我覺得遊行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剛從電教室看完紀念『五四』錄像的一些同學對記者說，「罷課不罷學」，實際上對學習還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現在大家都需要冷靜。可以邊上課邊對話。總之，是復課的時候了。在北京師範大學，剛從學生宿舍出來的王梓坤校長對記者說：「紫陽的講話比較全面，既肯定了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也指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比如貪污腐敗現象。學生的行動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羣衆對貪污腐敗現象的不滿。剛才我去學生宿舍看望同學們，我對他們提出兩點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看看紫陽的講話；第二，希望同學們早日復課。」記者了解到，也有一些高校師生對趙紫陽講話的某些內容，持保留態度。

在這篇報導的旁邊，還刊登了一篇題爲《遊行學生宣布今日全部復課》的消息，給人造成了一種學運已因趙紫陽揮動的手臂而走向平息的印象。同日，新華社也發出了《北京高校今日起陸續復課》的消息，稱「據有關部門統計，北京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罷課學生復課。」《光明日報》記者也匆匆採寫了一篇《五月五日：首都高校校園印象》，給人們展示的亦是一片曙色。

法國《世界報》載文評論趙紫陽的「亞行講話」說，「這位黨的首腦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了。」

反應最快的當然還是香港的股票市場。五月五日，新華社香港消息報導：五月四日這一天，香港股票市場的恆生指數猛升六五·九點，達到三二二一·一二點，創下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場大暴跌以來的新高峯。五日上午開市後，承接昨日升勢繼續攀升，中午收市時恆生指數達到三二五七點。

記者和報刊的上述報導，反映了人們期望安定，期望學運有個「善終」的良好願望，也大部分符合事實。但並不是真相的全部。他們在匆忙響應主張新聞獨立的鮑彤組織的宣傳攻勢時，恰好忘記了另一種存在也是事實，而對事實負責就是對歷史負責。這個被掩蓋著的事實是，相當的人對趙的講話持保留和抵制態度。

對趙紫陽講話採取保留和抵制的態度來自兩個方面：中央對這次學運堅持「四二六」立場的強硬派；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對學運懷有獨立期望的人。

在兩種人當中，第一種人的反應是本能的，因此十分迅速：五月五日，李鵬在首都八所主要院校黨委書記、校長會議上說：「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意見，中央精神是小平同志的講話。」同日，何東昌召開教委司局長緊急會議，說趙在北韓時就知道鄧的講話和社論，他是同意的。他在「亞行」的講話，是特定環境對特定對象講的話，「不能代表黨中央」。在五月八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預備會上，北京市提供的七個文件中，專有一個是關於堅持「四二六」社論精神的。這個文件逐條批駁了趙紫陽的「五四講話」^⑨。顯然，強硬派並沒有把趙紫陽的講話當成特殊的。這個文件逐條批駁了趙紫陽的「五四講話」^⑨。顯然，強硬派並沒有把趙紫陽的講話當成特殊的。這個文件逐條批駁了趙紫陽的「五四講話」^⑨。顯然，強硬派並沒有把趙紫陽的講話當成特殊的。這就使原先包裹在事情表面那層，「對一場學運持不同觀點」的窗戶紙被戳破，而使其「黨內鬥爭」的本質大白於天下。問題只在於，雙方都想利用這場平地而起的風波打倒對方。

學生和知識分子對趙紫陽的疑惑則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趙的政治品德的懷疑，使人們有理由認為，趙在把學運納入其可控軌道，平定局勢後，將反手處理這次學運的參加者與同情者；二是認為趙紫陽擺在學運面前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仍然是一黨獨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屬於合法性腐敗；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公然與憲法對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銷一家報紙總編輯的職務……這一切說明，在政治的行為與成文憲法抵觸的時候，在習慣法的王國裡確是「合法的」。所以，這個「好聽不好使」的建議，不可能真正解決這次學運提出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它在本質上與「四二六」社論沒有差別。五月六日，北京大學的一名研究生貼出大字報說：

趙紫陽有一個講話，貌似很理智，很有道理，很能感動那些已經有點疲倦的同學們。

其實不然，仔細一分析，我覺得與《人民日報》社論沒有多大差別。

一、他的推理過於簡單膚淺。他說學生的基本口號是「擁護……」，我們可以統計一下，學生的基本口號決不只這些。趙的前提就是對事實的歪曲，這與《人民日報》說學生喊「打倒共產黨有何差別？」……最初的遊行並無「擁護……」的口號，只是《人民日報》玩弄的少數強加於多數的慣用伎倆迫使學生別出心裁地高喊「擁護……」等口號，其用心良苦可知矣！沒想到，也被人利用……現在出現的許多腐敗現象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之下產生的，根源並不在於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失誤，而是整個領導體制本身不合理……身上長了膿包，不是把它割掉就能解決問題，而是要消炎，要除根。

二、趙作爲黨的總書記，並未道出學生的心聲……造成這些腐敗現象的根源，是人民未能行使主人的權力。黨和政府幾年來一直在解決腐敗問題，爲什麼解決不了，甚至更糟？因爲沒有改到點子上，說得確切一點，因爲自身解決不了自身的問題。任何事物的自身調節能力總是有限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強制作用……我們不要指望政府會賜給我們民主，只有我們爭取過來的監督權，才是有用的。

三、趙說的措施好聽不好使。對話亦不是一個新詞。早在幾年前，中央就提倡和羣衆對話，那不是真正的對話，因爲它是主人提出來的，是主人給的。因此，對話超過一定範圍，主人就不高興了。他有生殺大權，爲什麼不保護自己呢？……保護自己是人的本能，是人民的本能也是政府的本能。

同學們，你們沒有被《人民日報》社論所嚇倒，也不要被趙紫陽的講話所欺騙。揭開它的面紗，可看出是同一個東西。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民主權力全是人民羣衆經過各種方式的鬥爭換來的。事實上，人民確實需要一個政府來管理自己（應當是「個體」管不了的事——作者批註），人民也需要自己作主人，這一對矛盾達到平衡，社會才能真正穩定。

四、趙過於自信。不錯，學生運動在沒有一個別有用心政黨領導時，是會自生自滅的。但學生運動只是一種徵候，就像地震前某些動物的異常活動一樣。他們比較敏感，走在前面，其後必然有一場動亂，是新的層次上的動亂。不要理解爲以前的暴力革命。直到舊的體制被新的更合理的體制所取代，這是必然的，沒有人能阻止，也不可能用政府的調節措施來避免……⑩

這張大字報上有不少人加了贊同的批注，對趙紫陽一再為共產黨的特權辯護表示不滿。另有題為《要等就等一萬年》的一首詩歌，則發洩了不甘心被趙紫陽「收編」，不甘納入政府控制的漸進改良軌道的忿懣：

要把猴子等成人，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雨露等成海，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紅旗等成裹屍布，要把鮮血等成生命樹；
要把愛情等成乾地瓜，要把野心等成五色土；
要把事實等成一本書，要把鬼話等成萬里圖；
要把地主等成個體戶，要把生命等成真墳墓；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要把阿Q等成太陽神；
要把未來等成一張紙，要把真理等成兩片雲。

五月下旬，爲了批駁「撤免趙紫陽會出現歷史大倒退」的觀點，社科院近代史所一研究人員曾寫大字報說：

如果說五月十九日以前的學生遊行請願活動是有積極意義的，那是因爲學生提出了「打倒官倒」等正確口號。然而……官倒作爲一種大量的經過現象出現，並不是少數人的

不法行爲。而在於亦官亦商的經濟體制。而這種體制的產生又在於趙紫陽以商品化推到工業化、現代化的錯誤路線。

作爲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在這次羣衆運動面前，按正常道理說，是應當作一點自我批評的，如果他有「十年失誤，我有責任」這一句話，就不失爲光明正大……如果他像胡耀邦同志那樣主動承擔責任，事態本是可以很快平息的。但他卻不肯這樣做。

這張大字報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與趙持不合作態度人們的心理：不滿的人羣期待的是一個「承擔責任」的人，但他們的呼喚卻召來了一個指手畫腳的「救世主」。

就是在趙紫陽的陣營內，其他成員也未必有趙的那種自信和果敢。五月十一日，胡啓立與《中國青年報》部門負責人以上編輯、記者、幹部對話時，有記者問他對學潮的事情怎麼看，胡啓立說：「我想，《人民日報》二十六日、二十九日社論，趙紫陽『五四』的講話，亞行講話，以及後來的一系列講話，說明了中央的態度。這些講話，有同志說有變化，我認爲，一切的任何講話，一個文章，都只能根據當時當地的時間地點條件而作出。還有，跟什麼人談，對象……一切講話都有時間、地點、對象和條件。但是貫穿的中心，就是要穩定，要團結，這是始終沒有變化的。因爲我們這個國家是經不起動亂的，要求大家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所以，這是中央再三強調，一直不變的這麼一條紅線。」他的答覆，在那種時間、地點、對象和條件下，真正不失爲一種機智巧妙的答覆。但是僅此而已，因爲過了這一關，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大部分人想不清楚，到底是鄧小平面對當時政治局常委不得不講那一番話，還是趙紫陽面對紀

念「五四」的青年及亞行代表不得不講這一番話？抑或是黨的中央政策方針從來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如果說，趙紫陽的講話和「四二六」社論之間有那麼「一條紅線」貫穿，那至少也得讓大家都看得出來，否則，憑什麼前一個能氣得十萬人上街遊行，這一個又要大家鼓掌呢？更重要的是，這種含糊其詞沒能說明後來的黨內鬥爭。

胡啓立確實不妨當他的守紀律的好黨員，但這些未能消除的疑惑使人們認為，沒有必要把自己做的事情和趙紫陽攪在一起，充當黨內鬥爭的籌碼和工具。正是本於這種心理，一場眼看著將要被趙紫陽收進罅底的學運野火，在這個黨內唯一有可能扭轉乾坤的法師面前，稍加猶豫，又飄然而去。趙紫陽失去的機會，在事後看來，也是中國在八〇年代的最後一個機會。

然而，他的出面並非完全没有作用，至少，他把被「四二六」社論軋成鐵板一塊，懷著背水一戰、慷慨赴死決心的學生陣營，瓦解成了一些碎片；使他們的繼續抗爭會在國人面前顯得理虧；使本來在很大程度上基於情緒的這場學運出現了力量的衰竭。同時，也把知識界人士由幕後引到了前台。

第三節 新聞界接過「接力棒」

五四前夕，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對局勢曾有過一個估計：北京的學運高潮，已隨「四二七」大遊行而過去，並將以「五四」為界告一段落。而全國的學運高潮則是在「五四」。

果然不出所料，在五月四日這一天，除這次學運的發源地北京外，全國有三十個省、市都爆發

了學生、教師遊行請願事件。他們提出的口號，共同內容有：發揚「五四」精神；促進民主化進程；擁護共產黨；擁護改革開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科學；打倒官倒；公布領導人財產狀況；廉潔政府，懲處貪官污吏；反對官僚主義；抑制通貨膨脹；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坦誠對話，反對訓話；解除報禁；保障人權，健全法制；新聞、言論、結社自由；聲援北京學生；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等。

這一天參加遊行的（除北京市外）有一百三十所高校，人數達到十二萬。其中，山西太原有八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門前靜坐，口號除與北京學運相似的內容外，還有「爭取煤電的地方利益」，「重新評價胡耀邦」等內容；西北重鎮蘭州，六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向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內有要求澄清四二〇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真相；在憲法允許範圍內成立學生組織；制訂從政道德法，或廉政道德法等八條內容；杭州市十所高校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除提出上述共同口號外，還提出公開緊俏商品，諸如彩電、冰箱、自行車等的優惠票證的分發情況和流向；在北工業大學「五四青年會」的組織下，西安市也有三萬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參加的學生均佩戴校徽，穿軍訓服，提出「要求糾正輿論對西安學運的歪曲」，並有「吃喝官員魏明生滾下台」的口號；中南重鎮武漢市十二所高校三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向省政府遞交了有六條內容的《請願書》；重慶市六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的口號中則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國特色；傻博士，窮教授，中國獨有」，「官倒不滅，改革必敗」，「民主不明，中國無望」等口號；上海市六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散發了《告上海人民書》，書稱：「市民們，物價飛漲，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國已處在危機中。百分之三十九的中國人生活水平下降，百分之四十二的上海市民生活水

平下降，製幣的印刷機在緊張地、晝夜不停地運轉，仍然供不應求。市民們，你們想過沒有？錢到哪裡去了？該是清醒的時候了……我們再也不能被愚弄、被欺騙、被壓榨了，我們要作真正的主人」；天津市八所高校五千名學生在南開大學舉行紀念「五四」集會後，打著「誰鎮壓學生運動，誰就沒有好下場」，「外保球籍，內爭人權」，「政治公開，新聞自由」等標語上街遊行；長春市三所高校五千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的口號中有「反對政客」，「反對滑頭」；大連市兩千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到市政府門前靜坐，標語口號中有「反對專政」，「反對封建專制」的內容；福州市約兩千名學生冒雨舉行了遊行，並向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要求中獨特的內容有「提高師範生助學金」，「取消定向分配制度」等；長沙市三千多名學生在鞭炮聲中走出校門，橫幅標語中有「收回《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還我四二四《世界經濟導報》」，要求恢復欽本立總編輯職務，開闢人民批評政府管道等內容，遊行者還向羣眾散發了有「取消封建特權」、「抑制物價上漲，挽救農業危機」內容的《告同胞書》並進行了講演；廈門大學二千名學生遊行後，向市政府提交了要求查處浯嶼駐軍毆打廈大學生事件；南京二千多名學生在遊行中散發了《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個青春中國》，號召「所有的中國工人、農民、子弟兵、學生聯合起來，我們要有一個自由平等，享有人權的中國」，向省政府提交的《請願書》中有：一、集體造成的決策失誤應集體辭職；二、強烈要求七十五歲以上黨政領導辭職；三、中共經費不應在國庫內開支；應由各界人士組成廉政委員會，公開查處官倒內幕等內容；昆明市二千多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貴陽市一千二百名學生「飛行集會」；成都市高校六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廣州市有數百名大學生上街遊行；在石家莊市，五百餘名學生上街遊行；遠在青海的西寧市，青海師大、教育學院、青海民族學院也有近千名

學生先後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靜坐請願，民院打出的標語中有「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內容。安徽合肥，江西上饒，贛州，河南洛陽，陝西寶雞，湖南湘潭、衡陽、婁底，河北保定均有數百名學生上街遊行。

面對這些遊行，各地學校均先由教師、幹部進行了一番無效的勸阻活動。公安部門有的設置了象徵性的路障，但沒有硬性的阻攔。有的事先做了清道工作，甚至全程隨行。凡口號涉及國計民生和社會不公問題的遊行，都與市民發生了較強烈的共鳴。

北京的「五四」遊行人數少於「四二七」大遊行。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其一，是隊伍中出現了外地學校的旗幟，如吉林大學、武漢大學、瀋陽大學、南京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西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以及來自四川、南京、唐山、大連、溫州、湘潭、煙台等地的學生；其二，是重點院校的人數減少，但以前沒有參加進來的北京市專業學校，這次參加了進來，如服裝學院、印刷學院、廣播學院等；其三，是加入了新聞界編輯、記者的隊伍，他們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旗幟走上街頭。

這後一個新因素的出現，使仍在「開創校園民主」還是「向社會政治縱深」兩個目標面前徘徊的學運潮頭，有了一個喘息和重新選擇的機會。也正是由於學運出現了這種從思想、理論，到生員和激情都後勁不足的狀況，新聞界得以在一時間越居潮頭，在「五四」以後，接過學運的接力棒，獨領風騷。

新聞界本來是一個社會中最敏感的部位，但在中國，它又是受管制最嚴的一個部位。這種狀況的形成，不僅與經濟上「趕超型」國家的動員機制相關，更與政治上「專政型」國家的統治機制有

密切聯繫。不論新聞還是出版，都不是作為一種中介性質的文化、知識、信息的傳播角色而存在，所謂純粹的新聞工作者，當然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黨的宣傳工作者，他們統統受著共產黨宣傳部門的「歸口」領導，而在大大小小宣傳部的頂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管宣傳的常委。這個常委表面上主管著黨政軍、工青婦、各省市自治區（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國務院各部委）的上千家報紙，但黨委會對這些報紙的絕對領導（民主黨派的情況類似，也是由各黨宣傳部領導，以便與執政黨「歸口」，並事先在政治上進行了自我閹割），就形成在中國大陸實際上只有一家報紙，那就是中國共產黨辦的報紙的局面。這種局面有許多特定的維持機制：其一，辦報經費由國庫撥款；其二，總編輯由上級黨委任免或認可；其三，中宣部定期召集中央各大報刊的「吹風會」，確定一個時期的宣傳方針與宣傳「口徑」，規定哪些人的文章不予刊登，有越軌者要受到從「通報」到「撤職」的級別不等的紀律處分；其四，遇有重大事件，一律採用新華社所發「通稿」；其五，黨內因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的「意識形態權威」及其爪牙，對各報動向實行日常監督，一遇風吹草動立即舉報。幾十年來，中國報人的命運跌宕多舛，沒有一個是因為經費無著，言語失信，或迫於同行競爭而失敗，但也沒有一個不是和政治原因聯繫在一起的。

八〇年代以來，爲了探討全面現代化路徑，也有一、二人物在新聞界作出「造反」試探，如《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兼社長胡績偉，提出「黨報即是黨的報紙又是人民的報紙」，「黨報，既要有黨性，又要有人民性」等論題，但未及展開討論，立刻就被胡喬木之流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新聞界的代表」名義「槍斃」。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打「擦邊球」屢履險境，總算因緊跟總書記沒有被罰出局，但日子也從來不好過。

新聞界的痛苦由來已久，這痛苦不僅在於上級的壓制和種種約束，還在於新聞工作本身的特性及對新聞工作者素質的要求與這種約束之間的矛盾。猶如囚禁生活對於一個生性沉靜、愛好冥思苦想者，絕不同於一個活潑好動、血氣方剛者一樣，新聞工作要求的敏銳、快捷、社會責任感與道義感，恰好與中共的新聞管理體制形成尖銳的對立。在中共四十年的統治中，有著良好記者素質者，大致有三條出路：一是政治上被整肅，或瘋或傻或自殺，能鬱鬱而終者，皆算善終；二是移情，要麻轉而充當「劊子手」或他們的鷹犬，把過剩的能量和感情交給包裹著神聖外衣的權力；要麻轉戰其他領域，希圖走出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三是消弭自身的天性，掐滅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求能作新聞戰線的一名「老兵」，即使是這樣，他們也總是要尋找機會表現自己的天性，而他們，也正是這所有痛苦者中的最痛苦者！

發生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際的社會動盪，不論其價值判斷如何，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它毫無疑義，是一種戰馬對於騎手的召喚。雖有無數改革開放以來中箭落馬者屍體在前，年初傳出的《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刀下待斃，又有中宣部不失時機的給各報套上的「統一口徑」的籠頭^①，勇敢者還是忍不住要衝鋒陷陣。只是在奉獻到讀者面前時，那些巨大的勇氣和超凡的熱情，經過與各種陷阱的周旋和羈絆的廝磨，不得不只剩下絲絲熱氣。

最先行動的，應該說還是《人民日報》，四月十七日，該報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了記者張軍榮攝自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民羣衆自發悼念胡耀邦的照片，照片說明文字是「四月十六日，北京，人們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四月十九日，《科技日報》不僅在頭版以大幅照片刊登了十八日北京部分大學師生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的情形，而且發表

了《哀思灑滿校園——首都大學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傾注哀思——天安門廣場目擊記》兩篇通訊，對學潮的初始作了首次報導。

四月二十一日，就在新華社發出《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的失實報導，並以《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為題發表評論的第二天，《工人日報》刊登了題為《最重要的是贏得民心》的評論員文章。當中央責問全國總工會，要查處該報時，全總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進行抵制。

四月二十一日晚至四月二十二日，大會堂前學生追悼與請願的一幕，加之學生發表的對新聞界的不信任甚至憤慨言詞，大大地刺激了在場的記者。在政府的新聞管制和學生鄙視的雙重壓力下，不少記者選擇了新聞工作的職業良心和道德，錄下了當時的實況。但是，在報紙的總編輯負責與部門主任層層把「關」之下，有幸突出重圍的僅《科技日報》一家。四月二十三日，描繪了廣場學生追悼場面的大特寫《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飛遍全城。從職業要求角度看，這篇報導的感情色彩和主觀情緒過於濃重，但它畢竟是大報突破封鎖令，開始大篇幅報導現實情況的第一個勇敢的「吃螃蟹的人」。緊接著，第二天《農民日報》也刊出了本報記者撰寫的報導《再送耀邦一程，再看耀邦一眼》。但在中央的嚴密監督下，《人民日報》和其它報紙除刊登新華社的「通稿」外，自己採寫的報導文章卻隻字未提廣場事態。

此時，各報編輯、記者的「造反」行動已開始醞釀。

在《中國青年報》社內，四月二十四日，身兼學校部、科教部兩個主要部門主任的李大同領銜，起草了一份給報社領導的公開信，要求按中共黨的「十三大」有關「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觀、公正地報導學潮情況。全社幾乎所有編輯記者都參加了簽名。同時，大家撰寫了

有關學潮情況的報導。當晚，該報二十餘名編輯、記者和半數以上的部主任，與總編輯和黨組成員交換了意見。總編輯與各報「對表」以後，決定如其他報紙不發，該報仍按兵不動。此後，該報一部門負責人又醞釀「部門負責人集體辭職」，但考慮到問題的解決關鍵不在報社，這樣做只能增加報社內部摩擦，未獲多數部門負責人同意。

二十五日晚，《人民日報》的員工從電台、電視台收聽到「本報」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四二六」社論。該報國內記者又獲知鄧小平講話中有「要制止學生運動，看來流血不可避免，我們還有三百萬軍隊，不要怕影響國際聲譽」的內容，憂心如焚。社論在該報發表後，該報編輯、記者針對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起草了一份《我們的意見》致該報編委會。指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新聞起碼的職業道德和原則」，指斥了新華社和以《人民日報》名義發表的社論「強姦民意」^②。該報社評報欄內貼出文章，對「四二六」社論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駁。

「四二七」大遊行後，《中國婦女報》衝破禁令，頂住高壓，以《北京數萬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為標題，首次正面、真實報導了學生遊行的情況。所引學生標語「媽媽，我們沒有錯！」和憲法條文，體現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憲法為準繩的正義立場。尤其是此項壯舉出自巾幗一事，為新聞界同仁提高了據理抗爭的勇氣。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處理《世界經濟導報》，撤銷欽本立總編輯職務的消息傳到北京，給躍躍欲試的北京新聞界以新的刺激，人們紛紛到導報駐京辦事處表示慰問和鼓勵，支持導報同仁與上海市委的「非法」決定抗爭，迎接新聞界爭取獨立解放之日的到來。

雖然對《世界經濟導報》利用報紙出版周期短的優勢，不作修理地搶先發表與《新觀察》雜誌共同

舉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的全部內容有保留意見，四月底，《新觀察》也發出了自己有報導「四二七」大遊行，評論「四二九」對話的有份量的第十期稿件。

四月三十日，新聞界在八九民運中第一個聯合行動在醞釀中。

這個在五月上旬達到高峯的活動，是由兩條主要線索演變而成的：

其一，是以廣州的《亞太經濟時報》駐京辦事處在魯迅博物館主辦的「五四精神與時局」座談會為發端，以知識界部分人士對形勢的分析及展望為背景，由《亞太經濟時報》駐京辦和《經濟學周報》籌備的請願為線索的活動。

四月三十日，《時報》駐京辦邀請了一些學者就當前學運的背景、影響、評價；學運的發展趨勢及可能結果；學運對當前中國改革與民主化進程的影響等三個問題展開了討論。與會者有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中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許良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包遵信，四通公司周舵，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遠志明、謝選駿，民政部幹部管理學院黎鳴，《經濟學周報》社長費遠，副主編鄭棣、王重濤（未被邀請）。北京大學教師孫立平，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劉力羣等。

在發言中，大家認為導致這場學潮的社會背景，是中國社會總危機。它首先是經濟危機的徵候。經濟改革走入死谷，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社會情緒不滿。如果沒有胡耀邦的逝世，矛盾也會以另一種形式爆發出來（有人介紹了市民對學運的態度，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持贊成和同情態度），所以，學運不過是一種催化劑，它產生了催雨的作用，但雨水本身是不會結果的。關於學運走向，有人提出學運與社會民主力量結合，但與會者認為，學生不希望外界介入，以免改變學生運動的性質。學生應該

幹學生的事，記者應該幹記者的事。學運目前面臨的是學生「自治會」合法化問題和輿論公正問題。王軍濤插話說按照民主政治的規則，政治過程應該與行政過程分開，不然會導致上下對立，政府不像政府，公民不像公民。周舵的發言強調了「找出有限目標」和「議定議論程序規則」及新聞監督對學運前途的重要性，既反對胡鬧也反對清談。有人還特別警告不要讓陳軍這種人介入，也不要動員工人農民。以「四二七」大遊行為揭發中國政治中非理性時代應該走向結束。

對於學運可能帶來的成果，與會者估計比較樂觀，認為一是由對話入手，透過合法的程序，可能實現「結社自由」；二是由上海市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非法」手段為切入點，可能爭取「新聞自由」。

會議結束後，東道主請新聞單位的來人留下，共同商議就上海市委錯誤處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起草一份給中央的《公開信》，並相約五月三日下午再次集中，通過該《公開信》，五月四日正式遞交上去。

事後，《亞太經濟時報》與《經濟學周報》各出一人起草了《公開信》：

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向該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以及在此之前停止四月二十四日《世界經濟導報》的發行，我們認為，這些決定是違反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是違背黨章所規定的黨必須在憲法及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原則，違背黨的十三大關於黨政分開的原則的。對此，我們提出以下要求：

在此同時，《中國青年報》也在醞釀著一場與中央領導人的對話活動，與《時報》活動是建立在「務虛」基礎上的背景不同，該報的活動是在外界條件的壓力下，由自身「長」出的本能需求。據這次對話的組織者李大同回憶，事情的發起有這樣一個過程：

我當時的思考是，本報內部的爭論和分歧，實質上是我國現行新聞體制的弊端，與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的要求及廣大新聞工作者要求改革這些弊端的願望的摩擦。產生這種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說來，就是新聞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對重大突發性新聞事件的符合新聞規律的快速、準確、靈活的多層次反饋機制。以上問題自一九八六年學潮後即成爲我國新聞界和新聞理論界討論並加以改進的重點，成爲我國新聞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改革的具體成果，體現在對大興安嶺火災、一些嚴重交通事故、拉薩騷亂等重大新聞的報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國新聞界在國內外公衆中的威信。對以上取得的成

生；

- 一、中共中央考慮撤銷上海市委的該項決定；
-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經濟導報》公開道歉；
- 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違法事件；
- 四、政府與新聞界就這一事情進行對話，新聞界對話代表從本公開信簽名代表中產生；
- 五、對以上要求儘快作出明確答覆。

果，國務院辦公廳，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關於改進突發事件報導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分肯定，並提出了「要從引導國內外輿論，維護國內安定團結和我國的國際形象出發，本著中央關於『提高開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精神」，繼續努力改進突發事件報導工作的任務。

然而，這項重大改革畢竟尚處在探索階段，還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就突然面對這場規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複雜的學潮了。新聞界缺乏成熟的對策，只好再臨時採用按統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報」的傳統做法。這樣做的客觀效果，根據我所得到的信息，顯然對平息局勢弊大於利。

結果，對新聞媒介的抨擊，成爲學潮的重要口號；這種抨擊得到相當多公衆的共鳴；首都各主要新聞單位內部均就學潮報導方針發生激烈爭論；一些新聞單位在內部壓力下開始突破中央禁令；由於在我國新聞媒介上得不到關於這次學潮背景、狀態和評論的足夠信息，於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轉內銷」等方式傳播的謠言不脛而走；收聽《美國之音》、BBC等外台廣播的各階層人數激增。

我當時認爲，這些情況表明，採用「不利的事情不報」的傳統做法，使新聞媒介這個原來作爲平息事態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態進一步擴大的因素，這不是事與願違嗎？所以我提出應當迅速修訂學潮報導方針，這樣才有利於穩定。

但是，這一涉及到新聞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不可能在一家新聞單位內獨自解決，再在本報內部爭論沒有多大意義。但作爲一名普通的新聞工作者，我，如何在這個問題上起

作用，盡責任呢？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恰當的方法和途徑。四月二十九日，袁木在與首都部分大學生對話時說的一句話給了我啓發。他傳達了黨和政府準備在各個層次上與社會各界廣泛對話的願望。說「對話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層次可高可低」。看完當時的對話錄影以後，我覺得那場對話的水平很低。可見儘管大學生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文化水平，但他們受生活空間和閱歷的限制，不可能對社會各個領域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有深切的體會，更不可能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看來，真正能夠對我國改革和現代化事業起到制度化推進作用的對話，只能在黨和政府與專業工作者之間開展。這時，我便萌生了就當前新聞界共同關心的若干問題與中央有關領導進行一次對話的念頭。

四月三十日，當我否決了其他同志提出的「總辭職」動議以後，就提出了對話的動議。當即得到十幾位部門負責人的贊同。於是，我開始考慮對話活動的安排。首先要爭取不被誤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確定了幾條原則，一是要站在幫助黨中央改進工作的立場；二是要意見和建議要以十三大精神為依據；三是不能像學生那樣，提出衆多的先決條件；四是要與學潮嚴格劃清界限，只涉及新聞問題。考慮到本報總編輯徐祝慶同志的意見，我對活動以本報為主的原方案作了較大修正，決定廣泛徵求首都各新聞單位的意見，如對話動議得不到多數新聞單位贊同，對話活動立即中止；如對話動議得到贊同，但對話內容為非理性的激進方案所取代撤回動議，並不再參與此事。

我起草了這封給黨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幾份，由我報記者葉研五月三日，帶到了魯迅博物館。據葉研說，我們的東西魅力顯然比他們的大，他們的《公開信》顯得像「最後通

牒」，而我們的則意味著一次行動。各單位要了我們的信，準備回去徵求簽名。結果把他們組織的會給衝亂了……據五月三日魯博會議的主持者——《亞太經濟時報》的羅立為介紹：

五月三日，原定是討論《公開信》的事，在二樓會議室裡。但不知道誰把消息透露出去，結果來了很多外國記者，四十多個外國記者，加上二百多個國內記者，房間裡坐不下，我們只好把會挪到院子裡草坪上開，請各報派一名代表參加，其他人與外國記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們議定了《公開信》的第二稿。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中國青年報》的葉研也拿出一個打印稿徵集簽名，引起了一陣小小的混亂。後來經人提醒，葉研表示對東道主《亞太經濟時報》道歉，並提議是否可以考慮將兩個東西揉在一起？同意。這件事就這樣決定了。以後又討論了怎麼送《請願書》的問題^④。大家議定，五月四日中午十二點到新華社南門集合，然後到西交民巷的中國記協遞交《請願書》。當時也議論了如果學生遊行，新聞界是否參加。大家的結論是，我們站在路旁表示聲援。有人說，既然是「靜站」，為什麼不遊？當時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大家並沒有太重視這件事。

五月四日中午，各路記者頂著高溫 and 烈日齊集新華社南門。但這時，幾個原定的這次行動的主持人隻字不提請願的事，也不提到記協去的事。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卻拿出了一份遊行口號，說，我們提出十五條口號，我逐條念，如果大家沒有異議，就算通過，這十五條口號是：

首都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集會口號

- 一、新聞自由，新聞公開；
- 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
- 三、人民有知情權，參政權，監督權，批評權；
- 四、新聞民主，開放報禁；
- 五、要一部保護新聞自由的「新聞法」；
- 六、新聞自由有利於政治昌明；
- 七、新聞自由有利於經濟發展；
- 八、新聞自由有利於社會穩定；
- 九、捍衛新聞真實，保護言論自由；
- 十、放寬對新聞報導的種種限制；
- 十一、新聞要講真話，我們想說真話；
- 十二、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
- 十三、反對粗暴干涉《世界經濟導報》；
- 十四、恢復欽本立同志總編輯職務；
- 十五、新聞界要求與政府真誠對話。

從這份口號中自相矛盾的內容，人們不難看出，這次遊行是在基本沒有成熟考慮的情況下，一夜

之間，倉促決定的。但口號立即獲得了通過。於是，首都新聞界成爲響應八九學運的外界的第一支隊伍，走上街頭。

新聞界的遊行被看成是一個壯舉，但它卻是新聞界對這次學運中自身不同訴求公開暴露的起點。這種不同簡而言之，一是以爭取新聞自由、衝破報禁爲目標；一則是以爭取「放寬」對新聞的管制爲最近目標。前後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當前，新聞要不要對社會的穩定及執政黨負責任。大致來說，前一種觀點一般由生存艱難的民辦報紙或由於新聞管制生存受到威脅的報刊和新聞工作者持有；後一種觀點，則爲在日益變化了的條件下，感受到生存危機的報刊及新聞工作者持有。前者是這次運動中的「激進派」，具有「革命」的意向；後者是「溫和派」具有「改良」的色彩。由於知識界部分勇於「闖紅燈」者與前一種訴求有著相關的命運，所以，在行動時，他們是前一種力量的後盾。但在人數上，前者是少數。

不過，這種分歧，在當時並不明顯。這表現在，雖然人們對有「最後通牒」色彩的《公開信》棄置不顧，但人們卻以違反北京市「十條」規定，上街遊行這種更激烈的方式進行了補充；在遊行的口號中，代表兩種觀點的內容兼收並蓄。沒有人細想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

但是，到了五月五日，即趙紫陽「亞行講話」發表以後，在新聞界代表繼續討論對話問題時，這種分歧就更加明朗起來。會議開始以後，到會的各家新聞單位代表所匯集的情況表明，透過程序對話來表達意見的方案，得到了首都新聞單位的廣泛贊同；對中國青年報李大同起草的請求對話的文件內容，各單位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信件簽名者踴躍。而原先由《經濟學周報》和《亞太經濟時報》代表起草的，以責成中央重新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爲主要內容的《公開信》不再被人提起。並

且有人動議，因為這是以「首都新聞界」名義進行對話，所以，是否請非首都新聞單位就不要參加；另外，還提出這是黨報與自己中央的對話，是否非黨報就不要參加。按照這個動議，原《公開信》的發起者，《亞太經濟時報》（外地）、《經濟學周報》（民辦）和「當事人」《世界經濟導報》（外地）就可以被排除在外。但這樣一來，在這次學潮報導中表現突出的《科技日報》（專業報）也將不能參加外，甚至連發起單位和組織者《中國青年報》的位置也會受到質疑。由於這個動議的不合情理，因此沒有被通過。於是，在選派對話代表問題上，又採取按簽名人數多少分配名額的辦法。這樣，《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這些有一、兩百人簽名的報紙當然就位居這次對話的主要地位。再加上上述幾個相關單位，和召開當日會議的東道主——社科院新聞所，共組成對話「十人代表團」。最多不超過二十人，對話原準備指名與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進行。經諮詢老資格的新聞學會會長胡績偉後，改為「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

五月九日下午二時，新聞界要求與中央領導對話的聯名信遞交活動準時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進行。在記協常務書記楊翊致歡迎詞以後，《中國青年報》記者部負責人郭家寬介紹了此次活動的大致設想：

我們之所以要進行這次對話，是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發生了許多海內外矚目的重大事件。我們認為，首都新聞界在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報導中，沒有做到全面、客觀、公正，我們感受到，這和我們現行的新聞體制有一定的關係。我們希望就這些問題，

和中央領導同志進行一次心平氣和的對話。把我國的新聞體制改革，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此後，李大同宣讀了信件全文：

全國記協書記處：

根據趙紫陽同志五月四日「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的談話精神。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正常途徑，就中國近日來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

我們認為，需要進行對話的主要問題為：

一、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該報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的問題；

二、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後的一段時間內，首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學潮，在這種重大事件過程中，首都新聞單位因種種限制，無法做到全面、客觀、公正地進行報導。並且在各方報導中出現了極不正常的情況。因而嚴重損害了中國新聞界在國內外公眾中的聲譽，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事態的擴大。我們認為，首都新聞界在這次重大事件的報導中受到的種種束縛，違背了黨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則，現在極有必要重溫馬克思主義的新聞思想，就如何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等重大問題，取得全

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三、國務院發言人在四月二十九日與首都大學生的對話中說：「我們新聞工作實行的

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我們的新聞是自由的」。我們認為，這與中國新聞界的現狀嚴重不符。事實上，中國新聞報導的運轉機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端。而迅速建立起報社總編輯負責制，恰恰是中國當前新聞改革的首要問題。

以上對話請求，請中國記協轉呈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二個新聞單位的一千零十三名編輯，記者郭家寬補充說，他們均代表個人，而不代表所在單位。

在會場外面，數百名騎自行車而來的熱情的大學生聚集在記協門口，打著「聲援新聞界的良心」，「支持《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標語、橫幅，高呼「為民說話，關係重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口號，聲援新聞界的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新聞界對話的組織者，為將這次活動與學運區別開來，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早在五月四日，部分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李大同就通知該報記者，此次行事，絕對要按合法程序運行，這是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在五月五日的集體討論會上，議定的幾條不成文原則中，有「不為對話成立任何名目的組織」，解釋是因為新聞界已有自己的合法組織。但是因參加對話的新聞單位和人數過多，形成相對統一的意見之前的大量具體協商工作難以由全國記協承擔，有必要以一家新聞單位為主，就對話中將涉及的問題廣泛徵求意見，並加以初步的歸納和整理。同時還議定，要「嚴防活動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各新聞單位的參加者不得與學潮發生任何聯

繫」，故送達信件時，不造任何聲勢，以「靜悄悄」的方式進行。五月九日，當有記者報告：大學已貼出告示號召大學生下午到記協「聲援新聞界」請願時，組織者當即決定請幾位身高體壯者同行，任務是把大學生擋在門外。在遞交信件結束後，李大同還特別對「對話」這個詞進行解釋說：「對話不是對抗，也不是辯論，而是雙方充分交流自己的觀點」，以防外國記者對漢語造詣不深產生歧義。

此後，在進一步商議各報參加者名單時，因在「四一九」座談會上得發言^⑮，當時有「激進派」嫌疑的《光明日報》戴晴，也被提出了異議。

五月九日遞交對話信件一事，事後被有關的新聞報導稱為「遞交請願書」的活動。也有人譏之為「新聞界跪著造反」。但李大同堅持從未使用過「請願」這個詞。在當時，儘管他逃過了與被官方指為「動亂」的學潮的干係，但卻沒能逃過另一種猜疑：

在這次遞交信件活動中，原定程序沒有安排其他人講話。但信件遞交完畢後，面對眾多海外新聞記者，社科院新聞所陳崇山突然提出要對這次活動的「來龍去脈」進行介紹。她說，四月二十九日中央統戰部和北京市海澱區委曾舉行一個北京知識分子的聯誼會，當時，她提出，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能夠跟新聞界的同志對話，闡明復問，你們希望同中央哪一位領導同志對話？她提出，希望同芮杏文、胡啓立同志對話。閻希望她能拉出一個對話參加者的名單。她於是找到會上僅可找到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法制日報》副總編王××、《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與他們草擬了一個名單。事後，她接到芮杏文辦公室電話：希望繼續組織這次對話，她便致信闡明復，說「記協是新聞工作者的娘家」，所以請記協出面組織這次對話為宜，她除了左一個「娘家」，右一

個「娘家」地稱呼官方控制的中國記協，大談了一陣「中國新聞界的恥辱」，還強調這次是「黨的新聞工作者和我們黨的對話，目的是爲了促進新聞改革，而不是要把事情搞亂。」

這個講話，後來被不滿的人們稱爲政府繼「四二九」對話之後再次導演「新聞界對話」的信號和政府「插手」新聞界的「標本」。而事實是，她的表現，只是趙紫陽「開明牌」在新聞界的一個回響而已。

此時，趙紫陽確已面示胡啓立、芮杏文，新聞要更加開放。他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⑥遵照這一精神，胡啓立、芮杏文、王忍之於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主動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幾個大單位，聽取編輯、記者的意見陳述。

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會上，郭家寬的發言對學潮發生以來事實真相與報刊的失實報導進行了心平氣和的展示；指出了目前新聞管理體制是戰爭動員與計畫經濟體制的產物；並指出，胡耀邦逝世以來新聞界的作爲，已從前段新聞改革的成就上倒退。但他也表示，不贊成在現階段提「新聞自由」。李大同的發言著重分析了現代社會對新聞業的要求與黨對新聞工作的傳統觀念的不相稱；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良心在此次學運中遭受的刺激；以及新聞改革應從系統全面清理中共新聞管理思想人手。在論及《世界經濟導報》問題時，他提出了妥協的處理方案：即暫時保留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黨組書記的決定（因為這在程序上沒有問題），但撤銷上海市委對欽行政職務的處理，撤出整頓小組，改由宣傳部門，新聞界和公衆代表組成的評議會，對四三九期《導報》的社會效果進行民主評議。再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根據評議結果對欽的行政職務做出處理。胡啓立對此建議大感興趣。

表示立即轉達有關人士。

在這次對話中，胡啓立談到：

我理解，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強民主法制，推進新聞改革，這也正是我們幾年來在反覆思考、研究和實踐著的問題……新聞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我個人贊成你們剛才所說的一些重要意見，就是對我們的新聞工作，缺乏一個系統的總結回顧。在制訂新聞法的同時，或者在這個之前，應該有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們的思想，這是對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我認爲，通過這次事件，（對我們的新聞理論和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把我們歷來新聞工作的指導思想，領導方法，我們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當然……我們的指導思想，領導方法和模式，是歷史的發展而產生的，是環境條件等許許多多的因素決定的。我們不能一概否決，說都錯了。

這次事件的報導……開始控制得緊一些，後來放開了一些。遊行不是也報了嗎？也沒有什麼呀？看來，增加透明度，公開化，有好處；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開性不夠，毛病甚多。

我感到，我們的新聞管理體制，思想觀念，領導方法，宣傳方式方法，都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情況來改進和更新，這才能夠實現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才能夠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羣衆反映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

問題，反對官僚主義，同不正之風作鬥爭……完全靠中紀委、中監委去查，查不清楚，只有依靠人民，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套檢查監督的機制，包括差額選舉，人民有罷免權。你爛得不像話，下回不選你就是了……這涉及到一系列立法等等問題。

胡啓立在談到「新聞自由」問題時說：

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立法的渠道。我們的新聞立法，第一要保證憲法賦予的權利，保證新聞自由；第二要根據憲法，防止濫用權力，濫用新聞自由。這個同志們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沒有法制就沒有自由。但法制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此外，他還特別強調了，在兩種經濟體制轉換時期，「穩定」的特別重要性^①。

本來，這並不是一次理想的對話，事前既沒有通知新聞界方面，以預留準備的時間，也沒有告知來者的身分，在新聞界方面，不得不倉促上陣，全憑發言人功力和素質的臨場發揮。它只是趙系人物準備打好新聞界對話這一戰役的前哨戰，但由於後來的正式對話因學生突如其來的絕食而停止，它竟成了八九民運中（可能也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以來）唯一成功的一次對話。

與此同時，在《人民日報》舉行的對話則因沒有形成任何共識，而變得有名無實。會上發言者言詞激烈，鄧小平、李鵬、何東昌、袁木都被點名。前來尋求「溝通」的中央「對話」代表，如同代人接受審判一般，如坐針氈。但趙紫陽既然有心樹立開明形象，這也是不得不忍受的事情。

五月十二日，在中央舉行的首都各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傳達了趙紫陽五月六日就新聞開放對胡啓立、芮杏文的談話。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的傳播媒體出現了一派空前自由、活躍的局面。從自己的報刊上，讀者得以真正了解到發生的事實真相，儘管它仍是極其有限，很不徹底的。

五月五日，《人民日報》於頭版《首都高校師生歡迎趙紫陽講話》的下方，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張燕輝拍攝的高校學生「五四」遊行的照片，圖中隱約可見遊行隊伍中高舉的載有《憲法》關於公民自由權利條文的標語牌，還有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的橫幅，《中國青年報》於同日刊出圖片，報導了數百名新聞工作者自發組成的一支隊伍上街遊行的事情。圖片中「新聞封鎖不利於穩定」的字樣清晰可見；《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也報導了這一消息。

五月十日，《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等大報，均刊登了首都新聞界向記協遞交對話要求的消息。

五月十五日，《光明日報》刊出了「首都部分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請求對話」的圖片。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播出了戴晴等十二名知識分子、學者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當晚《新聞聯播》節目以引人注目手法對當日廣場學生的絕食及聲援場面進行了報導。並傳達了首都某地黨政機關也參加了聲援的消息。

五月十六日，北京出版的報章大都刊用了新華社或本報記者撰寫的有關學生絕食請願的報導，有的配以圖片，顯示了絕食學生暈倒的情況。其中《人民日報》公然採用了《首都一部分高校學生繼續絕食，知識界人士到廣場聲援》的標題，海外版刊登的照片中，有絕食團成員柴玲手拿擴音器，

身後牌子上學生的絕食時間和暈倒人數等場景。《科技日報》則刊登了一篇集體採寫的報導，題為《國家民族利益呼喚著理性和人性》，詳實報導了學生絕食事件。同日，《人民日報》社八百員工（包括一些資深編輯記者），再次上街遊行。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二版的圖片上，赫然有「北大教師誓與學生共存亡」的大字橫幅出現，並報導了絕食人數劇增，醫療單位全力搶救的消息。《中國文化報》還刊登了報導嚴家其等人發起《五一六聲明》的消息。

五月十八日，首都各大報紙均報導了五月十七日首都百萬羣衆遊行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消息，《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位置予以刊載，並以顯要位置刊登了《各界人士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緊急呼籲中央黨政主要領導人儘快同學生對話》的消息。同時還刊登了本報編輯記者遊行、絕食學生和羣衆、工人聲援遊行的照片。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次有史以來的「新聞維新」，外電自始至終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和及時的評價。國內人民亦不無耳目一新之感。幾年之後，當筆者到大西南山溝裡去採訪，一位農村教師得知筆者曾供職首都新聞界時說，只有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幾天內，中國有真正的新聞。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在戈巴契夫於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科技日報》記者問戈巴契夫，在蘇聯推行公開性、民主化的過程中，新聞輿論起了什麼作用時，戈巴契夫回答說，公開性的進程恰恰是從新聞開始進行的。新聞是促進公開性和民主化過程最強有力的工具。

顯然，與蘇聯當時的情況相比，中國的新聞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只是朝「公開性」邁出了第一步而已。因為，這只是「民事」的公開，而非「政事」的公開。尤其是黨的領導核心的觀點分

歧、決策過程、黨派鬥爭這些在集權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對於老百姓和有參政熱情的社會集團來說，仍然是一個「黑箱」。這種「單項公開」在黨中央和政府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的情況下，在某種程度上欺騙了公衆，使他們對政治革新的期望大大超過了黨和政府實際上的承諾。

正因為如此，那些對中國政治更有經驗的人們，即使是對學運抱同情態度者，對新聞界的這種冒險精進也不無憂慮。尤其是為趙的政治命運擔憂的黨內民主派，在新聞界和公衆正在為「新聞的解放」而陶醉時，他們卻希望新聞界能夠作出「自我犧牲」，以學生的有限目標為這次運動的最高訴求；希望在《導報》問題上，欽本立不要過分僵持，以免趙紫陽沒有台階可下。中國政法大學應邀「就《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起訴江澤民」一事進行論證的學生表示，如若開庭，欽本立可能敗訴。因為如果對照法律條文，可以在《民法》中找到「越權」一條，但此事不屬《民法》範圍，而屬《行政法》範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在年初七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後，此時尚未生效。《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阻止遊行隊伍上街時說：「我不是怕丟烏紗帽，只是想避免出現第二個胡耀邦。」而新聞界原先佔上風的「溫和派」，也擔心欲速則不達。

另一方面，原先作為新聞界激進派後援的知識界人士，則因政府對新聞界對話要求較對學生更「垂青」。實際上即對新聞界「溫和派」方案的「垂青」表示不滿。他們曾用「學生要求對話，政府圓（袁）木頭一根；新聞界要求對話，黨中央全體起（紋）立」這樣一種形象的比喻，表達了對於這種不公平的牢騷。

五月十三日開始的學生絕食，使趙紫陽打出的「理智、秩序」牌全面喪失了效用。這一非常的行動，使社會以「非常」形式加速了動員，一切理智的聲音均被感情的呼喚所淹沒，以「老莊」為

研究對象的學者也走上街頭。

這樣，由學生到新聞界的「接力賽」跑道上，出現了有社會各界加入的競走的局面。

註釋

①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② 一九八四年成立的康華實業公司是為殘疾人聯合會籌積資金而成立的，附屬於殘聯，一九八七年改裝後的康華發展總公司，請來原石油部、冶金部部長唐克任董事長；原煤炭部部長高揚文任副董事長；原北京市副市長韓伯平任總經理。這種改裝使康華公司升級變成名正言順之事。

③ 見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第一六三頁。

④ 即針對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思路提出的「部分調整，部分放開」，俟條件具備時，朝全部放開過渡的戰略。

⑤ 十三大後，中組部由保守派大將宋平任部長。趙作為總書記無力插手其事。

⑥ 同③，第一四四頁。

⑦ 這是事後李鵬一再加於趙的罪名。

⑧ 根據陳一諮和官方後來的統一口徑，說加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要求是李鵬提出的，但沒有反映出有多少人附議。此處是採納羅點點《流血的改革》中的說法。但兩種說法均未提揚對趙說時，是否反映了李鵬的修改代表了政治局的多數意見。

⑨見穆望《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載《鏡報》一九八九年六月號。

⑩政治運動的發生過程表明，在事物發展沒有超過臨界點時，它是可控的，一旦超過臨界點，它就將依自己軌道發展。這個問題可參見本人撰寫的《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個問題》，見本書附錄。

⑪按中宣部當時的指示，對首都大學生的校外悼念活動和遊行，一般不予公開報導；如遇特殊情況需作公開報導，各新聞單位均用新華社通稿。

⑫見《明報》記者陳天權採寫的《國內新聞界在學運中做過什麼？》，載《明報》一九八九年七月號。

⑬《經濟學周報》是一九八七年由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接辦的一張「同仁報紙」。

⑭在羅立為的介紹中，他一會兒使用「公開信」這個提法，一會兒使用「請願書」這個提法。

⑮即《新觀察》與《世界經濟導報》舉行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在該會上，戴晴和嚴家其的發言，是《導報》四三九期被查封的直接原因。

⑯同①。

⑰這次對話全文見本書附錄。

第六章 從學運到民運

253

辛亥革命的光芒至今照耀人們，不過，它在人們心目中只剩兩個名詞：

皇帝和孫中山。

政治的最高準則是什麼？民主政治家說，是對於社會利益的維護與對於生命意義的敬畏；專制政治家說，是對於權力的維護與對於權威的敬畏。如果民主政權所容納的階級是有限的，那並不妨礙它的政治代表以維護有限社會的利益為最高職志；如果專政的基礎是廣大的，那也不妨礙它的政治代表把權力看作生命的根本。總之，一個權力，是為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哪怕是為部分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另一個權力下的人和人民，是為權力的存在而存在的。前一種狀態意味著，權力，可以依人民的意志而轉移它的載體；而後一種狀態則意味著，人民，可以為權力犧牲他們的生命。

與此相應，革命也存在兩種形式和結果：前者為保障人民而爭取權力；後者為獲得權力而犧牲人民。總之，在權力與人民的天平上，重心向哪一頭傾斜，是分辨政治家和革命家性質最敏感、最微妙區別的測量儀。

顯然，沒有前一種要求，就不會有八九民運；沒有後一種存在，八九民運則無從染上血和火的色彩。當時間進入一九八九年五月時，如果說，政府面臨的是政治家的考驗的話，民運領袖們面臨的就是「革命者」的考驗了。

第一節 並非「突如其來」的絕食

那場把全社會捲入學潮，從而把一場前途有限的學運改變為「八九民運」的絕食，在公眾的視野裡是突然出現的。但到目前為止，政府的監測結果和民運人士的回憶資料已可以證明，它並非一個偶然的行動。

按照社會學者歷來的觀點，學生運動本身，是不可能產生什麼社會結果的。其功能，要嘛是反映社會矛盾的晴雨表，要嘛是社會危機的催化劑。如果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把它比喻為社會革命的「橋樑」的話，那麼，它也是一座速朽的橋樑；如果將之尊奉為「先鋒」的話，沒有後繼者的先鋒當然也就不成其為先鋒。當四月學潮進入五月以後，原先由悼念胡耀邦和報復「四二六」社論而激發起來的熱情，先後為悼念活動的結束、「四二七」和「五四」遊行的勝利而失去勢頭。這座靠激情和對現實政治的幻想架設起來的「橋樑」，眼看著從自己身上度過的「新聞界」揚長而去之後，已經不可能靠原來的支撐力繼續維持它的存在了。它，正等待著新的激情的注入。

又由於「四二九」對話所昭示的，政府（即使是「溫和」方式下）在學潮定性與承認學生自治組織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使得飽受「革命的堅定性」教育的學生們不得不硬著頭皮頂下去。正如兩塊堅硬的石頭互相撞擊，才能打出燦爛的火花一樣，這就決定了，這種新的激情，一定是帶有孤注一擲性質的行為才能發動的。

顯然，這時的學運橋樑，已不是靠人們在橋面上疊木架欄可以維持，而是需要有人跳入水中，充當新的支撐了。

那麼，在現實運動中，這又意味著什麼呢？

五四以後的校園，面臨著兩種現實的選擇：校園民主與推向社會。所謂校園民主，就是在復課的同時，繼續與政府對話，以解決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的問題。同時，事情可以邊探討邊做，如學生自治組織辦自己的刊物、廣播，按程序改選原來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組織。建立校園「民主牆」，舉辦民主論壇，邀請受歡迎的知名學者演講等等。而前段所採用的遊行、請願、罷課等形

式，一般不再輕易採用。

當大部分人都重新坐進教室、圖書館、實驗室的時候，前一種選擇便更加現實了。進入五月以後，許多學校已經開始實踐校園民主的以上內容：北大、人大、北師大等學校相繼建立起自治組織的廣播站；根據研究生會章程，北大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原研究生主席團進行信任投票，以二四四票中佔二四一票通過罷免了研究生會主席團，選舉學運中產生的北大籌委會的成員作為臨時主席團成員；五月八日，北大籌委會就是否信任原學生會及是否退出原北京市學聯和中華全國學聯進行投票，投「不信任」的佔百分之九十五·八，同意退出原市學聯和全國學聯的佔百分之八十一；北京大學籌委會辦起了自己的《新聞導報》，人民大學辦起了《人民之聲》，南開大學創刊了名叫《寬容》的雜誌。

在北京二十多所高校學生民主選舉基礎上產生，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項小吉^①為首的首都高校對話團，就下一步與政府的對話健全了組織，廣泛搜集對對話的要求和意見。這個對話團只有三名成員來自北高聯。其成員主要由來自二十四個院校碩士班及博士班的四十名學生組成（五月八日擴展到二十九校五十人）。五月五日，對話團成立三個議題組，根據其成員的個人特長，召集人指定了三個議題組的核心成員：第一組，討論本次學運問題，以清華大學耿涼鵬為核心；第二組，討論深化改革問題，以政法大學張志新為核心；第三組，討論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問題，以項小吉為核心。

對話團的構成與性質，決定了它在學運中溫和態度和學術的風格。由於「四二七」之後政府做出的新姿態，使人們幻想一個「對話的時代」已經開始，也就為對話團造成了一個今後學運重心的

前景。爲此，北高聯對對話團的工作也採取了積極促成的態度。

但是，就在市高聯的吾爾開希和周勇軍五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宣布「全部復課」^②的同時，北大卻貼出了堅持罷課的大字報。這種意見認爲，四月以來的學生運動，在什麼結果都沒有得到的情況下，就此結束，既對不起自己也有負於全社會的期望。特別是在新聞界已經起來，全國的大學已經起來，都看著北京的大學生的時候，北京絕不能停下來。至於趙紫陽所指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有張大字報說，同學們只是「聞到了餡餅的香味兒，還沒有看到餡餅是什麼模樣」，怎麼可以就此罷休呢？

對於北京大學學生來說，堅持罷課還有另一重意義，那就是北大在這次學運中，沒有像歷次學潮那樣，發揮應有的領先和領導作用。而是讓政法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這樣的學校跑到前頭去了。半個多月以來，這一直是富有民主傳統，同時也富有學運領袖意識傳統的、榮譽心極強的北大學生心裡的疙瘩。所以，他們說，現在，正是體現其「革命」的堅決性、徹底性的極好時機。主張繼續罷課者，撕去了籌委會宣布復課的《宣言》和《近期工作計畫》，手提擴音器在校園裡巡迴呼籲，「請同學們不要去上課……」；兩派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達成「用民意投票決定」的妥協。投票結果：在一千二百六十八張有效票中，百分之六十四·二贊成繼續罷課，主張復課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四，棄權佔百分之十一·八。於是，主張繼續罷課的意見終於說服了北大學生。北大，沒有復課。北師大、北農大也宣布繼續罷課。

五月九日，就在新聞界與政府「改革派」蜜月開始之時，北京市高聯宣布「復課決定」作廢，在「五四」宣讀該項決定的中國政法大學周勇軍，被開除出市高聯。北大籌委會的宣傳工具稱，所

謂「復課決定」並不是全體的意見（但是多數的意見）。十一日，市高聯總部又一次由政法大移到北大，領導體制也隨之由「主席負責制」改爲「常委負責制」。北大，又開始成爲學運的控制中心。正如人們所看到的，罷課，並沒有給事情帶來新的進展。除了學生自己受到損失外，被短期目標和短期行爲所左右的政府和人民於此無關痛癢。它，不能完成引導全社會「過橋」的任務，這就意味着，它只不過是串連下一個更激烈行動的過渡性行爲罷了。

那麼，下一步將採取什麼「更進一步」的行動，才能刺激起廣大學生教師的熱情，才能召喚全社會迅速「過橋」呢？就在市高聯醞釀著權力與中心轉移的時刻，問題的探討實際上已經有了眉目：五月五日，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室在北大未名湖湖心亭討論下一步學運的方案時，就提出兩套方案：復課和絕食，持不同觀點者進行了充分的交流；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北大四十六樓部分研究生在三角地貼出《緊急建議》，建議採取「激烈行動」。其方案有二：一是「集體絕食」；二是戈巴契夫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建議》稱這是「成敗在此一舉」的「最後拼搏」。此前，甚至還早在「新華門」請願時，四月十九日就有北大學生打出「絕食」的白布橫幅。似乎「絕食」，對於北大學生來說，早就是一種潛在的默契。至於它在什麼時候發生，那倒是一個偶然性問題了。據有心把八九民運中的學生絕食算在自己賬上的山西作家鄭義稱，還在四月二十二日大會堂請願結束的當天，他就與在學潮中表現突出的王丹、熊焱、郭海峯談話，提出進一步採取絕食行動的建議。他用文革時期他所經歷過的一場絕食作爲範例，說這是給對手施加壓力，逼使就範的最有力武器。因爲，一旦絕食開始，全社會都會因人類良心而動員起來，「救護車滿城飛馳，市民包圍著絕食學生，」拯救這些絕食學生的性命「頓時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話題」等等。據說，學生當時沒有採納

他的這條意見。但當五月十三日絕食真正開始，他聽說發起者是王丹時，他意識到是自己十幾天前的那條建議起了作用^③。

現有的各種回憶表明，絕食行動是少數人自行發起的。它與北高聯的計畫並沒有直接的聯繫。由於對話團與政府的對話遲遲不能實現，使北高聯認為，如果有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加之利用戈巴契夫訪華時機形成一種壓力，或許可以促使對話的早日實現。因而也對絕食採取了支持的態度^④。

五月十三日，經過短短兩天的醞釀和組織，絕食的隊伍終於出發了。據載，它的經過是這樣的：

十二日晚，北大三角地貼出了題為《血祭》的大字報，號召以絕食作最後的抗爭。提出了這次絕食自始至終堅持的兩項要求：要求政府承認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否定「四二六」社論；政府與學生直接對話，現場直播。隨後，掀起了一場絕食簽名運動。先後簽名者有六十多人。並成立了絕食團。

十三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北大三角地貼出署名「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的《絕食宣言》，其內容是：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

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
 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導。

絕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九時三十分，北大籌委會廣播了「絕食行動方案」：

1. 十一時三十分，糾察隊在南校門集合。

2. 絕食團中午十二時出發，十三時到達師大宣誓、誓師，通電中外記者、中外紅十字會和各國

政府。

3. 紀律：除水和飲料外，不進食任何食物，不准帶巧克力等食品，否則你不要參加。

十時三十分，北大絕食團一百多人頭紮白布條進行了「絕食宣誓」。誓詞是：「我宣誓，爲了促進祖國民主化進程，爲了祖國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指揮，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之後，北大部分青年教師用募集的資金爲絕食學生餞行。並在書有「壯士已去，盼回還」的橫幅前相留念後，便向北師大出發了。

北大絕食團這時由四百人組成，其中簽名參加絕食的約一百六十人左右。其餘的人組成了糾察隊、救護隊、宣傳隊、後勤隊，他們用自行車馱著絕食學生上路。

下午十六時二十分，北大、清華、北師大、政法大、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航、北醫、北農大、民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十三所高校三百多名學生，及三名上海請願學生，在二千多名學生的護送下，到達天安門廣場。

十七時四十分，絕食學生再次進行了絕食宣誓後，絕食正式開始。

自十五日起，北高聯總部遷廣場辦公。它與由絕食的發起人和參加者另外成立的「絕食請願團」指揮部並列，成爲了當時學運的兩個中樞。絕食團指揮部由主動請纓擔任總指揮的北師大八十六級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任總指揮。爲了保持對絕食團的影響力，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與對話團的負

責人王超華也參加了絕食。

五月十五至十六日，參加絕食的學生人數猛增了近三至四倍^⑤。到五月二十日改絕食爲靜坐時，七天中，有三千餘名學生參加了絕食。北京市醫療衛生系統累計收治絕食學生六千零三人次，其中留院觀察四千五百六十四人次，無一人死亡。

正如後來的評論家們所指出的，這是一步沒有給自己 and 對方留下退路的「棋」。但是，選擇了這一行動的學生，卻無不認爲這才是表現他們革命的堅決性的方式。他們的大多數人，無疑是懷著獻身民主自由的決心參加到絕食隊伍中來的。但作爲一種政治行動，選擇這個時間，這個地點，這種方式繼續與政府的鬥爭，無疑是懷有將事態擴及社會，藉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各國新聞媒介關注北京的機會，在全世界製造輿論的設想。同時，這種不留餘地的做法，也表現了行動的設計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求勝心切的心理。

從事後效果看，這個於五月十三日成立的「絕食請願團」，以及那幾個並沒有真正絕食，但一時間掌握了幾千條生命（甚至一個國家的政府命運）的領袖人物，的確產生了呼風喚雨的作用。這一行動也確實達到了它的設計者期望的一些指標，但唯一沒有達到的是它的最後目標：一舉將對方擊倒而大獲全勝。而是用鮮血，換取了一種古老的光榮。

原來，期望透過保持對政府的壓力，早日促成對話的算盤落空了；一個「對話的時代」一晃而過，被全社會的抗議浪潮捲得無影無蹤。人們再一次看到「手段」如何取代了「目的」——絕食，這個對話團曾經給予信賴的，看護民主搖籃的「拿破崙的刺刀」，面對著老長不大的嬰兒終於不耐其煩，自己坐到搖籃中去了。

第二節 斡旋

絕食！這一拳砸下來，首先震痛的是中共首腦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中蘇最高級會談這根神經。由於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對待學運問題上的死硬立場，中辦和國辦在與學生對話條件方面討價還價的僵持，趙紫陽在國家權力機構中可以支配和調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動用原本是和民主黨派打交道，但在學潮爆發以來一直持溫和態度並企圖干預最高決策的統戰部來。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時在開著兩個會。一個是由部長閻明復主持，胡啓立參加的與新聞界的對話會。另一個是由知識分子局召集的徵求黨外知識分子對時局意見的座談會。其實，也就是探討如何使學生停止絕食良方的「諸葛亮會」。閻明復在兩個會議之間來回奔跑，大有繫國運於一身的景象。在這後一個會上，閻明復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說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領導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對於許多具體問題有分歧。他特別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時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他警告說：「學生們鬧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他要大家給那些他們認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時間，「否則我們都完蛋，都下台」。

他請到會者做做工作，勸學生識大體，顧大局，先撤出廣場，有什麼要求以後都好商量，透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

同時，他又強調，「學生們不了解情況，反對鄧小平同志這是不對的。小平同志實際上是你們

所說的改革派的一堵擋風的牆。沒有他擋著，許多事情都不好辦。」^⑥

與會者建議，統戰部出面，邀請學生對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事情很快彙報上去，並得到了趙紫陽的首肯：授權統戰部主持辦理。

當晚，各路學生代表被請到統戰部。參加會議來自三方面：學生代表，作為「中間人」的青年知識分子和體外精英，由團中央書記帶隊的共青團和學生會代表。前往的學生中有市高聯的吾爾開希，對話團的項小吉、王超華、沈彤，絕食團的王丹等。作為中間人的有四通公司的周舵、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李肅、鄭也夫，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曉波，北京大學的孫立平，中國政法大學的陳小平，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王軍濤、閔琦等。

關於這次對話，《流血的改革》作了一些表述：

閻明復說：統戰部是信息傳達渠道。今天，一些知識分子建議他和同學們對話，他按當時的口徑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反對同學們的做法。呼籲學生們顧全大局，通過對話協商來解決問題。

他說，中央是有對話誠意的，就在當天下午，趙紫陽、胡啓立、溫家寶和他一起已經應總工會的邀請，同工人代表進行了對話。下一周準備和學生代表對話。趙紫陽同志有一點意見，希望不久會在電視上廣播，使同學們知道。

然後，他進入正題，說，戈巴契夫要來訪華，能不能順利進行已成爲國內外關注的事
情……如果天安門廣場聚集兩三萬人，連歡迎儀式都不能舉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學生

們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進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變得盡善盡美。同學們可以有各種意見，可是要做出損害中蘇會談的事情，必定會使親者痛，仇者快，是不會得到人們支持的。

他答應，同學們的意見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 he 可能了解的情況，一定坦誠地傳達給學生們，他個人的意見同意的就說同意，不同意的就說不同意。同學們儘管暢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顧慮。

王丹發言說：趙紫陽似乎非常擔心在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學生有所動作。記者提問也問這個問題，我回答說，我們這是國內事務，戈巴契夫是國事訪問，不必擔心。「四二六」社論為學運所定的「動亂」應該平反，必須以公開賠禮道歉的方式糾正。否則學運沒有一點成果，同學們的安全也沒有保證，學運不會平息。

沈彤說，今天絕食的出現，不是五月十五日戈巴契夫來訪這個問題，是因為政府始終沒有改變「動亂」的提法。連改變的姿態也沒有。

閻明復表示，同學們的意見，他會一字不改地向中央彙報。關於對話，從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就在認真考慮。同學們遊行的深層原因，是我們國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問題。同學們解決這些問題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國人民共鳴的。但採取什麼措施，不是一、兩天能夠答覆的。如果採取敷衍態度，我們可以同意對話。我們的黨中央和國務院，不是一個同意甚至推動腐敗的黨中央國務院。否則我們不會在報紙上揭露腐敗現象，決定審計五大公司等等。也不排除讓同學們參加的

可能性……對話是民主制度的一項內容。以前沒有貫徹十三大的決議，你們推了一把，我們已經反想了。在座的中青年學者可以作證，就在這個桌台，我們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新聞法、結社法、遊行示威法……都在認真準備。政府對話的誠意，同學們發生懷疑。我感覺我們首先應該檢討，沒有及時把四月二十七日以後的思考傳達給大家。當然也有困擾：用什麼方法傳達給大家呢？

閻還說，我認為，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冷處理的方式是成功的。中央的確擔心（我希望我們是錯誤地理解了同學們的心願）絕食會影響中蘇會談。希望同學們能表現出充分的理性和愛國熱情。中蘇關係的改善會使我們沒有一個敵國。我曾對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講：我今年五十八歲，還能幹幾年？過幾年就是他們（指學生們）來推進改革，希望他們能繼承一個好的遺產……我不想討好同學們，但將來的事情確是要由你們來決定的。如果你們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遺產，就應當約束自己的行為。現在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一代之後就是你們的一代，你們注定不是享樂的一代，是憂國憂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懷疑政府的誠意。

作為中共的統戰部長，他對比他年輕十幾、甚至幾十歲的「中間人」敬禮有加，自始至終以「老師」相稱，的確有一些禮賢下士的風度。但與此相比，對他真正的談判對手——學生，又忍不住要拿出關於「代」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過，到底比袁木、何東昌謹慎一點，還沒有把學生稱為「孩子」……

顯然，到了八〇年代後期，除了命中注定要成爲「接班人」的高幹子弟外，人們與中共之間「代」的關係的意識，已經變得非常稀薄了。

閻明復講話後，有一個短暫的沉默，接著是王超華發言。她把成立有更廣泛學生基礎的對話團稱作是「向中央作了讓步」。並認爲今天請他們來而沒有請學聯（其實請了），是「表明政府承認」了這些組織，也是在作「讓步」。她的話還未講完，閻明復就打斷她說：他會把她要求單獨對話、公開公正客觀報導的意見傳達給中央。但他說他不認識同學們，只是請幾位老師把「他們認爲有代表性的同學」請來。言下之意是提醒人們，到現在爲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變對學生自治組織的立場，仍不是進行單獨的對話，更沒有把他們當作這些組織的代表來看待。

「中間人」的發言立場比較一致：都是建議政府正確評價學運，並在此基礎上調解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立。

他們講完之後，閻明復談了四點，似乎是要結束這場對話了。他說：

1. 首先感謝這麼多同學到統戰部來；
2. 我今晚就向中央彙報；
3. 推翻「四二六」社論有難度，希望給一定時間，但希望同學們在戈巴契夫來之前結束絕食；
4. 沒有根據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兩派，但希望不至於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作爲跑龍套的，不能超出音樂的節拍，但我會盡力反映情況。

本來，這場對話到這裡已經可以結束了，因為雙方底牌都已亮出：政府方面在學運的定性問題不可能公開讓步；承認學生自治組織問題也屬談判底線以外的內容。充當政府代言人者懷著僥倖的心理，希望在不挪動一絲強硬立場的條件下，只用他個人給予學生的同情和空洞的肯定換取學生在行動上的讓步。到此，人們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消除他的個人色彩，這場對話，與四月二十九日的對話，除在氣氛上有所差別外，並無本質的不同。它的唯一收穫是，學生們終於知道，共產黨的高幹中，還有這樣的「好人」（王丹語）！

一直在沉默中的王軍濤最後作了發言，不意中給對話引出了一個小小的戲劇性的高潮，對此，羅點點是這樣記述的：

王軍濤：閻部長，坦率地說，你感動了上帝。幾位老師是被你們感動了。今天學生顯得比政府成熟，學生的要求已經降到最低了，降到幾乎沒有要求了。僅僅討論些技術性的東西，能度過五月十五日嗎？……今天度過這一關不一定是好事……

閻明復反對說：這是不對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王軍濤說：閻部長感動了上帝，也感動了學生，但學生們再讓步，就不可能代表學生了。

聽了這些話，閻明復似乎很動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複他的意見：

第一點，同學們回去只講今天是閻明復的意見。當然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見。

第二點，事態的發展不取決於我們的意志。

我保證如實向中央彙報。我豁出去了，官也不當了！也就能起那麼點作用。

第三點，我將盡力促成有關人員與學生們選出的代表團的對話。

第四點，我完全同意剛才幾位老師的分析，深層的問題不是幾次對話所能解決的。我一定以最強硬的口氣把同學們的神態如實傳達。

他最後又強調說：不可能在短短幾天之內推翻社論結論，對此不要有任何誤解。不能把問題赤裸裸地攤開來。

閻是無能為力了。他的錯誤是把一個「跑龍套的角色」，傾注了真心血來扮演。他明明沒有任何談判（還價）的權力，卻希圖用個人的人格抵押來「感動上帝」——搬動廣場上那座用「死」的勇氣充漲起來的人「山」。

五月十三日的二十四時過去了，五月十四日的零時又來臨了。「山」，巖然不動，而且愈來愈大！

五月十四日是星期天。但因為第二天要實現本世紀末的兩顆政治巨星的會晤，人們比往常要更加忙碌。

這一天，在「新聞改革」春風鼓舞下，決定作一些改弦更張的《光明日報》，由近年來活躍在知識界的作家兼記者戴晴出面，按原計畫把知識界、理論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請到了報社，對學潮問題進行座談。不知道是戴晴事先將計畫通告了閻明復，閻臨時將動員絕食學生撤離廣場的任務委託給了這次座談會；還是「絕食」造成的局勢必然使之成爲了議論的中心話題，反正溫元凱、

李澤厚、包遵信、劉再復、蘇煒、李洪林、于浩成、李陀、蘇曉康、麥天樞列位知名人士之外，會場上還出現了聲音沙啞的王超華。

座談開始前，王超華介紹了絕食學生的情況，說堅定者大約只有百分之二十，主要是北大學生；動搖的有百分之四十；想走的有百分之二十，但北大同學不想走的那一部分，也是「接著坐」，到晚上十二點為止，留不留人沒有說，她聽說公安部有報告表明，現在大量「盲流」（編按：指無固定職業，政府治安單位難以掌握的流動人口）湧向天安門廣場，壞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經難以控制。她聽說知識界準備遊行，想聽聽各位老師對局勢的看法。她說，「你們這些學者都是在學生中相當有影響的，如果能到廣場上去勸說學生離開，……至少不會有反作用。現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說，都只能起反作用。」

王超華還說，她在市高聯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協調作用，但她是唯一任期最長的。當有人問有無可能將學生勸走時，她說，對於大多數學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絕食團的領袖，他們的態度與文字裡面寫的也是有差別的。但他們的眼睛就盯著北大。

人們對她敘述的情況表示了十分的焦慮。

座談會開始時，《光明日報》負責人作了開場白：趙紫陽的「五四」講話提出用冷靜、克制的辦法處理遊行請願的問題，他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但這是兩方面都應該努力的目標。這次學生的罷課、遊行，對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都會有好處，但如果處理不好，矛盾激化，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輿論、我們的態度來影響事物的進程。請大家談談自己的看法。

王超華希望能夠直接議論絕食學生問題，李澤厚也不主張坐而論道，《光明日報》方面考慮留出

的明天的版面，希望先議抽象問題再議具體問題。考慮到明天戈巴契夫就要到達，明天見報可能已於事無補，溫元凱臨時動議：《光明日報》發一個《緊急號外》。他表示，他個人願意到廣場去勸說，如《光明日報》緊急動員一下的話，可以帶著號外一起去。

溫元凱說，當然他不是簡單地勸學生離開，而是有一系列的看法要表明。如果殺人的話，他也要去絕食。說到這裡，會場內贊同之聲大起。

衡酌會場氣氛，主持者同意會後留出時間議論《緊急號外》的問題。

下面是此次議論的大致經過：

戴晴：我們對大家不作任何要求，你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學者。中間爲了節省時間，不要重複。我提一個建議，前天曉康他們起草了一個知識界對局勢的宣言，他可以說得比較「整」，然後我們每個人再作補充。

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教師）：我是這樣看的，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的遊行事件意味著中國歷史已經走到一個新時期：中國的強人政治已經結束。學運最大的意義在於，他們在以現代民主的辦法來參與政治。但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說執政黨表現出極其無能，這才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我們不希望動亂，我們希望事情能夠朝著促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發展，我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心願。我們不想操縱學生，學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縱得了的。所以，我們就乾脆站出來說：

第一，中國共產黨應該吸取歷史教訓：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鎮壓五四運動；三、四〇年代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以及七〇年代後期，「四人幫」鎮壓學生運動，這三次大教訓，應該懂得這個基

本常識：鎮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

第二，既然是按現代民主的辦法來處理危機，就應該承認大多數學生自己選舉的學生組織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認不承認的問題……

第三，動亂的根源，恰好是學生提出（要反對）的腐敗、官倒，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等問題，這樣的問題不解決，中華民族沒有辦法。

第四，防止動亂的辦法，必須有新聞自由，必須開放報禁，必須讓權力受到監督。

第五，執政黨也應該吸取「胡風事件」、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那種殘酷迫害和鎮壓知識分子的歷史教訓，不要把知識分子當成一種敵對的勢力和一種什麼壓力集團，能夠跟知識分子，包括著青年學生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解決目前這種政治問題。

我也覺得中國目前的局勢的確比較危險，那麼，政府希望學生理智，政府自己就應該理智。你們不希望天安門廣場產生這樣的狀態，希望蘇聯戈巴契夫來的時候學生不在此靜坐，那麼，你們向學生保證了什麼呢？為什麼在「動亂」這個問題上，到現在為止，不肯拿出一個意見來呢？……所以，我們在呼喚同學們要有理性的時候，更強烈的呼喚：政府和執政黨要有理性。

蘇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現在，中國歷史到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對於執政黨，對於全體人民和知識分子，都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機會。危機也是生機，如果執政黨能夠在全新的、現代的觀念指導下，他們應該是有能力走過這個危機的。但非常遺憾的是，在事件發生以來，特別是前半期，執政黨從面目到語言，都表現出相當的陳舊。必須要指出，「四二六」社論，是真正引起這場這麼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學生抗議運動真正的媒介……到目前為止，學生是相當理性的，而

政府卻搖擺不定，政府並沒有表現出它執政四十年應有的成熟和足夠的理智。再重複一下，關於「動亂」這個說法必須改正，還有上海欽本立免職的問題。如果對這些非常具體、非常明白的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麼，我們還談什麼「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本質上是一次「護憲運動」。就是保護憲法賦予每個個人和公民的權利的護憲運動。共和國是一種現代的民主政治，對於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權威來證實、來認可的。如果一個執政黨，它對自己參與制定的法，採取一種為所欲為的態度，這本身就不符合憲法。那篇《人民日報》社論就充滿了違法的語言，這種違法現象（的糾正）如果不首先從政府本身做起，是沒有辦法取信於民的。

第三，遵守憲法的内容很廣泛，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一個最核心、最尖銳，和最緊迫的問題，就是新聞自由和輿論開放的問題……如果說，這次有可能引發一場動亂，動亂的一個廣泛的誘因，就是我們多年來傳播媒介的不溝通，不開放，在現代開放的信息社會，用新聞封鎖的方法來治理這個國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們還不面對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改革就沒有希望。而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是非常現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贊成今天的這場學生運動，他們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態度。所以，這場運動，應該說是一場「非常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改變了過去我們這個民族只能聽話，只能服從，（宣告了）這個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歷史中的一次覺醒，超越了五四精神。

現在勸學生回校，我表示贊成這個建議。但是，另一方面，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至少要做這麼幾件事情：第一，從四月十五日以來，我們的新聞媒介報導，你到底打了人沒打？包括西安事件

的報導。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論說這場運動是「動亂」，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鬥爭」，這些說詞，必須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終有一把劍懸在頭上。

這個運動提的口號很多，我認為一個最核心的口號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還有，承認公民的結社自由……我覺得紫陽這個講話還是比較好的，但光提口號不行。你必須承諾幾樣東西，這樣你的誠意才表現出來了。

于浩成（公安部羣眾出版社原社長）：我同意這次運動是一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還是一次護憲運動。對於民主和法制的關係，我們的領導人有一些錯誤的看法，認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來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員要合法。民主的基礎要合法，這是保障……有一句話說，現在沒有說真話的自由，而只有造謠的自由。我十七歲讀馬列，今年六十三歲……（打算）盡應盡的力量。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溫元凱：因為今天下午形勢比較緊急，所以，我希望就談今天下午的問題，也就是明天早上的問題。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中國政府將在全世界面前丟臉；第二個就是要清場。

（這個）問題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危險，可是又是機會。機會就意味著，我們希望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能夠大智大勇地利用學潮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把它變成爲一種契機……我完全贊同剛才諸位同志的講話，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一個政治多元化，一個民主潮流的時代的到來……我，作爲一個大學教授，向社會發出幾點呼籲。首先，我希望對政府發出三點呼籲：

第一，要理解學生，真正的、有誠意的理解學生。他們求什麼？絕食、罷課，損失的都是他們自己，他們的身體，學業。確實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府對這一點沒有充分理解，我認為是不夠的。從內部傳達的所有文件，都把學生說成是鬧事，千方百計地動員，怎麼樣來撲滅。趙紫陽的講話第一條就是：學生不是爲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講話在校園裡引起了鼓掌，這是一個月來第一次。

第二，要保護學生。堅決反對任何鎮壓學生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會要重蹈天安門事件的覆轍。將來我們要在歷史上背一個惡名，要遺臭萬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遺臭萬年！

第三，應該引導學生。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是希望幫助政府改革。我們希望顧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世界的面子。剛才曉康同志講，政府畢竟要有一個面子。我們希望顧全大局，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

我希望我們這批人，能夠用一個辦法來維持一個局面。

作爲長者，我希望對學生方面也有三點呼籲：

第一，我希望學生要認清國情。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但經濟體制改革仍然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一季度三個「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學潮和盲流結合，可能會導致動亂。這是西安、長沙已經發生的事情。當然，學生這一次組織性、紀律性，他們的口號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種危險不是不存在。

第二，要推進實際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種很空洞的口號。當前，非常現實的，就是要推動新聞自由……大家對學潮的看法都應該如實地報導出來。我們也不怕有人發什麼偏激的看法……

不報導就變成「黑箱」，結果到處都變成「有鬍子的人」。另外就是對待學生（自治）會問題。學生（自治）會只要通過大部分學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說，他們否決了原來的學生會，而建立了新的學生會，我覺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說還不夠程序化，我們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進實際的改革。當前改革面臨一個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個人認為，改革十年應該打一個句號，新的十年應該開始。當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聞改革作為一個開頭，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對這個十年我們應該加以總結。而且，十年來的失誤，我們應該加以否定……十年改革的重大失誤，還是在於決策，決策機制基本上沒有變……而當前，我國處在困難時期，國家的經濟處於困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顧全大局，為國分憂，渡過難關……增加社會凝聚力，要增加四個意識，即公民意識，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國家意識。

我希望同學們認清國情，使當前學潮，當前社會危機，成爲一個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發展的一個契機。

因參加北大的活動，這一天下午，嚴家其來得較晚，也比較沉默。也許是不同意溫元凱關於解決問題需要政府的「大智大勇」一說，他發言說，眼前的問題，對於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應該很容易解決的。他談到絕食對人的摧殘，政府如果任其下去，就是一種對學生和人民的無形的摧殘和鎮壓。但如果把學生架走，可能會引起死亡，政府對此要負政治責任，而且警察兩個架一個也做不到。他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面對學生的要求，發表電視講話或者廣播講話，一下子就解決問題。講話應當包含四點內容：(1)公開宣布這次學運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就「四二六」社論做出檢

討；(2)承認受到大家擁護的市高聯是合法組織；(3)與對話團進行公開、平等、有誠意的對話；(4)公開宣布不秋後算賬。他說，趙紫陽講話談到中國人的「聲譽和形象」，如果政府把學生架走，那就做了最大的有損國家利益和尊嚴的事情，有損於中國人聲譽和形象的行為。因為，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因此，他提出現在要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並強調全體人民的利益高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利益，全國人大的利益高於它產生出來的機構的利益。而眼前的事件，正標誌著「人治時代的結束」，一個「以建設民主和法制為目標的新時代」的開始。

此後，劉再復、李陀、麥天樞、李洪林均就學潮評價問題發表了意見，並從各自的身分、背景和感受出發，對政府處理此次學潮作出了批評，還探討了其源於政治體制、政策與思維方式的原由。對於當前學生絕食問題，大多認為政府應該有所表示。李澤厚的最後發言認為，要政府出來就一些問題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勸學生暫時撤離廣場。

於是，人們轉而開始議論呼籲書的內容。在七嘴八舌之中，人們的意見大體可以分為三派：其一，以溫元凱為代表，道義上的學運派，立場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希望顧全大局，給政府臉面。戴晴、李澤厚也是這種意見比較堅定的支持者，是為一種「現實政治」的態度；其二，以嚴家其為代表，道義與立場上均為學運派，堅持政府不滿足學生提出的條件則無由勸學生撤退。是為「理想政治」與「原則政治」的方式。其餘的人則在溫、嚴兩種意見之中來回搖擺，實質上是在原則政治與現實政治之間找不到落腳點。比較獨立的第三種意見由蘇煒個人提出，

民主社會的特徵應該是依法行事，合理的社會結構應是知識界獨立於政府與學生之外，充當社會的緩衝機制。他警告人們「兩極社會」是一種很危險的社會。他同意到廣場上去勸說，但聲明不是爲了誰。他們的行爲不應對誰上台，誰下台負責任。因爲，誰是改革派？說不清楚。

最後，由溫元凱和蘇曉康根據大家的意見同時重新起草一個文告，既似聲明，又似呼籲書。結果，終因嚴家其說了一番要對歷史負責，他個人沒有權力勸學生撤退的話，和他個人不能簽名的話，人們同意在呼籲書對政府的三條要求後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條的話，我們全體將站到學生運動一邊」。蘇曉康建議加上「堅定不移地」，最後，大家認爲，既然如此，應改爲「堅定不移地一同奮鬥下去。」

這個呼籲書形成的整個過程，表現了知識界在這場突發事件面前全部的矛盾態度和矛盾心理。如果沒有嚴家其在場，知識界、理論界（特別是感情敏感，理論上慢半拍的文化界）也會從此捲入學生運動。但嚴對自己角色的自覺和堅定的態度，無疑給這個「文告」注入了過多的「聲援」而不是「勸架」的色彩。究其原因，大概是前一天他已與蘇紹智等人聯名貼出了《我們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報，預知知識界明日將舉行第一次遊行，以及他領銜簽名的《五一六聲明》正在徵集簽名的過程中。顯然，他考慮到這一系列活動之間的聯繫和邏輯關係，不能貿然同意就此勸學生撤退^⑦。不是嗎？「過河」的人已經走到了橋邊，此時，怎麼能將「橋」拆走呢？

座談舉行的過程中，閻明復給戴晴打來電話，託她向各位轉達了慰問與拜託之意，引起在座的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的反感。這一插曲，使人懷疑有特殊背景的戴晴是否事先秉承了官方意旨，在利用知識分子。因而，反而削弱了溫派意見在「呼籲書」中的分量，由蘇派立場向嚴派傾斜。

下午五時零九分，在哭泣和感情失控的大笑交替出現過後，呼籲書終於被通過。統戰部派車接送，到國務院信訪局與談判無果的學生代表見面。

此前，在統戰部，閻明復、李鐵映與以項小吉等四十三名代表組織的學生對話團也進行了最後的談判。雙方仍然在學運的定性問題和「動亂」的摘帽問題上爭持不下。對於現場直播問題，官方以中央電視台轉播部已開赴迎接戈巴契夫來訪現場作了搪塞。當學生宣讀了一份絕食同學的遺書後，閻明復以異乎尋常的口吻說：「我個人理解學運的原因，我知道你們的行動是學生的真正呼聲，但是，『四二六』社論是政治局會議的精神。我有我個人的看法，但我實在不能在這樣的場合說出來。我希望用你們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你們自己的判斷。」在談到「清場」問題時，閻說：「黨是人民的政黨，不可能用武力來對待學生，你們不撤也沒關係，戈巴契夫明天來訪，就讓我們丟醜吧。在外國，接見國家元首還有人扔臭雞蛋呢！我們的政府也應該適應特殊情況。但是，我也只能為你們說這一句話，而你們，也在人民面前丟了一張牌。」

對話以學生代表遞交了五條包括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和不對運動參加、同情、支持者打擊報復等內容的「最低要求」而告結束，但在實質上依然無果^⑧。

八時四十分，當廣場傳出清華學生擬於當晚撤出，北三環路上出現坦克的消息時，絕食團的廣播宣布：溫元凱、蘇曉康、劉再復等十二位學者將步行到達廣場看望大家。還沒有弄清他們來意的學生頓時發出一片歡呼之聲。

晚九時，這篇由上述十二人簽名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在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宣讀：

鑑於天安門廣場的情勢，我們十幾位學者作家本著良知和責任心發出如下緊急呼籲：

-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立即發表公開講話，宣布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賬」。

-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 三、強烈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親愛的廣大同學們：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四月中旬以來，你們爲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理性精神和大無畏的勇氣，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歷史功績。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內實現。爲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爲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爲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能夠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斷。

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爲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緊急呼籲》宣讀完後，溫元凱、蘇曉康、戴晴先後發表了演講。爲了使學生接受撤退的意見，講演者大大褒揚了學生在前段表現出來的理性精神，像蘇曉康這樣名噪一時的「大才子」，居然

稱：「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正因為如此，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

從他們熱烈崇拜的人物嘴裡，講出如此的讚美之詞，使學生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而且，他們的警覺性並沒有因飢餓而麻痺。當戴晴進一步引誘學生進入「圈套」時，原以為來聲援他們，所以一個勁地對講演者叫好的學生，開始轉變態度。等到戴晴說出，學運的性質和學生自治組織又何必要政府承認；考慮到領導們的水平有限，只要趙紫陽或者李鵬到這個地方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大家就撤好不好？他們終於發出了不是配合的聲音。

嚴家其沒有發表講演，而是在學生領袖的簇擁下走進絕食圈，頻頻向同學們問好。

十一時十分，當十二位學者撤離廣場時，廣場上「自由論壇」評論了他們的行動，不友好地稱：「他們有他們的要求，所以，他們已經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

翌日，《光明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節目報導了十二位學者的《緊急呼籲》。戈巴契夫卻沒有按慣例在天安門廣場受到歡迎。他的車隊，離開了倉促之間沒有鋪上紅地毯的首都機場，徑奔釣魚台去了。首都知識界從此告別了它的超然態度，而捲入了洶湧的長安街人流。

第三節 知識界與社會各界的捲入

知識界與學生運動向來有著血肉的聯繫。這次也不例外，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來，它就密切關注著學潮的發展，部分人士已經開始積極干預。下面，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行動的軌跡：

四月十七日，當天安門廣場出現第一個由大學生送來的花圈時，中國人民大學貼出了以「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部分師生」名義寫的《幾點建議》。其主要內容，一是建議學生悼念胡耀邦的輓聯花圈向天安門廣場集中。並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二是號召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作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從這個《建議》可以看出，除第一條有現實操縱意義外，其餘的均可看作一種政治觀點的公開表露。雖然第一條可以想像為實現後者的管道，但第三條明顯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責任，與悼念活動無實質上、政治上的聯繫。因此，它表現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的堆積。

四月十九日，同樣是人大校園裡，又出現以「北大、人大、清華部分教師」名義寫的《告同胞書》，警告學生「無組織的行動將會一事無成，你們必須在法律的保護下，有組織、有計畫、有綱領地行動」，同時，還號召將同學們組織起來，走向工廠、街頭，喚起工人和羣衆的支持和參加，要有拋頭顱、灑熱血的「五四」精神，為民主、自由，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獻身。並提醒學生「要明確目標，不可四面出擊」。較之前一個《建議》，這張大字報充滿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標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師中的「激進派」所為，倒真可懷疑是別有用心者的挑動和為「栽贓」埋下的伏筆。當晚，果然發生了所謂「衝擊新華門」事件。

四月二十日，北大有學生聲稱，北大未來學會顧問金觀濤對學運提出了三點意見：(1)認為現在形勢很好；(2)北大、清華的學生要聯合行動；(3)要採取非暴力行動。據說，會後兩校就商討了聯合行動的問題^④。

四月二十一日，由青年幫策劃，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領銜，有四十七名作家、學者簽名的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發表，歸納了學潮要求，提出了與政府對話的建議^⑩。為胡耀邦追悼會後可能出現的學潮低落提供了對策。同日，作家鄭義向學生領袖提出「儘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儘快出版自己的報紙」，絕食，並少與方勵之夫婦接近等建議。

四月二十二日，「師大青年教師自治會」貼出《運動向何處去——致廣大愛國學生》的傳單，稱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組織、宣傳、綱領，然後是強有力的行動」，並提出以「持久戰」為策略，以「罷課」為手段^⑪。

四月二十四日，北大貼出一四七名教師簽名的《教師緊急呼籲》，提出「鑑於目前形勢，我們緊急呼籲，堅持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中國政法大也貼出署名「部分黨員教授、副教授」的《給黨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協商對話」，避免壓制。

四月三十日，北大出現以「中央黨校幾位同學」的名義寫的大字報，鼓動人們抓住有利時機擴大戰果，並說，「現在的形勢是政府已無法實行軍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對我們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輿論工具。」^⑫

五月三日，人大貼出未署名的《關於當前學生運動的目標策略的建議——立足校園，面向社會》，提出要爭民主，爭自由，首先應該在校園內取得突破。

五月十日，包遵信、戴晴應人大工會青年部邀請，進行講演。包遵信預言「四二七」大遊行將會在歷史上被「大書特書」，標誌著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進入重要階段」。並希望大家盡

快復課，然後考慮言論、結社自由等問題。戴晴則宣布，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統治了中國人上千年之久的權威統治，就要結束了。」

五月十二日，包遵信又應王丹的約請，在北大「民主沙龍」講演。他要人們記住四個日子：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國家獨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在全國引起動亂，但也暴露出黨和政府的教條主義，加速了人們對偶像崇拜和權威崇拜的懷疑時代的到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事件，給老人政治畫了一個問號；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宣布長期封建家長制應當結束，標誌著中國民主運動達到一個新水平。在論及民主化的具體目標時，他說，當前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談到「五四」，談到對傳統是否應當進行分析時，他說：「當傳統壓在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把壓在我們頭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慮這個石板哪一塊是好的，哪一塊是壞的。」

以上，是截止學生絕食前，知識界一些人士的動向。當然，還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動並未見諸文字或公開發表。從這個粗略的時間表，對照學潮進程，人們大致可以看出知識界人士與這次學潮的關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時，他們只是分散地，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合作一些道義上的評論和符合法律與政策的建議，或就學生的諮詢表示自己的觀點。他們或許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將走上街頭。

但現在，由於學生絕食，道義感的壓力和新的民主社會的召喚，終於使他們決定按照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公開站到學生啓動的，這場勢必要成爲全民運動的行列中來。

五月十五日，就在戈巴契夫到達北京的當天，知識界終於打出自己的旗幟，走上了街頭。但此事的醞釀，卻是在絕食以前，新聞界請願以後。其經過，包遵信在回憶錄《未完成的涅槃》中，是這樣描述的：

「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作爲一個羣體投入這場運動，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識界的大遊行和《五一六宣言》的發表爲標誌的。這兩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個會上商定的。^⑬據說，開始是五月九日^⑭，鄭義覺得白天新聞界的遊行「代表面太小，應該有更多的投入」。因此籌組了五月十二日的會議。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東郊的團結湖公園西門集合，然後到紅廟的一家旅館開會。到會者有包遵信、劉再復、蘇曉康、蘇焯、李陀、趙瑜、鄭義、徐剛、夏駿、遠志明、陳宣良、王魯湘、謝選駿等四十多人。會議開始，由蘇曉康介紹了組織者的設想，請衆人考慮知識界下一步的行動，然後由鄭義宣讀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後來的《五一六聲明》初稿）。大家對此議論了近一個小時，然後又討論了五月十五日知識界遊行的問題。確定了聯繫方式、集合時間、地點，參加者的裝備，以及遊行的組織者：趙瑜、徐星^⑮。最後，人們在起草的文告上簽字散會。

紅廟會議以後，蘇曉康、鄭義帶文告徵求嚴家其意見，嚴將其定名爲《五一六聲明》。其他人分頭聯絡教育、科研、文化、新聞單位人士。新聞界對話組織者爲保持自身的運作軌道，拒絕了邀請。

在五月十五日遊行開始以前，這次遊行的組織者們確曾懷疑過它是否能成爲事實。許多人聞訊後，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復興門。包遵信等曾估計，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參加，最少能有幾十人。據鄭義回憶，他和趙瑜也私下決定，就是有幾十人也要堅持遊完。加之包遵信、蘇曉康、劉再復、蘇煒、李陀都參加了十四日的斡旋，他們甚至臨時發出了取消遊行的決定^⑥。但是，他們沒想到，在他們的準備過程中，學生突然宣布的絕食和戈巴契夫的來華日期，正好從另一個方面對知識界進行了强有力的發動。當這一天下午他們來到復興門，面對人山人海鋪滿望不到頭的復興門外大街時，連「總指揮」等人都迷惑了。而這，僅僅是後來那個越滾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個「核」罷了！

下午二時三十分，在由北大製作的「中國知識界」的巨大方幅引導下，知識界的遊行隊伍從復興門高架橋出發經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行進，隊伍前列的知識界人士，均頭紮布條，肩披綬帶，上書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寫在白布上的《五·一六聲明》要點。隊伍起初是二十人一排，兩旁有各界青年自動組織的糾察隊，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隊伍和各方組織、發起者組成的混合編隊，然後才是各單位的隊伍。參加遊行的有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六十多個單位的教授、講師、研究人員、博士、碩士生和職工。有的打出了單位的旗幟。

鄭義帶有文學色彩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當時的場景：

隊伍在觀瞻上超過了以往的每次遊行，佔據半條長安街，緩緩向前推進，極壯觀。我

人什麼？

和趙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聲明》旁。趙瑜手持電喇叭……因為隊伍太寬，圍觀市民甚衆，我們的行進速度頗慢。有時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糾察奮力開道；有時中外記者衝進來，對《五一六聲明》和隊伍前列拍照；有時候在路邊的某單位連人帶旗呼啦啦擠開糾察隊，撲入大隊……此時，絕食已進入第三天，天安門廣場幾無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隊伍在絕食圈外擺正，開個簡短的會……事實上已絕無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開會。首先宣讀《五一六聲明》，手持擴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邊鼓噪吶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們仍叫喊聽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現了這樣感人的奇觀：手執擴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圍凡能聽清的上萬人大聲複誦一句！這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波濤一浪浪蕩往遠方……^①

根據包遵信歷史學家的回憶，當然不存在什麼「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奇觀。其時的情景也頗為狼狽，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講話者附近的人加以轉述，人們也很難聽清楚說了些什麼。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千人的周圍，並不是絕食學生。不過，好歹總算是將《五一六聲明》象徵性地發表了。

這份《聲明》的全文是：

五一六聲明

六〇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無疑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二十三年後

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伏此起彼，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契機。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特此於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鑑：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〇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〇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絕無好下場。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局勢因而有所緩和。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尊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牴觸。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

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吞噬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該吸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

四、學運期間，以《人民日報》社論、新華通訊社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完全是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

五、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和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真正安定

團結的政治局面。

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制從來不是被賜與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關頭。

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人民萬歲！

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於北京

這份《聲明》的內容之間雖然缺少一點內在的邏輯性，但它幾乎匯集了學潮以來人們對政府行為的所有重要意見。但它牽強附會的拉上文化革命，使它帶上了某種與時代旋律不相合拍的個人趣味和色彩，及其以「勞動階層」自視，把政治體制改革簡單地概括為「廢止特權」的做法，使它缺少作為知識界獨立宣言的內涵。所以，與其把它看作知識界的獨立宣言，不如把它看作知識界人士拋

棄幕後導師和斡旋者角色，公開亮相的一個標誌。

對此，包遵信後來有一個感受：「《宣言》內容當然很重要，但更讓人注目的是一長串名單……那天的講話，與其說是有什麼宣傳鼓動效果，還不如說造成一定聲勢的轟動效果……」^⑩即使將包遵信在官方的審查和長期監禁後，形成的為自己辯護和開脫的慣性考慮在內，他的這一感受還是真實的。

知識界遊行結束後，嚴家其、包遵信、鄭義、徐剛等代表遊行者看望了絕食學生。包遵信的即席講演代表六十多個單位參加遊行的「四萬知識分子」向學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並稱在他們的感召和鼓舞下，四萬知識分子「站起來了」；鄭義則把絕食學生稱為「我們的老師」，表示「我們跟著你們走」；嚴家其表示，願意和同學們一起度過困難時期，並高呼「同學們萬歲！」^⑪

五月十六日凌晨，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對廣場學生發表廣播講話。這個講話指出：「現在，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與同學們的對話已經開始，還將多層次，多渠道繼續進行。廣大學生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黨和政府正在研究，採取切實措施和步驟加以解決。六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把羣衆關心的若干熱點問題列入主要議事日程，通過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解決問題。這些都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局面。」^⑫「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爲重，不要做有損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⑬「現在，由於同學們靜坐絕食時間較長，夜間氣候較涼，有的同學已出現病情。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希望同學們盡快返回學校。也希望學校老師，領導和家長做好勸說工作，動員同學們回校。」^⑭

講話在廣場的廣播裡一連播送了二十遍。一心等待中央和政府領導表態，已經堅持了兩天的學

生，靜靜地聽完了第一遍。等第二遍播出時，他們便開始齊聲高呼「關掉！關掉！」然後全體起立，唱《國際歌》，並搖晃旗幟，高呼「對話！對話！」等廣播第三遍時，全場情緒更加激昂，一遍又一遍地唱《國際歌》，中央音樂學院的小鼓「咚咚咚咚」地敲個不停。好心的通知起草者——那個曾經致信欽本立，試圖在良心和職業道德之間找到平衡點的青年，絕對沒有想到，他的傾注感情的文章，竟會形成一次與絕食學生耗力費神的「聲浪比賽」。

為響應「兩辦」的號召，當天下午，北師大、清華、北大、北外、人大、北航、政法大、北科大、北農大等十位大學校長，透過廣播向社會發出《公開信》，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著對參加絕食學生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但是，這十位校長不知道，現在，不論任何內容的廣播、簽名、遊行、探望，除加強「民運——學運」的熱鬧氣氛外，均已失去了它實現本來意義的可能性。

當日，又有新聞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企業界及民盟等單位十萬人次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中央民族學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師組成的絕食團也開進天安門廣場；北京大學一百四十名教授就南京大學教師倡議發表《聲明》，敦請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辭職；同時，北大朱德熙等十位教授，也發表了請政府更正對學潮定性的《緊急呼籲書》。該校以張炳久、袁紅冰為首的一些青年教師還成立了「教師後援團」，協助學生與社會各界的聯繫工作，與政府進行溝通，為年高體弱，行動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方便；同時負責交換各高校教師的意見和要求，為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提供諮詢，保障絕食學生的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

當日，北京以外地區上街遊行人數也逾十萬，波及二十餘個城市，近百所高校。絕食學生增加到一千二百名。

第二天，與絕食學生一起度過了四天四夜的北師大青年教師劉曉波，以個人名義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他說，如果政府還遲遲不公開回答學生所提要求，絕食運動將無限期延遲下去，這對於國家和學生都將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他呼籲「在最大範圍內」為絕食學生開展募捐活動，因為「人的基本權利、人道主義的立場，是屬於全人類的」。

——自「四二六」社論發表以來，「一小撮」、「長鬍子的人」一直像一個巨大的磨盤壓在知識界的心頭，而學生的絕食使他們終於有勇氣站起來，掀掉這塊磨盤。他們天真地以為，從此，人人都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再也不存在幕前幕後之分。而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別人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第四節 鄧小平上街與趙紫陽的眼淚

五月十三日，當北京學生把「絕食」的黑色旗幡在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旗桿升起時，八九民運中的第一個「玩火者」北京市委已經意識到問題的棘手了。當晚，市政府便派工作人員到廣場進行了一些無濟於事的勸說，並帶去一千包軟包裝飲料。以後，又命北京市紅十字會接手絕食暈倒學生的搶救工作。按有關資料統計，為應付這場他們親自呼喚來的「天外來禍」，先後調動了一百多

輛救護車，數百名醫護人員日夜守護絕食現場，動員五十二家醫院騰出近兩千張病牀，調運六千頂草帽，一千條軍用棉被，七十八輛大客車，四百多塊厚木板，並在天安門廣場搭起臨時沖洗廁所。此外，還調用了許多防中暑、感冒、腹瀉藥劑，及大量麵包、飲料等；僅北京市急救中心，就用去近四百箱各種輸液藥品^②。事後，絕食學生的生命得以保全，與北京市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當然是分不開的。但主要還是廣大醫務工作者偉大的人道主義和獻身精神，及全社會的輿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方面，從後來的所作所為全面判斷，「救人」基本上仍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因為，不能設想，一個懷著人道之心搶救絕食者的人，五月十六日，當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時，會有意斷絕天安門廣場供水，此後又用槍彈奪去那些在絕食後留存下來的性命。

學生的絕食，使第二個「玩火者」趙紫陽也開始感到火有點燙手。

自「亞行講話」之後，趙紫陽一面部署用新聞改革衝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圍，一面拋出「六點意見」，爭取社會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③，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堅持「四二六」社論基調和批駁趙的「亞行講話」為內容的七個文件針鋒相對，趙紫陽提出了六點意見：一、盡快公布審查國務院直屬的四大部級公司^④的結果；二、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但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的經歷和財產；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專門受理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及其子弟違法亂紀的案件；四、盡快制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五、司法獨立審判，不能再搞聯合辦案；六、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進行。他建議，如果大家同意，由新華社發通稿，明日見報。但由於李鵬堅持反對，政治局沒有討論趙的意見，有關信息只好由人大常委會在即將召開的七

屆八次會議的議題中透出^②。

但是，趙紫陽也許萬萬沒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敵把他逼到懸崖邊的時候，學生一方也同時抽掉了他身後唯一可以脫險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將於六月二十日正式從法律和制度方面考慮目前學運要求的當口，學生同時做出了絕食的決定。此時，趙紫陽還能做什麼呢？而從五月十三日開始，他的陣營裡除統戰部長閻明復的一條三寸不爛之舌外，已沒有其它可資利用的部件了。當新聞界準備對話的代表正情意殷殷地等待著與政府共同再創「奇蹟」時，胡啓立以「等待局勢平靜後再進行」的回答，使之成爲了一個世紀性的夢想。

五月十六日是「巨星」會晤的日子，但是，這一天的白天，是屬於鄧小平和李鵬的。

黃昏終於來臨，釣魚台國賓館，只安排了十分鐘，是屬於趙紫陽的。面對機智明快的蘇共領袖戈巴契夫，面對舉世矚目的時刻，趙紫陽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他想到了：「他是真的，而我是假的。我要把這告訴全世界！」所以，當他步入會場時，首先問的第一句話，是學潮以來學生使用頻率很高的話：「是直播嗎？」當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的最後一點擔心也放下了。

果然，人們這一天從直播的電視上看到的趙總書記，有一種少見的輕鬆和愉快。但他的講話卻令舉世震驚！

戈巴契夫先對趙紫陽說：「我們兩個總書記的會見，說明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這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趙紫陽對戈巴契夫說：「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見面，就是兩黨最高級的會晤。七八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黨公認的領袖。我告訴你一個祕密，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

是，全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我們黨通過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因此，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②4}

只有黨的中央，只有趙紫陽本人，才知道後面的這些話是多麼地言不由衷！但是沒有辦法，這是他給自己出的一道難題。他既不願意再當傀儡，也不能公開與他的恩師過不去。這位曾有效解決過六〇年代廣東人逃港，七〇年代四川人吃飯等共產黨國家舉世公認難題的政治家，在黨內鬥爭的暗礁前不得不擱淺了。

五月十七日，也許是爲了作最後的努力，趙紫陽對學生發表了那個保證絕不進行「秋後算賬」的書面講話。但這個講話除更加暴露了他面對自己打開的「潘朵拉」的匣子放出「洪水猛獸」後江郎才盡的窘境，什麼作用也沒有。此時，針對他的其實已沒有多少可靠性的「信誓」，人們已針鋒相對地指出：現在不是你對不對我們「秋後算賬」的問題，而是我們對不對你們「秋後算賬」的問題了。

其時，這位黨的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在偌大的中國，在沸騰的首都，已經成了最無事可做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一個「多汁的詩人」的命運。聯想到兩年前他拋棄改革派同盟胡耀邦，以開拓自己的前程，一九八九年初打算犧牲知識分子，以渡過政治危機等往事，人們只有替他感嘆政海沉浮的無定而已。

有人願意把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講話與第二天開始的「倒鄧狂瀾」說成是一種「巧合」。因爲

事情明擺著卡在鄧小平那裡；十七日，是學潮經過一個月，也是學生絕食達一百小時的日子。在這日子裡，不論有沒有趙紫陽與戈巴契夫的會談，人們總是會有所表示的。但考慮到鄧小平作為改革領袖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他是否會像一九六六年的劉少奇一樣，被推上了大街，還是值得疑問的。在那場運動中，雖然劉少奇在學校推行鎮壓「右派學生」的「資反路線」可以看作他為自己下台的鋪墊，但沒有毛澤東的撐腰，一個黨的「一線」的領導人，一個國家主席，要「上大街」還是有一定距離的。當然，此次趙紫陽究竟出於什麼動機，還有待事情的進一步揭祕，但是，事實總歸是發生了。

請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對這一天的情況是怎樣記載的：

從上午起，聲援學生的隊伍打著橫幅，呼喊口號，陸續走進天安門廣場、遊行人數達幾十萬之多。在聲援的隊伍中，有高校的教師，中小學教師和中學生，有新聞、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財貿、商業郵電、市政、飲食、工廠、企業、醫療、國家機關等許多部門、行業的職工，還有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遊行隊伍中，攻擊鄧小平同志的橫幅、標語急劇增多。下午，天安門廣場傳出鄧小平已經辭職的謠言；一些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放鞭炮。同時，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充斥了「擁護趙紫陽」、「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在這前後，咒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台」……^⑤

其實，說「擁趙」表語充斥與攻擊鄧、李的標語鋪天蓋地都有些言過其實。但後者的內容之豐富，卻是前所未見的。如：鄧大？黨大？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聽小平的？聽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作主；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打倒中國的馬可仕，趕走全斗煥，不要布里茲涅夫，要戈巴契夫；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小平，我們的孩子在挨餓，你們的孩子在幹什麼？如此「簾政」，國將不容；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天下為「公」；人過八十要糊塗；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簾子後面找政府；鄧小平（八十五）——戈巴契夫（五十八）。一隊小學生挑著的橫幅上寫著「鄧爺爺，快出來！」有的帶領呼口號的人，還操著一口小平家鄉的四川口音，與整個氣氛的歡快、戲謔一起，既表現了人們對這個八五老翁的輕蔑，也不乏幾分親切。

總之，這一天，人們藉聲援學生發起了對鄧小平的宣洩性抗議，但大量的標語口號仍是聲援學生，抗議政府對絕食一百個小時置之不理和抨擊弊政的。這樣的口號如：社會科學院擬定的一份「五一七全市遊行口號」，共列十八條：(1)聲援學生絕食鬥爭；(2)堅持改革，反對倒退；(3)學潮不是動亂；(4)推倒四二六社論；(5)政府必須公開承認四二六社論錯誤；(6)我們要民主，不要獨裁；(7)我們要法制，不要人治；(8)絕對權力，絕對腐敗；(9)維護憲法，維護人權；(10)捍衛新聞自由；(11)老人政治，必須結束；(12)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13)歡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14)大學生萬歲；(15)人民萬歲；(16)打倒官倒，反對腐敗；(18)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壞人趁機搗亂；(19)民主萬歲，自

由萬歲。九三學社的橫幅是「要真理，不要面子」；個體戶請願團的橫幅是「還我自由」；中國檢定研究所的橫幅是「腐敗＝愛滋病」；北京服裝學院的標語是「請政府穿比基尼，增加透明度」；宣武醫院的橫幅寫的是「難產，難產，政府難產」；《中國青年》雜誌社和團中央的一幅對聯說：大貪抓小貪——安定，大倒整小倒——團結，橫批：國際笑話；中央財經學院的一幅橫幅是，「八八年，官員吃喝四一〇個億；教育經費三五〇個億」；航天部的一幅標語寫著「導彈，導彈，瞄準腐敗」；中國政法大學的一橫幅寫著，「祕密決議——四千一百萬黨員的恥辱」；公安大學四百名穿警服的學生，也打著「警察醒了，維護正義」的標語上街遊行。此外，還有「一天不理，是為呆也；二天不理，是為蠢也；三天不理，是為昏也；四天不理，是為惡也；五天不理，是為殘也；六天不理，是為虐也；七天不理，必完蛋也！」、「民可載舟，也可覆舟」；「賣掉奔馳（編按：賓士），不買國庫券」；「給官倒放個節育環」等類標語。

在這一天的遊行隊伍裡，還出現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畫像。

據有關資料統計，十七日全天，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數約達三十五萬人。八個民主黨派在「中國的民主黨派」的大紅橫幅引導下，進入廣場；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單位有中直機關、中組部、統戰部、國務院機關、外交部、文化部、衛生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審計署等；工人隊伍裡有首都鋼鐵廠、北京齒輪廠、北京第二、第四機牀廠、北京起重機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第四製藥廠等單位，及煤炭、石油、鐵路、建築、造紙工人。此外，還有上訪人員聲援團、失足青年聲援團、個體戶聲援團、農民聲援團、失業的人聲援團，也參加了遊行。據稱，「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約十幾平方公里的範圍，二十四條主要交通幹線處於癱瘓狀態。」²⁶

同時，在各個校園裡，也有不少「倒鄧」的言詞散發。如一首用流行歌曲《一無所有》的曲子填的新詞說：

我總是問個不休，小平你何時才退休，你頻頻微笑地告訴我，老鼠還沒逮夠。

我一直問個不休，紫陽你到底幾把手，你無可奈何地告訴我，大小總是個頭。

我曾經問個不休，李鵬你屬狗還屬猴，你彷彿謙虛地告訴我，反正不屬牛。

我必須問個不休，耀邦幹麼這樣早地走，你憂鬱的眼神告訴我，死了樂悠悠。

我還是問個不休，中國還有沒有救，誰能明白地告訴我，茫茫我神洲。

在「倒鄧狂瀾」席捲首都的日子裡，還有兩件最無辜的東西——瓶子和貓——也遭受空前劫難。前者因為與「小平」諧音，所以每每遭到粉碎的命運。平白無故地，你就能見到有人摔玻璃瓶子，給大街樓道留下一片「水晶」；後者因鄧小平六〇年代初期講過一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於是與鄧結下了不解之緣。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因此批他「老右」；改革開放後理論界又為此平反；改革出現失誤後，人們便開始不客氣地稱鄧小平思想是「貓論」了。「倒鄧狂瀾」中的長安街上，遊行隊伍常常有人用竹竿吊著這種馴良的動物，招搖過市。

當然，除上述這些發洩性質的「倒鄧」言行外，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它終於出現了一種嚴肅的聲音。這就是知識界人士發表的《五一七宣言》。下面是這篇宣言的內容全文：

五一七宣言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關於《五一七宣言》的起草過程和「倒鄧」問題的提出，目前，還等待更多的材料問世才能揭開這個謎。但包遵信的回憶可為我們提供一些零星線索：

五月十六日晚七點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來找我，說：我們覺得現在應該明確提出「倒鄧」，大家商量請您出頭，發表一份聲明。如果需要和他人聯繫，我們可以幫助跑。我聽了一愣，倒不是由於他提出「倒鄧」。因為下午我從北大回來時，從廣播中聽了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談話……就感到事態的發展會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的。我感到納悶的是，這位姓邢的同學究竟是代表誰來的。他所說的「我們」是哪些人？我知道他在陳子明那個研究所兼職，但我與陳子明很少來往……起初，包遵信以為此人是學生派來的代表，但當他到廣場走了一圈，用談趙紫陽講話，暗示推翻「四二六」社論問題繫於鄧小平一人之身等問題試探之後，發現學生雖然無限憂慮，但還沒有人提「倒鄧」問題。

當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快一點了，卻看見陳子明留給我的一張條子，說他來訪未見，讓我回來給他打個電話，並告訴了他家的電話號碼。陳子明從來沒找過我，現在這麼著急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是不是與小邢找我的事有關？我撥通了電話，陳卻說沒什麼事，

只是看看我。奇怪，看看我為什麼還要我給你打電話，還是有什麼事電話裡不便說？這是一個疑問，帶著它，我進入了夢鄉……也許是因為電話裡不便說，也許是因為事情已另外有了著落。如果是後者，說明有人在這個夜晚是夠忙碌的。至少這個主意在趙紫陽講話（下午五時四十分）之後兩小時之內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一時之前，他就為中國「第二個辛亥革命」找到了孫中山！或為「第二個護國戰爭」找到了蔡鐸！

果然，當第二天的太陽剛剛升起時，不僅孫（蔡）找上了門來，而且，一篇「起義宣言」（或「護國宣言」）都已起草定稿完畢：

五月十七日晨，我起牀不久，就接到嚴家其的電話，問我上午是不是有事？說九點在政治學所有個會，希望我能參加……嚴家其見我進來就說，你來得正好，我們在研究今天遊行的口號，你看看有什麼意見？說著就從正在抄寫的年輕人手中，將擬好的口號拿來遞給我。我看了看，有二十幾條……我說很好……這時嚴又將我叫到他身邊，從幾份複印件中拿出一張遞給我說：你看看這份東西。我一看，正是《五一七宣言》。

……

我看了以後，好半天沒吭氣，嚴就問我：怎麼樣？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問嚴：他們看了沒有？嚴說：他們看了，說還要考慮考慮。我覺得現在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我說：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反對老人政治，維護民主集中制有什麼錯？嚴說，那你是否就簽上名？我說這可以。他讓我先簽，我堅持由他先簽²⁷。

此後，包遵信把這份《宣言》帶到廣場，並交台灣《聯合報》記者王震邦，《宣言》於是便成了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倒鄧狂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顯然，如果沒有《宣言》，趙紫陽的講話也會提醒人們，五月十七日的長安街上，也少不了「倒鄧」的口號，但它們只不過是老百姓的牢騷發洩罷了。但宣言賦予了這一天的行爲一種永恆的理性。而趙紫陽對戈巴契夫洩露「天機」的講話之所以能夠「開啓」這扇「地火之門」，其原因還是在自胡耀邦逝世一個月來，因「四二六」社論遲遲得不到糾正而積蓄起來的民衆的不滿。當然，完全將此事存入「社會檔案」也是不公允的，趙紫陽、嚴家其畢竟有「首義之功」。因爲，趙紫陽對戈巴契夫洩露的所謂祕密，對中國人早已不是祕密。他的講話內容與「倒鄧狂瀾」在時間上的如此緊密銜接，無疑是在客觀形勢下，人們把它當作了一個行動的信號。

從當時的情況看，真正公開提出這個問題，的確是需要一定的勇氣和冒險精神的。所以，在《宣言》徵求簽名過程中，許多人提出了「時機是否成熟」的問題。但一旦有人提出，可以理解的，一個在辛亥革命的光榮歷史教導下，在反帝制、反封建革命精神照耀下過著自己精神生活的人，要接受「倒鄧」的事實並不需要在思想上作太大的飛躍。更何況黨的總書記已經說話了，人們沒有理由懷疑，他是在已經有了把握的情況下，才作此驚人之舉的。

沒有想到，這一回，是總書記有意放了一個「濕爆竹」。第二天，當寄望於他的人們把「倒鄧」的口號喊得更響的時候，他居然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不幹了。第三天早晨，他來到廣場絕食學生中，對自己「來晚了」表示了歉意，並灑下憂國憂民更顧影自憐的最後的眼淚。隨後，在大軍的進軍北京聲中，請假病休去了。

其實，在民運中，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始終在考慮如何收場的問題的。大量表面上助長了學潮聲勢的活動，其初衷未始不是為政府，尤其是為鄧小平找下台階而發起的。如四月下旬知識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試圖迫使江澤民承擔動亂責任；五月十七—十八日「倒鄧狂瀾」中，《人民日報》社、理工大學研究生、化工部化學研究所、國旅北京分社、《旅遊》雜誌，航天部的遊行隊伍專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抗議、請願，特別是第二天由北京市所屬新聞單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法制報、北京科技報、首都經濟信息報、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一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到市委機關請願，要求北京市委、市府「向人民交待請戰真相」；教委系統要求罷免何東昌；同日，以曹思源為首的「學者代表」十二人和以王丹為首的學生代表九人提出的建議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授權一名常委處理學生絕食問題^②，均是一些希望問題繞開鄧小平的帶有引導意義的嘗試。中國社會科學院甚至有部分人廣為張貼《就喪失領土主權一事告全國人民書》，披露了中印邊界領土爭端的所謂「驚人消息」，企圖把一場對內的以政治民主化為訴求的運動，引向對外的民族主義運動。

此次學運中，鄧小平的確表現出了缺少治理現代國家政治的能力和根深柢固的家長作風。「倒鄧」問題的提出，正是這和人民對現代國家和政治家的要求已產生尖銳衝突的表現。但客觀地說，這還不是全體人民的要求，只是人民中具有現代覺悟和與知識界接近的這一部分人的要求。「倒鄧」，是人們政治現代化要求的一部分，但並不是這種要求的總體。因為，這種口號缺少現代政治的操作方式。經過十年改革，大多數覺醒者已經形成了漸進的、改革的、按法制軌道進行的、程序化的運作以促使國家逐步深植「現代化的共識」，他們的大多數和人民的大多數，都沒有進行一場

「革命」的思想和準備。鄧小平是「無冕皇帝」。他的權威不僅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礎上，而且是依習慣而成立的。按成文「法」要求，對於他是不打自倒的事情；按習慣法，打倒一個皇帝需要經過革命。如果不透過革命，而是走「程序」，用成文法打習慣法，無異於「關公戰秦瓊」，打不著邊。但是，在人民還沒有準備接受一場革命的時候，提出這種只有革命才能實現的口號，如同在子宮不適於懷胎條件下要求植胎一樣，未免是一種鋌而走險的行爲。

註釋

- ① 項小吉曾榮獲「第二屆亞洲辯論賽」最佳辯論員稱號。
- ② 按《平暴紀事》和《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的說法，五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是周勇軍宣讀的《五四宣言》，吾爾開希講話並宣布了復課。
- ③ 見《歷史的一部分》第二十三、二十四、四十四、六十二頁。
- ④ 參見《北高聯的四十日》。
- ⑤ 一說是十六日增至一千八百人次，見《平暴紀事》第八十三頁。另一說是十五日已增至三千一百四十七人，見《顛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一二頁。《京都血火》說十六日絕食學生爲「千餘名」，見九十九頁。《人民日報》五月十六日的消息也稱「上千名」，在該報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特寫中，始提到「三千餘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十九日刊登的一篇十八日訊中說，北京市急救中心「截至今晚六點，已救治三千五百零四人次」。
- ⑥ 見羅點點《流血的改革》。

⑦ 透過對資料的研究表明，當時在座的人中還有包遵信、蘇曉康、劉再復也預知知識界的有關活動，但他們當天沒有像嚴家其那樣，表現出對這一系列事情的明確的責任感和堅決性。

⑧ 見《新聞導報》第四期，暮雲的報導。

⑨⑩⑪⑫ 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二十九、三十六、六十八頁。

⑩ 見本書第二章。

⑬ 包文在提及《五一六聲明》時，一概稱為《宣言》。

⑭ 包文在此提到鄭義與蘇曉康也「客串」參加了遊行，因為，正確時間應是五月十日。

⑮ 根據鄭義回憶，這次會議選出的遊行組織者是趙瑜和他本人。後來事實上也是他們兩人，參見《歷史的一部分》，第四十五頁。

⑯ 見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⑰ 同⑮。

⑱ 同⑯。

⑲ 同⑨。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⑳ 詳見《顛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三六—一三八頁。

㉑ 穆望在《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一文中，說此事發生在五月十日，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則稱是在五月八日。此處採用陳說。

㉒ 即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康華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為當時社會所稱「四大官倒公司」。

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華社北京十一日訊只說：委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時間的決定（草案）。

㉑見《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

㉒見一二八頁。

㉓見《平暴紀事》第八十四頁。

㉔本節所引包遵信回憶，均出自《未完成的涅槃》。

㉕該建議共四條。見五月十八日《科技日報》。

第七章 保衛北京城

上帝也有自私和貪婪，因為他創造了猶大。

正如一場接力比賽，自發產生的人民運動與企圖利用它的人們，無不以壓倒對方為目的，競相追趕。當五月中旬即將結束時，這場A組由學生↓新聞界↓知識界↓全社會組成的，B組由玩火者們組成的比賽，雙方都完成了最後一棒的傳接。

第一節 戒嚴令

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終於在屢次受阻後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絕食學生避雨的公共汽車裡，他老淚縱橫地用手提擴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別演說」。他「希望同學們健康地活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那一天」，並說自己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一天，鄧小平啓程飛往武漢，在那兒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據稱是組織「第二指揮中心」①。

北京市當天下午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再次用「四二六」社論統一思想，並提出以後講話要以李鵬講話為準。

晚十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講話，要求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楊尚昆的講話則通報了調兵情況。趙紫陽稱病請假三天，沒有出席大會。

第二天，由李鵬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和由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的組織實施戒嚴的一、二、三號令公開發布。

組織實施令規定：

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眾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動；

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布謠言，進行串聯、講演、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

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

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

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嚴禁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關於外國人的規定有：

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許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關於中外記者的規定有：

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報導；

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影等活動；

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戒嚴，是一個政府依法擁有的權力。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的權力，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②；第八十九條則規定，國務院則可「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③。由於憲法沒有具體規定在什麼情況下上述機構才能行使戒嚴權力，也沒有對國家的首都與一般直轄市進行區別，更沒有對「部分地區」進行界定，所以，在戒嚴的「合法」還是「非法」問題上，在民運人士中產生了不同的理解。但更多的人既不了解法律的具體內容，也不用這一方式來規範自己的思維。他們僅僅根據情理，就否定了戒嚴的必要性。在這一點上，他們不愧是中共「政治高於法律」信條的忠實的無條件的接受者。只不過，這一次雙方在同一信條下，高舉的是兩種政治信條：當中共說「權力重於一切」時，人民卻說「民心決定一切」。

那麼，此次戒嚴決定的出爐，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事實表明，它是以前一個或幾個老人的感覺為依據，以他們對權力危機的感覺為依據的。

根據《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和《流血的改革》所述，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之間，中顧委、中紀委的一些老人就開始廣泛搜集學生在激憤與不滿情況下的偏激言論與口號，尤其是聽了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報告以後，更斷言這次學潮引起的民運是一場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動亂。所謂李錫銘的報告，就是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和鄧小平彙報時所用報告。它的突出特點就是首先把學運說成被一小撮壞人操縱的，然後說學生的矛頭是對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對準老同志，特別是小平同志的。並列舉了學生根據傳聞畫出的「關係圖」，用以刺激這些老人。其次，李的報告把學潮歸咎於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軟弱和縱容。據

說，在李錫銘向政治局彙報的當時，胡啓立就建議「還是聽聽羣衆的意見」，但王震當場反駁說：「爲什麼不聽聽我們老同志的意見」。他們由此也得出事由在學生，但根源在黨內的結論。按照李先念的說法，就是「黨內的兩種聲音」。

五月上旬以來，幾個已經退休和半退休的老人一直在鄧小平周圍活動。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召開的軍以上幹部傳達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時，也透露了當時的情況。他說：「多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的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垮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

早在五月八日，即黨的總書記兼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清理整頓公司等六條意見時，待在北戴河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就開始召見各大軍區軍兵種的負責人。將幾十個野戰軍以換防、拉練（編按：野營訓練）、野營的名義往北京調動。五月十日，楊尚昆向他彙報了伊朗總統柯梅尼要求會見的情況，鄧曾以「我心情不好」加以拒絕。從五月十六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中蘇最高級會晤的新聞節目中，人們看到的那個與戈巴契夫交談的鄧小平言語支吾，反應遲頓，的確是一副「年邁昏庸」的樣子。但是，據說，他居然聽見了到大會堂找水喝被拒絕的人打破玻璃的聲音^④。可見他老兄雖然身在大會堂內，心卻在天安門廣場。學潮，他本人「四二五」講話的反應，廣場的絕食學生，始終是他心裡的一塊石頭。

五月十七日，是正式決定採取戒嚴手段的關鍵時刻。這一天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先是討論了

退不退的問題。趙紫陽提出，不能因一個人對學潮的定性，大家就不能改動。學生運動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動改革和開放，打倒的是「官倒」。李鵬的發言偷換了概念，把對學潮的評價問題轉眼變成了對黨的評價問題，說，黨這麼多年來，成績是主要的。如果從「四二六」社論上退下來，政府和黨要蒙受重大損失。胡啓立的發言比較了兩種意見導致的結果，但不作結論，態度「騎牆」^⑤。這一天正式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沒有任何結果。

會後，趙紫陽要求單獨見鄧小平。但當日深夜，鄧小平將五常委與李先念、楊尚昆一起召到了家中。

一開始，鄧小平就對在場的人說：就這樣拖下去不行，究竟怎麼辦？還有沒有退路？退到哪裡去？

楊尚昆說：這是水壩最後一個大壩，一退就垮了。

趙紫陽說：對當前的問題，我認為有兩類解決辦法。一種辦法是軟辦法，一種辦法是硬辦法。軟辦法就是，承認學生是愛國的，承認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改變「四二六」社論的說法。硬辦法中，一種是空硬，就是發表「四二六」社論那樣的東西，公安局發布十條，不許學生遊行，上街。這種辦法已被實踐證明是沒有有效的。另一種硬辦法就是實硬，也就是戒嚴，軍管。這種辦法短期內可能奏效，長期來講會使國家陷入動盪不安之中。

接著，姚依林對趙發起攻擊，歷數了他的四大罪狀：第一，搞亂了經濟，搞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二，支持學生，支持動亂，和黨中央不一致，和小平同志不一致；第三，分裂了黨（據稱，這時李鵬指著趙對鄧小平說：他和戈巴契夫的談話，就是把你推到第一線，要你承擔

全部責任，這是分裂黨中央；第四，兩個兒子是最大的官倒。

鄧小平說：我知道你們中間有爭論，但現在不是來判斷爭論的問題，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只討論究竟退不退。

於是，常委們在這個非正式會議上對戒嚴問題進行表決。贊成的是李鵬、姚依林，反對的是趙紫陽，喬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棄權；胡啓立表示服從組織決定，棄權，保留個人意見。

最後，鄧小平表態說：我贊成常委大多數同志的意見。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成績是主要的。戒嚴決定就此通過。

趙紫陽在戒嚴決定通過之後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要好。但這個方針我執行起來有困難。我身體不好……

鄧小平說：你知道少數服從多數是我們黨的原則，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⑥。

事後，執政黨沒有像以往一樣，將自己的決定「會知」人大、政協，連做一做讓他們「舉手」或「鼓掌」通過的表面文章的興趣也沒有。人們設想，如果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京的話，他會不會站在趙紫陽一邊？因為，直到五月十七日，身在加拿大的萬里還發表講話，聲稱「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⑦。趙紫陽甚至還電召萬里提前回國。但值得考慮的是，萬里雖然有他自己的明確立場，但他會與政治局常委的「集體決定」對抗嗎？他會與他的老朋友鄧小平在最後的年月裡分道揚鑣嗎？他雖然有功於國，有信於民，但在現行的權力體制下，他的委員長位置的獲得，

畢竟是中共，特別是以老人為重心的幕後政治派給的。權力的授予者也有權力的收回能力。在這一點上，他的最後表現雖然可以稱為一大「懸案」，但大致結果是不難推定的。就是趙紫陽，也沒有提出戒嚴問題應交據說有多數反對^⑧的政治局討論，而是消極地卸去責任，萬里，能夠比他的這位改革盟友走得更遠嗎？

據駐石家莊的二十七軍某副政委回憶，他們於十八日晚便接到了進京命令。

十九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處以上幹部會議統一思想之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召集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部分負責人，以及體改所正處級以上幹部會議，通報了趙紫陽當前的情況和關於戒嚴的極機密消息，並決定就當前形勢公開表示自己的態度。

「三所一會」之所以能一反歷來黨內鬥爭的傳統，與他們新生代的特徵和成長的歷程是有關係的。他們不屬於任何舊的山頭，是中共黨內最新鮮的血液。由於鄧時代是在「前朝老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文革前十七年計畫經濟的思路和「左」的科研路線，使改革事業中能夠提供決策參考的新思維和人才奇缺，十年文革造成的幹部斷層，使他在幹部力量上已無法承擔起改革新使命。於是，便發生了陳一諮回憶的以下過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鮑彤先找我談了幾次話，接著趙紫陽找我談了三次。趙紫陽當時

主要談了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說：你們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改革的重點轉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上過山，下過鄉，了解中

國的實際情況，又學了各種理論，思想上框框比較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服務。第二個意思他講：不要把所有能幹的人才都集中到一個單位，要把中央和國務院一批有眼光、有知識、有能力的人組織起來，用一種方式讓他們定期或不定期地討論中國改革的問題……正好當時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也提出應該建立一個青年經濟學家的組織。這時很多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來組建一個青年經濟學會……誰來當會長呢？當時很多中青年建議由我來當。我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應該找一個更有影響的、離決策比較近的人來作這個會長。當時很多人提出來一些老的經濟學家，像薛暮橋、于光遠、馬洪等，當然他們都很好。可是我反覆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之後，決定請鮑彤擔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會長。鮑彤當時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本人思想敏銳，方向清楚，辦事果斷，為人正派，很得趙紫陽本人的賞識……我對他說：第一，你在改革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貢獻。第二，你可以經常把上層決策遇到的問題轉達給我們，我們也可以把一些研究結果轉告給你。第三，中國菩薩太多，拜這個不拜那個都會有意見。把菩薩都請來也請不起。他考慮了一周以後，同意擔任會長……

第一批理事二百多人，分布在中央各部委、研究機構、大學，都是由各單位推薦的三、四十歲的，在前一段的改革中作出過貢獻的一批人。從這以後，每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遇到新問題需要解決、需要研究的時候，我們就召開各種不同方式的會議，討論的結果上送^⑨。

陳一諮請趙的祕書任會長的做法，當時曾引起中青年學術思想界的議論，因為它違反科學相對獨立的原則，把應該以自由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研工作納入了奏摺學派的軌道。但它從另一方面卻加強了改革派的社會與政權基礎，形成了黨內新生代與趙紫陽的政治同盟。他們的素質雖然限制了中國八〇年代改革的想像力，但從縱向比較來看，他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共和國的歷史。

從這個背景看，陳一諮當然是要插手民運的。還在一九八八年歲末，這批忠心耿耿的「熊瞎子朋友」^⑩就在港刊上掀起了那場「倒鄧保趙」的愚蠢的運動；一九八九年四月京豐賓館會議上^⑪，他們也發出過改革派即將受挫的警告，及類似團結起來，保衛改革的號召。自四月中旬學潮之風起於青萍之末時，陳一諮就已經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動作了。四月十八日，以北京大學部分師生校友名義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條幅「中國魂」，就是體改所的北大校友捐款製作的。當時，起家與胡耀邦關係密切的陳一諮就關注著學潮的發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氣可用」。趙紫陽發表「亞行講話」以後，他們也試圖與在野的「職業革命家」達成一致，使事態在趙所指引的軌道內進行。但是，這種願望在對方記恨於他十年改革壟斷了「進言渠道」的舊賬面前，碰壁而歸。胡耀邦逝世以來，在北大還屢次出現類似「救趙」的言論，試圖把學生的抗議引向保衛包括改革派在內的「改革成果」。但這些言論也立即受到謹慎的警告。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絕不希望學運充當「政客的拐杖」^⑫。

智囊們的動作與趙紫陽的真意未必一致。前者確有利用學運挽救趙紫陽下滑命運的用意，而從趙紫陽本人在學運最初兩周的情況看，是不願當「胡耀邦第二」，所以急於要撇清自己與學運的關

係的。

儘管如此，趙的這幫忠實的「熊瞎子」朋友並未因為趙的失勢而見風轉舵，而是始終如一地站在總書記的周圍。五月十九日會議的成果，是以「三所一會」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該聲明的全文是：

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1. 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2. 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3. 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羣衆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的局面。

4. 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至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5. 為此，我們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做出判斷和選

擇；

預；

議；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

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後勤服務工作；

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勝利！

6.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

該項聲明是八九民運中來自中共體制內，以單位名義正式作出的第一個反戒嚴的行動。它反映

了與改革命運攸關的一大批中青年幹部，在是容忍中國人做暴政的奴隸、甘心出賣靈魂爲這樣的暴政充當馴服工具，以沉默來默忍強權的勝利，或是做人、做共和國主人，爲道義而戰的大是大非面前，取義成仁，與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同進退的決心。較之於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時，胡派陣營的無聲無臭，分崩離析，不能不說是一種壯烈的舉措。

戒嚴的消息帶到廣場，晚九時十五分，學生停止絕食，宣布改絕食爲靜坐。中央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門廣場，實際上是當時消息最靈通之地。各種在朝在野的政治與非政治的派別，出於各不相同的目的，都把自己認爲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到這裡。其中不乏數個與最高決策者們有密切關係的消息管道。而這些管道中也有「太子黨」有意識建立起來的。有人就曾在廣場遇見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的祕書與廣場絕食學生指揮部聯繫。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就是透過類似管道得到戒嚴消息，並擅自宣布停止絕食而一度被免去高聯主席職務。不過，太子黨到此透露關於戒嚴消息，與趙紫陽派系的目的不同，主要是爲了挽救其長輩的歷史名聲罷了。

第二節 進軍難

還在戒嚴令正式發布的頭一天，北京市民就已發現隆隆開入北京市區的軍車。這時，人們就開始自發地起來抵制了：

第一批進城的軍車被堵，是十九日下午在城西公主墳解放軍總後大院門口，共五十輛，由車牌是「V」字開頭的吉普車、卡車、雷達指揮車組成。卡車上裝載著鋼絲牀、桌椅、煤炭、柴火、大米等。

同時，在城東的呼家樓，城西南的六里橋，也有軍車被堵。人們向軍人講述北京的事態，解釋學生的要求和主張，要求他們絕對不能到廣場去，不能鎮壓學生。在六里橋，還出現附近的居民給又渴又餓的士兵送食品的情況。他們把食品交給維持秩序的學生，由學生送到戰士手裡，戰士和學生你推我讓，使圍觀的羣衆感動得直掉眼淚。

據後來主要擔任開道和清理天安門廣場的二十七軍某副政委回憶：

在這二十多天裡，對我們來說，是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特殊戰鬥。我們當時在老山，說老山是一個特殊的戰場，這個地方比老山還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國的首都，好人壞人一時難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驗，也有政治上的考驗，而且鬥爭的性質，更主要的是一場政治鬥爭，太複雜了。這些天經歷了三個浪潮，可以說一浪高過一浪，一浪比一浪複雜。

第一個浪頭是我們從駐地向北京開進。我們感到時間太緊迫了，部隊來不及動員，準備工作非常倉促。十八日晚，我們接到上級命令，到北京來執行緊急任務，守衛首都的重要目標，維護首都的秩序，我們感到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務。從胡耀邦逝世起，我們就十分關注報紙和電台，對輿論上某些導向，我們指戰員還是有所警惕的。特別是我們軍的領

導，感到有一場風雲要來……但是沒想到來得這麼急！

接到「緊急命令」後，我們馬上開會，統一思想。因為好幾年沒有復員，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復員了，剩下的幾乎都是新兵。爲了應付，我們打亂了全軍建制^③臨時調集，有許多幹部都不認識自己的兵。二百八十名戰士休假迅速召回，二百七十九名官兵把臨時來的家屬送走，三百六十五名幹部戰士推遲了婚期。已經買到車票準備探親的幹部戰士，通知他們不休假。病房的幹部戰士聽說有任務趕回營房。僅用六個小時，全部準備就緒。

十九日上午八點多鐘，執行任務的部隊就開始啓程，向北京慢慢地開進……我們走的時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莊的幹部晚上都沒敢回家……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攔住了。後來才知道，是趙紫陽身邊的人把這樣的核心機密透露給人家。北京學生打電話到河北保定，保定學生出動攔截，說什麼也不願意放。後來不知道是什麼環節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聯來電話指示：不要管他們，讓他們走吧！

那麼就走吧！但走了一會兒又不讓走了。說是高自聯又來了一個電話，說剛才那個電話是錯誤的……嘩！一下又攔住了。攔住了六百多人……雙方談判，一直談到二十日的下午……後撤行不行呢？他們說後撤可以，一直把你們送回石家莊。好吧，你送就送吧！……這樣，我們的部隊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帶，又有四個青年在道上攔住……我一看，這四個人氣色不大對，搞不好又要打電話、通報情況，又要堵車。我就說，下車，找個地方吃飯，確實也沒吃飯。結果把那四個人甩了。以後我告訴先頭部隊，這個地方不能停留，趕快走，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這是第一個浪頭。

十九日夜裡，機械化部隊到了豐台、大興一帶。這時，部隊來不及宿營，臨時找不到住的地方。二十日，部隊第一次進城，就接到命令，要我們緊急向市區開進……來不及開會，只能電話聯繫，結果在開進途中，遭到部分青年的圍困。

我們一個高炮旅旅長，帶了三百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寶山，在那裡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過了半個小時，嘩——成千上萬的人上來了。我們被堵在了八寶山和八角村之間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車、公共汽車、垃圾桶、自行車，真是層層障礙、種種阻攔，使部隊無法前進，更談不上執行什麼戒嚴任務。

從二十日上午八點，一直到二十一日十八點，整整被圍困了三十多個小時……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風襲人。沒有飯吃，飯送不上來……後來只能用救護車，讓一些戰士假裝虛脫了，用送病號的名義把乾糧送進來……一些廠子裡的工人告訴我們戰士，他們廠裡有鍋爐，水開了，可以去打。我們的士兵三三兩兩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讓你出去，還得給他請個假，說「打開水」……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學生給我們送來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們再說。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部隊接到暫緩進城，在郊區集結休整的命令。但圍堵的人又不讓你回來。我們有一個工兵團，有一百來人，在大興黃村一帶。最後被趕到一個廠子裡去，然後把大門關起來。幾個學生守在門前，光席子，一個枕頭，睡在馬路上，也夠難為他們的……我們找到了這支部隊，說回來吧！我那天換了便衣，汽車也不得不掛上地方的牌子，老遠就得停下來，過關口時還得把兩個指頭伸出來^①。但我們還是被看出來了……透

過交涉，我們還是把部隊接了回來。

擔任清場任務的二十七軍奉命暫停前進。但被派遣佔領「重要警衛目標」的部隊卻必須按時到達指定地點。據駐紮在京東通縣某部中校團長回憶，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該部隊接到師長命令，進駐人民日報社；摩托車隊剛開出營房即被當地居民圍住。闖過此關後，又在朝陽區大北窰一帶「被潮水般湧來的上萬名市民學生團團圍住，動彈不得。」他們想方設法擺脫困境退回營房。最後選擇了以二九二醫院為「前進基地」避開大道走小道穿農田，兩步到位的方案。到了出發的時間，借用的「五副地方車牌照遲遲未到」，結果，不得不讓「二百一十七名官兵攜帶武器、彈藥、電池等物資」，「身穿花襯衣、牛仔褲、新潮服」，乘坐沒有車牌的大轎車闖北京。當車來到北關橋重要路口時，他們跟在蔬菜運輸車的後面，「伸食指、中指作V字手勢，探出腦袋搖旗吶喊，嚷成一片」，才算蒙混過關。但到來達二九二醫院後，部隊不得不採取化整為零的方法潛入市區。圍堵羣衆在實踐中也總結出識別便衣軍人的經驗，凡見到穿軍褲軍鞋、頭髮被軍帽壓倒的人，必要像「相女婿」一樣圍之，上下打量，審問鑑定，直到脫掉長褲看裡面是否穿著軍短褲。到廣播大廈執勤的戰士董振軍被發現後，被關入地鐵站，在黑暗的隧道裡摸索了三天兩夜，才到達指定地點。某部專業軍士程志仕在被發現後，假裝上廁所，翻護窗得以突圍，差點被迫上後，又鑽入垃圾桶藏身才最終逃脫^⑮。

自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二日，被困在城邊的部隊開展了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為駐地羣衆做好事的活動，這暫時緩和了軍隊與市民的對立情緒。而一旦他們重新開拔，這種「貓

鼠蜜月」即行結束。二十七軍某副政委繼續回憶說：

從六月二日晚七時，開始向大會堂開進。當時爲了防止再次進城受阻，避免和學生、羣衆發生正面衝突，根據上面的精神，部隊採取了化整爲零，行微棄服，不帶一槍一彈，全部便衣、徒手，不帶挎包，只提一個塑料袋，步行進入市區。

……進城的戰士三、五個人一組，有一個人負責……有些迷路了。因爲出發前只是給每人畫了一個草圖：豐台↓大興↓大會堂西南，很簡單。有的戰士拐幾個彎就走迷了。有的只到六月三日還在釣魚台一帶，又不敢問人，怕被發覺……有的找到了大會堂也不知道西南門是哪個口，轉好幾圈還進不去，往往要繞到廣場去。一個戰士到廣場坐下，結果，一個高自聯問：你，幹什麼的？他說，我是民工。有人轉了二十三個小時的市區……有的戰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屈，千難萬難，突然在路上看見了自己的團長，忍不住熱淚盈眶，上前大叫一聲「團長」，結果周圍的人一片震驚，怎麼辦？團長也害怕被圍住，跑吧！

據北京市委編發的《平暴紀事》記述，五月二十日，成千上萬的學生和羣衆在昌平、朝陽、海淀、豐台、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區、縣的路口、馬路上，阻攔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武警，大批學生分散活動，動員工人、農民和羣衆一起行動。學生、羣衆攔住公共汽車。趕走司機和售票人員，把車橫在路上，或坐在、躺在馬路上，不讓軍車、裝甲車前進。有的從公共電車站推

走電汽車當路障，有的用磚石砸碎汽車玻璃，有的把汽車掀翻，有的甚至投擲石塊、酒瓶，襲擊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有的還將車上的軍官拉下來，讓他表態不去天安門，不鎮壓學生。還有人高喊：「軍隊進京，受人欺騙，北京市民行動起來，保護學生。」圍堵軍車的羣衆，少則幾十人、幾百人，多則二萬餘人……

當日，地面公共交通全部癱瘓，地鐵於十時左右停止營運。下午，有萬餘人聚集豐台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北門，並用火點著了傳達室。

二十一日凌晨，一千多名學生、羣衆衝進地鐵太平湖總站，用磚頭堵住鐵道，二千多人堵住南苑機場，運油車隊被攔截在外，汽油供應一度告急。宣武門、德勝門、崇文門、大北窰、吳家廠、八王墳、五棵松、廣渠門、農展館、天橋、六里橋、郎家園、東直門、東大橋、蘋果園、紅廟、十里堡、明光村、霞光街、亮果廠、紫竹院、三元橋、大磨廠、右安門、長安街、東單、天寧寺、蓮花池等二十八個路口被堵。

下午近四時，天壇西門傳出部隊準備在此空降的消息，天壇、先農壇、工人體育場大門立即被汽車堵住。截至晚六時三十五分，北京站內外有二萬人圍堵。同時，九一七五次軍列剛過沙河火車站，即被三、四千名學生包圍^⑮。

在反戒嚴的行列裡，由北京市民中佔改革的先機，「先富起來的」部分個體戶青年的私人摩托車組成的「飛虎隊」^⑯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被政府稱爲「社會渣滓」的人隊伍雄壯，嘯聚成羣，忽來忽去，傳遞著各處出現的最新情況，也仗著民運的聲譽幹一些搶劫汽油的勾當。其隊伍最多時達到三、四百輛。

對於北京市民的這些反戒嚴活動，有關外電進行了及時的報導：

「今天（二十日），一百多萬學生和工人公開反對政府，無視戒嚴令擁到大街上，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攔著配備衝鋒槍的軍隊不讓進城。」

「天安門廣場上聚集著數十萬羣衆，人們擔心人民解放軍會從地道衝進廣場，工人們把垃圾車開到廣場上，堵住地道出口。」

——合衆國際社

「（二十一日）數以千計的市民在市區周圍用公共汽車和卡車設起路障。在首都郊區的公路上，大批的軍隊被市民阻住無法前進。」

「一位驅車從東城去西城穿過北京的西方公民說，他經過了三十多個分別由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守衛著的路障。」爲防止軍隊便衣混進城區，人們還在沿路設置了檢查站，對進城車輛進行檢查。

——路透社

「支持學生的工人和市民，一到晚上就湧向廣場周圍，據認爲，抵抗軍隊的陣勢在整個市區有二百萬人以上。」

——共同社

「（二十二日）黎明前北京的大街上擠滿市民，是爲了保衛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免遭他們害怕發生的軍事攻擊。」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一個軍事家，一個統帥眼裡，一個擁有現代武器和作戰知識的現代軍隊面前，在幾十萬大軍層層的包圍圈中，這些居民構築的層層障礙密密工事，就猶如一個人看螞蟻辛勤的搬山築穴、蜘蛛在拉絲佈網一般。據稱，這次奉戒嚴令進京的，有來自全國七大軍區的軍隊，達三十五萬人之眾。他們大多出自作為軍隊「精銳」的野戰部隊；軍兵種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空降部隊、導彈部隊。其中二十七軍、三十八軍、三十九軍、二十四軍均為經過合成改造的現代化集團軍。參加人數最多的二十七軍和三十八軍為中央軍委戰略預備隊^⑧。與這樣的軍隊對峙，北京市民那些用肉體、自行車、汽車、垃圾桶築成的路障，不能不說像是一場玩笑。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要去嘲笑這些螞蟻，輕視這些蜘蛛。它們的辛勤、執著，表達的是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一種不可辱的尊嚴。儘管這是螻蛄般的意志和尊嚴，但是它確實擋住了滾滾的鐵甲，它讓人民流淚，讓士兵流淚，讓將軍流淚，讓神明為之流淚！

有一首題為《有沒有腦袋都一樣——北京戒嚴有感》的打油詩，反映了北京民眾此時的心情：

菜籃子是您抓的／鴿子窩^⑨是您關懷的／悶罐車是您提供的／就這腦袋是咱自己的／眼睛您又給蒙上了／耳朵您又給堵上了／嘴巴您又給縫上了／手腳您又給捆上了／咱百姓還剩下什麼／動彈不了一無所有／可您還說咱動亂了／乾脆／這腦袋也給您了吧／有沒有腦袋都一樣。

第三節 廣場的支撐

就在軍隊進軍北京，羣衆從自發到有組織地堵截軍隊進城的同時，社會各界也對戒嚴行動作出了相應的回響：

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成立，以保護學生爲有限目標，宣布如果黨和政府不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學生的兩點要求，則從五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時開始，進行全市工人總罷工。這一天的上午，北大五十餘名黨員教職工也宣布絕食，並登上天安門前的觀禮台，「誓與學生共存亡」。

五月二十一日，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的呼籲書。經徵求該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兼社長胡績偉的意見，以他的名義，發起了徵集人大常委會委員對該呼籲書（議案）的簽名的運動。該議案的全文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近日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局勢表明，我們國家陷於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我們作爲人民選出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成員，必須對人民共和國高度負責，在此緊急關頭，應立即通過法定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爲此，我們提議，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左右，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非常）緊急會議，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制軌道，

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參加的緊急會議。

一時間，人大、萬里，幾乎成了人民的救世主。沒有了這個救主，一切透過合法鬥爭形式爭取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希望均將化為泡影。

一篇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散發的題為《關於當前學運籌略的建議》，號召堅持中心廣場的戰鬥，以支持高層鬥爭的勝利，要堅持一到兩週^②。所謂高層鬥爭，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是趙紫陽、萬里的聯手。鑑於趙已病休，奪取「勝利」的希望當然就全部落到了萬里身上。

萬里回國前，反戒嚴形勢下成立的各社會團體紛紛發出「歡迎萬里回國」的號召。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學生廣播站甚至已發出通知：五月二十五日上午開始緊急舉行有社會各界參加的大遊行，歡迎萬里回國，由萬里委員長主持召開人大非常會議並作出英明決策。遊行口號是：「歡迎萬里主持人大，罷免李鵬，伸張正義」。與此相應，廣場堅持的目標也由「對話」、「現場直播」和「正確評價」轉變為：

- 一、召開人大緊急會議；
- 二、罷免李鵬；
- 三、解除戒嚴令。

五月二十二日，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開部分高校學生代表會議，宣布干預學運，具體由兩位副總經理和曹思源協助學生工作，有發言權、建議權、參謀權，並給與經濟支持。

當日，北京爆發了戒嚴令發布以來首次正式遊行。

二十三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成立，同時起草了內容為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軍人通過北知聯編發的《新聞快訊》發表了一封給學生市民的公開信，對「反戒嚴」行動進行軍事上的指導。這封信說：

可愛的同學們，市民們，我向你們致以一位老軍人的敬禮！

這一段時間，我默默地關注著你們的鬥爭，我想提醒你們：你們已經取得了不可想像的勝利！我無法公開站出來支持你們，但我想對你們說幾句話：

一、戰略：

天安門廣場數十萬人，少數軍隊是無法解決的。戒嚴令公布幾十小時了，沒有對天安門廣場採取行動。因市內兵力、警力嚴重不足。軍隊與警察受的教育也不同，很難把槍口指向人民。一千萬同仇敵愾的北京人民是無法對付的。

二、戰術：

1. 路口：羣衆自發地攔截軍車，是前所未見的壯舉。千萬不要撤，即使聽說其他方向已開進一、兩支部隊，也不要撤。因為，一兩支部隊解決不了問題，無法實施廣場行動和戒嚴、軍管。堅守路口就是勝利。爲此目的，各路口必須建立穩定的指揮系統，改善無組織狀態。

2. 分割：這是一貫戰術。人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可放行軍隊的三分之二，卡住三分之一。在下一個路口，再放行三分之一，卡住三分之一。把成建制的軍、師分割成首尾無法相顧的幾部分。能做到這一步，部隊的軍心、戰鬥力就基本上瓦解了。

3. 開槍、催淚瓦斯：對聚集在一起的十幾萬人開槍，施放催淚瓦斯必將造成混亂和大批傷亡。必須警告軍隊領導，誰下令，誰將來必上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就算北京用屠殺可以暫時控制，全國幾十個大城市怎麼控制？我們沒有那麼多軍隊。

4. 要相信人民軍隊的基本素質，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不僅要號召他們不進城，而且要號召他們調轉槍口，站在人民一邊。

祝北京人民勝利！

一位老軍人

與這位軍人不同，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等七名退休上將聯名上書中央軍委，反對以軍事行動解決面臨的問題。當中國新聞社記者根據傳言向他們電詢此事時，他們公開予以確認。二十三日，在戒嚴以來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中，人們讀到了載有這些內容的傳單。

同時，三十五位香港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就中國當前局勢發出聲明，要求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議。香港文藝界、宗教界人士也對戒嚴行動作出反應：著名

藝人汪明荃說，如果中國政府的辦事方針令人民失去信心，她將考慮辭退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全港十七萬基督教徒和二十六萬天主教徒在祈禱和做彌撒中，為中國人民的安危祈禱。查良鏞（金庸）、鄭廣杰也為此辭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職務，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仍擔任這一職務「違背良心」。

當日下午大雨，氣溫驟降，大批寒衣和薑糖水被送到廣場，僅某中央機關就捐獻衣服四千件。社會各界用上述方式表達的對戒嚴令的不滿和憤怒之情，無疑成爲了廣場學生繼續堅持下去的意義支撐。

此外，支持學生廣場堅守的另一支柱，是政府戒嚴行動所賦予他們的理想支撐。顯然，原先那些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的問題，還是一個可緩可急，有商量和討價還價餘地的问题，因爲它們的實現，確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是，戒嚴令使事情一夜之間變成了「不能在暴政面前低頭認輸」的問題。正如那個絕食行動的最早播種者鄭義，後來在《歷史的一部分》一書中，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的一樣：「或者在專制暴政面前低頭服輸，永不再提什麼自由、民主；或者組織起來、聯合起來，爲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抗爭奮鬥。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歷史，選擇了被迫害、被鎮壓與被屠戮，選擇了流芳百世的光榮。」其實，也就是選擇了一條更爲簡單化的道路。因爲，在暴政與自由，苟活與犧牲之間，是沒有選擇餘地的。而逼迫人民作此選擇，正是戒嚴的主要動機和功效之一。

期望問題簡單化，本是根植於人類天性中的惰性之一。廣場戰鬥的徒勞無功，堅持日久的身心疲憊，均是這種潛伏在人性深處的情性上浮的有利條件。而支持這種惰性的最顯著的標誌之一，就

是進入五月下旬以後漫天飛舞的謠言。

下面，是這些謠言的一些例子：

以李鵬、薄一波、楊尚昆、王震爲首成立中央僞政府。李鵬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將學運定性爲叛亂；不惜用二十天時間鎮壓掉廣場二十萬大學生。

萬里從加拿大來電，稱李鵬講話不符合憲法。十個副委員長都支持趙紫陽同志。

北京各監獄除重犯，其餘犯人全部撤走，準備關押學生。

二十七軍的駐紮在老山前線的將士們聲明支持這次學生運動。

鄧穎超要求退黨。

聶榮臻說：「誰開槍打學生，我就先斃了誰！」

國家十一個部委反對李鵬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脫離中央。

上海市已不承認北京政府。

世界上有三十個國家不承認李鵬政府。

葉飛、聶帥、徐帥表態支持學生運動，上述三人及鄧穎超要求召開軍委會會議，罷免鄧小平。

戒嚴部隊兵變，三十八軍軍長被抓。楊尚昆停止老帥汽油供應。

解放軍三總部二千餘名官兵呼籲士兵調轉車頭班師回營。要求罷免鄧小平的軍委主席和李鵬的職務。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全國舉行大選，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

人們對有利於自身惰性謠言的渴望，自學生絕食以來就存在了。這可以從筆者一個朋友的敘述

看出。這是一則關於「鄧小平下台」謠言在廣場激起的一場激動人心的漣漪：

那天（五月十八日）下午下雨，我和司機躺在車裡，因為連日搶救學生，太累，睡著了。突然間有人猛敲我們的車門，我們從夢中驚醒。再往外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車裡的學生都從車窗、車門裡往外咕嚕，連滾帶爬地出到外面。再看廣場，歡聲雷動。學生們有的在一起抱頭痛哭，搖旗吶喊，大吃東西，還把東西扔給別人吃——以為勝利了！北大的學生還準備馬上回學校慶祝。手提擴音器裡下面的話沒聽見，都被歡呼聲壓倒了！其實，下面還有話：此事未經證實，還在核實中。等廣播第二遍時，聽清了，說沒戲了。這個關於「鄧小平下台」的消息，是兩個自稱高幹子弟的人在廣場宣布的。當然不是事實，但它活生生地反映了，學生們需要神話，需要奇蹟的精神世界。他們或許正是懷著對奇蹟的渴望走到一起來的。就是在六月四日以後，學運已被無情鎮壓，明擺著已無回天之力時，人們仍然沒有從這種夢想中醒悟過來。「李鵬被刺」；「鄧死李傷楊逃」等謠言如縷不絕。六月五日，北京城南傳來的數聲炮響，立即給人以「情況微妙」的感覺，接著，「二十七軍與三十八軍在南苑機場火併。」的謠言，迅速地被生產出來。凡此種種，反應了人們在潛意識中迴避最不堪面對的現實的願望。

在這所有的「謠言」中，關於軍隊內部分歧的內容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鑑於中共政治的不透明，軍隊內部問題更屬於「軍情機密」，我們一時很難對它的嚴重程度及矛盾性質作出判斷。但根

據事後楊尚昆兄弟的下場，反觀當時的傳聞，則可以斷定，這種矛盾至少是存在的，而且是相當尖銳的。七上將給中央軍委的聯名信，只不過是海底冰山露出水面的一個尖頂。而軍隊內部，特別是以解放軍三總部系統，確實對「楊家將」抱有強烈的反感和牴觸情緒。據稱，這種反感主要是由於楊尚昆的攬權，不避嫌疑的提拔資歷淺薄的異母兄弟楊白冰，以及不惜虛與委蛇地作出鄧小平家臣的姿態，以博得寵信，鞏固自家在軍隊的統治地位的行徑造成的。這些，都使人認為，楊家二兄弟是新時期軍隊的最大野心家。所以在戒嚴的決定剛一作出，他們就把消息透露給學生，故有軍隊一出營房門就被堵回去，以及識破其「化整為零」戰術，且反應極其迅速的情況發生。

在五月二十三日爆發的戒嚴以來最大遊行中，人們讀到的「七上將的聯名信」竟是從在廣場上空盤旋的戒嚴部隊的直升飛機上撒下來的。

軍人的干預，除通報消息，像上面那位老軍人進行戰略戰術指導外，還有盡力化解軍民對立的勸誡。它告訴人民：解放軍並不是真正的對立面。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目前他們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騙到這裡來的。重要的是使他們了解真相，了解人民的意志，要理解與尊重他們。一份致廣大市民的傳單說：「某些盜用中央和政府名義的人，將解放軍官兵騙到這裡後，採取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使解放軍的飲食得不到保障，有些官兵已連續幾天沒有吃多少東西。其目的無非是試圖激化解放軍與人民的矛盾。因此，我們對子弟兵要加以愛護，盡量幫助他們解決飲食方面的困難。」這份傳單還說：「要理解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但也要向他們說明，軍人也有拒不執行或反抗違背人民意志的權利的……在攔截過程中，要絕對避免與解放軍官兵的衝突。同時要警惕便衣或其他別有用心的人毆打解放軍戰士，製造事端。」他們在宣傳中還揭露楊尚昆講話中「軍隊

不是針對學生的「這條謊言，因為在官方通告中有「可以運用一切手段」的允諾，這必是包含了開槍和使用催淚瓦斯在內的。

反對楊家將統治的軍人，既需要以羣衆的肉體作屏障，以粉碎楊氏兄弟進一步獨攬軍權的陰謀，也試圖減輕人民的犧牲，他們向人們傳授「催淚彈防護」基本知識。告訴人們催淚彈的中毒特徵、使用特點、物性、及急救辦法。此外，也同時作著戒嚴部隊的工作。一位未署名的陸軍少校在一封《致奉命進駐北京戒嚴的官兵的信》中說：

親愛的戰友：

我也是一個軍人，出身在農民家庭，咱們是階級兄弟，一個戰壕裡的戰友。我在北京工作，年齡比你大一點，想跟你們談談心。

……我十分痛心地告訴你，你這次來京，既不是抗敵，也不是救災。你確確實實是上當受騙了。這次部隊進京是來鎮壓學生運動的。

……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推動改革、反對腐敗、打倒官倒、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場運動打中了特權階層、腐化分子、醜惡官僚的要害，也打中了楊氏家族的要害……他（楊尚昆）當上軍委副主席後，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親手提拔自己的弟弟楊白冰當總政治部主任，又提拔親兒子當二炮負責人。軍委會議快變成家族會議了……楊家兄弟預感運動愈深入，對他們的封建特權愈不利，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排擠全黨正式選舉的總書記趙紫陽同志，扶植剛剛犯了嚴重錯誤的李鵬，篡黨奪權，進而私自調動幾十萬軍隊向北

京開進……他們的陰謀已經敗露，受到一大批我軍高級將領和廣大指戰員的堅決反對和無聲抵制。有些人甚至提出「打倒新軍閥」的口號。

親愛的兄弟，你也許已經看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態度……中華民族又到了一個歷史的關頭，我們都不要做出受人唾罵、令親人痛心的蠢事，不要當楊氏兄弟的走卒，不能成爲歷史的罪人。你的槍口、拳頭絕對不能衝著大學生和慈愛的老師以及廣大人民羣衆。寧可開除軍籍，也不當別人的工具……

致以崇高神聖的軍禮！

一個陸軍少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應該說，聰明絕頂的楊家兄弟對於自己在軍內的地位，是有明智判斷的，這一方面反映在他們緊緊地抓住鄧小平，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成不變的保權策略，另一方面，表現在此次戒嚴行動中對軍隊的不信任。有評論認爲，這次調兵之所以要打亂建制，動用如此多的軍力，完全不是爲了對付乳臭未乾的學生、手無寸鐵的市民，更不是一事無成的秀才知識分子，而是爲了軍隊內部的制衡，爲了便於權威尚差的楊家將的控制，同時，透過此事來考驗軍隊對他們的忠誠。這一套方略，比起此次民運中的第一個玩火者——北京市委的小魔小術，比起第二個玩火者——趙紫陽的優柔寡斷，當然堪稱是有大開大闔，吐霧吞雲氣魄的傑作。但是，不論其伎倆多麼高超，玩人頭者畢竟有玩火者的下場。正可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人們對廣場的物質支援，構成了學生堅守廣場的物質支撐。這些物質支援，除北京市政府出於政治需要的支付和各界羣衆自發的捐款捐物外，大宗款項主要來自幾個單位，其一是陳一諮控制的體改所，其二是全國總工會（由紅十字會掌握使用），其三是殘疾人聯合會，其四是四通公司，其五是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此外，還有各種小宗款項和應有盡有的物資支援。五月十八日新華社記者報導上述公開捐款的同時，還報導了東風電視機廠兩萬元，北京紡織廠一萬元的捐款；以及送飲料、蜂王漿、被褥、毛毯、茶葉、餡餅、糕點，全聚德烤鴨店的一輛車上寫著「送鴨湯」三個大字等情節。他們出資的時間、方式、緣由雖各不相同，但有政治訴求的團體大部分是爲了一個目標，即保持對廣場學生的影響力。而學生領袖，多半也是以此來判斷對方的誠意的。

海外的援助也是廣場（尤其是後期）物質支撐的重要組成部分。五月十九日台灣《聯合報》報導，蔣緯國解囊台幣十萬元，透過民間團體給廣場學生購買營養品；五月二十八日，香港聲援團帶來捐款六十五萬美元、港幣二百萬元、五十頂帳篷，還有五貨櫃包括藥品、食品在內的物資^①。六月一日，台灣李登輝總統也表示，除聲援外，對於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其它方面也支援」^②。

但是，任何外在的支撐條件都不如內在的理性對事情具有決定的作用。那麼，此時廣場學生是如何看待「堅守廣場」這個問題的呢？

顯然，原來大家認爲，絕食這張最有力的牌打出以後，政府除了讓步，轉彎，就再沒有退路了。和平請願，取得勝利的希望，僅僅在於大家「再堅持一下的最後努力之中」（毛澤東語）。但是，人們心目中自己的政府，居然打出了戒嚴牌：以數十萬正規軍對手無寸鐵的飢餓學生，雖然政府將爲此失去道義上的支持和承擔更嚴重的歷史後果，但與它的對抗已經沒有取勝的可能。況且，

絕食提出的三項要求，已因下述事實的出現，而使「堅守」漸漸喪失意義，或顯得理由不那麼充分：趙紫陽五月十七日書面講話已明確，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賬」；李鵬在五月十八日與絕食代表的談判中也聲明：「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到，提的很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該次對話也進行了現場直播。甚至在《世界經濟導報》問題上，有關人士也透出鬆動的口風，說那只是「臨時的決定」——這些事實表明，政府面對輿論壓力，確實也做出了希望和平衡解決的姿態。在進行這些退讓的時候，雖然不那麼明快，不那麼情願，不那麼徹底，發言人甚至要用惡狠狠的口氣來挽回他們失去的顏面。但它的確是按照學生的要求進行了答覆。這也給學生的繼續堅持，帶來了一些輿論的壓力。

鑑於五月十八日北高聯和絕食團、對話團成員與李鵬見面成爲現實，要求電視實況轉播的條件似也部分滿足，有關人士又傳來軍管的消息，五月十九日凌晨，學生領袖們開會決定停止絕食。但晚十時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播出以後，廣場羣情激憤，北高聯在此影響下，又決定舉行廣場二十萬人的集體絕食，並宣布不願參加者可以離去。當時就有五十人撤出了廣場。後經各方做工作，仍然維持了靜坐的決定。但是，戒嚴的消息傳出以後，在「撤與不撤」問題上，廣場的學生實際上立即就分裂成兩派。一派以一貫帶有溫和色彩的吾爾開希爲代表，一派以態度始終激進的王丹爲代表。爲這個問題，兩種觀點展開了拉鋸戰：

首先，是吾爾開希以個人名義號召撤退。據他本人後來的回憶說，事情是這樣的：「……我曾得到的消息是，軍隊將會殘酷鎮壓廣場學生，我是在五月十九日得到這個消息的……當時時間很緊

急，没法召開全體會議。但也是在當時有幾名常委在場的情況下，討論了一下，決定由我個人來呼籲大家撤離天安門廣場。」

但是，他的這一行爲的後果，是他立刻被罷免了北高聯主席的職務。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北高聯召集五十多所高校自治會的負責人開會，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問題。會上，對撤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問題爭論十分激烈。對此問題投票表決時，三十二票贊成撤離，十四票反對，二票棄權。於是，會上提出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口號，其內容是：「擁護黨內改革派，打倒黨內保守派」；決定撤離的方式是：「遊行、宣傳，回校後繼續罷課。」

但是，這一集體決定也未付諸實施。據《平暴紀事》稱，這與「幕後人物」的干預有密切關係，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干預」呢？北高聯宣傳部的負責人在事後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知識界開會，一致決定堅決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堅決同李鵬偽政府鬥爭到底^②。

此期「知識界」有案可查的會議有兩個，一個是當日（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陳子明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會議（詳見本章第四節）；一個是五月二十二日嚴家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碰頭會議。據參加者回憶，這一天，除李澤厚外，社科院幾乎所有精英都參加了會議。主題是討論廣場學生「撤與不撤」的問題。蘇紹智、嚴家其、高瑜等均主張撤，但以鄭義爲代表的「晉軍」均強烈反對。會議結束時，竟成壓倒呼聲。嚴家其宣布，會議只是一個設想情況，表明觀點的碰頭會，所以不作任何決定。這與北高聯宣傳部長的說法有出入。

在以後的幾天裡，天安門廣場開始了一場「撤」與「不撤」的大討論：

五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吾爾開希再次發表講話。他說，爭民主，爭自由不能以學生的鮮血爲

代價。要是學生真的流血了，這場鬥爭很難說是成功的。為避免發生流血事件，希望學生和工人隊伍暫時撤離廣場。但是，僅僅過了十分鐘，北高聯王丹便宣布，吾爾開希的意見不代表市高聯，也不代表廣場指揮部。他說，他個人的意見是，這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意味著對政府高壓政策的屈服和學運的失敗。並說，是否撤離，要待指揮部集體討論過後才能作出決定。在集體討論中，吾爾開希提出將隊伍撤到使館區，爭取外國人的支持的意見也被否定。到凌晨四時多，廣播裡傳出指揮部已與部隊達成協議：只要同學們維持廣場秩序，部隊將不開進天安門廣場。一位自稱指揮官的人也透過廣播證實了這一消息。

為了體現傳播媒介的價值中立，「學運之聲」往往交替廣播著兩派的不同聲音。一份以「全體北京高校暨全國各地參加這次民主愛國運動的學生」名義散發的《緊急呼籲》說：「經過三十天堅苦卓絕的努力，我們已取得初步勝利——自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起，現在天安門廣場的所有大學生大規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離天安門廣場，返回校園，重新整頓，重新準備，把這場科學、民主鬥爭繼續再深入持久廣泛地進行下去。」並呼籲政府和人民協助這一返校行動。而另一份落款是「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宣傳部」的傳單，則呼籲堅持。它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退讓，天安門廣場的人數減少，阻截軍隊的力量減少，他們就可以不惜流血，採用暴力鎮壓。北京乃至其它大城市的人民就會在軍管的專制恐怖中生活，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會停滯不前。

一份署名「中華民主同盟會」（亦稱五月同盟）「廣場智囊團」的傳單說：

目前，撤出廣場的思潮甚囂塵上。這是一種最爲糊塗的思潮和招數。但我們相信，持這種觀點的人大多數是出於糊塗，而非出於什麼惡意，所以我們才在這裡申明大義，力排胡言，極言不撤……廣場若干陣營早已成爲此次運動的標誌，如不攻自破，不論設置何種理論、理由，都將是對中國民主運動和精神的一個沉重打擊。參加者必將遭到歷史的嘲笑。其實，撤出論者，尤其是領導者，主要是因爲物資消耗問題被搞得頭腦不清。堅守廣場，每日要耗費五萬元用於飲食等。但這並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廣場各校，應立即向支持廣場的費用自負過渡。絕不能吃大戶，絕不能讓經濟問題把廣場聖地和偉大的民主運動拖垮。各校都有革命民主的不辭職責，應該主要自己籌款。

爲了實現撤出廣場這一目的，主「撤」的學生領袖和學運的社會支持團體，提出了以退爲進，走向全國、走向全民的方針。這既可以迴避所謂「失敗」問題，滿足參加者的榮譽心，又能達到撤退目的。一位北大學生的大字報說：

……雖然人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但這只是外部動力。人民支持我們的愛國行動是關心我們的身體。因爲未來必定要依靠我們。這也要求我們自重……同學們，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但鬥爭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要捍衛天安門廣場這面大旗，並不一定要孤

立地在天安門廣場上；要高舉這面大旗，就應該讓它深入民心，真正成爲實現民主的熊熊火炬。鑑於現在的情形，中央高層角逐已成定局，高層內部已達成妥協，一致對付學運，我們的要求不可能爲當局接受，因此，我們呼籲有步驟撤離廣場，保存實力……儘快結束目前這種消極的對峙，把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從天安門廣場傳播出去。

這場「撤」與「不撤」的大討論，導致了學運領袖和學運事實上的分裂：五月二十三日凌晨三時，市高聯召開了各校代表大會，通過五點決定：1. 選舉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成員，代理高聯行使兩天權力。北高聯總部撤回北大，運籌全市鬥爭，行使絕對權力；2. 一致通過堅決不撤離廣場的決定；3. 臨時指揮部在四十八小時內行使有效權力，除正常工作外，還要重新籌備長期的、穩固的廣場學運指揮部。4. 臨時指揮部行使權力期間，廣場上其他任何組織機構均告無效。5. 公告發布後即生效。

就在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市爆發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的隊伍中，素有「學運龍頭」之稱的北京大學，僅有幾百人參加。一位女大學生接受記者採訪時解釋說：「可能是因爲連續幾個晚上攔軍車，過於疲勞吧。不過也有些人已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爲事已至此，應該適可而止了。」^②

自二十二日以後，靜坐學生大爲減少。二十二日北京航空航大大學的隊伍全部撤離廣場，廣場有九十九所高校的旗幟，其中外地六十四所，北京三十五所，計萬餘人。每面旗幟下實有人數平均逾百。據王丹稱，流動人數已超過固定人數，是爲「旗多人少」時期的開始。到二十四日，北京的校旗也開始減少，由前兩天的三十五面，減爲二十八面，而外地的旗幟則由六十四面增爲八十九

面，是為「旅遊革命家佔領時期」的到來。

第四節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統一指揮系統

那麼，後期廣場的支撐主要來自哪些因素？誰是決定廣場學生命運，實際上也掌握著鄧小平一生清名及共產黨形象的關鍵人物呢？從各種資料分析，可以看出，與十天以前運動主動權在絕食團領袖手中不同，此時，它已轉移到一個名曰「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協調組織手中。這個組織正式成立於五月二十三日。但在前一天的凌晨，廣場的廣播站已透出了某種信息，消息稱市高聯已完成其歷史使命，下一步將成立一個爭取民主的聯合指揮部，吸收工人農民參加。從廣播的內容看，當時這個組織的結構已經確定。但目標、功能還未下傳到學生領袖，名稱待定。

至於這個「聯席會議」的醞釀過程，參加過其五月三十一日前各次會議的包遵信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印象：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又稱「首都各界協商會議」，即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取締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

聯席會議的一些主要參與者，五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曾在薊門飯店開過兩次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和後來的聯席會議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聯席會議的前奏。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點左右，王軍濤給我打來電話，說目前運動出現很多問題，大家需

要在一起交換一下意見。他準備請一些人開個會……五月十八日，這個會議在城西北元大都遺址附近的薊門飯店舉行。會議由王軍濤主持。參加者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兼職人員：鄭棣（《經濟學周報》副主編）、楊百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劉剛（北高聯成員）、劉蘇理（中國政法大學教師）、陳小平（政法大教師）、劉衛華（華中師大教師）。此外，還有《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主任張偉國、北大教師後援團負責人張炳九、山西作家柯雲路等。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勢；王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

在這個會上，包遵信說，做這項工作單靠他們這些人不行，建議動員一些社會賢達，像周谷城、費孝通這些老前輩們。他們說話，比較有分量。

由於要趕赴復興門參加鄧正來、周舵、陳兆鏞發起的知識分子絕食活動，包遵信離會，但王軍濤表示，一定要他趕回來，請他「擔任這個會的召集人」。因為在復興門聽到了軍隊可能要進城的消息，包遵信已無心回去參加會議。但第二天一早，陳子明、王軍濤就親自到了他家，用車將他接到薊門飯店。

十九日的會增加了醞釀知識分子絕食活動的鄧正來（某民辦研究所負責人）、周舵、陳明遠、陳兆鏞（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社經科所兼職人員）。在學生絕食開始率先到廣場聲援的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提出動議，呼籲廣場學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議遭到「冷落」。這天會議的成果，一是決定整頓廣場秩序，二是通過了一份警告「軍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書》。

由此可見，這個聯席會議的醞釀，是在「倒鄧狂瀾」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用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另一名負責人××的話來說，陳子明原來設計了一個「三線計畫」，自己不公開出面^{②⑤}，「到五一七時，他感到再不跳出來可能什麼都撈不著了。」記住這一點，對人們理解這個「聯席會議」爲什麼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有意義的。因爲，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的問題，失去了這張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牌，「三線計畫」就可能成爲泡影。從包遵信的敘述還可以看出，這個會議急需一個有社會影響，可以作爲公開的召集人的人物。發起者原本寄望於包遵信。而這一點，從五一七「倒鄧」問題提出前夜，陳子明那個神祕的來訪已露端倪。

包遵信的回憶沒有記述二十至二十一日兩天的會議情況。大約因爲戒嚴令發出，情況有了突變，「三所一會」和四通公司這兩個有分量的社會團體公開跳到前台，所以原來的設想要進行調整。但五月二十一日，陳子明電告張偉國，說政府已請他出面調停，讓學生退走，條件是撤軍。這一電話內容的真實性顯然有待商榷，因爲政府究竟根據什麼，認爲陳子明有駕馭學生的能力？「政府」在趙紫陽已經「請病假」，鴿派已明顯受挫的情況下，還有什麼人在民間尋找協調力量呢？這還是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說，「太子黨」還希望能糾正父輩的錯誤，正做著最後的努力的話，那麼，鄭義的回憶說明——戒嚴前夕，他數次到朋友家，請人透過鄧樸方做鄧小平的工作，但鄧樸方根本就找不到了^{②⑥}——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對於陳給張的這個信息的另一種比較合乎邏輯的解釋是，由於戒嚴令的發布，陳有意以金蟬脫殼之計替自己的活動尋找解釋，而他知道，《導報》的電話是被安全部監聽的。不過，這樣的努力當然也是杯水車薪。因爲，官方的記錄留下的完全是來自另一方面的佐證：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等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六個分指揮部的會議，參加者有體改委、社會科學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單位的人。會議要求組織專門輿論班子，準備辦報紙，搞《李鵬其人》材料。要求指揮中心一天換一個地方，最好能到部隊高級幹部的宅院。要求一些指揮人員轉入地下，並確定密碼等特殊聯絡辦法^②。這一天，廣場的廣播裡傳出「成立十五人組成的廣場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消息。

五月二十二日晚，王軍濤、陳子明把包遵信接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二層東北角。參加者有三十多人。包遵信回憶說：

究竟爲什麼要開這個會，王軍濤事先沒對我講過，所以一直到開會時，我還是懵懵懂懂的，當主持人和王軍濤讓我講話，真不知從何說起。後來軍濤說，你就講講白天會議的情況。我只好如此，將白天嚴家其召集一百來人開會的內容簡單介紹了一下。

開完會後……我問軍濤，才知道今晚的會，是籌備召開各界聯席會議的。

五月二十三日，北高聯撤出廣場，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會議室成立。據包遵信回憶，到會的大約有五十來人，除前述薊門飯店會議的參加者外，還有陳子明《北京之春》時代的朋友，全國總工會工運學院的呂嘉民，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人員。《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主編甘陽、作家鄭義、學生代表王丹、柴玲等。王軍濤主持了當天的會議。會議指定了王丹爲召集人。爲會議定名爲「首都各界愛國維憲協商聯席會議」。

根據鄭義回顧，「聯席會議」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成立「以絕食團指揮部領導成員為核心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²⁸。

由同一天成立的「北知聯」主辦的《新聞快訊》第三期報導了這一消息：

統一指揮 堅持鬥爭

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

本報訊：爲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爲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保衛天安門指揮部」設總指揮一人，副總指揮四人，常委委員七人……總指揮部同時規定了愛國民主運動的政治紀律若干，以確保運動能夠按照人民的意願順利進行，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峯（祕書長）、李錄（外聯部長）、王剛（後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其中連勝德、李錄爲外地高校聯合會代表，楊朝輝（北師大職工子弟、北太平莊玻璃店職工）爲工人代表²⁹。

從廣場指揮部組成人員的名單可以看出，學運領袖兩名最主要人物王丹、吾爾開希退出了一線指揮。但也就是從此，在廣場學生中始終扮演「中堅」角色的王丹，開始進入更高層次的活動——

成爲最高指揮中心「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召集人，實際行使主持會議的職責^③。

四月二十四日，柴玲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誓師大會上舉行「就職宣誓」，誓詞是：

我宣誓，爲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爲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爲了保衛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爲了十一億同胞不在軍管統治下流血犧牲，爲了中華民族不淪爲法西斯的專制統治，爲了千千萬萬的兒童享受自由民主的和平生活，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排除萬難鬥爭到底。

王丹則代表「聯席會議」作了題爲《光明與黑暗的決戰——關於時局的聲明》。

從第三期《新聞快訊》上，人們還可以讀到這個聯席會議《致北京市民的公開信》。信中在揭露北京市政府製造混亂的一系列陰謀後，提出了「全市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抵制戒嚴令，堅決推翻李鵬政府」的口號。

據甘陽向包遵信複述二十三日下午決定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經過時稱，指揮部與聯席會議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但包遵信認爲，「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決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

這個「聯席會議」在五月三十一日前共開會八次。與民運氣勢漸趨低落相應，二十七日以前人比較多，每次都有五十至六十人。二十八日以後，社科院的場所已不可能借用，會議地點轉到西郊，每次就只剩二十來人了。其中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已決定廣場學生於月底撤回學校，並在廣

場進行了宣布。但由於總指揮柴玲一人聞「撤」則哭泣，並在以後召開的「戰地聯席會議」中以多數票通過了「採取最激烈行動」和「主動出擊」的方案，上級「聯席會議」又將撤退計畫改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召開之日實行。據稱，柴玲反對撤離的藉口，是「知識分子將藉此左右廣場運動」。她是宣過誓的，就像美國電影中那個機器人「霹靂五號」的傳奇故事一樣，權威一經培養成熟，就會獨立於她的創造者，擁有自己的情感。意志，便不再受人支配了。

顯然，柴玲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算真正撤離廣場。因為，爲了給繼續堅守的行動尋找根據，聯席會議這一天由甘陽起草了一份《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對本次民運和學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及對時局的態度進行了重申。由於它可以被視作這次運動最後一個有代表性的，並在客觀上帶有總結意義的文告，所以實錄於此：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

偉大的「四月學潮」迄今爲止已持續了四十餘天，並已經發展成爲聲勢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運動」。由於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爲，致使目前中國政治局勢已出現極其嚴重而又複雜的狀態，爲重申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特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如下：

一、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羣衆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之超出「四五」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倚、根本不依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爲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

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運動。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運動的目標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團都必須順應這場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萬民痛恨的「官倒」現象。顯而易見，這些充分體現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正因爲如此，這次運動才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至全世界人民羣衆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響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展成爲如此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

三、由此，對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爲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肯定和順應這場運動，就是肯定和順應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否定和反對這場民主運動，就是否定和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一切政治黨派和領導人都將在這場運動面前經受嚴峻的考驗，並將由此得到人民羣衆的公正評判。

四、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於：他們從一開始就無視人民羣衆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錯誤的態度，從「四二六社論」到頑固拒絕平等對話，使人民羣衆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可能領導中國走現代化之路的。而五月二十日李鵬簽發的極端非理性的戒嚴令，更是破壞民主與法制的法

西斯恐嚇手段，它使全體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鵬等人在台上，所有參加過聲援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黨員、幹部、知識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嚴重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在發布戒嚴令以後，各界人民羣衆才一致提出罷免李鵬、何東昌等人的完全正當而合法的要求。

五、作爲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的政府的腐敗以及官倒等現象，無疑負有重要責任，但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一度創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應，也使人民羣衆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希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六、由此可見，人民羣衆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認爲這場偉大學運和民運在一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爲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這次學運的水平及人民羣衆的民主和法制覺悟，同時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人民羣衆的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羣衆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一些政治領導人，恰恰仍然在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問題，根本缺乏開創「新思維」的政治素質。他們總是習慣於把人民羣衆的民主運動看成僅僅是

黨內鬥爭的反映和工具，總是想當然地認定這場民運幕後一定有黨內高層人士做後台，因此極端錯誤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黨內鬥爭，也就解決了問題；只要找出了所謂「後台」，這場運動也就自然而然的煙消雲散了。這種看法未免太落後於時代，也太低估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質。我們在此嚴正指出：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費心機的。黨內鬥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這場偉大民運的結束。說到底，不是黨內鬥爭決定這場運動，而是民主運動必將最終決定黨內鬥爭的最後結果。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次學運和民運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堅決支持，因此，不管黨內誰上台，只有首先站在這場運動的一邊，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信任。如果站在這場運動的對立面，那必將在黨內失去合法性基礎，其最後以不光彩下台只是時間問題了。

八、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近期的具體目標如下：第一，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二〇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免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環境。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長期的艱苦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内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召

開。

九、這次學運和民主運動的偉大之處還在於，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高度理性、冷靜、克制、秩序的和平請願運動。我們正告某些政治領導人，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企圖以武裝力量軍事解決問題更只能玩火自焚，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在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著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十、偉大的「四二七」和平請願大遊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四二七」遊行一週月之際，我們特發表以上聲明，以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並向全國人民倡議：將四月二十七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在這篇文告上落款的組織名稱有九個，堪稱八九民運之「最」，除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外，還有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外省赴京高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

但是，自二十六日以後，全總的四人不再出現在會議上；自稱是「經受過較長時期的考驗和選擇，其權威性即對學生羣體的影響力比這批一個月間倉卒形成的核心要大得多」的「文革中的學生領袖」鄭義，也因不能發揮作用，於二十六日離京回家；二十八日以後，柴玲也不再到會，後來作為知識分子絕食主角的周舵與劉曉波，是二十七日以後才正式參加的。這預示著，知識精英公開取

代學生在廣場中心地位的時期開始到來。

但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陳子明此時也放棄了對廣場的興趣。這個從四月底以來就設計出「三線計畫」的人，幾乎是在前三個「玩火者」的鬚髮已散發出糊焦味的關頭，興匆匆地趕往「火場」的。此前，他的理論與措施如影隨形一般透過渾然不覺但卻在衝鋒陷陣的學生、大聲疾呼的學者投射出來，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麼，自己會幹什麼（包括陳子明《北京之春》的另一戰友嚴家其）時，他像上帝一樣無所不在地俯視著北京城的每一個角落，觀察著每一羣人，並考慮著棋盤上的棋子。而當他的戰友——處在「二線」的王軍濤鄭重宣布，自己將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③②}時，處在「三線」的他，卻考慮如何與李鵬政府「握手言歡」的問題去了^{③③}。

與嚴家其等人「絕不向末代皇帝稱臣」的剛烈舉措不同，的確早就對趙紫陽改革思路抱批判態度的他，在趙失敗時自然不會萌生「同進同退」的忠義之情，相反，此時，過去一直壟斷著「進言」管道，也最靠近最高權力的三所一會的「集體自殺」，在客觀上為這個十多年來臥薪嘗膽的青年，騰出了一個廣闊的空間。這個機會曾經在趙紫陽改任總書記，體改所不為李鵬政府所用的關頭出現過，但由於「血親」的原因，李鵬更願意使用高幹子弟的羣體，機會轉瞬即逝。而這一回，處理民運問題「太子黨」顯然不是他的對手。他的機會可以說是「千載難逢」。

但機會總是與危險同在的！

註釋

①《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

②③見該條第二十款、第十六款。

④見《流血的改革》。

⑤同①。

⑥此處列舉戒嚴令通過過程，是參考《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和《流血的改革》等資料整理而成。因它們的敘述各有側重，本書根據談話的邏輯關係對其進行了部分調整。

⑦見《人民日報》五月十九日頭版。

⑧見《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

⑨同⑧。

⑩一則用以形容「幫倒忙的朋友」的寓言故事說：有一個隱士與熊瞎子交了朋友，一次，他們在森林裡遊玩，隱士睡着了。有一隻蒼蠅停在了他的鼻樑上，熊瞎子爲了幫朋友趕走蒼蠅，搬起一塊大石頭砸在隱士的臉上，隱士因此死去。

⑪即「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⑫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第五章第二節。

⑬一說是「楊家將」不願單獨承擔此舉的後果，有意讓儘量多的部隊捲入事件的措施。

⑭打「V」形手勢，以示勝利。這是八九民運中在互不相識的參加者和同情者之間互相溝通，以為勉勵的一個最流行的手勢。

⑮見《向首都重要警衛目標開進》，載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戒嚴一日》上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版。

⑯⑰⑱⑲見《平暴紀事》第九十九、一〇一、一〇五、一一四、一〇五頁。

⑳據《平暴紀事》稱，五月十七日的倒鄧狂瀾中便出現了一支有二百多輛摩托車組成的車隊，到鄧小平府上高喊「小平出來」；而《顛狂的蛇年之夏》稱它於五月十八日零時正式糾集而成；《京都血火》稱其成份中「無業人員和個體戶佔七六%」，因流氓、詐騙、盜竊等被判刑、勞教、拘留處理過的人員「佔三四·三%」，見該書一三三頁。

㉑參見《明報》一九八九年七月號載文《黨指揮槍？槍指揮黨？——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

㉒「菜籃子工程」因政府為解決市民副食與蔬菜供應問題的措施而得名。後擴展為國家對於消費的物質生產和供應的干預。「鴿子窩」指居民住房的狹小如同鴿子窩。

㉓據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

㉔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㉕見《顛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七八頁。

㉖早在四月底，陳子明就提出了他的「三線」計劃，即在這次胡耀邦逝世過程中自發產生的學生運動構成第一線，透過與社經所有聯繫的大學青年教師對之產生影響。二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功能是指導與保護學生，也可以制約學生，由與知識界朋友較多的王軍濤和閔琦聯絡，二人均為該所元老，也是七〇年代末期西單

「民主牆」時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憶證明，他們聯絡知識界的管道之一，就是緊緊抓住包遵信。三線，由陳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

②⑥ 見《歷史的一部分》，第七十二頁。

②⑦ ②⑧ 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一五三、九十四頁。

③⑩ 見《未完成的涅槃》。

③① 據包遵信回憶，王曾在醞釀「聯席會議」的薊門飯店會議，和成立會上均事先告知與會者，自己將對此負全責。

③② 對此事，參加的知識分子多有保留看法。當時，被招前往的人當中有人當場拂袖而去。但考慮到維護民主陣營的聲譽，多不願提及此事。

第八章 六月腥風

相傳回教主鄂瑪下令焚毀亞歷山大圖書館時說：
「如果這種書籍與《可蘭經》相合，則就無需這種書籍；
如果與《可蘭經》不合，則這種書籍根本即應消滅。」

異化現象無處不在。在資本主義社會，它表現為被人創造的經濟秩序與技術手段對人的支配；在東方帝國，它表現為被人創造的政治制度對人的制約；在一場革命中，它表現為手段對目的的修正。半個月以前，無論是進軍、靜坐，還是絕食於天安門廣場，那只代表著一種行動，可現在，堅守天安門廣場卻似乎成了目的。

廣場乃是學運中樞，學運乃是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依照這種三〇年代革命理論的邏輯，天安門廣場成了又一個瑞金，又一個延安。

但是，這必然隨之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對廣場管理水平要求的提高；對於民運的制裁手段也就變得似曾相識，變得古老。

第一節 主角的替換——從「旅遊革命家」的佔領到四君子絕食

如果說，八九民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水平最高的一次民主運動的話，那麼，其組織管理方面的創造應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如果說在「四二二」請願產生出來的糾察隊標誌著運動第一階段的管理水平的話，那麼，天安門廣場絕食營地的「生命線」則表志著運動第二階段的管理水平。

所謂「生命線」，是學生絕食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建立起來的一條絕食學生的救護車通道。它的中心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的旗桿前，在擁擠嘈雜的廣場上，這兒闢出了一塊空場，場內停放著隨時準備發動的救護車數輛，周圍是整裝待發的，由白衣戰士和擔架組成的救護隊。「生命線」由這塊空場向東向北伸出，然後呈輻射狀散開，如同人體的神經系統一樣，末梢連接著北京市急救中心

和北京同仁、天壇、朝陽、友誼、積水潭、復興、鐵路總醫院等三十二家醫院。自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的十天時間裡，從這兒運出救治的學生達九五一八人次，保證了絕食學生的及時搶救需要，無一人死亡。據稱，這條生命線是北方交通大學師生與紅十字會的傑作，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廣場糾察隊紀律的嚴明和羣衆的自覺維護。

但是，政府的遲遲不表態造成的社會各界的捲入，給被聲援者的廣場管理帶來了新的難題。請看五月十八日新華社記者對廣場情況的報導：「今天遊行的規模在百萬計以上。除教育界、科技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外，工人的比重很大。據現場觀察：輕工、紡織、化工、建築、機電、冶金、儀器儀表、電子、商貿、旅遊，幾乎都有職工參加。工人參加遊行，有以下幾個特點：1.幾乎都乘大小車輛來廣場；2.不像學生有統一的指揮；各單位自成一體，口號五花八門；3.捐錢送物數額較大。」「工人參加遊行，造成廣場秩序更加混亂。車輛過多擁擠在廣場及長安街，直接影響救護車的通行。學生的臨時廣播站多次呼籲，要求大家幫助維持生命線——即救護通道的暢通，多次緊急調動糾察隊開赴現場疏通。但學生糾察隊的負責人對記者說，經過幾天的辛勞，糾察隊員的氣力都快用盡了。」

不僅如此，爲了防止聲援人羣發生衝擊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事件，給政府造成鎮壓口實，維持這些地方遊行秩序的沉重責任，也落到了這些糾察隊的身上。

如果說，五月十八日廣場出現的問題還帶有某種喜劇色彩的話，那麼，一周以後由於外地學生的大量湧入，它面臨的境況，則帶有悲劇色彩了。五月二十三日發生的湖南、瀏陽三名進京人員用顏料污損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畫像事件，僅僅是給民運敲響的第一聲警鐘。

在八九民運中，全國學運對北京的聲援，以及外地學生的進京運動，無疑是這個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種「北伐」運動的起源，最早開始於悼念胡耀邦階段天津學生的進京活動。四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南開大學五十餘人組成的赴京請願團正式踏進天安門廣場。第二天，這支隊伍就擴充到一百多人。四月二十二日，他們參加了北京高校學生人民大會堂前的第一個聯合行動。在「四二七大遊行」以後，當北京學生出現告一段落的情緒時，外地剛剛興起的學潮，成爲了首都學運堅持下去的外在動力。五月三日，兩名山東大學學生《致北大同學的信》中說：「我們是爲北京的老同學爭取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召而來的……我們代表一些同學，對你們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並且說，「從四月十五日到今天，學潮已進行了十七天，進展到這種程度，只有前進，不能後退。如果後退……不但會遭到政府的恥笑，也會讓人民失望。」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紀念「五四」的遊行隊伍中，出現了天津、武漢、瀋陽、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連、湘潭、溫州、南京、煙台、香港等地二十三所高校的學生。五月十三日，天安門廣場第一批絕食者的行列裡，也有來自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七名學生。

從「倒鄧狂瀾」開始後，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都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自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遊行人數上萬的城市有蘭州、鄭州、昆明、哈爾濱、南京、合肥、上海、武漢、長沙、太原、濟南、石家莊、成都、重慶、廣州、長春、福州、南昌、貴陽、寧夏、杭州、海南、烏魯木齊、桂林、瀋陽；仍處在戒嚴狀態的西藏拉薩，也有三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西安僅五月十七日，南京、上海、太原、長沙僅十八日就有十萬人以上參加了遊行；太原、吉林大學各二百多名學

生，上海、蘭州、長春高校各一百多名學生，西安一千五百名學生和鄭州、濟南等城市的學生進行了絕食；昆明大專院校和部分中專罷課；武漢長江大橋上出現了一萬餘人的靜坐。十九日福州學生因衝擊火車站，導致停運六小時。哈爾濱也出現學生坐軌阻止列車運行事件。

與此同時，有大批外地學生進京。五月十七日，天津、河北、山西、陝西、吉林、遼寧、河南二萬多學生進京；五月十八日，有河北、河南、山西、天津、吉林等地四十多個學校和單位的二萬餘人分乘四十一趟列車（其中哈爾濱一千五百人強行乘車）進京；五月十九日，有三十多個院校的二萬多人分乘二十三趟列車進京。

這種進京的趨勢，不僅沒有因為戒嚴令的頒布而減弱，相反，在五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有一個短暫的停頓後，使進出京流轉速度大大加快：五月二十二日起，各地又開始發生學生強行登車，造成多列火車停運事件。二十三日，有二萬三千名外地學生分乘四趟列車進京，四千五百六十人離京；五月二十四日，一萬四千人進京，八千二百九十人離京；五月二十五日，一萬四千人進京，一萬一千四百人離京。自五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十三天內有二十萬（人次）學生進京^①。

外地學運的高漲和學生進京，使運動出現了持久化傾向。但也給運動的控制帶來新的不可測因素。首先是紅十字會發出了「天安門廣場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流行病的可能」的警告。其次是外地學生的生計問題。由於他們倉促來京，不帶錢糧，沒有住處，對廣場靠捐獻建立起來的供給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後期廣場領導系統的矛盾，學運與社會的矛盾，主要來自這個因素。而進京「支援革命」者的狀況也十分悲慘。他們中的人有兩種情況，同時帶來兩類問題：

一類是在北京各高等學校有同學、熟人、同鄉關係的，能夠住進高校的學生宿舍。這時，一個

同學往往會領來兩、三個、三、四個同學或熟人的熟人，往原本很擁擠的宿舍裡硬塞。許多大學的宿舍裡一時間人滿為患：不是走廊過道裡躺滿了人，就是供水不足，洗澡票價提高。有一個學校食堂，一頓供應的饅頭、米粥被三千外地學生「一取而光」^②。使原來的在校學生要嘛從圖書館回到宿舍便沒有了住處；要嘛到食堂吃飯已沒有了飯菜，引起本校學生與進京「革命者」的尖銳衝突。

另一類人在北京舉目無親，又不可能住旅店。於是，天安門廣場的地下過道便成了他們的理想的棲息之地。遇上颯風下雨，裡面能裝上幾千人。一位河南學生當時在《北京日報》撰文《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對此描述說：

……因為聽說捐款很多，吃穿都不用愁。但到這裡後，就感到有些傻眼了。我們吃的都靠市民自願送來，但平心而說，現在又有多少市民富裕到那種程度呢。於是，我們的眼晴幾乎每時每刻不在為尋找吃的而忙碌。每當出現提著稀飯、饅頭的市民，我們老遠就眼巴巴地盯上。說實在話，那情形簡直連叫化子也不如。

為了解決吃的問題，一個比較主動的辦法還是募捐……不但包括捐款，也包括捐衣、捐物、鹹菜、饅頭、麵包等一概來者不拒。據統計，天安門廣場的外地大學生來自全國四百多所大學，中專則無法統計。二十四日，紀念碑東側的食品發放點圍滿了排隊領食品飲料的外地大中專學生。一位負責的學生告訴記者，領吃的人太多，而食品太少。送食品的車還未到這兒就被截住，東西一下就分光了。二十六日，開著機動車來送飲食的單位已十分稀少。下午三時，烈日當頭，一輛平板車上

放著兩桶綠豆湯駛入廣場南側，還未停穩，一個桶就被圍上的人擠翻^③。

學生的油印刊物《新聞導報》第七期上，一篇由該刊記者採寫的報導說，外地的大學生沒有擋日避寒的帳篷，甚至連棉被、大衣也沒有。僅有的幾件棉襖和單衣鋪在冰涼的石板上，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寒氣透骨的夜晚。他採訪的一位山東工業大學的女生說，由於晝夜溫差大，她們出來時只穿了兩件單衣，因為寒冷，夜晚只能睡兩到三小時。這篇題為《廣場——時代的難民營》的文章說：「絕食結束後的第六天，廣場已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時代的難民營。」「儘管靜坐在廣場上的絕大多數是被稱為時代驕子的大學生，可從他們身上已無法領略到時代驕子的風采。疲倦抹去了姑娘臉上的紅暈，灰塵遮住了小夥子額上的剛毅，一面面紅旗與一堆堆垃圾相應；招展的橫幅下一桶桶泔水發出令人空息的腥臭。」

儘管這些外地來的大中專學生中，許多人一下火車就認真地參加了遊行和堵截軍車的活動，但不少人是抱著親身經歷一下「千載難逢」的「歷史大轉變」的浪漫熱情來的，在他們盼望的東西沒有出現的時候，他們便去滿足起瞻仰祖國名勝古蹟的願望來了。白天，校旗插在廣場上算是一席領地，免票進出北京大小公園。晚上回到旗下，算是歇息的歸宿。到五月底，儘管廣場上旗幟林立，但北京高校的學生大致已撤退，天安門廣場於是出現所謂「旅遊革命家」佔領時期。

據包遵信回憶，他曾代表「聯席會議」協調過外高聯與北高聯的關係：

五月二十八日，在文化書院開會……說到了外高聯與北高聯的團結問題以及廣場秩序、衛生都極差，市民已經嘔有煩言，……決定當晚在北大開一次北高聯與外高聯的聯席

會議……我們在（北大）二十九樓等了將近一個小時，也不見外高聯的人來……只好決定撤。當我們快走到三十二樓時，見外高聯一幫人閒閒悠悠地走了過來。我們只好又回到二十九樓。等他們都聚齊了，就通知我們到第二教室樓去……沒料到了二教卻吃了閉門羹，又通知我們到文史樓去。……同樣進不去。沒辦法，最後只好在與文史樓幾步之隔的化學樓後面的草地上開會。奇怪的是，北高聯的一個也沒有來。由於北京學生接受「達七位數字以上的海內外捐款」的消息不脛而走，而他們又不斷地以「指揮系統」的名義號召外地學生經費自理，加之外地學生的境遇每況愈下，最後，終於釀成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及其丈夫封從德被原副總指揮連勝德、原絕食團常委王文等「綁架」事件④。

關於民運領導層內的權力之爭和廉潔問題，當然不應歸咎於外地進京潮流，即使在沒有這些因素的情況下，時日漸長，自然會暴露出來。但是，外地進京潮流無疑充當了各種矛盾的催化劑。它把「社會是否能承擔一次大的動盪？」、「人民是否有義務支付看不到成果的民主運動？」、「『革命者』是否有權利要求人民作出無限期的犧牲？」等問題，尖銳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官方公布的以下數字，變得有感染力了：

鐵道部說：增開一列客車，要少開七列貨車。貨運量日均減少一千多車，收入減少九千萬元。張百發副市長說：北京市一千一百萬人口，加一百三十萬流動人口，按最低供應標準，每天需要五百萬斤蔬菜，五十萬斤雞蛋，六十五萬斤鹽，四千噸糧食，四萬噸煤。現有一百七十二條公共

汽車路線基本癱瘓，地鐵停運，造成九十萬人次上下班困難。

——這些，雖然在民運色彩的字典中可以解釋為「四二六社論」的過錯，並追究政府的責任，但是，任何一個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準則的政治家或實習生，都要問一問：自己，能做些什麼？

失控！意想不到的結果！的確是進入五月下旬以來，籠罩在民運參加者和領導人心頭的陰霾。因為，他們現在面臨的根本就不是開始那種學生與政府雙方「對話」的問題，而是一個有著各種不可測量的因素構成的子系統集合而成的巨型系統。對於只會談原則和理想的知識分子來說，它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大怪物」！而且，這個怪物像雪山上向下滾動的雪球，愈滾愈大。如果它不能自生自滅的話，最終不免演變為一種社會毒瘤，既消耗著全社會，又毒害著民運的聲譽和理想。

怎麼辦？市高聯依據毛澤東當年「到工農羣衆中去」的思路，想出了到全國各地「播撒火種」的辦法，實際要達到的則是「大串聯」和「上山下鄉」疏散紅衛兵小將，恢復城市秩序的效用，名之為「空校運動」。

主張堅守廣場的「聯席會議」，則推出了取代學生為廣場主角的「千人接力絕食」方案。關於這次絕食，從已經披露的材料看，有這樣一個過程：

二十六日晚北大學生籌委會廣播播出了一份《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請願書》，其內容為：「我們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正在絕食的學生。發起人：國家各部委領導和工作人員、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報名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第二台階。時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人數：一至五千人、憑證件自願報名。聯繫人：華夏子。截止時間：根據事態發展而定。請願內容：1. 要求撤離所有部隊；2. 為這次愛國

民主運動正名，是救國而不是動亂；3. 將所有不義之財上交國庫；4. 釋放所有政治犯；5. 要求昏庸無能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罷免職務，歡迎辭職；6. 要求保護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7. 要求代表真理的趙紫陽主持工作……。口號：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開除公職；不怕砍頭坐牢；真理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精神永存；民主萬歲。」廣播還宣布，二十九日絕食開始，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二十七日，就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公布了將堅守廣場，直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召開為止的消息以後，又公布了成立「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絕食請願團」的消息。在第二天由留法中國學生聯合會發起的「全球華人大遊行」中，出現了「絕食請願團」的傳單。該傳單除前述《請願書》中的請願內容外，還增加了絕不允許以各種藉口予以打擊和鎮壓民運參加者；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大赦國內言論政治犯；交出「官倒」子弟，人人報賬，歡迎有錯即改，歡迎真誠的領導和領袖；要求迅速清理整頓中央政府的裙帶關係；要求立即改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惡官，選拔人民真正的公僕掌管國事；要盡快修改憲法；反對專權者和機會主義者趁機發動兵變和政變等要求。傳單把《請願書》中的「口號」改為誓言：「爲了真理和正義，爲了民主救國運動的徹底勝利，不怕開除黨籍、公職，不怕開除幹部隊伍、丟掉領導職務，不怕砍頭和坐牢。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不惜爲整個民族利益而獻身！」傳單將原定的二十九日開始絕食，延後到三十日。

二十九日，北大學生的廣播也播送了延後的消息。

五月三十日，預定的絕食日期到了，仍未付諸實施。其中原因，包遵信的回憶或許是一種解

釋：

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點我回到家裡，就見桌上有一張條子，說何維凌^⑤來電，讓我回來不論何時都要給他回個電話……一刻鐘後，他就到了我家……他一見我就說，你能不能跟王軍濤他們說說，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你打算怎麼個撤法？何說，可以確定一個時間學生撤離，撤離之後將廣場打掃乾淨，表示我們歡迎解放軍進城。然後在廣場或者什麼地方開個聯歡會，軍隊領導和學生代表都講幾句話造成一個團結和解的氣氛。

我真佩服何維凌的想像力，竟然要讓一片亂石瓦礫長出一叢又一叢的鮮花。不過，既然他把學生撤離的步驟考慮得這麼具體，肯定不是隨意說的……何維凌說：我到這兒來包括剛剛講的撤退辦法，都跟樸方說了，而且還得到老人家的首肯。這件事楊家也知道，撤退的辦法就是得到他家的默許……

我與何談到三十日凌晨四點多……他從我家一走，我就呼王軍濤，讓他上午派車來接我。

五月三十日上午，在我講完與何維凌談話內容，確定了由王丹等人負責經辦之後，會議就轉入討論絕食問題了……那天會上大家的意見是：此事（絕食）聯席會議不做什麼決定，由劉曉波去組織發動去，聯席會議採取支持態度。

六月二日下午五點左右，王軍濤、甘陽又來我家，說劉曉波絕食引起很大震動……他們還對我說，打算組織第二批、第三批……這樣接力式地把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退

讓，取消戒嚴令。他們動員我參加第二批，甘陽還說他也參加第二批。

從這個回憶提供的情況看，絕食的延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後續無人（因為設計者要求知名度高的人參加，所以一般報名者難以令人滿意），按常規，只有至少準備了第三批輪換的人馬，才能開場；第二，原擔任「協調」和後勤工作的聯席會議因考慮接受何維凌的方案，打算把原來就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這次絕食「個人化」。只是後來看到「震動」很大，而官方並無動靜，所以又想全力促成。

就在聯席會議開過之後，王丹便著手準備撤退事宜。三十日下午七時四十分，他便透過廣播宣布：北大學生將於當天全部撤離廣場。並說，這並不標誌學運的結束。今後要轉入校內的民主建設。如：組織合法化、民主沙龍、新的社團、組織學生到社會去宣傳建立獨立工會、知識分子聯合會等。——這個往日以「堅定」、「不調和」著稱的學運激進派領袖，之所以能轉眼之間改變說法，回到「五一三絕食」前北高聯「右派」的立場上去，相信除廣場的不如意狀況和「以同學生命做抵押」的精神重負日益沉重之外，聯席會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對它的服膺，恐怕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六月一日，此次絕食的發起人之一，「千人接力」第一輪（三天，七十二小時）出場者劉曉波，也按「個人化」方式在北師大發表了絕食演講。他說：「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分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光

榮！」「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藉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這個演講分別在北大、人大、清華等校的學生廣播站廣播。

六月二日下午四時，劉曉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二層紮營。宣布「七十二—四十八小時有限絕食開始」^⑥。

第二節 鎮壓前夜

五月三十日雖然沒有按原定計畫舉行絕食，但廣場上卻出現了另一件新鮮事——由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等首都八大藝術院校推出，由中央美院雕塑系二十多位同學集體創作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門廣場落成。這座高十米（人像高七米），用泡沫塑料和石膏等材料製成的塑像，坐落在天安門廣場中軸線，國旗旗桿與紀念碑的中點——原國慶節期間置放孫中山畫像的地方。這一塑像的成立，及其周圍的彩旗與藝術氣氛，使單調沉悶的廣場一時間如同置身節日。但它的位置的選擇和女性性別，立即招來了種種非議，並有指斥其為「強姦民意」的痛詆。不僅如此，經過三天四夜的設計製作奮戰的作者們面對這件成品時，他們發現，用這種材料製成的塑像雖然有防雨特性，卻經不起大風的吹颳。他們不得不告誡前來觀看的遊人，「最好不要離塑像太近」，希望最好保持十

米的距離，以免風大像倒，砸傷遊人。

與「民主之神」像帶來的戲劇性效果不同，六月二日開始的新一輪的絕食，卻揭開了這次民運一直等待的一個嚴肅的主題。

參加絕食的四個人中，劉曉波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文學博士。一年前因發表尖銳的傳統文化批判言論和與新一代青年思想領袖、美學權威李澤厚論戰，在各大專院校颯起過一陣「劉曉波旋風」，是第五代青年崇拜的新偶像。一些勇敢的新聞媒介稱之為「黑馬」，意識形態的官僚則視之為「瘋狗」。周舵是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长，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屬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論界人物。台灣歌手侯德健則是因一首《龍的傳人》，幾乎成爲中國大陸盡人皆知的人物。北師大校刊前主編高新則兼有中共黨員的身分。

絕食開始，四人在紀念碑平台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劉曉波首先說明了絕食的目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中國專制機器的強大，也由於幾千年中國人的怯懦和盲目順從，整個世界看待中國的前途、中國問題的思路，一直是從執政黨著眼，從執政黨內部的鬥爭著眼。但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到五月的全民民主運動，在向全世界宣布，這種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思路……（因是整理現場錄音，此處不清楚）人民已經覺醒了，人民再也不會跪倒在地，以襯托幾個獨裁者的高大形象。（熱烈歡呼鼓掌）我們需要對話，我們需要平等，我們主張和平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反對任何暴力。但我們不畏強暴，任何暴力也嚇不倒我們。我們將用這種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鵬政府的戒嚴和軍管、消除李鵬政府的這種狹隘的封

建式的農民的仇恨心理（熱烈歡呼，長時間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進程。

另外，這一次絕食，我們的另一個宗旨，就是想公開地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極少數極少數」，所謂的「黑手」，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們是中國的公民，他們所幹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學生運動沒有錯，我們這些被稱之為「一小撮」的人也沒有錯（鼓掌）。我可以代表我們四個人公開宣布：我們不但不恐怖，反而，我們為能夠充當這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黑手」而驕傲，而自豪，而榮耀！（好！長時間歡呼鼓掌）。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幾千年來……基本上處於順從地位。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會動口而不會動手，只會空談理論而很少行動。今天，我們四個站出來，就是要代表我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一個公開的，知識分子聯名出現的，真正的行動！以行動抗議李鵬政府的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我們幾千年的沉默、軟弱、盲目、順從所犯下的種種過失……

接著，周舵宣讀了《六二絕食宣言》：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

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我們長期的軟弱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分責任。

(一) 絕食目的：

1. 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衆。爲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爲了請願，而是爲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行，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制度。政府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衆實行戒嚴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爲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2.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了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爲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爲，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爲總理，犯有重大過失，應該按照民主

程序引咎辭職。但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便他下台，仍然應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力（編按：應為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重新和平談判，以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我們抗議李鵬政府的新聞封鎖，要求立即解除新聞戒嚴。

3. 此次學運，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的民主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對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是同情與支持，而是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個人的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應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

4.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的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

政治力量，為政府決策的制衡。所謂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過失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5. 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的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的政治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發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製造動亂的，是政府的錯誤決策……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吸取沉痛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

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平上，理論，不講程序、操作；只講目標，不講手段過程。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

侯德健為大家唱了他為八九民運而創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國人》：

愛自由的人們／張開我們的翅膀／有良心的人們／敞開我們的胸膛／為民主的人們／團結
我們的力量／醜陋的中國人／今天我們是／多麼的漂亮／把耳朵豎起來／誰也不許再撒謊
／把眼睛睜開來／誰也不許歪曲真相／我們手挽著手／把腳步邁開／慢慢來／誰也不用慌
慌張張。

可是，正當這批知識分子用折磨自己的腹胃來推廣自己的思想，企圖用「張開的翅膀敞開的胸膛」感動人民也感動政府時，政府那張原來看去撒得太大的網，卻正在慢慢地收攏：

第一個行動，是抽掉這次非暴力的和平民主運動的精神支撐——使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這一行動流產。首先是五月二十五日由加拿大訪問歸國的萬里被阻隔於上海。然後他被告知，不得就國內問題發表個人或作為委員長與（實際已沒有了主席的）中共中央口徑相悖的意見^⑦。五月二十七日，萬里在上海發表了擁護戒嚴的書面講話。這篇講話指出，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爲。對此，廣大公民和青年學生要高度警惕。他認爲，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羣衆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他還說，他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楊尚昆五月十九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八十九條賦予的權力，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他並且呼籲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做好維護首都

正常秩序的工作。」

五月三十日，六名人大常委委員公開發表聲明，對香港《文匯報》五月二十五日發表的五十七人簽名呼籲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之事予以否認^③。

第二，是從五月二十六日起，北京和中央機關開始了新的統一思想和支持戒嚴的動員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區、縣、局、總公司及大專院校領導幹部會議。李錫銘傳達李鵬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並對下一步工作進行了部署。號召放手發動羣衆，做好輿論宣傳；組織羣衆，維護首都秩序；在鬥爭中加強黨的建設；廣泛開展慰問解放軍、公安幹警、武警、交通民警活動。

同一天，中央顧問委員會召開常委會議，傳達學習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反對動亂、維護社會安定的指示精神。中顧委主任陳雲作了講話。

五月二十七日，全國政協舉行主席會議，一致擁護中央、國務院重要決策。政協主席李先念作了講話。

在萬里發表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書面講話後滯留上海不歸的情況下，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邀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外副委員長，進行了統一思想的座談。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北京郊區順義縣一萬多農民、工人、商業職工、教師舉行「堅決反對動亂羣衆大會」；下午，大興、懷柔兩縣分別舉行羣衆集會遊行，抗議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在大興縣的集會中，人們在「反對動亂，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聲中，燒毀了方勵之的畫像。

六月一日，門頭溝區、通縣、房山、延慶、昌平同時舉行了號稱「二十多萬農民和城鎮幹部羣

衆」「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爲制止動亂、穩定局勢所作出的正確決策」的遊行集會。

第三，打掉民運側翼——剿滅「飛虎隊」，綁架「工自聯」頭頭，激化矛盾。

從五月二十六日開始，北京市公安機關經過連續幾天幾夜的活動，抓獲了「飛虎隊」的隊長和一批骨幹分子。據北知聯《新聞快訊》三十一日發布的消息稱，遭逮捕者包括汽車司機易京瑤在內，共爲十二人。這就摧毀了民運中自發產生的信息傳遞系統。

五月三十日，工自聯執行常委沈銀漢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被「一輛裝有警燈的吉普車上衝出的兩名警察」綁架。同日遭到逮捕的還有錢玉明、向東平。

六月一日，北京市總工會發表聲明，要求取締「工人自治聯合會」。指斥工自聯的所作所爲是「企圖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公然破壞正在恢復的首都正常秩序」。

一時間，關於有關部門提出的逮捕名單多種多樣的謠言順勢而起^④。《新聞導報》稱，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被捕，「揭開了大清洗的序幕」。

第四，製造輿論，爲清場鋪平道路。

六月二日，新華社發表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重彈其「極少數人製造動亂」早有預謀，目的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制度，並有周密策劃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插手等論調。各大報對此進行了刊載。

最先感覺到氣氛變化的人羣，是可以看到衛星傳送的海外電視節目的外商和華僑。他們在得悉北京附近地面軍隊調動情況後，紛紛撤離北京。

與政府的這些「準備運動」相應，一些來歷不明的煽動造成了民衆中反叛傾向與暴力主義的呼

聲突然抬頭：

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站播出題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評論員文章，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文章說：「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層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現為罷工、罷市、罷課、罷教、示威、遊行，也可以表現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極抵抗，也可以表現在拒買國庫券、提取存款等具體手段上。一句話，只要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和偽政府過不去，每個人都一點一滴地破壞，瓦解這個本來就很虛弱的紙老虎。那麼，李鵬、楊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⑩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農大、理工大、北師院、北方交大分別出現題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今中國時局可能性預測分析》的傳單。傳單說：

現在一部分掌握共產黨、中國最高權力的領導人如果不順從民意，不聽人民的呼聲，而一意孤行，動用軍隊來壓制人民的吶喊，這就極有可能導致這場民主愛國運動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的巨變。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他的政府，人民將自願組織起來，組成以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界愛國力量為主導力量，將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並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誠的共產黨軍隊）來與共產黨的腐朽力量相鬥爭、相抗衡，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去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來進行鬥爭。台灣國民黨李登輝已經宣布，台灣不但要從思想上、道義上支持大陸的民主愛國運動，而且還要從其它方面給予支持援助。據有關人士

分析，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導致人民組成能夠順應民意，並獲得美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尊重人權要求民意國家的支持，可能被稱為民主黨的反對黨派，以共產黨開明人士組成的改革派，以民聯為機構，以要求民主的人民為主體，民主黨和中國國民黨聯合起來，組成以三個黨為主體的多黨制，進而過渡到議會制，從而完成大陸和台灣的真正合好，完成中國統一大業。

中國人民必須特別珍惜並且堅定地、徹底地把目前這場聲勢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進行到底^①。

六月一日，北大自治會的廣播甚至報導了李登輝的上述言論，並說：「政府說學生運動中有台灣特務，如果這個人是搞人權、搞民主的，就是特務我們也歡迎。」

儘管這些言論傳播半徑有限，並沒有在仍然懷著浪漫幻想的學生和鬥志日益怠懈的市民引起回響，但由此，一個為軍隊開進北京市區，最後以掃平「反革命暴亂」為藉口，結束四十餘天來的主運動的輿論氣候已經造成。

第三節 最後的紀念碑

軍隊全速前進！

終於，在集結多日之後，最後的行動命令下達了。軍令如山倒！

還在六月三日的清晨來臨之前，鬆懈疲憊的北京市民在睡夢中就聽到了一個聲音：

「市民們，起來吧！軍隊進城了！……市民們，起來吧！軍隊進城了！……市民們……」僅僅只有這一個聲音，沒有了往日摩托車的喧嘩，在沉睡的城市夜空裡，它顯得那樣淒清，那樣哀怨！只有這一個聲音，再沒有聽到響應，但它頑強地喊著，也許是緩慢地登著自行車，越走越遠。

凌晨兩點，十五輛軍車在西長安街被驚醒的羣衆包圍；二：三〇，三千軍隊由東面開進，在距廣場五百米處受阻；三：〇〇，在民衆的掌聲中，三千軍隊撤退；同時，有部分軍隊被趕進天安門附近的建築工地。堵截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當最後一個「紅色的白天」到來時，人們被暫時的勝利又一次欺騙：軍隊進城了！又會怎麼樣呢？血！那個在戒嚴令發布當天，人們相信一定會兌現的情景；五月二十二日晚，在豐台大井附近發生的戒嚴令以後的第一樁流血事件^①；彷彿也證明「流血」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局。但因一段較長時間的雙方的克制，以及後來一系列「軍愛民，民擁軍」的活動，這意識漸漸被淡漠了。善良的人們在看到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本質時，將這次反人民的戒嚴行動的本質忘卻了。

但是，「這一回真的死人了！」六月三日白天，北京城裡傳開的一個消息把人們的警覺又重新喚醒：一輛警車撞死三人，撞傷一人，軍隊要行動了。在這一消息傳開的同時，人們也了解到：雖然未進行化裝開進的部隊，被凌晨的呼聲喚出的市民堵在了半途，人們痛毆了這些軍隊，但是其他軍隊已趁著黑夜，大量地滲入城區。數個奉命先期到達大會堂的軍，由於執行從六月二日便開始的「F七五行動」（即化裝進城）計畫，順利地到達集結地點；在阻截的軍隊和運輸車中，人們找出了機槍、匕首、繩索、子彈進行展覽。當天上午七時至十時在西單路口被圍的「軍火轎車」中有一機

槍五挺，衝鋒槍一百多支，手槍七支，子彈×萬發，電台×部。」^⑬下午二時二十分，在六部口又有一輛彈藥車被圍，為解救被圍的這批武器，中央警衛團向密集的人羣施放了催淚彈。

火藥味已經越來越濃！

晚七：〇〇，已進入大會堂的部隊進行了戰前動員。某師長說：按照戒嚴指揮部的命令，後面部隊將在二十一時開始強行開進。

四：三〇，在大會堂西被圍的五千名士兵與羣衆發生衝突，人們看到了「血」！

五：三〇，五十輛運兵車在東直門被攔截；七：五五，又有七十輛軍用卡車在建國門高架橋被阻。

晚七：〇〇，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重申戒嚴令原則，警告人民不要上街，離開天安門廣場，聲稱戒嚴部隊、公安幹警、武裝警察有「強行處置」一切情況的權力。

此前，武警部隊接到北京軍區命令，當晚八時到軍區「領受任務」。當他們五十名「戴頭盔、盾牌、電警棍，又裝了一千發催淚彈」的防暴警察到達軍區司令部的作戰室時，衆多的二星、三星將軍已經雲集此地。寬大的軍用地圖上若干個三角形紅色箭頭，從東線、西線、南線、北線直插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盤踞的天安門廣場。軍區政委劉振華當著衆將軍的面，對他們進行了動員：「同志們，目前，首都從學潮引起的動亂現在已經發展成暴亂。他們燒軍車、搶軍火，傷害解放軍戰士，性質已經變了。」「現在搞打、砸、搶、燒、殺的不是學生，也不是羣衆，而是反革命暴徒。我們要開進天安門，清理天安門廣場，要保衛黨，保衛人民，保衛國家政權，保衛首都北京！你們的任務就是要為大部隊把路打開。」接著，軍區周司令員說：「沒人阻攔要進，有人阻攔

也要進！軍區首長直接指揮你們，今天一定要開進天安門廣場。」^⑭

晚九時十分，這支由五十名防暴警察開道的軍區首長指揮車隊，從西山的北京軍區出發。那麼，擔任開道主體的軍隊情況又如何呢？據某集團軍少將政委王福義回憶：

……軍區命令，以×集團軍的建制，並由我集團軍為先導，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排除，務必按時到達。同時命我集團軍於當晚十時前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成四路縱隊乘車東進。據此張副軍長提出將整個集團軍密集收縮在一公里之內，人車集中，首尾相顧，形成鐵拳。

……經簡短研究，劉參謀長及司令部同志提出以A、B兩個步兵師，一家兩路，齊頭並進。坦克師、炮兵旅和工兵團隨後跟進。整個車隊先頭設六百人左右的防暴隊、排障隊開路，兩側有各自的防暴隊護車，人車相互掩護前進。整個戰術以集團密集隊形，對付人海戰術，以原始防衛手段對付磚石、木棍等的攻擊，以強大的威勢對付反革命的氣焰。

八時許，集團軍的車隊上路，由於A、B兩個步兵師尚未趕到，沒有側翼保護的軍隊，遭到了四面雨點般飛來磚石的襲擊。九時二十分，部隊集結完成。九時半，這支從一九二八年隨彭德懷平江起義，歷經保衛井崗山、兩佔遵義城、激戰直羅鎮、大戰平型關、遼西會戰、天津攻堅、抗美援朝等戰役的軍隊，正式從記錄了他們光榮歷史的軍事博物館出發，向天安門進軍，去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敵人」。

晚十時，軍隊在木樨地向密集的圍截羣衆開槍。軍隊的宣傳車反覆播送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地上車上的軍人齊聲高呼：「嚴懲暴徒！」「如若阻攔，堅決還擊！」的口號^⑤。車到復興門時，十八輛裝甲車從高架橋下衝上長安街，加入了大部隊，使舉步維艱的軍隊行動大大加快了進度。儘管如此，從公主墳到天安門，實際距離只有七公里左右的路程，這支機械化部隊卻花了整整四個小時。

它們到達天安門的時間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時三十分。也就是在這同時，一天多來棄服微行，輕裝簡從滲入北京市區，已進入大會堂的二十七集團軍，領受了戒嚴指揮部命其搗毀天安門廣場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指揮員撩開大會堂二層的窗簾，俯瞰著情緒激動而秩序零亂的廣場。在那裡，準備「背水一戰」的人們把棉衣、被服堆成了一個個的小山，並用火將其點燃……

此前，就在木樨地軍民劍拔弩張，血戰猶酣的當口，天安門廣場的民運領地內，按原計畫舉行「民主大學開學典禮」，關於這個「大學」的成立，是五月二十九日零時，北高聯、外高聯、絕食團在天安門廣場開會，決定聯合成立「全國高聯」時議定的。設想是用香港支援的帳篷設立教室，以廣場為根據地，辦成黃埔軍校式的大課堂。為了使「大學有個正規的模樣，六月二日晚，人們還拆除了廣場上下不規則的帳篷，讓學生到廣場的香港接待處領取統一材料，搭設統一帳篷，人們沒有想到，僅僅三十個小時以後，這些吉普賽式的營帳就將被付之一炬。

嚴家其以名譽校長的身分為「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作了講話。其中一句「用鮮血和生命鋪平通往民主的道路」，給尚不知軍隊強行開進消息的聽衆留下了不祥的印象。加之輪到「大學」校長作家老鬼講話時，忽然尋不見他的蹤影，更給事情帶上一種詭譎的色彩。它與此時廣場仍然沉浸其

中的懶懶氣氛一道，形成一齣荒誕劇的特有氛圍。

不久，軍隊已經開了殺戒的消息傳到廣場，不斷地有人在廣場學生的廣播站失聲痛哭地控訴當兵的如何殘酷無情地殺人。十一時二十分，一輛代號為三三二，丟失了大隊的裝甲車（經劉家窪——天壇公園——磁器口——和平門——正陽門）堂堂皇皇地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⑥。原先還煙火繚繞的廣場東路小吃攤商轉眼隱入了黑暗。有女人驚得哭叫了起來。這輛找不到大隊的甲殼蟲飛快地在廣場上兜了兩圈，又到崇文門——宣武門一線尋覓了一遍，最後決定停在大會堂西路。而當它第二次進入廣場時，驚懼的人們開始咒罵：

「法西斯，滾回去！」

「劊子手，滾回去！」

身着汗衫，腳穿拖鞋的市民開始用棍棒敲擊鐵甲，一時找不到武器的羣衆撬起大會堂周圍地面的水泥磚。路過的人們紛紛以分到一塊碎磚，並向這龐然怪物敬一石為快事。

與此同時，○○三號裝甲指揮車經蒲黃榆——崇文門——東單，於午夜零時二十分到達天安門東側的金水橋邊熄火。在路經中國革命博物館北門時，它撞死了一個正在翻越隔離柵欄的黑衣人，還沒有見過血和火的皇城牆下的居民在驟然來臨的暴行面前突然瘖啞，緊接著便如山洪爆發一樣地發出了怒吼：

「壓死人啦！」

「壓死人啦！」

人們追逐著這輛裝甲指揮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的金水橋邊，把鐵棍插進裝甲車履帶，澆上

汽油將它點燃。

一時整，天安門廣場上政府的廣播開始反覆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發布的《緊急通告》。廣場上的人們第一次知道，政府把反對軍隊進城的抵抗已定位為「反革命暴亂」、並發出了「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的號令。之後，三顆信號彈在北京的夜空升起，大會堂東南角的軍隊朝紀念碑發出一陣密集的射擊。四面天空這裡那裡不時劃出一道道閃光的彈跡……

網，已經越收越攏了！

在軍隊與市民的混戰中，操著原始武器的市民死傷慘重。紀念碑下廣場學生的救護站裡，人們送來了血肉模糊的市民和死去的學生。但頭腦清醒的大學生，始終不渝地堅持著非暴力原則，這表現在不斷送往廣場救護中心的傷員中，不少是學生救下來的軍人^①。但面對嚴酷的形勢與慘烈的刺激，沒了主意的學生領袖多少也有些亂了方寸。

人們聽到，在學生廣播站的廣播裡，一會兒是吾爾開希因憤怒失去控制的聲音：

「我們要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我們要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共存亡。」因為暈倒，他的聲音戛然而止。

一會兒，柴玲又聲嘶力竭地質問：

「市民敢死隊的人都到哪兒去了？！市民敢死隊的人都到哪兒去了？！」

一會兒她又領頭宣誓：

「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

事後，戒嚴部隊從一名英國記者手裡繳獲的一捲錄音帶，也反映了清場前學生的混亂思緒，一

個人氣急敗壞地對英國記者講：

「快和中國斷交吧！」

「快叫美國出兵吧！」

旁邊有人插話：「美國太遠了！」

「叫蘇聯出兵吧！」

「把鄧小平、李鵬他們統統抓起來！」

在這個時候，唯一清醒的，對廣場的學生有左右力量的，是四名絕食者這個小集體。他們原打算只開一個頭，然後把接力棒傳給後面的絕食者，沒想到他們的開頭就是結尾，並且還要替整整一場持續了五十天的「學運——民運」結尾。那些曾經為這次民運推波助瀾，出謀策劃的人物都到哪裡去了？他們沒有在混戰的人羣中，有北京市民在，他們料定軍隊進不了城。就是進城了，有的人還懷著幕後活動者逃避責任的僥倖心理！

不過，這四個人沒有逃避。

他們做的第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勸說幾個打紅了眼的市民敢死隊成員放下武器。第二件有意義的事，是決定和組織和平撤離。關於這個過程，羅點點透過對當事人的訪問，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將近三點半時，北京大學的邵江闖進絕食者的帳篷，蹲在周舵的地鋪前，用緊張得發抖的聲音描述了他親眼看見的血腥場面。然後帶著哭腔懇請四人勸學生撤退，說柴玲的話已經沒人聽了。「只有你們幾位老師能救大家了！」周舵先徵求了高新的意見，高新同意撤。但立即就有人反對。理由是北京市民爲了保衛學生，堵軍車，流血犧牲，死了那麼多的人，若是撤了怎麼向人民交代？

不流血，怎麼喚起民衆？但侯德健也同意撤。於是，周舵又找劉曉波談。劉曉波開始不同意，但被三位說服。接著，周舵提出了具體方案：第一，說服學生領袖，由柴玲和李錄指揮學生撤退；第二，在廣場廣播站發表講話，請廣場上的全體人員放下手裡的一切「武器」，準備和平撤離；第三，四人中派出兩人去找部隊談判。讓他們配合，留出撤退通道。

接著，四人進行了分工。然後一起去說服柴玲、李錄，幾乎沒費什麼力氣，他們就同意了。周舵開始用學生的廣播對廣場上的人喊話：

「親愛的同學們，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們，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剛才我們參加絕食的四個人和學生組織的領導成員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我們一致決定，馬上組織和平撤離。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抵抗是毫無意義的。血已經流得夠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這裡的全都是中國的精英，是民族的寶貴財富，我們多保留一個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國的民主事業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強烈呼籲各校同學馬上組織撤離。我們要求同學馬上集中到紀念碑的周圍，馬上放下手裡的石頭、棍棒這一切不成其為武器的武器，堅持非暴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廣場周圍的解放軍官兵們！你們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嗎？這裡都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我們強烈要求你們，馬上停止屠殺手無寸鐵的羣衆，停止自相殘殺。我們正動員同學們和平撤離，請你們配合，派代表來談判，我們也將派代表去和你們談判撤退。」

周舵在廣播裡把上述內容講了兩遍。劉曉波、侯德健、高新也都講了話，接下來是與軍隊談判。

正當周舵、侯德健向廣場西邊大會堂方向尋找軍隊談判，同行的宋醫生說跑去太危險，最好找

一輛救護車時，一個奇蹟出現了，已被軍人團團圍住，只留下東南角一條「只許出，不許進」¹⁹的廣場之中，居然有一輛白綠相間的中型巴士開了過來，雖然上面坐著人，但一經說明，「乘客」均下車來，更巧的是，司機知道軍頭在哪裡，這輛車飛快而又準確地繞廣場半圈，把他們送到了廣場東北角，一行四人步行來到歷史博物館西路和長安街交會的路口處。

有幾位軍官朝他們走來。雙方握手後各作自我介紹。軍隊的代表是某團上校政委季國新，部隊番號為五一〇四八。

周舵說明來意和方案後，提出希望他們報告指揮部，給學生撤離留出時間和通道。季國新表示歡迎他們的態度，答應馬上報告指揮部，並要他們原地等候。

在談判代表等候回音的過程中，大約是四點十分左右，廣場上的燈突然全部熄滅，這是戒嚴指揮部與各部隊約定的準備清場的信號。就在這個時間裡，二十七軍派出搗毀高自聯指揮部，由二百零五名偵察兵組成的「特緝分隊」摸出了大會堂東門，直插人民英雄紀念碑。

大約去了十幾分鐘，季國新回到談判地點，對談判代表說：「首長歡迎你們的態度。我們執行戒嚴任務，是爲了恢復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亂，政府的通告你們應當早就聽見了，已經播放了幾個小時，反覆動員你們離開廣場，我們當然不願意發生流血衝突。你們幾位這種時候來絕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們能說服學生撤離，時間已經不多了。上級命令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天亮前完成清場任務。天一亮，市民出來，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一點你們應該能理解。」

周舵說：「現在不是談論誰是誰非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已經停止絕食了。我們起了什麼作用，歷史和人民會做出評價。政府的廣播根本沒有說明從什麼地方可以撤離，你叫我們怎麼辦，怎麼撤

離法兒？」

季國新說：「廣場南邊一直留著通道。」

他們沒有多爭辯，相約保持聯繫，隨時通報情況，四個人就朝紀念碑飛跑回去。

在廣場燈光再次復明時，學生廣場指揮部的廣播站裡傳來了副總指揮封從德的聲音。他再次強調了非暴力和平請願的原則，命令學生叫市民交出手中的棍棒。人們遵從了這一命令。接著，封從德建議用口頭表決的方式，對撤退還是堅守作出決定。他喊堅守時，贊同的聲音聽起來比同意撤退的更響亮。聲源主要來自紀念碑西南角市民聚集的地方，但封從德宣布：贊同撤退的居多，全體開始分批撤離。

周舵透過廣播通報了談判情況，並對學生說：「不同意撤離的同學們，你們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行動上要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則，我們爭取民主，應當首先從我們自己做起。我呼籲同學們，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靜的態度，堅持非暴力原則，這才是我們成熟的表現。」侯德健說：「我們這些人一定最後撤，只要廣場上還留下一個同學，我們四個人也不會走。」周舵又將「不要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一類話勸告了一番，然後二人又再次跑去向軍隊通報情況。但餓了兩日的侯德健已經體力不支，周舵不得不扶著他跑，兩人抱著只要不死，就要把學生已同意撤離的消息送到，以爭取更多的時間讓他們平安撤離。紀念碑下劉曉波和高新繼續留下做學生撤離的工作。

第二次與季國新見面，他們沒能爭取到更多的撤退時間，東方此時已開始泛出魚肚白。歸途中，他們查看了沿路的帳篷，見裡面確已無人。待回到紀念碑下時，見學生的隊伍已經開始緩緩撤

離。

學生們排著隊，打著各校的校旗，喊著口號從東南角向外走著，自己的廣播裡播放著悲壯的《國際歌》，東南角的廣場上，軍隊留出一條狹窄的通道，把撤退學生原先寬闊的隊列拉成了一條細繩。紀念碑東邊北邊仍有大片學生手挽手沉默著坐在階梯上一動不動，士兵卻緊貼著他們倚上了台階，揮動槍托驅趕剩下的人。

「尖刀班」奉命直搗學生的「廣場指揮部」，而此時的指揮部裡，只剩下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擴音機了。

一陣掃射之後，唱著《國際歌》的喇叭終於瘖啞下來。

第四節 澄清難——代《結語》

天安門廣場的清場，結束了五十天的北京「學運——民運」。但沒有結束由此引發的全國性的學生與民衆抗議活動，更沒有把這件事情，在哪怕是現實的人的頭腦中打上一個句號。限於資料，本書的簡寫本不打算去揭示這場運動在外地的來龍去脈。下面僅就第二個問題稍作分析：

開槍以後，人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自然是「死了多少人？」第二個問題便是「誰對？」

這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驚嘆號，在人們的思想感情上帶來的震動是劇烈而巨大的。當思維還來不及處理上述那些糾葛時，各色各樣關於死亡、開槍、血的故事卻飛遍了全城：

僅根本沒有進行有意搜集調查的筆者個人，當時所經歷或聽到的幾則傳聞就有：

1. 木樨地二十二號樓關山復之女婿，在高層建築的陽台上中彈身亡。

2. 同一幢樓上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3. 家居玉泉路一帶的一科研機關幹部，見坦克裝甲車開過的路段，一被壓扁，血肉均被履帶帶走，只剩一身影的小孩。

4. 躲在三里河路邊樹叢中錄音的××，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花壇掃射。

5. 家居木樨地的××，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賣香煙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

6. 團中央下屬單位中年幹部×××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彈射穿肺部。

7. 某民辦研究所研究人員××，四日凌晨前往復興醫院，見急救室內死傷遍地，記錄下了當時的死亡人數。

8.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人員×××途經府右街回家，被槍彈擊傷左腿，致殘。

9. 一輛擔任清道任務的裝甲車，行至建國門高架橋，撞翻一輛軍車，車上一名軍人摔死。

10. 一輛從東面來的裝甲車，途經中國革命博物館北門前東長安街時，將一企圖翻越隔離柵欄的黑衣人撞翻壓死。

11. 協和醫大研究生（女）×××，協助協和醫院搶救傷員，曾抬送死屍到停屍房，見冰櫃人滿為患，櫃門無法關閉。

12. 四日二點以後，軍隊進入廣場時，一頭纏布條的學生在天安門前與一羣軍官遭遇，學生朝軍

官舉起手中的木棒，軍官掏出手槍將其擊斃。

13. 在公安部門前的長安街上，筆者於黑暗中曾踩到三處黏稠物體，直徑約七十公分左右，天亮看時，鞋上黏滿乾硬的血漿。

14. 在南池子靠近勞動人民文化宮東門處，六時三十分左右，筆者見一小三輪上拉著一身穿碎花襯衣，頭部繃帶滲出鮮血的少女，邊哭邊向尾隨的旁觀者用標準的北京口音說：「這都是教他們打的……」

15. 同一時間，某報記者在公安部大門附近的街邊見一青年敞開衣衫，嘴裡說著：「畜牲，朝這兒打！」向對峙的軍隊走去，被軍人當場擊斃。

16. 應戒嚴指揮部邀請，參加六月七日官方組織的「廣場調查」的記者××，調查時遵循大會堂工作人員指點，特地注意了大會堂東路西北邊第三棵燈柱附近的地面，發現有一大塊被水洗過的地面，顏色明顯淺於周圍的路面。

關於六月四日白天與晚上傳聞：

1. 六部口南，坦克路遇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調頭過程中輾死學生六人。

2. 六月四日凌晨，某出版社工作人員×××在西長安街路遇一從廣場出來的醫務人員。白大褂上滿身是血，他聲稱經手救過三十多人。同一人路經六部口，見附近西長安街中一名軍人躺在地面上，有報紙蓋臉。同一人稍遲，在月壇南兒童醫院附近一飯館前，見一身分不確者（可以肯定不是學生和軍人）停屍路邊，頭蓋骨被砸碎凹陷下去。

3. 中央某機關幹部××，四日上午騎自行車到建國門一帶查看街景，正遇士兵槍擊外交公寓。

經建國門內大街回家時，又遇戒嚴部隊朝一建築工地上的民工開槍。

4. 六月四日夜，和平里一帶槍響，居於某國家機關樓房內的一退休老婦開燈觀看，被窗外子彈擊中身亡，玻璃上濺有血漿。

事後，有關的文字材料也描述了死傷情狀：

1. 衝突始於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墳，軍隊向前推進時對人們使用了電棒。當一位年輕婦女被打後，一位青年對士兵講，不應毆打婦女。但他遭到一陣痛打。當時士兵還沒對人開槍，僅對地面開槍……所以當部隊推進到木樨地時，人們的膽子很大，卻遭到了實實在在的槍擊。士兵們向各處開槍，包括附近的高級幹部公寓樓。一個男青年（某官員的女婿）到廚房打水時開了燈，士兵看到燈亮，就對著窗戶開槍，殺死了這個青年，還有一些人被這種隨意和毫無目的的槍擊奪去了生命^⑩。

2. 六月三日晚，羣衆試圖去阻攔軍事博物館附近的部隊。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學、北京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醫學院的研究生。開槍之前，武警用磚頭，帶有金屬扣的皮帶以及有一米長可能有釘子的棍棒毆打羣衆。傷員一個接一個地被自行車和三輪車運往復興醫院。所有傷員頭部都有傷，大部分傷員的眼睛在流血，鮮血從他們的前臂流過，從肘部淌下……大約夜裡十一點二十分，部隊開始向在木樨地的人羣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裡噴出^⑪。

3. 大約晚上十點二十分，士兵那邊突然起火……兩側的士兵開始向前移動……北京大學李平上前準備與士兵對話，一排子彈打來擊中了他。他還沒來得及說一句話就倒下了。當我和其他兩個學生衝上去把他往回抬時，又是一排子彈打過來，打中了我們當中一人的前臂。我們把傷員抬到復興

醫院。由於李平被擊中頭部，很快因失血過多而死亡²¹。

4. 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我們的車跟著這輛救護車到達了復興醫院。平均每分鐘都有自行車或三輪車送來一位傷員……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路障約一百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員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AK—四七型和五〇口徑機槍²²。

5. 截至六月四日凌晨二點四十五分，光是復興醫院就有二十六人死亡……一些身著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²³。

6. 「〇〇×號裝甲車上的駕駛員……由四個學生背到醫院才保住了一條性命……與此同時，醫院的急救室裡躺滿了被戒嚴部隊打死打傷的人。地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凝固的人的血漿。一個護士說：『我從沒見過這麼可怕的場面，腳踩上去咕唧咕唧……分不清是誰的血，一輩子也忘不了……』一個醫生正給一個不省人事的婦女包紮傷口，那腹部的巨大傷口從臍上一直到橫膈，切透了那女人的腹腔和胸腔，醫生面無人色地說：『不是匕首就是刺刀，手真狠』。」²⁴

7. 四日凌晨二時左右，在南長街南口，「一輛公共汽車猛然向軍隊衝來，嘎然而止，沒有傷人。兩人從車後跳出，立即被射殺。我看到士兵打破車窗，將司機拉下，用槍柄狂擊。看到的人都很憤怒，他們衝前救助，卻給亂槍擊回。不少人在槍聲中倒下。一名工人衝前，擲出玻璃瓶，擊中一軍人的頭部，跟著響起兩下槍聲，工人抱腹，彎下身子……鮮血像水龍頭的水一般從背後湧出……」²⁵。

8. 同一時間，歷史博物館前，「一個十五、六歲少年在人叢中大哭，說他哥哥給軍人打死了。

他要和軍人拚命……凌晨三時左右，我看見有人抬著血淋淋的屍體和傷者來回奔跑，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滿身鮮血，由一名工人抱著……」^⑳

9. 在某醫院，「有一護士剪開傷者衣服時，嚇得連退兩步。醫生也呆了一陣。原來，傷者的胸口血紅一片，部分好像不見了……一位同學說他是逃跑時從背後給軍人射傷的。」^㉑

10. 一位波蘭國家電視台記者說，一名站在距他一米遠的學生，在對向前推進的士兵辱罵之後被槍殺^㉒。

11. 到清晨五點，死在復興醫院的數已達五十九人……兒童醫院死了五十五人，鐵路醫院死了八十五人^㉓。

非官方的死亡估計數字從幾百到幾千不等。六月五日在北京的外國報刊記者引用來自北京各醫院的消息說「一千四百人死亡，一萬人受傷」^㉔。此外，多篇報導引用中國紅十字會的某些消息來源，六月四日提供的，即有二千六百人死亡，一萬人受傷，一些報導中還提出了更多的傷亡數字^㉕。

北京政府儘管在軍隊開進前的輿論準備及軍隊的動員中，賦予了自己這次行動充分的「正義」，但這些關於死亡的謠傳，顯然還是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因為，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文明的國家和文明人，可以像古代血族復仇社會的崇尚那樣，不僅對死亡無動於衷，而且簡直以殺戮為力量和榮譽的標誌。也許是出於上天賜予的「好生之德」的本性，那些曾以堂而皇之的名義鼓勵過鎮壓行動的人，也不得不對「謠言」略費唇舌。

首先，是六月六日下午，國務院發言人，那個被羣衆稱爲「臉皮可進入自然博物館」的袁木舉行的國內記者招待會，不得不首先談到這個問題：

……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國務院也很關心這件事，因此，讓有關方面儘可能去調查了解，但是由於局勢還不穩，秩序還相當混亂，許多正常渠道還沒有恢復，所以統計數字還不完全，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

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羣衆）共傷二千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羣衆。

除此之外，軍隊到目前爲止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

就是傻瓜也知道，一個能把活人的身分分清的人，把死者的身分分清是不困難的。況且，一個能說出死者中誰屬「罪有應得」，誰屬「誤傷」的人，沒有理由不知道他們的身分，即使退一步說，分不清非軍人中的「暴徒」與羣衆的話，軍人與非軍人的界限應該是可以區別的。但是，正是在這個應該最不含糊的地方，發言人有意採取了含糊其詞的做法，這個欲蓋彌彰的辦法恰好證明，即使在「不完全」統計的情況下，軍人的死亡與羣衆也是絕不成比例的。

再看戒嚴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張工的閃爍其詞：

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羣衆，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當前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說法，叫做解放軍「血洗了天安門廣場」，還有的傳說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並且在天安門廣場焚屍，這純粹是謠言，根本沒有這個事情……

如果說袁木採取的是一種魚目混珠的手段的話，那麼張工在這裡則使用了以偏概全的伎倆。首先，他把軍隊的開進過程與清理天安門廣場區分開來，然後把一時四十五分進入廣場，對廣場實行包圍過程中驅趕、彈壓、反衝擊過程（共約三個小時）從「清場」時間中排除出去，最後把廣場限定在歷史博物館西路以西，人民大會堂東路以東，天安門前的長安街以南，毛主席紀念堂以北的地域內，大談什麼絕對沒有死傷一人，以圖消弭關於「血洗天安門」的傳言，是十分虛偽的，本人相信，在上述範圍內上述時間內，部隊驅趕離去的人羣和打掃廣場的垃圾時，的確未曾死傷一人。由於本人的親身經歷，也相信那種「坦克碾壓帳篷，帳篷裡還有熟睡的人」的說法純係無稽之談。

但問題在於張工的這種「保證」對於海外的「血洗天安門」的傳言沒有說服力。因為，在了解中國首都城市地理的人們心目中，天安門就代表北京；血洗不血洗說的也不只是四點半到五點半。如果軍隊沒有「血洗天安門」的話，袁木所說那死傷的兩千餘人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如果這個

數字在他的心目中還夠不上「血洗」的話，那麼，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官方關於死傷數目的另一個解釋，出自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報告指出：「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暴亂中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羣衆，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等。」這個面對至少是形式上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常設委員會的報告，不得不把死亡人數中的軍人與非軍人進行了區別，而這個數字恰好揭露了袁木當日故意在這一點上含混其詞的拙劣。

應當指出的是，官方公布的這種死傷人數表面上看是爲了澄清真相，或者不妨說是在「減輕罪責」，但它極其迷惑人民的地方在於，若是過於強調死亡者中羣衆所佔的比例，就意味着漠視了軍人死傷的無辜性質！而問題恰恰在於，無論是軍人還是羣衆，都是不該死的，他們，都是北京市「戒嚴令」無辜的犧牲品！！真正的罪犯，是那些把軍隊用於處理現代社會常規事務，把軍人和民衆逼上對峙火線的人！！

這裡，就自然牽涉到一個「是」與「非」的問題。

自學潮爆發以來，政府中的「鷹派」就一直在爲鎮壓尋找理論根據。習慣於階級鬥爭邏輯和「冷戰思維」的他們，當然立即就發現「理論」是現成的：其一，你們不是罵黨和國家領導人嗎？反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反黨。用你們民主派的語言說，就是反人民，因爲共產黨與現代世界上多數政黨一樣，都無不是以多數名義進行統治的。其二，你們不是鼓吹「民主」嗎？你那個民主的模式與我們的不一樣，因而是資產階級民主，搞資產階級民主就是搞資本主義。搞資本主義自然就是

反對社會主義。僅這兩條就夠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都是做爲國家的根本制度寫進憲法了的。一個國家的根本制度比之個人的權利當然更重要千百倍，反對這一點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反對無產階級政治觀，引而伸之，也就是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之以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如果你說這種判斷沒有事實根據，你沒有看見我發現了有那麼幾條「反動標語」，有人呼「反動口號」，是事實鐵證如山！如果你說那不代表大多數人的觀點要求，你看到的是表面，只有政治庸人才看數量，我看到的是「一小撮」。一小撮才代表實質！

這種邏輯並非筆者的杜撰，在前述「四二六社論」、戒嚴通告、鎮壓前的「緊急通告」中均呼之欲出，「平暴」之後更是所在多有。請看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陳希同的報告也沒有什麼新發明：

……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

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只不過陳希同的報告所強調的「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似乎更增加了「動亂」或「暴亂」目的的險惡，在原來就可以十惡不赦的罪名下補之以千刀萬剮。雖然看來至今證據不足，但在中共的習慣思維中，它肯定是一個「莫須有」的存在。

那麼，即使如此，他們就擁有了動用軍隊鎮壓的正義理由了嗎？

首先，筆者認為，八九民運與十年改革一樣，其主體的行為特點不是「有計畫」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即使是在設想過為這場運動提供理論指導和合理性解釋的人們那裡，如本書〈序〉中所言，它不僅有著明顯的硬套歷史教科書的痕跡，本身還存在與現實對接錯位的矛盾。所以，它至多是一種模擬的實驗室理論而已。而所謂「組織」。如所有公安部、安全部、國家教委、北京市政工人員提供的追蹤監測資料所展示的，那均是在運動開始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預謀」對於整個運動來說更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有，那只能限定在一些具體行動的策劃方面。

但是，作這樣的說明仍然不是筆者不辭的義務。筆者的義務在於說明，如果陳希同等人不是更崇尚給社會帶來毀滅性打擊的「自發的」動亂和暴亂的話，那麼，「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則不應受到另眼的看待。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區別於純粹破壞的建設行為，都必須是「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恩格斯說過，工程師之區別於蜜蜂的根本一條，在於工程師是有藍圖的。藍圖者，用之於建設，凝聚著計畫和預謀，以有組織的施工隊伍為背景的實物體現而已。現代社會平穩

發展、平穩變革與平穩過渡，在社會利益分化和社會目標分歧客觀存在條件下的社會整體的整合而不是崩潰，均與人類對自身行爲的計畫性、預謀性、組織性無法分離。所不同的是，在社會生產生活內容單調，社會各階層缺少發育的古代社會，它的計畫、預謀和組織的權力發源於一個中心，而現代社會則必須透過多層次的整合調節才能達到最後的平衡。所以，是否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不僅是工蜂與工程師的區別，也是古代政治思維、政治手段與現代政治思維、政治手段的區別。

撇開政治思維和政治手段不談，「政治目的」就成了最核心的問題，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搞改革開放，搞四個現代化固然好，但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復辟資本主義」可能就成了問題了。持有「綠色政治」觀點的筆者，不欣賞以物慾爲動力的資本主義社會自我生長機能，以剝奪和奴役勞動者爲財富奠基的資產階級國家，更無意於爲資本主義制度的「征服世界」和「永世長存」提供依據。筆者也無意於作一些「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問題，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問題，各自如在不同環境下生長起來的大樹，誰也不能代替誰」這類常識性的論證。僅僅從保留這個地球上人類對自身未來的選擇機會考慮，筆者也不贊成某一種社會制度（哪怕有時候它顯示出無可質疑的優越性）統治全球。這一點，是筆者需要聲明，並區別於其他民運同情者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筆者認爲，不論是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或者說以社會基本結構與發展階段和發展契機相聯繫的社會選擇爲基礎的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的問題只能在意識的範圍內解決。不惜以人的生命爲代價的意識形態戰爭，不僅無助於維護一種意識形態，相反會證明它本身虛弱的、暴虐的、落後的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無論是暴民的「革命」還是暴君的專制，都具有一種相同的本質。也就是說，他們的位置可以互換，但其自私性、狹隘性與短視特點，

均是同一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六四」事件死難的不論是民衆還是軍人。他們最終應當歸於同一合葬墓。在那個墓碑上只有一個數字，一個永遠不再重複的時間標記。

註釋

① 此處引用數據均出自《平暴紀事》、《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及新華社報導。據北京站負責人說，自四月二十一日以來，由該站進入北京市的學生達三十七萬人次。

②③ 見《京都血火》，第一四一、一四〇頁。

④ 在六月一日召開的記者會上，柴玲稱「綁架者」是外地來的學生。李錄懷疑「有同學已被中共收買成了內奸」。六月二日的台北《中央日報》按這一口徑發布了消息。而六月三日香港《新報》披露的情況則是，連勝德、王文等請柴玲交代一筆未上繳的捐款的下落，有錄音為證。

⑤ 鄧樸方北大同學，改革初期的幕僚人物，後作為體改所派駐美國聯絡員旅美。經常出入鄧、趙幕府。八九民運中棄趙跟鄧。

⑥ 侯德健因有片約在身，只絕食四十八小時。

⑦ 見《流血的改革》。

⑧ 在五月二十一日胡績偉委託四通公司代徵集簽名這份議案上，簽名的常委委員不足召開緊急會議的法定人數。但將五月十七日以厲以寧、江平等二十四位，同日盧嘉錫領銜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五月十八日在全

總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八次會議，同日張友漁等有相同內容的呼籲書上先後簽名，同意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加在一起共有五十七人，構成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法定人數。四通公司代理人在將消息發送《文匯報》時，未對「在議案上簽名者」與「先後同意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者」進行區別說明。在後來的清算中，此事被稱為「四通公司侵權案」。

⑨ 這些謠言說，戒嚴指揮部、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各有自己的逮捕名單。其中戒嚴指揮部關照的是學生領袖；安全部的目標是與外國人有聯繫者；公安部的眼中釘是學運黑手；北京市的死敵則是「飛虎隊」和工自聯。

⑩ 引自《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一八二頁。

⑪ 引自《平暴紀事》，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⑫ 按新華社五月二十三日發布的消息，及《戒嚴一日》中尉幹士任斌的回憶，此次流血事件是協助轉移軍車的學生與士兵均遭到身分不明早有準備者的襲擊。其中軍人一六名受傷、學生十一名受傷。被當場拘留審查的十人當中，有五名北京人，五名外地人。但稱此事為「五二〇慘案」的學生傳單說，他們遭到的是頭戴鋼盔，手持電警的防暴警察的襲擊。報導此事的北大傳單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傳單除在細節上有差別外，內容大體一致。

⑬ 參見《戒嚴一日》上册，第一四二—一四三頁；本書附錄《二十七軍某政委關於參加首都戒嚴和「平暴」經過的報告》。

⑭ ⑮ 同⑬，第九十二—九十三、八十九頁。

⑯ 見李勃《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載《戒嚴一日》下冊，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①⑦這類事例，哪怕就是在為戒嚴和開槍尋找合理性的《戒嚴一日》中，忠實於事實的指戰員和編輯者也沒有故意隱去不提。

①⑧見趙曉強《我所經歷的開進與清場》，載《戒嚴一日》下冊，第二一二頁。

①⑨ ②① ②② ②③ 據國際特赦《中國：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大屠殺及其餘波》。

②④ 見《流血的改革》。

②⑤ ②⑥ ②⑦ 見《明報》一九八九年七月號。

②⑧ 路透社華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消息。

②⑨ 同①⑨。

③⑩ 見法新社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發自北京的報導。

③⑪ 見一九八九年七月香港《爭鳴》雜誌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香港《文匯報》。

附 錄

409

中國爲什麼要民主？

——中國現行權力系統分析（節選）

中國人民大學 何凡興

現行的政治體制不民主，這是權威們和老百姓都承認的事實。但是，現行政治體制是如何運轉的？它不民主的根本表現是什麼？不民主導致哪些不治之症？今天，當我們試圖將民主向前推進並希望取得某些實質性成果的時候，不得不對以上幾個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思想和分析。

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根本特徵是一黨一派的權力體系，即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並在執政黨內不允許不同派別的公開、合法存在。這種政治體制必然導致將國家權力集中在某一個人手中，形成「一黨一派一領袖」的政治體制（簡稱三一體制）。這不但爲中國四十年來的歷史所證明，而且幾乎爲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所證明。

一個人怎樣掌握和控制整個國家的權力？爲什麼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竟可以決定十億人的命運？是君權神授？制（治）國之才？個人魅力？

根據我的研究，這種權力一元化的政治體制絕不是靠某個人或少數人所維持，而是靠一個特殊的權力系統來維持的。這種權力系統大體可分爲四個方面：

一、武力系統。主要指軍隊、警察、便衣、法院、監獄等。中國有一位偉人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沒有……軍隊，便沒有……一切」。在這種體制下，誰最能控制軍隊，誰就最有權。

反之，在這種體制下，如果沒有人能有效地控制軍隊，整個國家就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儘管這種體制主要建立在武力之上，無論哪一種力量在取得國家政權之後，都不可能單純靠武力來維持。

二、意識形態系統。任何國家都有一個用以說明掌權者掌權和所作所為合理性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而維持中國這種「三一體制」的意識形態主要為三方面：

1. 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該學說認為：由於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此，全社會只能由工人階級領導，而工人階級只能透過其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而共產黨又是由最有權威、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來主持（《列寧選集》第四卷，一九七頁）。如果你同意這種邏輯，你就必須承認「一黨一派一領袖」政治體制的天然合理，不容置疑性；如果你不同意，則可以用各種可能的方式來使你「同意」。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又為達到這一目的提供理論依據。大家想想，建國四十年來，無論是黨內或黨外的哪一次政治鬥爭中受到「特殊照顧」的人現在幾乎都已平反，但可以預計：如果這種政治體制要維持下去，它不得不繼續使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來對待對此持異議者，以維持「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從理論上推演，這種「三一體制」不但真正地代表廣大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也真正代表所有勞動人民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如何呢？問題出在哪裡？

2. 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在正統的宣傳中，社會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將一天天好起來，資本主義將日趨沒落下去。四十年來的歷史證明，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迄今為止，大概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因為昨天被斥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今天又可以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不但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的高

級階段，反而倒退到初級階級了。問題不在於人們是否弄清了社會主義的含義，而在於它主要是作爲一種意識形態。權威們透過將制訂和推行的政策標上「社會主義」，來說明所有政策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以獲得人們對現行政策的擁護。此外，也可以將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政策稱之爲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來不斷地向人民說明，確實存在一個完善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以此論證當政的權威們所作所爲都正確。

3. 馬列主義指導論。透過說明馬列主義是人類最偉大最正確的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指導勞動人民求得徹底解放的學說，並說明黨政的權威們正是馬列主義的最忠實的信徒，能最完全、最徹底、最全面理解馬列主義精髓的理論家，從而說明黨政的權威們的一切都是絕對正確，人們都應該絕對服從。在政治上應該與其保持高度一致，否則，如有不同意見，必當斥之、誅之。當然，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學說都只是馬列主義的一部分，但由於它們具有不同的功能，故對它們單獨進行分析。

這套意識形態儘管有許多錯謬，但由於他們「邏輯性」很強，能「自圓其說」，因此，不少人相信它，而且不但使很多老百姓也使不少高級領導人陷進去而成爲其犧牲品。已有大量事實表明，不少高級權威曾使用這套意識形態來幫助維持這套「三一體制」，但最終自己也被這套意識形態所傷害、所吞沒。

武力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是維持國家權力的兩個最主要的支柱，它們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多少年來，儘管權威們也發現了這套意識形態中已有不少問題，甚至提出了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但要維持這種「三一體制」，就絕不會允許人們對它進行全面分析和公開的批評。另一方

面，若沒有一套新的意識形態去取代它，要建立起一個新體制也是不可能的。

三、組織系統。國家權力的維持和行使必須靠一套相應的組織系統來完成。透過組織系統這條傳送帶進行權力分配，資源控制，維持中國「三一體制」的組織系統，其根本特徵是：各級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主要擷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和自下而上負責制，若不實行這種原則，這種體制則無法維持。在這種體制下，儘管也可以搞一些選舉，但只能限於基層，或進行一些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嚴家其說：「在選市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時，在開人大會議前預先擬定的候選人名單，百分之九十九都通過。而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時由十名以上代表聯合提名候選人，只有百分之一當選，不但北京是這樣，全國都是如此。」在這種幹部制度下，某位權力至高無上的掌權者只要有效地控制少數幾個下屬就可以控制整個國家。因此，在這種體制下，權術高度發達，最常見的兩類權術是：(1)「提吹術」，掌權者透過越級提拔聽話的下屬或親友來換取對前者的忠誠和吹捧，來維持對自己的崇拜和權力，一旦發現不聽話者，就馬上將其替換掉；(2)利用矛盾搞平衡術或利用矛盾各個擊破。

以上三個系統可以使全國絕大多數人在心理上或行為上處於服從和不得不服從的狀況，是維護這種「三一體制」、「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的「體制硬件」。我透過研究發現：這套權力系統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權力系統在實質上是相同的，差別之一，是現行政治體制用一套新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封建社會皇權的舊意識形態。比較一下兩者的某些特徵，則可發現他們在外表上的某些差異和本質上的同一。

現行體制與封建社會專制體制的另一重大差別是所有制……事實表明，「一黨一派一領袖」的

權力系統透過生產資料公有以達到可以控制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生存，而使國家對人民的控制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五〇年代中到七〇年代中期爲空前絕後的頂峯……即使出現五十九到六十年大量餓死人（據說餓死二千萬人）的情況下，人民也無力起來「鬧事」或「揭竿而起」。

……這種「三一體制」的「體制硬件」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徵：

1. 新聞不可能自由。從一些民主國家的情況來看，所謂新聞自由是：公民只要不表現有推翻政府的目的和誹謗行爲，任何人都可以對政府的所有政策和任何官員進行公開批評。在「三一體制」下，人民不但不能對政府的政策和高級領導人公開批評意見，而且對他們規定的一些原則也不能討論。爲什麼呢？因爲這種體制是一種剛性系統，不能對其進行直接抨擊，在這種權力一元化體制下，如果能允許公開對高級領導人和正在執行中的政策進行批評，那麼，整個社會將失去權威，任何政策也就無法貫徹下去，從而造成社會的混亂……

2. 人民無真正的選舉權。尤其是沒有選舉那些國家政策制定者的選舉權，而只能採取從上而下的任命制……

3. 法律無權威。由於權力一元化，人民無新聞自由、無選舉權，各級幹部主要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受人民監督、制約，掌權這就可以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在極端的情況下，連國家主席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某些事情上，社會甚至無正義、無是非。因此，若不改革這種體制，法律就不可能有權威，人治就不可能變爲法治。

四、國民性。毛澤東曾經對尼克森說過：史達林式的專制現象在美國不可能發生，因爲美國人民不答應……由此可見，一定的權力系統必須有相應的國民性來維持……與「三一體制」相適應的

國民性主要表現為二種特性：奴性和寇性。即在強權之下，大多數國民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而一旦沒有強有力的控制，大多數國民又唯我獨尊，各自為政、不妥協、不寬容、不合作。正是這樣的國民性才使得這樣的體制能長期存在下去。而一旦打破之後，又必然是一派混亂。混亂一段時間後，人們有覺得需要新的權威來統一，來維護安定團結、社會穩定。於是二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局面就在「專制——混亂——新的專制」之間惡性循環。此外，與這種體制相適應的國民性還有介入奴性與寇性之間的「皇權崇拜癡」。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些國民性呢？下面作一簡要分析：

1. 皇權崇拜癡。將國家的一切和大眾利益的維護寄希望於某一位「清官」、「好皇帝」身上，而不是寄希望於建立確保法律為全社會最高權威的制度上。原因：中國傳統文化中佔統治地位的人性善說，以及馬列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對無庸階級盡善盡美的假說，使得中國人的深層意識中導向：既然人可以透過修養、教育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達到盡善盡美，那麼，也就可以將至高無上的權力交給少數或某個人，而不必對他進行制約……

2. 奴性。對強權的逆來順受、委曲求全、阿Q精神、說假話等，原因：由於專制政治體制擁有強大的軍隊和嚴密的組織系統，人民無真正的結社、言論和出版等方面的自由和權利，人民作為一個在空間上和心理上分散的個體，無力反抗，只能逆來順受。而當個體的奴性積澱為集體的奴性定勢之後，專制體制就可以長期存在下去。

3. 在無強權控制下唯我獨尊、各自為政、不妥協、不寬容、軍閥混戰、家長作風、「婆媳現象」、派性、不團結、不合作、將個人意志強加於人等，都是中國人寇性的表現。原因：(1)價值二極化。在這種社會中，只有絕對好和絕對壞，那麼，誰都認為自己最好，別人不好；公開承認錯誤

被認為是丟臉的事……(2)無結社自由和達到互相溝通的新聞自由。因為寇性的反面是團結合作等，而團結、合作只有透過組織，透過坦誠相見，互通信息來實現；(3)用人標準的任意性。即用人既可以憑關係，也可以憑才能。於是互相不服氣、瞧不起；(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大多數人只能關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無社會的責任感。

可悲的是，權力一元化的政治體制在意識形態中隱含了人性善的假說。但實際上該體制鼓勵、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並使其得到充分的發揮、發展，如說假話、利用羣衆鬥羣衆、一盤散沙等等，而壓制、打擊人性中「善」的特性，如說真話、創造性等等。

如果一個人長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那麼，他將在不同程度上表現這些劣根性，並且內化到他的深層意識中，以致到國外多年，身上還留有這種「國粹」。多少年來，不少人都在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認為傳統文化並非要徹底否定，所要否定的只是傳統文化中產生國民劣根性的成分。如果我們要對「一黨一派一領袖」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而不同時對與之相應的國民性進行改造，那麼誰也無法保證中國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不重複幾千年來「專制——動亂——新的專制」的惡性循環……即使是讓那些要求民主最堅定的勇士去取代現有的權威，也很難保證這些民主鬥士不變成新的「權威」。

透過以上分析和對四十年來歷史的考察發現，權力一元化政治體制具有四個自身無法解決的對社會進步有決定影響的問題：

1. 無法保證國家實現最佳決策。出現嚴重失誤之後也不能保證其能得到迅速糾正。四十年來的重大失誤有：大躍進運動、十年文化大革命、人口問題、農村政策問題、教育問題、政治體制改革

等。原因：(1)由於權力一元化，在該體制下，國家政策不是透過各種觀點的充分討論、爭辯，然後在各派力量的妥協中產生，而是透過各種潛在的派別之間的權力鬥爭，最後由少數人說了算；(2)無新聞自由，不能及時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3)無真正的選舉，人民無監督、更換最高領導的權力。

2. 政治腐敗成爲不治之症……

3. 人力的巨大浪費……爲了維護權力一元化和社會穩定，最強壯的體力和最優秀的腦力不是被用來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而是進行無休止的整人和被整的內耗之中。它必須經常地把一批又一批人打下去，又一個一個地平反，這怎麼還有心思搞現代化呢？……另一方面，由於以權謀私和官僚主義現象的存在，在很多問題上，人們不能也不敢說真話，「時間長了，許多人就抱著一種懶得說、懶得想，甚至懶得生氣而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這種現象表面上也能給人以安定團結的假象，但實際上這種安定團結是以人的麻木、冷漠和壓抑爲代價的」（胡績偉語）。但是在私下，幾乎人人都有牢騷，個個都有難言的苦衷。一個國家，如果人民的士氣長期普遍低落，能較快地推動經濟發展嗎？……

4. 無法防止社會動亂。由於要維護權力一元化的政治體制，在黨內和黨外必須經常地進行清洗運動、權力鬥爭，這種非程序化的權力鬥爭其實就是一個個的動亂……另一方面，由於該體制自身無法解決以上三個問題：決策常失誤、腐敗和國民士氣普遍低落使國家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況，又由於沒有新聞自由這個「安全閥」（有人稱之爲「出氣筒」），人民中日益積累的不滿，一旦爆發出來，必將造成在某種程度上與權威們對抗的局面。如「四五事件」，以及近年來各地發生的一

些事件。另外，由於國家權力集中在某個能對軍隊進行有效控制的人手中，一旦沒有這樣的人取而代之，誰又能保證整個國家不出現真正全國性的大動亂呢？……

綜上所述，「三一體制」的主要功能是維持現狀而無法保證不斷進取，這種體制不但使國家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狀況，也使不少高級領導人得到一個個不幸的下場……

……四十年來的情況表明：我們的權威們和廣大人民都希望把中國建成一個高度民主和繁榮昌盛的國家。但是，由於我們對體制和國民性的研究和認識還不深入，還不系統，而無法達到既要有效地防止動亂，又要逐步地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的目的，我想，現在是時候了。

原載《人民之聲》第一期

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節選）

陳小雅

近年來，由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學科對辛亥革命研究的切入，由於各自觀照事物的角度不同、對辛亥革命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問題之一，就是辛亥革命應該避免的觀點……

一

……辛亥革命，準確地說，是以革命黨人長期倡導的武裝鬥爭為開端，有社會上各種反清勢力（包括統治階級中下層的官紳與軍人）參加的，以推翻滿清貴族極少數人的狹隘專制統治為目的的，一場兼有武力與談判、鬥爭與妥協的革命。從革命的發動來看，它實際上是「三道合一」、「四級動員」的結果。所謂「三道」，一是革命黨人長達十餘年的此起彼伏的武裝起義；二是立憲派發起的「請開國會運動」；三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收回利權運動。所謂「四級」，即會黨、新知識界、中下層官紳與新軍等四種社會力量。這場革命的最終成果，一半得之於地方獨立，一半得之於中央政變。它的發動是出乎革命黨人意料的；它的過程，是不受革命黨人控制的；它的結果，也是革命黨

人始料所不及的。在這場革命中，革命黨人擁有宣傳與號召輿論的能力；會黨擁有凝聚與網羅社會下層組織力量的能力；立憲黨人擁有基層政權管理能力與控制地方局勢的財力；而北洋軍閥，才控制著左右全局的軍事實力。

正因為辛亥革命具有如此複雜的面目和性質，因此，即使它不存在前述所謂「大氣候」之類的背景，即使它完全是一種主觀努力的結果，從技術層次上說，它的「避免」問題，也是非常複雜的。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整地單獨承受它的全部結果。

……正如歷史所昭告我們的，革命，並非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是無可避免的。古今中外，抹煞革命是不會有滿意結果的。但以不斷的改良，促進社會矛盾轉化，以改革主動解決尖銳化的社會問題，達到革命的效果，而避免伴隨革命而來的動亂的事例，則大量有之。這就是說，在革命發動以前，在一個有行政效率的發育成熟的社會中，握有對未發事件控制的主動權的，只有一個人，這就是政府。政府的政策，政府對社會矛盾作出的反應如何，直接決定著矛盾的走向與雙方對峙的性質……

二一

構成辛亥革命一支重要力量的會黨，是明亡之際，滿漢民族矛盾的產物……鴉片戰爭爆發後，外國商品經濟侵入，中國的舊有社會進一步解體，流民激增，會黨也空前活躍……太平天國失敗，會黨勢力便滲入新軍。在有些地方，甚至達到了控制新軍的程度，從組織聯絡功能來看，它的效率

已經超過清朝的地方政府甚至軍隊。在辛亥革命爆發前，真正擁有強大的組織系統和對社會下層動員能力的反清勢力是會黨，而不是新式的革命黨。如果沒有他們的參加，革命至多是一種「秀才造反」，不可能發揮席卷全社會的作用……如果清政府能夠在較早的時候，向漢族開放上層政權，結束少數民族的狹隘的專政，這股力量必將自行瓦解。但清廷沒有表現出這種歷史主動性，反而在革命已近燃眉之際，還成立了用以欺騙立憲輿論的「皇族內閣」，這無疑是對仇滿的社會勢力火上澆油的舉措。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爲一場「革命」，而有別於傳統的社會動亂和下層造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在一羣新式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的參與和領導下發生的。而這些新型的知識分子及其組織，又都是清政府洋務運動和開放政策的產物……清廷採取這些政策，原本是要爲挽救大清帝國的命運，製造「中興」而用的……但是由於清廷在這時並沒有相應地擴大政權基礎，採取廣泛地吸納社會優秀人才的措施，而是頻於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造成威信激劇流失，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會新生力量，迅速產生離心傾向。當著革命的歷史任務已經提出，革命的社會力量正在聚集之時，清政府卻把這些原來聚集在洋務派周圍，或是對皇權寄託希望的新知識界領袖排出「體外」。迫使他們與社會下層原有的異己力量結合，並給他們送去了革命的綱領和領袖……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新軍，也是洋務運動的產物。如果說，在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一年，湘、淮軍還帶有某種地方武裝色彩的話，那麼，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聘請德國教習編練的北洋新軍，則是一支拱衛京畿的重要國防力量了。但是，就在這支軍隊地位顯要上升的時候，

它在思想上卻日漸分屬於價值與目標高度分化的各種利益集團，成為國家分裂的潛在力量。北清廷視爲「王牌」的北洋六鎮，更是成爲一種高度私人化的軍隊，關鍵時刻，它便成了清廷的顛覆力量。辛亥年間的「武昌首義」，促成南北統一的紫禁城的「逼宮戲」，嚇走請袁世凱到南京就職的南方代表團的「京城騷亂」，這些重要的角色，都是由新軍扮演的。

辛亥革命的第四個重要角色，也就是這場革命導火線的點燃者，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他們導演的「保路運動」。這場運動，是二十世紀以來，民族資產階級一系列「收回利權運動」的繼續，並最終釀成了武裝衝突。考其運動的由來，一方面是國內民族資本的發展，逐漸與（透過清政府「寧贈友邦，勿施家奴」的政策實現和保障的）列強的在華利益形成衝突；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觸發的原因，乃是清廷「下放」給地方官紳自辦鐵路的權益，重新收歸國有的「整治」政策。這種「與民爭利」的嫌隙，所激發的保護自身權益的鬥爭，當然比捍衛一個空頭理想而作出的反應，要堅決得多，甚至激烈得多。

三

世界歷史上，凡專制的權力發展充分的政權，都免不了脆性瓦解的結局，一種社會政治制度愈是成熟，它一旦過時，面臨的「轉軌」問題就愈是艱巨，主動性也愈小……

一般說來，君主制發達的國家，多是社會階級尚未充分分化，或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在各民族、各階級面前佔壓倒地位的社會。在這種國家裡，政權是統治階級的禁臠，統治階級或民族以皇

族爲中心，形成政治社會的一極；廣大社會其他階級或民族形成另一極。前者透過龐大的官僚系統控制著社會利益的分配，主宰著國家機器的運行。這類國家顯然具有兩套政治調節系統：一套是內部調節系統；一套是外部調節系統。

內部調節系統，一般用於常態社會。它依照社會事務的性質，可分爲經濟系統、文化系統、政治系統……在內部調節系統中，皇權處於權力發射中心和政治主體位置……皇帝並不只是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仲裁人，他本身即是國家，他的意志便是國家的意志，除頒布法令作爲一般社會行爲準則外，他還經常運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治術）系統，調節超常狀態下的社會……所有這一切決策，基本都是出自前代統治的經驗。雖然聖君賢相也可能參照民情，傾聽輿論，決定政策；雖然皇帝也設置了一套監督與制約官僚系統的制度機構，但在最高層次上，皇權卻不受任何制約與監督，故他也無法逃避「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規律。

每當皇權腐敗，原先「無所不能」的內部調節系統便失去作用。於是，社會的第二套調節系統——外部調節系統，便自動開啓，透過「天下大亂」的方式重建社會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這第二套調節機制的啓動，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實現的。它並不依賴一個類似統治體系神經中樞發出指令，但也不是純粹地依照「天譴」。它依據的是一種特殊的機制……中國於周代以來的思想家，就給社會留下了一筆思想遺產。這種思想，便是「革命」的思想。不過，這種「革命」與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不同，他並不表示制度的轉換，而是「革其王命」（即「王者易姓」）的意思。在這套理論中，「造反」是一種比「皇權」更高的「天權」……所以古來所謂革命，大多以「奉天承運」、「弔民伐罪」、「順天應人」自相勉勵。而所謂「載舟覆舟」、「造反有理」的

理論，也遠較西方發達。

中國政治的這套外部調節系統，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於社會歷史中的。它的主要載體，是古代的知識分子，在常態社會下，靠皇帝身邊的士大夫，向皇帝灌輸這套思想，以使社會矛盾盡量在體制範圍內解決。當皇權腐敗，體制內解決問題已不可能，大量知識分子的目光便轉向社會，甚至直接加入到農民起義隊伍中去，尋找或輔佐「新天子」。

清中葉以後，帝國照例出現了周期性衰敗徵兆……雖然他們已難能可貴地作出了像「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新政」這樣的應變措施，但卻沒有改變千年來形成的「二元對置」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系統的自我調節機制……尤其是在政治系統封閉的情況下，開放社會系統的政策，只能加劇革命的總動員與舊政權的總崩潰的到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既可以說是新式革命的「長子」，也可以說是舊式革命的「繼承人」。它的爆發，不僅是對清王朝一朝統治的清算，而且是對兩千年來專制制度的總清算。當清朝的末代皇帝接過祖傳的權杖，登上紫禁城的金鑾殿時，他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代表他的前輩，來接受歷史的審判罷了。

四

……革命黨對這場革命所負的責任，主要的應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這個層次上提出要求，達到了這個要求的，應享有榮譽；未達到要求的，應吸取教訓。

那麼，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應做到哪些事情呢？用通俗的話來說，一個是「破」，一個

是「立」，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可知，在社會各種力量的參加下，革命在第一階段所做的事，是不可能再好的了。但革命在第二階段的事情，就不夠理想了。

所謂「立」的任務，就是政治建設的任務。在這個方面，通常的指標有兩項：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制度設計，一個是對設計的實施操作，其中包括根據偶發因素隨時修訂方案等隨機調節的過程……嚴格地說，辛亥時期的革命黨活動，是在一個「有綱領而無計畫，有組織而無調度，有目標而無角色分工，有理想而無現實感」的層次上進行的。

舉例來說，革命黨人在革命爆發前七年，就提出了「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的戰略主張，用以區別此次倡導的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方式上的不同。但同盟會從來也沒有明確過以何省為「雄據」之點，並實現行動上互相配合的統一調度。各革命小團體往往各行其是：他們有的側重於運動會黨，有的重視在軍隊中建立組織，有的熱中於暗殺活動，有的熱中於遊說八方，許多稱得上「職業革命家」的人，不是自視為革命的鼓吹者，宣傳家，就是埋頭於具體事務。他們親自募捐、運餉，甚至研製炸彈，卻荒於政治形勢分析。政治過程設計，更沒有考慮到各種政治派別在革命中將產生到何種作用，政治家將透過何種方式實現各種革命力量的整合。當多次軍事冒險失敗，革命黨幾乎認為起義無望的時刻，革命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時刻，以意外的形式爆發了。由於事變的這種突發性，造成革命後幾乎大部分獨立省分的政權，都落在了革命黨以外的政治派別手中。但革命黨人在建立南京臨時政府時，卻無視現實地將政府要職全部分配給自己的同黨，造成立憲派、舊官僚和社會名流「多不到政府就職」的局面。堂堂一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竟然形同往日的同盟會機關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真誠的革命者孫中山被視作「獨裁者」，偽善的袁世凱被稱爲「中國的華盛頓」，也就不足爲奇了。

辛亥革命之後，政治動盪頻仍，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制度性回溯時期……整整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探索期，才算奠定了中國現代政治制度的基礎……

在政治制度設計方面，革命黨在革命前作了哪些事情呢？一是革命團體聯盟——同盟會內部。

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設置組織機構；二是孫中山於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後的治國機關」設想——五權憲法。辛亥起義後，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時，政權建設這門並沒有採納孫中山苦心孤詣的「五權」模式，而是把同盟會的框架從東京照例地搬到了南京。這種從美國「拿來」的制度，藉助革命狂瀾，僅勉強實行了兩個月，便壽終正寢了。

……

在選擇國體的問題上，辛亥志士們的一個最大錯誤，也是不分歷史條件，不分階段地企圖「畢其功於一役」。清朝末年，由於清廷控制能力的下降，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態度上已經拉開了很大距離。辛亥革命爆發，南部的起義與北部的政變，也具有不同的性質。當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之時，北方實際上控制在軍閥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南方本來不必急於「問鼎中原」，而是先以南部聯邦的形式，鞏固已有的勝利果實。利用共和的優勢和南方的資源發展經濟，在實力與人心已經鞏固的情況下，在選擇有利時機與北方決戰，這樣就可以避免在把握不大的情況下，與北方的袁世凱作明知無望的妥協，以至於把革命成果「拱手」送給他人。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辛亥革命從參加者和決定因素質方面來說，具有非常複雜的性

質，但從大的方面來看，握有主動權的有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一是清政府，它的主動權主要在運動爆發以前；一個是革命黨，它的主動權主要在運動的醞釀過程中。在運動爆發以後，它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在此之前的準備。

由此，我們可以給二者分別贈送兩句遲到的名言，給前者的是：

「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

——梁啟超語

給後者的是：

「機會，只有對有準備者，才是存在的。」

原載《求索》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全文一萬字

北京市十萬學生和平請願口號

〔共同口號〕

和平請願，反對動亂

公平對話，平等對話

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

堅持改革開放

自由萬歲，民主萬歲

反貪污，反腐敗，反誣衊，反造謠

人民萬歲！理解萬歲！

愛國無罪！

新聞自由

反暴力，反欺騙

爲民請命，絕非動亂

我們不反黨，我們不反社會主義

尚曉原
記錄整理

「一個革命的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鄧小平文選》第一三四頁

「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鄧小平文選》第一三四頁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愛國熱忱，人民作證

人民日報，胡說八道

北京日報，胡編亂造

中央電台，顛倒黑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北京大學〕

憲法至上

堅決維護憲法權威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

堅決維護憲法尊嚴

抗議《人民日報》任意歪曲誣衊學生運動

真理萬歲

清除官倒（僚？），剷除官倒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全國人民國家主人

無民主，毋寧死

北大北大，不怕不怕

忍痛罷課，平等對話

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清除

北大北大，人民北（養）大。

為民請願，灑血不怕

聯合起來，推進民主

真正聽聽人民的聲音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國際關係學院〕

抗議新聞欺騙

〔北京農業大學〕

農業為本，教育救國

打倒官倒，減輕農民負擔

官倒富，農民苦

民以食爲天

無農不穩

重視教育，教育救國

打倒貪官污吏

打倒官僚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懲辦貪官，廢除特權

擁民主而亡，抱科學而死，視死如歸

〔清華大學〕

堅持法律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

民心不可欺

擁護四項基本原則

反貪官，救百姓

新聞立法

悲歌一曲壯君行

拳拳赤子心

新聞要講真話

新聞的生命在於事實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尊重憲法，人民必勝

廉潔奉公，民主萬歲

得道多助

愛國不是反革命

實事求是，教育立國

憲法立國

官倒不倒，人民不饒

嚴懲貪官，清除腐敗

我們一無所有

爲國爲民，一片誠心

我以我血薦軒轅

安定團結

〔中國科學院〕

擁護改革，哪來陰謀

士氣不可辱

錢太少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不再沉默

血諫政府

民主選舉不能僅有一個「候選人」

毛主席教導我們：「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

良心正義民主

新聞要真實

民主要靠爭取

民主自由永存

民主十改革＝現代化

一腔熱血付東流?!

爲民而死

幹部要年輕化

當官不與民主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歷史作證，人民必勝

位卑未敢忘國

愛我所愛，無怨無尤

熱血救國

勞而無獲，苦浮人生

天賦人權

讀書不忘愛國

〔北京外語學院〕

我愛天安門

穩定物價，促進民主，大小老九，共求民主

罷課罷課 支持理解

〔北京理工大學〕

人民大眾是中國的上帝

為民主戰

官倒不倒國家倒

我哭我泣爲我民，民捐民助求民主
媽媽，我們沒有錯

〔北京師範大學〕

面黃肌瘦，我們的老師在挨餓

教育危機，祖國的花朵在凋謝

抗議政府誣蔑

正視事實，保持國格

反對挨餓

正確評價

救救教育，救救孩子

解放報禁

不許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重演

民主共和萬歲

失民心者失天下

精忠報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光明磊落，無私無畏

按勞分配，剷除官倒

不自由，毋寧死

公布官員財產

祖國不會忘記

民主科學，振我國魂

民意不可辱

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反迫害爭民主

欲蓋彌彰，紙是包不住火的

政府應該說真話

媽媽，我們在這裡

一心為公，終生報國

重視教育，珍惜人材

興國在於科技

〔北京科技大學〕

反對大量進口轎車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誓死捍衛憲法

為民請命，雖死猶榮

起訴書：原告：北京市高校學生

被告：人民日報

事由：侮辱，誹謗

……

〔北京醫科大學〕

對症下藥，打倒官倒

治民病，醫國患

救國救民，救死扶傷

共和國萬歲

〔北京體育師範學院〕

振興教育

〔中央財政金融學院〕

鄧小平同志說，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敢於面對事實，講真話。
老的不退出來，新的就進不去

〔北京郵電學院〕

堅決要求對話

愛國憂國報國

〔北京師範學院〕

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無憂事事憂。路在何方？

尊師重教，教育救國

教育不興，師魂安在

國殤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

人民警察保護少數民族

七十年了！還要多少代！

甘灑熱血

生死自由魂

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

〔北方交通大學〕

「四五」運動是可以理解的

麵糰法律形同虛設

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圍觀者〕

天之驕子，人民感謝你們

學生代表歷史，學生代表人民

歡迎勇士凱旋

壯士們，到家了

凱旋在子夜

向衝在最前面的勇敢的人大人致敬

誰是最可愛的人——人大人！

人大教師向你們致敬

平平安安回家來

大快人心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歷史的記錄

四二七運動的勇士，民主先鋒，辛苦了

學生是中國的希望

後生教先生，先生趕後生——生生不息

學生萬歲！理解萬歲！

——二十二樓全體教師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胡啓立與

《中國青年報》社部分幹部的座談

李大同錄音
陳小雅整理

徐祝慶：今天啓立同志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到我們這兒來，跟大家一起座談新聞改革、聽聽新聞報導、新聞改革方面大家有什麼意見。希望大家暢所欲言，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建議，都可以談。

胡啓立：作爲我們中央分管宣傳和新聞這一塊的幹部，作爲一個老的青年工作者，應該和我們《中國青年報》的同志，保持一種直接的接觸。可是我過去這點並沒有做到，向大家來表示我的歉意。今天，一方面來看看我們老同志，再一個和同志們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談一談，關起門來談一談。我知道同志們這一段時間辦報很不容易，社會反差很大。記者們與報社工作的同志受了不少的冤氣，也有很多的意見，因此想來聽聽大家的聲音，因爲記者和羣衆有很密切的聯繫，你們又是青年報的工作人員，負有領導的責任。因此對你們的看法特別重視，所以我想聽聽大家的聲音。直接聽，比我們看材料、聽彙報強得多。真正理解羣衆的脈搏，就是這麼個想法。因此我想今天來了就不拘形式，也不擺架勢，不擺樣子大家都……我也……都是黨員，你能夠發表不同意見……重大事情……不必非得字斟句酌……你也得負責任……那樣大家都感到非常吃力。主要是想聽聽同志們的呼聲，聽聽同志們的意見，使我們比較直接了解羣衆的脈搏。我可是沒有準備什麼成篇或者是成套

的東西準備在這裡發表。毫無這個意思，主要是聽大家的，這就算我的開場白。

包括你們無論多麼尖銳的批評，也包括對我的，對中央的，有什麼意見都請你們說，在這裡說什麼都可以，我都願意聽。我將非常虛心的非常誠懇的聽大家的意見。誰先帶個頭？大家也可以插話嘛！

（靜場約一分鐘）

郭家寬：好吧，我先帶個頭吧。我沒有準備，啓立同志來，這也是剛得到的消息。感到既很意外，作為我個人又感到很高興。我是參加了請求和中央負責同志對話的那封信的簽名的。並且，前天下午，我也是作為記者代表，到記協遞交了那封信。我們始終稱那個送去的東西是一封信，信還在起草的時候，我就強調……就寫一封信，談談我們的觀點，希望能夠從這次學潮中的新聞報導，來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同時想透視一下，我們新聞工作多年來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是一些想法。當然現在新華社就這麼發通稿了，大家都叫它作「請願」。那麼，我就先從這封請求對話的信談起。

寫信這個想法，最初同志們在一起議論，是四月三十日上午，比較早，紫陽同志那時候在朝鮮（編按：指北韓）還沒有回來。四月三十日上午開始醞釀這個事情，當時的情況是我們覺得非常難辦、心裡非常難受。當然，前天下午在記協，考慮到有那麼多外國記者在場，我斟酌了一下，用了「尷尬」這個詞，我們新聞工作者在這次學潮中間感到比較尷尬。我是十九日才從外地趕回來，回來後到廣場上看了看，到耀邦同志家裡面去弔唁。從當時的情況，沒有料到後來會發生學潮。因此後來學潮發生之後，也沒有料到規模會越來越大。再一個沒有料到的是，與八六年學潮不同的是，

連著幾天都上了大街，而不是在校園裡。還有一個沒有料到的是，學生這次鬧的時候，羣衆反應這麼強烈，那麼多，幾十萬市民在旁邊圍看，支持，鼓掌，送麵包，送汽水。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社會事件。作爲我們新聞記者來說，因此顯得非常被動、特別難受。實事求是地講，改革開放十年以來……我七九年從中國青年報復刊後調到中國青年報當記者，當了十年記者，過去的情況也了解一些……說實話，這十年，中國的新聞事業跟其它事業一樣，變化是非常之大的。前天晚上，香港電視台的記者採訪我，我講了這一點。這和十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的新聞報導比過去是開放多了。

但是還是不行。在平常的時候，它可以顯示出比過去進步很大，但在突如其來的事變當中，一下子又顯得非常之被動。有些東西就不能報。當然頭幾天還好，上面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指令。據我們了解，十八、十九、二十，每天下午，總編都到中南海開會，去了解精神，回來以後傳達貫徹。對悼念期間的報導，剛開始幾天沒有什麼明確的限制。我知道的就是一條：單位內的可以報導；單位外的，街上的，不讓報導。到了後來，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多，到了十八日晚上，十九日晚上，我去到新華門，出現了那樣的情況，這時，新聞媒介才開始有所反映。反映用的都是新華社的通稿。這個稿子一出來，據我們了解，在公衆中的反應就是比較強烈的。而且，十九日晚上我在新華門，在那待到一點多，據我們，還有其他許多同志，在那待的時間更長的，我們覺得新華社的那個報導，是不夠客觀，不夠真實，不夠全面的。也不能說它完全不真實，不客觀。因爲它裡面寫的，也是真實，發生了。比如說，有一個學生喊「打倒共產黨」這個口號，新華社的報導裡面就突出此例了。確實有一個學生，被警察推到車上去的時候，才喊了這麼一句口號，沒有別人附和著喊。報

導突出的這個也是真實情況，但沒有反映出廣大學生對耀邦同志的那種悼念之情，以及他們的愛國激情，這是更大多數的情況。這種情況對於我們記者來說，認為總體上失真，總體上不夠客觀。事實證明，這個報導實際的社會效果也是不好的。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情節，就是「採取強制措施」怎麼怎麼題，在這篇報導裡沒有反映，只是用了一個非常模糊的外交詞令，就是「採取強制措施」怎麼怎麼樣。但是寫了警察挨打，這也是真實情況。警察打人的問題，在袁木和學生對話的時候，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了。閻立本同志做了很多解釋。我們聽了這個解釋，總的來說還是羞羞答答的。實際上句話明確地說：「警察確實打人了。」（二十七日，警察還把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同志打了。我聽說，新華社分社的很多同志聯名寫了一封信，要找人大談話。——插話）確實打得比較厲害。也不說別的，我們報社就有一個實習生，大學剛畢業，二十日凌晨二點半，在廣場也挨了打。兩次被打得抱著頭躺在地。但沒有流血，然後又被審了兩個小時，放回來。就是說，當時打的時候是不分青紅皂白，不聽你分辯。他說我是中國青年報的實習生，我們到廣場實地了解情況。那邊說，你別說這個，上來就打。

……這是新聞報導。那麼我想，到了二十一日晚上，學生進一步擴大事態，跟這個是有關係的，跟警察打人以及新聞報導沒有客觀地反映事實是有關係的。所以學生隊伍出現了一些：「嚴懲兇手！」「人大，人大，人民養大，爲了人民，流血不怕！」這樣的標語。我覺得這是擴大了事態，擴大了……

那麼，二十一日晚，十幾萬學生開始進駐廣場，那樣地悼念耀邦，很遺憾，因爲我第二天要參加追悼會，晚上十二點鐘就離開了，沒有親眼目睹學生入場的情況。但是我們有的同志，一直在那

兒待了一個通宵，看到學生列隊的情況、入場的情況，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看著升起的國旗唱《國歌》的情況，以及後來三個學生跪下請願。這些情況，到現在為止，我可以不對這次學運學潮作任何評論，到底是什麼性質？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七分對三分錯，還是怎麼樣？我不想作這個評價，我覺得這是政治家的事情，同時也是廣大人民羣衆的事情。作爲我們新聞記者來說，我們的職責是真實地反映這時發生的一切。真實反映，客觀報導。只要我真實反映出來了，客觀報導出來了，究竟是怎麼一個性質，政治家自會去評論它，人民自會去評論它，歷史自會去下結論。但是，後來我們之所以感到尷尬，感到難受，就是因爲，連新聞記者起碼應該做到的，真實、客觀、全面的反映發生的事情，這都無法做到。但是有幾家報紙還突破了一下，《科技日報》、《農民日報》、《中國婦女報》。本報沒有登，用的都是新華社的通訊。

這些情況，在我們報社內部，激起了比較強烈的反應。編輯記者、中層幹部與老總們之間，交鋒，矛盾，最激烈的時候，甚至是拍桌子吵架。是不是應該在我們的報紙上來反映這些真實情況？當時的見解，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大家意見是不一致的。我是主張真實報導的，老總呢？沒有同意發這個東西。平心而論，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他們也有他們的道理。但是我覺得，就是在這種交鋒的情況下，還是應該客觀真實地反映。我覺得，這是我們記者、新聞工作者的天職。後來，事態進一步擴大，到了二十七日，十幾萬學生上街遊行，當然了，更直接的原因是《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對於定性的不滿，不服氣，感到委屈。另外，我還從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反省一下，我覺得二十七日事態擴大到那麼大，仍然跟我們新聞界沒有盡職有關係。所以，在二十七日的遊行隊伍裡，如果要分類的話，大概數量最多的是責罵新聞的、「新聞要說真話」、「新聞自

由」、「開放報禁」。另外還有一句罵新聞單位的順口溜，不知道啓立同志聽說沒有？「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沒有光明；中央電台，顛倒黑白；北京日報，胡說八道。」對我們客氣一點，沒有編在這裡面，但遊到這裡時喊了一句：「中國青年報，莫明其妙」。還算口下留情。所以，我們當時站在旁邊看，作爲一個記者，心裡感到非常難受。一方面，從個人感情來說，爲學生的這種熱情所感動，再一個從職業道德來講，爲一個記者沒有在報紙上全面反映這個事情而感到難受，感到失職。這裡，我想再強調一遍，我不想對這場學潮在這個時候對它的性質做出評價，我們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們可以在報紙的版面上可以不去爭這個評價。我覺得這也不是我們新聞記者的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客觀全面公正的報導。這一點沒有做到，所以，我認爲，是後來學潮繼續升級擴大，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衝突越來越激烈。但是後來我們議論了一下，覺得我們老這樣去爲難總編輯也不是事兒呀！其實，主要問題也不在老總們的身上，這是我的想法。我們反思了一下，覺得問題還是在我們的新聞體制，以及我們黨現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方法上。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我和大同他們幾個在一起，自發的醞釀了一下，越過老總們，直接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請求對話，談談我們作爲普通記者的心裡話。出發點是一個記者的良心和職業道德。我還補充了一句，我們簽名的人，許多都是中共黨員，出於我們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那天香港電視台採訪我，我也講了這麼一段話，我們有這麼多報紙、電台、電視台，但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在自己的首都，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們的公衆還要聽「美國之音」！從「美國之音」去收聽北京發生的事情。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記者的恥辱。我說，作爲記者來說，我們中國記者的素質一點也不比美國記者差，「美國之

音」也有不準確，不真實的地方。比如說，今天《參考消息》第一版，合衆國際社發的這篇述評，評我們的這封信，說《中國青年報》請願記者李大同說，「實現新聞自由的時候到了。」根本沒講過這句話，不論是在會上，還是對外國記者，還是個別在一起的時候。顯然是不真實的。所以，我說，如果對中國事情的了解，外國人怎麼比得上我們有優勢？我們對中國的事情了解得太深了。但是爲什麼還要我們的公衆，把耳朵借給「美國之音」呢？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恥辱。不是我們辦不到這一點，而確實是新聞體制上還存在一些問題。一遇重大問題，就要聽「美國之音」，就要把頻道調出來。於是就考慮給中央領導同志寫封信，不光是談談這次學潮中的新聞報導，而且要談一談我們的新聞體制，談一談我們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觀點。信談了三段，提出目前我們新聞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就是那三個問題，希望有機會和中央負責同志在一起就幾個問題探討一些心得，交換一下看法。想把我們的新聞改革切實的往前推進一步。把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情辦得更好。特別是在這樣的比較嚴重的關頭，比較重要的時期，以後我們的新聞工作不要給黨、給國家幫倒忙。

當然，如果這次對話能實現，那個香港記者也問我，是否認爲會取得很大的成效？我說，只要對話能實現，我絕不希望一次對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中國的新聞改革跟其它改革一樣，非常艱難。肯定是個漸進過程。我是第一次和啓立同志這樣面對面坐著談心裡話，其實復刊的時候啓立同志來過，這是第二次，平時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們希望有這麼一個機會，談談我們的心裡話，供中央領導同志、黨中央、政府，在研究新聞問題、新聞改革，特別是下一步在制定新聞法的時候，能參考一下我們這個意見。

胡啓立：關於新聞體制，你們有什麼想法？

郭家寬：提到這個問題，我簡單的講一下，我們的新聞體制，打個比方來講，多年來和計畫經濟一樣，是計畫經濟下的大一統的新聞體制。它起源於過去革命戰爭年代。而且我們的報紙，一開始誕生就是黨報，一直延續下來，建國以後，沒有相應的改變，以應和平建設時期的需要。甚至在過去左的路線下不斷地強化，到了文革發展到頂峯時期，而我們的新聞體制也糟糕到頂峯時期。不誇張的說，如果說五八年我們的新聞工作起到了禍國殃民的幫兇作用，文革當中更是起到了幫兇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把它定在七八年五月十五日，是中國新聞事業開始有了變化的一個開端。這十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各項改革都在往前推進，新聞事業，伴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在不斷地改變。這幾年，改革的步伐加快了，確實和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整個體制還沒有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平時沒有什麼大事時可以放得開一點，袁木同志那天講，我們實行總編輯負責制，我們都感到好笑。但是你說它完全不是總編輯負責制也不是，平時權力很大，發什麼、不發什麼，總編基本上可以定，但到關鍵時刻，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那就不行了。那麼形象地說，我們的新聞體制，就像產品經濟下，大一統的計畫體制，那種方法，那種模式。

現在總的來說，我個人覺得，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還是限制太多。

關於「新聞自由」這個口號，現在新聞界呼聲很高，我個人的觀點，我現在還不願明確提這個口號。因為在這些問題上，我自己有……新聞法……也是新聞工作經常受到限制的一個理由，比如說，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大局的穩定，社會效果不好。比如這次上海，停《世界經濟導報》也是這個原因。裡面有些內容對大局的穩定極為的不利。平時我們也經常碰到這樣的事情，有的東西不

讓發，明明是事實，我們覺得從新聞的角度講應該發，總編不讓發。那麼從這次學潮，從新聞報導的實際社會效果來看，事情恰恰相反。限制過多，卡得過緊，有時候甚至搞歪曲報導，恰恰會造成社會動亂。如果能夠讓新聞工作按新聞工作的規律辦事，最起碼一點，按新聞的……來辦事，客觀、真實、全面，反而有利於社會安定，有利於真正的、民主氣氛下的安定團結。

李大同：這次啓立同志來，我們確實是出乎意料。我們要求和中央領導同志對話，這封信就是由我起草的。並且第一個人在上面簽了名，並且把我是中共黨員，現在擔任什麼職務都列上。我就是準備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我準備接受這樣的處理。因為這在新聞界，畢竟三十年來是一件前所未有的舉動。我們當時覺得，確實……很大。而一些老同志、報社的領導同志，和我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建議我們不要搞這樣的活動，當然我們當時也不夠冷靜。很粗暴的對領導說：「請允許我們行使自己的權利」。但是現在看來，全部情況是在一種非常好的氣氛中進展。今天啓立同志親臨本報，所以，我確實想藉這個機會講一點真話。把任何的虛飾，或者說作一點外交詞令的表示，我都不想做。我很懷疑，經常在中宣部召開的各報總編輯的會議，是否有那樣的氛圍來真實的反映新聞工作者的心聲，我很懷疑在這樣的場合能夠作那樣的表達。但是我相信，各報的總編輯爲了自己的手下各部門的主任好，其實在很多問題上，心是相通的。但是，他們處於他們的地位，他們所承擔的這種政治責任，在關鍵時刻就缺乏一種洞見。剛才家寬同志介紹了一下本報和總編輯之間所發生的劇烈的摩擦。據我所知，本報確實是最劇烈的一家。簡直是一次浪潮不行就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不行就第三次浪潮。但據我了解，首都各家報紙，都發生了這樣的和總編之間的摩擦。《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有一百五十多位編輯記者具名，要求和編委會對話，要求和編輯們

說明，這篇社論究竟是怎麼出籠的？包括《科技日報》、《中國婦女報》，都有類似的行動。我想，新聞界這次的這樣劇烈的不滿和行動，包括遊行，本人在理智上是非常反對這種非程序行爲的，我想，遊行是可以的，但是既然北京市有這樣的十條規定，那麼，事先還是應該去通過一下這個東西。現在沒有什麼人去申請過。並不是你那十條就是不許遊行。我覺得也不盡然，也許申請了也能同意。我事前覺得是一種不明智的行爲，事後，我聽說，當時魯博會上的議定，實際上是靜站，那就是說記者心裡面還是比較清楚的。後來由於時勢使然，走動起來。就是原本不想走進去的，已經無法不走進去了。原來不想參加的，也只好支持自己的同仁。那麼，你現在是以「一種非法行爲」來譴責它呢？還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聞界推進新改革的要求」來肯定它呢？我都覺得爲時過早，這個問題可以留待歷史來判斷。

我想提請中央領導同志考慮的是，我們這個要求對話的信上所寫的，主要是新聞體制改革。剛才家寬講了一下，我們的體制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產品經濟形式下的，包括戰爭年代形成的某些傳統，造成了某種體制。家寬講的，只是它的性質的某個方面，我還想補充一點，我非常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能夠對我們的新聞體制作出根本性的反思。而不是用一、兩句話來概括我們新聞改革的方向。我認爲我們的新聞體制還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工具性。這和我們的新聞理論是有連帶關係的。我們常常講，我們的新聞是一種宣傳工具，是一種黨的喉舌。並且只要它堅持了黨性，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人民性。在這一點上它們天然統一的。黨性和人民性，事實上，無論是從事實際的新聞工作者，還是新聞理論的研究工作者，目前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我們認爲，在我們目前這種新聞體制下，黨性和人民性是常常不一致的、常常發生矛盾和偏離。但是

由於我們這種體制沒有一種自我調整的能力，在實際運作當中就常常體現一種慣性，如果正確的路線佔主導地位，而我們黨的領導人，比較開明，比較明智的話，我們在報紙上見到的報導就比較開明，比較開放，一旦錯誤路線佔統治地位，或由於我們黨的個別領導人的個性使然，就可能使我們的報導受到極大的緊縮和壓抑，而這套工具式的體制，是無條件的對上負責的。而我們這套新聞體制，竟然在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在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全面的、比較深刻的反思，但是對我們的新聞工作，沒有做出非常深刻的、非常認真的，或者叫做里程碑式的反思。在這方面的工作，缺點還是很多的。

從我們實際新聞工作者看來，中央領導同志對新聞業應該是一種受到尊重的職業這一點看來認識得不夠。總是把我們的新聞工作者等同為黨的宣傳幹部。按照黨的宣傳幹部的這一套管理體制、方法，來進行管制。當然，「管制」這個詞似乎嚴重了一點。意思是這個，進行……因為事實上，無論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也好，無論是世界潮流的發展也好，信息，是現代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應該值得尊敬的獨特的職業。而絕不簡單是黨的一個宣傳陣地。我覺得中央領導同志在這一點上，認識還不夠。在重大的，突發性事件的報導上，我專指這次，前頭還有很多例子可舉。我們這些第一線的編輯和記者，感受到的最大的東西是什麼？可以說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恥辱感。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恥辱感？就是中央的禁令直接侵犯了我們的職業道德，傷害了我們的職業榮譽感。我們很多同志都很激動的……（哭。有人插話，我們感覺那是犯罪……）

×××：中央領導同志……這次學潮在羣衆中的反應……，我們作為記者採訪，聽了領導同志傳達小平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社論以後，二十七日學生又上街。當時，我作為一個攝影記者，

最擔心的是，因為從社論，從講話，從北京市、上海市萬人黨員大會，這個調子是很緊張的。最擔心的是，既然是對待「動亂」嘛，那還有什麼客氣的？如果流血，我們當時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絕對不是靠某個人的意志可以收拾的。絕對不是！十幾萬學生遊行幾乎是百萬羣衆夾道歡迎，就和解放軍當年進北平一樣。這種民心民意的反映，如果中央領導同志不知道的話，我不相信。因為天安門廣場華燈上，到處都是攝影機，都是現場。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講：李鵬同志不知道有三個人在那跪下，我對這種說法也表示懷疑，當時的人是十幾萬啊！不是一個、兩個。但是，如果李鵬同志真的不知道的話，那是不是李鵬同志這個渠道不通了？就在眼皮底下。而且羣衆也是一種情緒，幸虧中央也是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這真是一個萬幸。前天我回來回得晚，在個體戶飯館那吃飯，講的都是學生遊行的事，老闆和老闆娘在那聊天，說二十八日，派出所的警察就把這一片的五、六百個個體戶全招去了，開緊急會議，誰給學生捐款了？非法遊行，誰給錢了？誰給學生送水了？送麵包了？可口可樂？自己交代，互相揭發。大家都說沒有。後來那老闆娘說：「我們憑什麼不可以給學生送水？派出所的所長，他家打大衣櫃，讓木匠到我這兒來吃飯，給我扔了五十元錢吃了我一個星期。」她說僅僅是一個所長啊！所以我覺得，悼念耀邦同志，對於耀邦同志的看法，民心評價之外，也確實反映了我們國家的黨風、社會風氣，已經到了不能不收拾的地步了。如果中央不在這方面下決心，我覺得這個國家不可收拾。那麼多老百姓，不要說我們對學生如果像電視對話的態度，說實話，對對話的反映並不好。如果有那個決心，有那個及時勁兒，把官倒收拾收拾，把貪官污吏收拾收拾，我覺得學生也還是很理智的。

李大同：剛才很激動，我還是接著把想說的話，繼續剛才幾個同志……我們這次和老總衝突，我剛才講了第一條原因。我還想接著講，我們這個職業，是有我們的職業規範的，是有我們的職業道德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我們自己異化成一種服從性的工具。不能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面對的是成百上千萬的公眾，我們在向他們傳達信息，這個信息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全面，是不是客觀，每時每刻都要受到公眾的檢驗。我們必須得對人民負責。這是我們的天職。這次我們衝突，有一個爭論的焦點：發與不發，你們是站在中央一邊還是站在學生一邊？成了這樣一種問題！似乎發了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試想一想，那天我們國家全部黨政軍領導幹部都在大廳裡悼念，都出來看到十數萬學生坐在那，這是多麼大的新聞！你不發它就没有了嗎？它就不存在嗎？外國記者就不加以報導嗎？我們竟然可以視而不見，在中央最主要報紙上居然可以隻字沒有，將來我們翻開歷史，我們說新聞是記錄歷史的，翻到這一天的報紙，隻字沒有，這會怎麼樣？因此，我們既不，我們沒有這種政治上的選擇，我們並不是說發了這個東西就站在學生一邊了，不發這個東西就站在中央一邊了。我很不同意老總的這種論題。我們說，我們作為記者應該首先站在事實一邊。首先報導時空發生了什麼變動，不行！那麼，事實證明不行！那天晚上，有多少記者自動齊集在這間屋子裡，全部把自己親眼看到的，親耳聽到的素材集合起來，供我們幾個人製作。很多同志要求一夜不睡，早上報紙一印出來就馱上報紙到外面去散發，來挽回我們報紙的聲譽。我們很多記者在採訪的時候，竟然不敢說自己是《中國青年報》的！因為我們沒有報導。只好說我是市民，我是外地人。攝影記者說我是《科技日報》記者，人家要他掏出記者證來，又不敢掏，說我是暗房工人。這種恥辱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超過了我們涵養的極限，說句老實話。

因此，我想請中央領導同志應該好好聽取廣大新聞工作者的心聲。

我認爲我們現在的新聞體制除了政治上的不利以外，剛才家寬同志已經講過，由於不報，由於片面地報，起到了擴大事態的作用。我們當時要求報的一個論據是：這會幫中央的忙。因爲我們的標題就是《悲痛、理智、自勵》我們在向學生暗示，你們應該這樣、應該堅持這樣。我還想請中央領導同志注意，我們現在這種體制，在極大地削弱我們這支隊伍的質量。我不知道中央領導同志注意到沒有，前些日子，中國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中國潮」的報告文學發獎大會，前十名有七名是記者，那麼，記者成爲「走穴」的人，這倒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最優秀的記者不給報社寫東西了。紛紛走向比新聞自由度更大的文學領域。我非常擔心這種狀況下去會怎麼樣。包括本報一些非常優秀的記者，不寫了！都去寫報告文學了。我們隊伍裡到底還能留下多少真正優秀的人？因爲他們真實的見解，他們了解到的真實的情況，不能在他職業的圈子裡得到展現，他只好去「走穴」，就像那些流行歌星一樣，不給他提供正式演出的機會，他只好去「走穴」。

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蘇聯、東歐，世界上和我們共同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聞公開化方面邁出的一步接一步的堅實的步伐。這種不斷的信息傳過來，對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刺激非常大。不是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一個副總編輯剛剛到蘇聯去採訪回來，他在私下裡和《共青團真理報》的總編輯說，你們說老實話，你們現在還受什麼約束？這位《共青團真理報》的總編輯說，除了外交問題現在實際上已經不受任何限制。當然，還要有法律的保密範圍。不用提，我們自己就會自我約束。那麼，蘇聯報刊的發行量，包括《真理報》的發行量，大幅度的上升。有一個陪同團的女工作人員告訴他，每天幹什麼呢？就看報紙，因爲現在報紙上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她訂了五、

六份報紙，每一份都要看下來。但是我們現在能夠提供的東西……爲什麼《參考消息》的發行量最大？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爲什麼我們自己正規報紙的發行量，不如《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大？說得過去嗎？因爲我們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特別是公衆關心的信息太少了。公衆拿來和自己身邊的事情相對照，覺得這是不真實的、是不關心的，他就不喜歡這張報紙。《中國青年報》之所以比較受到歡迎，就是比起其它報紙來說，更多的接近羣衆、接近青年，但又絕不是完整準確地反映了他們的。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呢！我們的職業規範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這個世界上發生一件事情的話，我們能夠全面、客觀和公正地去反映它。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失職。

那麼，我感到，作爲領導中央報刊的中宣部的工作，有極大的缺陷。事實上，關於報紙日常的這種宣傳報導，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的指示精神還不是非常之多的。主要還是中宣部的領導，在那召開例會也好，談他們的意見也好，但是我們認爲，我們到這個報紙已經十年了，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趙紫陽同志十三大上講的「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我們中宣部究竟根據沒根據這樣的精神全面清理我們的指示，我們給報社的這些規定？清理過沒有？我相信是沒有的。這各種各樣「不許」的禁令究竟有多少呢？我們的副總編輯高偉同志，沒有費勁就鬧出了三十個。送到總編室，這也不許，那也不許，以至細緻到了某種提法都不許！

（胡敏立問：從哪一年開始？）從三中全會以來。（胡問：說什麼不行？）「不許」，迅速地就整理出三十個不許，其實遠不只這個數，我相信。老高也可以談……（眾議論）

郭家寬：不光舊的，今年元月份又來一個新的，就是中宣部和國務院辦公廳發的《關於突發事件報導的嚴格限制》，比十三大的精神，比去年都是個大倒退。去年一架一一八安——二飛機摔下

來，全都損失十八萬。到了去年夏天，三七五〇飛國內的，飛機摔下來，當場摔死四十多個人。我們通訊員聽說了連夜現場採訪，發來電報，據說，這個人還沒落實，還受到一些批評。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這個飛機摔下來，這個人錯在什麼地方。

（插話，議論）有人解釋說那架一一八上坐的是外國人，所以才報。這架坐的是中國人……我想，這次學潮中間縮手縮腳，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李大同……問題在於，這個東西不清理，不宣布的話，他不整你就算了，他如果整你，這都有效。我們上次有一篇報導出了一點問題，這個張……當總編輯也當了有幾年了，竟然從自己多少年的筆記本上查到這樣的規定，他要到檔案庫裡去查，你們說說，誰的腦子裡能記住這麼多如牛毛的規定啊？我們的工作應該是在一個基本原則下的工作，而不應該是在這樣一些亂七八糟的禁令規定的工作。很多臨時性的某個個人的意見，就必須成爲一條、有案可查、援引先例。這很麻煩的。

我很希望責成中宣部的同志根據黨的十三大的精神，根據紫陽同志這次講話的精神，對造成這次極爲嚴重的不滿，造成這次學生的大規模的遊行，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這已經是非常深刻的歷史教訓了。但是我們沒有這種制度化的保證。我們新聞工作者手裡，沒有一種寬鬆、寬容、大膽工作的尚方寶劍，沒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我深爲老總們難受。

我們爲了籌備好這次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會談，這些日子裡也在廣泛徵求新聞界的意見。我們感到，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爲中央提供一份可供參考的、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案。我們不想僅僅是發發牢騷就完了。這沒有多大意思。當然，也應該發，因爲中央領導同志很難聽到我們的牢騷。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有意義的（胡：這不是牢騷，這是理性的思考。）我們很想經過非常充分，非常嚴肅的研討，給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具體的操作的方案……

……造成學生事態擴大一個很重大的原因，中央各大報紙，而且我相信是所有省級以上的報紙，都在頭條刊登《人民日報》這條社論。它究竟？社論是代表編輯部對某件事情的看法，它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涵義。在西方新聞界，轉載別人的新聞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轉載人家的社論，那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不可能的。這只是代表你們編輯部的觀點。現在我們的新聞運轉機制裡有一個很要命的弊端，就是把社論和新聞混為一談。新聞本身被賦予了高度的政治性，或者叫做暗示性。這是一個極需改變的狀況。即便是在黨報上，我們也應該把言論和新聞作嚴格的界定。新聞就是新聞、新聞就是事實的報導而不代表誰的觀點。如果要發表觀點的話，可以用本報評論員文章，可以用社論文章。如果我們是黨中央的機關報，我們可以採用黨中央發言人的方式，正式對某一件事實作出我們的看法。但是事實另外有其它的涵義。現在我們在新聞報導上所受到的種種約束，事實上就是新聞和言論混為一談了。似乎你發表了這個新聞就是支持了誰，就是反對了誰。這是不應當的，這是一個極大的混淆、界限不清。

我們建議中央可以責成宣傳部研究這個問題。能否把報紙上的言論和報紙上的新聞事實作出一個明確的規定。使公眾知道，事實就是事實，而小楷，代表編輯部觀點。這樣的話，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混亂。如果編輯部對某個新聞事實有看法的話，他完全可以加編者按、可以加編後、可以加短評，來表達編輯部的觀點。但絕不能由此來不能報導某一件事實，不能全面的報導某一件事實。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現在形成了一種慣性，現在位居領導崗位的同志不由自主地這麼去考慮問

題，發表什麼就代表了什麼，就意味著什麼，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況。也是我們這種陳舊的新聞體制的慣性。現在應該明確提出這個問題，要把新聞事實，和編輯部的言論分開。

那麼，剛才也算提了一個建議了，就是建議根據黨的十三大精神全面清理一下中央宣傳部，關於各中央新聞單位，乃至全國新聞單位這個不許發，那個不許發的……它處於一種無序的狀態，是受當時的一種形勢、受當時中央某位領導人的看法左右的，缺乏根據的東西。我們建議把這些東西清理一下。剛才老高講，這三十多來，不費勁，就三十多條。事實上已經無法報導了，如果連「危機」這兩個字都不許提，這個報紙上還能提什麼呢？有危機感是中華民族有希望的表現。現在我們有一些領導同志聽不得這兩個字，似乎一提危機就是眼前一片漆黑。並不是這樣，居安思危，古訓就是這樣，危是什麼？就是危機。居安尚且要思危，在我們現在困難的時候，就更應當思危，而未必諱言這個東西。要相信我們的人民有這樣的抵抗力，有這樣的承受力。

另外，我還想請中央領導同志要像當年學習法律那樣，了解一下現代新聞學的東西。當時，中央在耀邦同志帶領下，請了法律方面的專家專門去講法律方面的課，我看了後非常感動，這是實事求是的。我們的中央領導人並不是大專家、大學者，是政治家，他並不一定具備每一個領域裡的完備的知識。但是我現在感到……我去年接受了人大輿論研究所的一份問卷調查，最後一個問題是，你認為現在中國新聞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什麼？它是發給副教授以上的同志。我不知道中央領導同志能不能看到這樣的問卷調查，但是我當時就非常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究竟寫什麼？最後我還是寫下現在最重要的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要徹底改變傳統的新聞觀念、要樹立起現代的新聞觀念。我是非常有切膚之痛地寫下這句話。因為在我們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下，一件東西能否順利的展

開，或者具有某種動勢，常常取決於中央主要領導人有什麼樣的知識和觀念。我認爲戈巴契夫現在的新思維，爲什麼現在是響徹世界的口號？大家認爲他是一顆新星，今天《人民日報》大標題叫做「新型領導人」。爲什麼他們要強調他是新型的？我想，他就是具有一些新的觀念。我很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能請一些新聞界的專家和學者具體探討一下，你們認爲現在世界新聞的潮流已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應當確立起一種在現代新聞觀基礎上的、全新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而不應該繼續沿襲我們在戰爭年代在產品經濟的模式下，習以爲常的、陳舊的、封閉的僵化的模式。應該建立一種全方位開放的、動態的新聞模式。這就不是黨的領導人，在黨的範圍內的一兩句話能夠解決問題，所以說，我們很希望中央能夠召開專門的會議，就這個問題統一全黨的認識。而且，這封信裡面寫得很清楚，首先是全黨的認識，然後是全體人民的認識。能就中國新聞公開化的問題，作出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如同我們對教育作出的綱領性規劃一樣。我認爲它的重要程度，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問題上，是絕不次於教育的，甚至對教育也是一種極大的推動。這也是一個建議。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深深憂慮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第一部《新聞出版法》正在訂定之中。我們接觸了新聞界很多老同志，中年同志和青年同志，沒有一個人談起這部法規時不表現出憂慮。因爲這是關係到全國人民基本人身權利的基本法規，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它是性命攸關的法規。我們很多同志在議論的時候，都非常擔心會出現一部什麼樣的法規，爲什麼現在還處在一種非常祕密，非常不公開的狀態下。我們曾經聽說……（有插話），這部法規出台前的一個信號，曾經給我們的心中投下了陰影，法規還沒出現，先拿了一部《新聞記者管理條例》來討論。新聞工作者的基本權利還沒有確定，已經要我們來承擔各種各樣的義務，承擔各種各樣的責任，並且說，這就是新聞法的一

個組成部分。我們感到大惑不解，我們很擔心這部法規，在這樣祕密的狀態下制訂，它是不是一項保障新聞自由的法規、還是一項限制新聞自由的法規。我們很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能夠把新聞法的制訂過程公之於衆。應該在報紙上公開刊登這部法規的草案，至少要在知識界、法律界和新聞界進行廣泛的討論。集中大家的、全民的意見。我相信這是一部基本法，基本法是不能由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應該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這是關係到每一個公民基本權利的法規。應該有它的公開化和透明度，而不應該像現在這種，我相信老徐（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就沒看過，看過嗎？（答：沒有。）這樣一個大報的總編輯都不知道在制訂什麼，這究竟說明了什麼呢？我們很擔心，確實很擔心。我們很希望能看到這份草案，能夠提出我們自己的意見。

我不知道今天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事情能不能說？（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郭：我們信上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是這樣，《世界經濟導報》是一張創刊還不久的報紙。它基本不是以刊登新聞爲主的一張報紙，而是一張集中地反映知識界的各種不同的見解和聲音的一張報紙。它大概是八〇年，還是八一年創刊的，現在它逐漸地在讀者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譽。很難想像，這樣一份嚴肅的報紙，特別是在一座城市，而不是在首都，發行量能夠達到三十多萬份。像我們全國性的大報《科技日報》，現在也就是七、八萬份。這樣一份嚴肅的，甚至很難看懂的報紙，竟然可以發行到三十萬份，應該說，它在全國公衆中，尤其是在知識界中，是有它的一種崇高地位的，也是受到我們這些以刊登新聞爲主的同仁的很大的尊敬的一張報紙。因此，讓這張報紙在這樣一種突然的情況下整肅，在全國新聞界的同仁的心上，蒙上了一種極大的陰影。從中央到地方，現在爲什麼紛紛在聲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就是因爲唇亡齒寒，我想明確的說出這一點。如果我們能容忍這種非程

序的、非法律的這種事情一再發生的話，我們自己還有什麼保障呢？我承認上海市委有權力停止欽本立的黨組成員的職務，作爲上級黨組織，無論是根據黨章，還是根據其它的中央規定，它是有這個權力的。無論這個決定是否正確，但是它有這個權力。但是我覺得上海市委絕無權力越級停止欽本立同志的總編輯職務。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正式建立了國家的新聞出版機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根據黨政分開的原則，黨不應該直接過問，或者是直接干預政務方面的問題。何況在不經過任何協商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決定，就更不應當。據我們所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設在上海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共同領導的這張報紙，我們現在已經拿到了上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給上海市委的抗議信，他們的信裡面都講得非常明確，撤銷欽本立總編輯職務完全是非程序的。而且在中國新聞界門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這就是事前的新聞檢查。但這話可能說得重了一點，但我覺得實質上是一種檢查。是根據這個領導人他個人的看法，他認爲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發表的看法可能要造成動亂，可能社會效果不好，他就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這種權力是不是合法的還是個問號，來停止這張報紙的出版，來要求改版撤銷，他究竟有沒有這種權力，我是很懷疑的。

郭家寬：另外，方法也是突然襲擊式的。據我們了解，《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記者也是和上海市民一樣，在同一天的電視上看到萬人大會和它們被整頓的。

李大同：現在實際上是兩種不同意見在衝突：上海市委認爲，這些文章發出去會引起很惡劣的社會效果。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同志則認爲，這篇文章發出去會有好的社會效果。我認爲是兩種社會效果論之間的鬥爭，或者叫做摩擦。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解決這兩種「效果論」的方式是什麼呢？是動用權力！而不是一種同志式的協商和探討，這是很不應當的。那麼我個

人的看法是，現在，這個事情在海內外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我建議中央能否這樣考慮？暫時做出這樣的調解；繼續保持停止欽本立同志黨組成員職務的決定，但是能不能把這期報紙的是非稍稍的容當後敘，可以提交到一個評議委員會來做出裁決，由黨的宣傳部門的負責同志，由新聞界的同仁，由各個方面不同的公衆來對這期報紙、這些同志做出一種評議，但是現在能否先行恢復欽本立同志的總編輯職務，作為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我想可以極大地挽回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造成的影響。這證明我們黨還是會實事求是地來處理這個問題，同時也承認有點過急，處理得不是非常恰當。他首先越過了上海新聞出版局，這是不應當的。這個指令應該是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發出的指令，不應該是上海市委的指令。因為它不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我個人建議中央能否考慮這樣一種暫時的平衡。不要以為這是一種退步、退讓。我覺得做出這樣一種舉動確實代表了一種民心，如果做出這樣的舉動，一定會贏得新聞界同志的一致叫好，說明我們黨確實是實事求是的，有錯就改。

我估用的時間太長了。

王石：有兩年不到中央去開會了，啓立同志好久不見。我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獲准辭退總編輯職務的，是在耀邦同志下台的前不久（眾笑）。那時候報社同志送給我一個很好的綽號，叫做「檢討專業戶」。因為，我在做總編輯的時候，當然也是工作沒搞好，這我有責任。我不贊成《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據我聽到的同志的意見，都不贊同這個社論。有人認為，這不是中央對學潮的一個不科學的，或是錯誤的判斷。我是贊成客觀的、真實的報導這次學潮的。我覺得報導比不報導有好處。事實證明是這樣的。我之所以贊成，是因為耀邦同志追悼會的那一天，我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待到下午學生撤退。因為那天，我在大會堂裡邊追悼了耀邦同志，但是我感到

好像光在大會堂裡邊追悼了還不夠。我看到好多同志從大會堂裡邊一出來，追悼會一結束，看到廣場上那麼多學生在那兒追悼，馬上就要掉眼淚，包括鍾佩章同志。我無法理解和猜測，那一天，那麼多高級幹部從大會堂裡出來，面對著這麼一種情景，究竟心裡是一種什麼樣複雜的情緒？那天，直到學生撤退完了我才回家。在廣場，有三點對我個人衝擊相當大。我抑制自己，在大會堂裡沒有掉眼淚。但在廣場上，我掉了好幾次眼淚。第一，我問學生啥時候來的，在這廣場裡待多久了。他們都是走了六個多小時，後來我看新華社內參《動態清樣》講，是走了十七個半小時，來來回回。我看見有人往學生坐的裡面扔塑料包，學生又把它扔出來，扔到武警戰士前面，學校裡邊想法拉著一點麵包，一點油餅，還在那說：「大家不夠分著吃吧。」（哭）我都在想，這麼多青年，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是要動亂？是要反黨？搞垮我們的社會制度？我確實百思不得其解。我認爲不是。學生裡大概有很多共青團員，也有相當多的共產黨員的後代。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客觀地去理解學生的感情，他們的真心實意。我在那站得很累，想到學生堆裡坐一下，他們拉著手怎麼也不讓我進。要學生證。我說我這麼大的年紀，哪兒來的學生證？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學潮到底怎麼判斷？這個問題，中央現在或不管是什麼時候，是需要有一個明確的回答的。

第二，那天我站在廣場，最使我難受的是那三個人在大會堂的台階上長跪不起。我在那看著錶，十二：五〇開始下跪，到一：二〇起來，那麼，我就在想，人民大會堂啊，這學生在裡邊都是相當反映了民意的啊！羣衆後來對學生的歡迎，以至到現在，《動態清樣》上反映的這些證明了，包括紫陽同志講話也表達了對學生問題的實質性的理解。在我們的人民大會堂前的台階上，竟然有代表民意的代表長跪不起，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發生這種事，我感到特別難受。那一天電視講話，

何東昌用譏諷的口吻說，用一種封建習俗來醜化我們……下面的話沒說出來，大概是這個意思。我更加難以理解何東昌同志，究竟有多少人民的思想感情，作為國家的教委主任，究竟理解不理解學生？

第三個比較難受的，是我們到處聽見別人罵報紙。我是幹了一輩子新聞工作的！我想不到會有那麼一種結果，大標語呀！新聞要講真話。我弄不清楚，我問：「你們到底要求什麼？」他們說我們不要什麼，我們只要求能夠如實地、原原本本地把我們的情況，我們的口號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請願……為什麼報紙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呢？那天晚上，有些年輕同志要寫這篇稿子，還向我作了採訪。我也看了他們寫的稿子，我是覺得，那天還是應該有所報導的。後來，「四二六」社論上，也到那天畫了個句號。「……追悼會之後……」才是什麼什麼。

最近以來，我聽見的議論很多。我覺得有四個問題應請中央考慮。能否做出解釋，說明，或者回答。一個問題是「四二六」《人民日報》的社論和紫陽同志後來的講話，五月四日的講話到底一致不一致？我看是不一致的。因為「四二六社論」的調子是動員全黨反動亂。那就是說，有動亂了，非以要反動亂。但紫陽同志後來的講話說，「不會發生大的動亂」。這個問題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我最近在看新華社的動態清樣上邊，有的省建議中央……還有，紫陽同志五四講話裡面講到透明度不夠，公開化不夠。而這個意思，據我個人的理解，我也有一個疑問，和傳達的小平同志的講話也不太一致。小平同志的講話裡面，講的是蘇聯的、波蘭的自由化問題。第三是反自由化的問題，一九八六年的反自由化問題。但據我了解，在知識分子當中，絕大多數人對此有不同的認識。第四個問題是耀邦同志辭去總書記的做法，不是他個人的做法，而是黨內採取那種辦法合不合乎黨

章？正常不正常。八六年以來，我聽到很多議論，都是在這個問題上有意見的。怎麼能夠高級政治生活會議就辭了職了呢？應等到十三大才是……至於耀邦同志工作當中有哪些缺點和錯誤，我覺得都可以客觀地評價。現在我不理解的是，黨內的這種意見，這次由學生在悼念耀邦同志的時候表達出來。我覺得這也是黨內政治生活不太正常的一個表現。我想，這是黨內、幹部和知識分子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好地解決，真正的團結統一才會有所加強。

另外，我講一點對我們國家新聞改革的看法。新聞改革已經進行很多年了。口號喊得也很響亮。這幾年新聞改革的實際狀況，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聽到一些同志的看法。剛才家寬講了，確實我們這個變化還是很大的，也確實有進步。它主要表現在這麼幾點上：我們辦報的思想，比較堅決地拋除了階級鬥爭工具論這樣一種觀念，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第二，報紙上的新聞品種確實多了，新聞的輿論監督作用確實多了。不要說比很早的過去，就是比前幾年，也確實有所加強。新聞媒介起的作用確實在加強。第三，報紙宣傳的內容比以前有開拓。第四，報紙本身的經營管理都有不少的改進。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新聞改革，恐怕有相當多的屬於新聞業務的範疇。真正的新聞改革現在還進行得不多。那麼有幾個問題，在新聞改革時需要考慮一下：第一，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新聞民主與政治民主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目前，我們的整個改革當中，政治體制改革有所拖後。教訓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新聞作大踏步的改革比較困難。我認為新聞民主，是政治民主的一個伴隨物。同時，新聞民主又是政治民主的一種催化劑。學生遊行裡也表達了希望我國政治民主快一點的願望。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指導報紙的觀念也應該有所改變。前些時候，我看見保加利亞的黨中央報紙，大概是叫《公民事業報》總編輯訪華，《動態清樣》上登載了保黨中央的一個決定，它對報紙有一個改變。兩條，一個是把保黨中央機關報的性質，改成保全黨的報紙，這是根據了列寧的說法，這與過去就有很大的不同：作為機關報是從上到下，作為全黨的報紙，就包含了全黨對黨中央工作的監督在裡面。第二，黨中央機關報總編輯、副總編輯有權簽發，對黨中央領導、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中央總書記進行輿論監督的稿件。它還決定，鑑於報紙作用的加強，保黨報的總編輯要由保黨代會來決定。我並不是說要我們中國的報紙完全仿效它這樣，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它對報紙的性質規定，確實有一定程度的變化。那麼這裡是不是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第三，對報紙和新聞宣傳，要盡量減少權力的干預。這個剛才李大同同志已經講了很多。我總覺得，我們對報紙的作用一方面太誇大，好像社會上一有什麼風潮，有什麼動亂，有什麼大問題，都是報紙在那兒鼓勵起來的。其實，據我體會，報紙也沒那麼大的作用。因此，我們總是在幾個問題上不能夠正確地去看待。比如說，因為是黨報，所以在任何時候，宣傳都要作政治考慮。我不反對在重大問題上作政治考慮，在外交問題上就需要作政治考慮。但是不是一切問題上都要作政治考慮？那麼一切都可以有規定限制你，你就沒法搞新聞報導。再一個就是所謂社會效果，而我們常常是人為的，提早的在那兒估計社會效果……我想，作為黨報，作為總編輯，都是有政治水平的。他在發出每一個報導的時候，會作政治考慮的。安定團結這些都要考慮的。

如果讓報紙按照新聞規律去辦事，發揮它應當發揮的作用，它的客觀效果，很可能是積極的作用，正面的作用，而不是負作用。

第四，要盡快地建立新聞法規。現在，好像是聽說在新聞法制訂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對於新聞自由難以界定。

第五，新聞體制要有一個變化。特別是總編輯要有自主權。在法定的規定下，總編輯要有什麼樣的自主權，這要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我的見解是，新聞宣傳的是非，大量的不是有領導去干預。應該是由法律去判決。

賀延光：我想給啓立同志提個問題。中央提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這是十三大提出來的。我堅信，到現在為止，中央並沒有改變這個方針。那麼，作為重大問題的決策人中央各位領導同志，局以上各層的領導同志，我覺得也很有必要讓人民知道和了解。前幾天，北京市陳希同市長，在北京市萬人大會上提出，他可以公布個人財產。但是，當我要求訪問他，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卻遭到他的拒絕。（插話：他兒子做些什麼，搞什麼公司，都不要求談。）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像啓立同志，還有中央各位常委、領導同志，我們的人民不太了解。像您，個人的性格是什麼？興趣如何？愛好如何？生活方式怎麼樣？家庭成員怎麼樣？這些我認為都是重大問題，（眾笑）因為它會決定重大的命運，所以人民有權利了解這些情況，今天能不能請啓立同志……（眾笑）當然今天時間不行，那麼，回去以後……我作為本報的專欄記者，我能不能訪問啓立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既然能訪問，能不能報導？但是我覺得很悲觀，陳希同同志的祕書跟我說，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報導了他本人，那麼對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來說就很難堪。他本人宣傳自己有多少財產，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是不是也可以宣傳？不要說陳希同國務委員這樣的級別，就是前一段，我採訪外交部新聞司新聞發言人，結果還作了檢討（眾笑）。也是說同樣的道理，事情是大家做的，不要宣傳我一個人

嘛！

正像剛才大同所說的，我們這些中央領導，應該看一些關於新聞的知識。新聞，是向公衆提供公衆需要關心的事實。特別要及時地提供一些事實。像中央領導同志一出來，哪位中央領導同志當選了，馬上就有一條簡歷，哪年入黨呀，多大歲數什麼的，就完了。至於別的東西，其實更重要的，影響這個人做出決策的一些東西，人民的興趣更大。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開放新聞的時候，能從自己做起，首先讓新聞記者報導自己。

×××：……在制訂新聞法的問題上，國外有兩種可以參考的做法，一種是追議制，一種是審查制。國民黨的時候就實行審查制，這會出現「開天窗」的情況。我認爲，我們的新聞法，應實行追議制。

現在的新聞體制，逼迫新聞站在了政府面對觀衆的最前沿。新聞改革能否像市場體制那樣，讓新聞相對獨立，讓政府也超脫，這樣對政府的形象也許更有利。

×××：現在是黨控制一切，所以碰到困難，黨就麻煩了。

×××：沒有緩衝機制了。

李大同：本來我們的新聞應該起這樣的作用，它是彈性的，能夠緩解各方面壓力的這樣一種機制。我還想再簡單的說兩句話。建議中央重新建立新聞體制的時候，要考慮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就是現代國家所普遍遵循的一些……現在我們一些東西……而不是應該讓你了解的就讓你了解，不應該讓你了解的不讓你了解。而且我擔心現在的新聞體制，使真正做出決策的主要中央領導人，聽不到真實的聲音。這是個很大的危險。剛才延光提出了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昨天已經了解到

李鵬同志確實不知道外面有長跪不起的學生。但是我們的學生跪了四十五分鐘。在四十五分鐘裡，我們的新聞媒介，或者我們的工作人員都不能把信息傳遞到李鵬同志那裡去！那天閻明復同志都說了，即使打個電話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再派車去也來不及。（胡：只有幾分鐘。）就幾分鐘的時間嘛？（當時我是在臨春。就是嘛！）就是沒有人告訴你們！你們想一想吧，這是多麼大的危險啊！

XX：我來說兩句。傳達小平同志講話的時候，在新華社和中宣部這樣的機構裡面，在幾處都……這樣的情況怎麼看呢？作為我個人，對小平同志的講話是有看法的，我覺得他把問題看的太過了，對形勢的判斷並不準確。但是，我還想一個問題，小平同志八十五歲了，我很想知道，究竟哪些領導同志，究竟怎麼樣向小平同志彙報的？因為沒有傳達其他人的，光是傳達小平同志的，藉小平同志的威望，來做這樣的決定……我希望我們中央的領導同志，都要實事求是。

李大同：最大的危險就是以爲報紙上不登的東西，就是我們這個社會上沒有的東西。以爲報紙上登的東西，我們自己相信的東西，就是人民相信的東西，這是最大的危險。中央應該能夠，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政治家，應該很敏銳地感到，對耀邦同志的這種悼念爲什麼會這樣劇烈？就是因爲人民羣衆對耀邦同志這種非程序性的處理極大的不滿。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就是因爲它說出了這句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強烈的不滿，說實在話，沒有道理。但是不許登，就以爲大家沒有這種情緒，這就非常危險。不知道啓立同志您是不是特別相信我們的內參？事實上我們的內參說的真話也是有限的。反映內參都要受到嚴厲批評，爲什麼？我們實在無法理解。不願意聽到自己不願意聽到的聲音！這樣怎麼能夠領導好我們這個國家，怎麼能夠不出現失誤呢？一定要有不同於的聲音！

×××……一個是誰是動亂根源，一個是從反精神污染到自由化……是貪官污吏……提個意見，小罵大幫忙……黨不能做違反黨章，違反程序的事情……小平同志有很大功勞……但是小平同志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常委和中央委員，……如果這樣的話，陳雲同志、鄧穎超同志都講話，那都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胡啓立：這個問題是這樣，我們中央全會，在選舉，十三屆選舉的時候紫陽同志取得了全會的許可，以後，做重大決定的時候，我們要和小平同志商量。這個是取得了大會的通過的。（大家七嘴八舌）

李大同……我們去年去新疆講學，正好碰到彭真同志到新疆去，這時候彭真同志已經退了。他既非中央委員，又非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也非中顧委委員，純粹從法律上的身分來說，他是一個普通公民。但是他在新疆在幹什麼呢？召集新疆師級以上的自治區幹部大會作指示。召集自治區所有常委開會作指示。自治區第一書記以及其他幾個常委要陪著他視察工作！他究竟代表誰？他究竟以什麼身分來代表？這是一個程序的問題。在西方，這是不可想像的。雷根，行嗎？他可以去當演員，但不能繼續他在職時候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有規定，這是不允許的。

徐祝慶：現在已經五點了，大家還有什麼？

胡啓立：我想到各編輯室去看一看大家……我想，座談是我們對話的開始，而不是終點。我覺得今天來，很有收穫，不虛此行。來了以後聽了同志們很好的意見。我覺得不僅是這次對話，今後……按照既定的程序，我們有些同志應該參與決策，因為有很多思想很好。就我的理解，同志們提了很多意見看法和要求。我理解，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強民主法制，推進新聞改革。這

也正是我們幾年來在反覆思考、研究和實踐著的問題。這是我們大家的一個共識。聽了大家的發言，使我更加深了認識。新聞改革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剛才同志們發言過其實況，也肯定了，這幾年以來，特別是十三大之後，新聞改革是有了進展的。比起過去，很有進步。這是同志們的努力，也是我們共同的努力吧！但是遠遠不夠。我個人贊成你們剛才所說的一些重要的意見。就是對於我們的新聞工作，缺乏一個系統的總結和回顧，在制訂新聞法的同時，或者在這個之前，應該有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們的思想，這個是對一個很大的提醒啊，同志們啊！……我們前不久發了一個文藝方面的若干意見，前後開了幾十個座談會，廣泛徵求文藝界同志們的意見，試圖總結我們的黨在領導文藝工作的歷史經驗。因為這個問題太突出，把文藝變成階級鬥爭的……把文藝界的空氣弄得非常緊張，解放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全是從文藝上開始的。什麼評《武訓傳》，以至後來的《紅樓夢》、《水滸傳》等等的，總的來說，是在這方面作了個徹底的反思，發了個若干的意見。這個文件獲得了文藝界絕大多數同志的承認，覺得這次的文件寫得還可以。覺得把我們想說的話、我們的歷史經驗都寫進去了。我也不是說這個文件就盡善盡美，好得不得了。這也不是我們寫的，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產生的，對吧！

從新聞這方面呢？我們就做得很差。從理論到實踐，我們都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我跟你們說老實話啊，我是主管新聞工作的，我在這個方面缺乏深刻的認識。這我得承擔責任，你們要批評，什麼都可以。我認為，通過這次事件，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把我們歷來新聞工作的指導思想，領導方法，我們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當然，這不是我說了就可以決定的，我這樣做就違

反黨章了。我們可以提出這個建議，認真地來討論這個事情。因為我們的指導思想、領導方法和模式，是歷史的發展而產生的，是環境條件等許許多多的因素決定的。我們不能一概否決，說都錯了。它在當時的情況下發生過重大的作用，保證了我們革命戰爭的勝利，這些都不多說。時間條件地點都在變化，情況也在變化，這些問題我們好好總結一下也有好處……

這一次這個事件的報導，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開始控制得緊一些，後來放開了一些。遊行不是也報導了嗎？也沒有什麼呀！看來，增加透明度、公開化有好處。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開性不夠，毛病甚多。許多問題變成大道不通走小道，小道不通，出口轉內銷。聽美國之音，因為沒有什麼好聽，只好聽它的。還有剛才各位提到的，領導人的情況，大家都非常關心，當然這些東西基本上我都不知道。其實這些東西，選舉的時候都作了介紹，但羣衆不知道。另外我們缺乏完善的法律，我贊同這種意見，要考慮按照制度相應的法律。對國家哪一級以上的幹部，要有財產的申報制度，應該還有監督制度，是可監督的，可操作的，這個有什麼不好呢？因為你沒有貪污你爲什麼害怕這個事情？（李大同：向羣衆公布你可以享受什麼也可以）你比如說，我就這些個工資，大家也不相信。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這個問題你說清楚了，我看也沒有什麼。我們現在大概就住宅比較寬一點，我們這些人的家具，我不知道別的人，政治局以下的，我們這些人的家具是國家配給的。特供，這個問題早在半年之前，因為學生反應很強烈，就決定把高級煙酒統統取消掉。現在我們的特供點在西四這邊，它是向全市各大公司、旅館供應高級蔬菜和肉類的地方。我們這些人去買的時候，按照高價來買，蔬菜比市面上高百分之十，肉比市面上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當然品質要好一點，因為質優價優。煙酒確實是取消了。但這些我們說了我認爲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一個領導人

到電視上說，這個東西，也不成個道法呀！（插話：你們應該有一個制度來作保證。）我說了你就信嗎？那完全可以懷疑嘛！芮杏文同志被人問：「你一月賺多少錢？」他說：「三百。」別人說：「你甬胡說了，我還賺五百呢，你三千差不多！」過去，中南海封閉，在過去的歷史年代中，也許你是把中南海的領導人往好的想，什麼「八角樓的燈光」呀；現在你可能往壞的想，什麼都壞，實際上也沒那麼壞。（眾笑）

所以，我覺得大道不通，小道盛行，謠言甚多，謠言滿天飛，真假難辨。這是激起羣衆憤怒的一個很大的原因。紫陽同志跟我們講話就講了這個問題。實際上大家也知道，並不是完全都信。比如說誰是誰的女婿，這我們都認識，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但是你沒有辦法，大道不通！所以，我感到，我們的新聞管理體制、思想觀念、領導方法、宣傳方式、宣傳方法上，都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情況來改進和更新。這才能夠實現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樣才能夠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羣衆反映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問題，反對官僚主義，同不正之風作鬥爭。

同志們，我跟你們說，我們坐在中南海是每天睡不着覺的。經常睡不着覺，不能說每天，誇大了啊，（眾笑）中國這麼大，誰知道底下搞些什麼？我們怎麼知道哪個人貪污不貪污？腐化不腐化？完全靠中紀委、中監委去查，查不清楚。我看這個東西只有依靠人民，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整套檢察監督的機制。包括差額選舉，外面的人民有罷免權。你爛得不像話，我們下回不選你就是了。採取種種有效的辦法來同不正之風作鬥爭。這涉及到一系列的立法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問題，先講這麼一個意見。

第二個是同志們談到的新聞改革的問題。這是一個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特別是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新聞自由的問題，議論的一個焦點。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必須通過立法的渠道，我們新聞的立法，第一要保證憲法賦予的權利，保證新聞自由。第二，要根據憲法，防止濫用權力，濫用新聞自由。這個同志們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這是不可能的。沒有法制就沒有自由。但是法制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既很重要，又有相當大的難度。因為它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單純是新聞界自身的事情。比如說，大家所關心的，為什麼新聞法遲遲不能出台？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要求反差很大。有的建議立即制訂新聞法，把這些記者們管一管，嚴加管束。有的就要求，你要制訂新聞法，你就得完全放開。這個尺度怎麼掌握？不能夠由某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這個要新聞界和社會各界按照立法的程序進行充分的、廣泛的討論，進行民主的協商。上上下下多少次，這樣，然後最後通過人大，才能夠把它確定下來。這整個來說，這是一個過程，但是我們要加速這個過程。這個制訂的過程，我認為也是一個學習民主的過程、也是一個認識民主和運用民主自由的過程。全民討論，這本身就是一個教育……這個你要問第一線的同志，他們的牢騷和他們的苦惱也是相當多的。相信你們知道的比我多。就在北京地區，你下去跑跑問問，有些縣裡多得不行了。我講這是個建設過程，這是個學習過程，認識過程。怎麼樣把我們學習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更成熟一些，做出比較準確的決策。我們要加速這個過程，這只有依法來做，沒有別的出路。黨中央也不能來幹這件事情，我們來代替立法機關、制訂一個新聞法，然後讓人大來舉手通過，因為幹不了，而且也不可能，要經過社會各界來協調。當然，最後，大家都通過了，黨中央可以來確認這個東西，作為黨的一個重大的方針政策，

那是可以的。

還有同志提出了，對學潮的事情怎麼看？這個問題，我想《人民日報》二十六日、二十九日的社論、趙紫陽五四的講話、亞行的講話，以及後來的一系列的對話，說明了中央的態度。這些講話，有同志說有變化，我認為，一切的任何一個講話，一篇文章，都只能根據當時當地的時間地點條件而作出。還有，跟什麼人談，對象。至於我今天說的話，就是在你們這種情況下，跟你們說的。如果把我的講話，一字不漏地整理，然後《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發表，這一定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一元化的社會，它是一個複雜的、多元的社會，各有各的看法。你怎麼能夠講這樣的話呢？馬上就會有人質問。所以，一切的講話都有時間、地點、對象和條件。但是，貫穿的中心，就是要穩定、要團結，這是始終沒有變化的。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是經不起動亂的。要求大家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只有在穩定的，而不是動亂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我們才能夠順利前進。當然，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秩序發展的道路，走上一條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所以，這是中央再三強調，一直不變的這麼一個紅線，這也是廣大的學生、新聞工作者更為希望的一個方向。當然，這樣做不是說就不要民主了，不讓人說話，不是這個意思，這已經多次說過了。我想，這個問題我們要深入思考，因為在中間形勢變化是非常迅速的。一個晚上就會有很大的變化。那你说怎麼辦呢？你说我們社論已經發了，非鎮壓不可，這怎麼可以呢？你有原則還要靈活呢？你要靈活反映呀！學生的行動已經表明，那我們當然不能有出格的行動啦。如果北京出現了像長沙和西安那樣的搶王府井，那我們的公安人員就坐那兒勸勸？勸不下來，我們也不管，你們去搶吧，這像話嗎？你們哪一

個也不會贊同這樣的政府。這個事情既是有原則的，也是靈活反映的、理智的。這樣，我覺得就有可能，把事情逐漸引到一個好的結果，學生不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嗎？把貪污腐化、貪官污吏打倒嗎？要求民主嗎？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嗎？這些，正是我們的希望。完全有可能引上一個好的發展。就是原來講的，治理環境，整頓秩序，深化改革，真正引向積極的方面，這就很好嘛！這就可以實現趙紫陽同志講的，實現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據說，學生遊行那天，香港恆生指數報界，丟了六十多個百分點，不得了啊！誒，二十七日遊行沒出事，恆生指數立刻上升。緩回來，又上升幾個百分點。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有的人講，這件事情的處理結果增加了人們對中國安定的信心。這麼一看哪，誒，有希望！有的人講，這次學生和政府表現出來的理智和克制程度，使得外國的觀察家都大掉眼鏡，就是原來的估計錯誤了。原來估計要出大事、流血！有驚無險，大家覺得，心裡放下一塊磚頭。但是事情還在發展，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斷發展的，都是無窮無盡的環節的某一個鎖鏈。有了這一個鎖鏈，還有下一個鎖鏈。一環扣一環在不停地發展，事情總是有兩種可能的，而不是一種可能，好的可能和壞的可能。我們現在努力地要把它引向好的結果。沒有壞的可能呢？趙紫陽同志和社論裡也講了，中國這麼大，這麼複雜，你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沒有人利用，那才叫奇怪呢！而且，我覺得也不一定都是壞人想利用。你比如說，六〇年代調整下馬的中專學生，到中南海去跪著，要文憑。你說他是壞人嗎？他不是壞人。昨天，五十二個人到中南海去請願，爲了什麼呢？爲了菜園子的糾紛、果園的什麼事情，我都不大想講。也是給下跪，要求中央給解決。同志們，去年國務院信訪辦接待的集體上訪是一百八十批。個人不算。這些人背後，少者有十幾個人，多者，背後是成千上萬的人，平均是兩天一批。如果都採取街頭民主的辦法

來要求我們解決，那我們中南海新華門就天天跪滿了人。而且也沒辦法解決，這怎麼能解決呢？

社會是褻瀆的，我們現在的社會，光遊民就有一千多萬！你說這些人是壞人，他也不是壞人。當他可以找到餓吃的時候，他不壞。可是當他找不到飯吃的時候，他就什麼事都幹！他爲了搶劫，就可以殺人。所以，我們如果爲了民主和自由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和法制，出現的後果，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學生們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我講的是廣大學生，個別學生我不敢保，但廣大學生是不會做的。如果政府的法制權威由此而削弱，天天遊行示威，一定會有人跟上來。而且現在，我跟你們說，我們的政策同資本主義國家是不一樣的。他們那個政府是不管生產的，他那個生產是由市場去調節的、是資本家在那幹著。資本家什麼時候都管他那工廠。總統倒台，政府倒台，內閣倒台，市長下台對他毫無影響。市場都是管著的……我們就不行。我們的市長、省長，都是直接管著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現在市場百分之五十是國家管。

……我不是反對對話的，我是贊成對話的。就是同志們說的客觀報導裡面，有這麼一個實際的、不同的情況，因爲我們的國家，是正在從計畫體制朝有計畫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新舊體制並存，兩種規範，兩種模式並存。這是有它的特殊情況。因此，爲什麼政府再三強調安定團結，再三強調要穩定，這個大家也能夠理解。再加上我們的法制不健全，漏洞很多。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說一句話，同志們所有要求，總的一句話是要求我們深化改革，要把改革進行到底。如果我們不做這種事情，根本就沒法存在下去。可是如果要作這件事情的話，就必須有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要認識我們國家確實處在一個困難的關頭。這個困難關頭我們能不能度過？至關重要。你們也談到東歐國家情況。如果東歐國家出現的動亂出現在中國，這就不得了。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種情況

出現在中國，那就不得了，因為我們國家人太多。

我相信能夠得到大家堅定的支持，包括我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當然了，改革還是很困難的。有些問題不光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比如說，黨報的問題，黨報的作用是黨章第二章第十五條規定了的。這句話講：黨的各級組織的報刊和其它宣傳工具，必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我們舉手通過的黨章，只要我是共產黨員，我就必須遵守這個制度。這個事情，我指的是黨報，黨的各級組織的報刊和其它一些宣傳品。當然，黨報也有一個如何管法的問題。比如說，把黨報變成一個黨和政府的文件彙編？也是不行的。怎麼管法，這是值得研究，這裡面有個程度的問題。

同志們今天發表的這些意見很重要，我想請你們把這些發言……所談的要點整理一下。如果太長，說實話，中央同志那裡的文件就太多了，看不了。希望把重要的意見都整理好，我負責幫你們送到所有中央領導同志手裡面去，請他們了解你們的聲音。

另外就是很有收穫，受到同志們的啓發。我在此，再次向同志們表示感謝，而且希望以後繼續這種談話。我說完了。（鼓掌）

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識界人士

《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醞釀經過

陳小雅錄音整理

《光明日報》負責人：趙紫陽的「五四」講話提出用冷靜、克制的方法處理遊行請願的問題，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但這是兩方面都應該努力的目標。這次學生的罷課、遊行，對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都會有好處，但如果處理不好，矛盾激化，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輿論，我們的態度來影響事物的進程。請大家談談自己的看法。

王超華：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有點過分了。你們這些學者都是在學生中相當有影響的，如果能到廣場上去勸說的話，昨天×××作了一個講演，他是勸說學生撤去的，這和他以往的态度不太一致……但至少他的講話沒有任何反作用，只是沒有積極的效果而已。但現在政府任何人說都是反作用。

李澤厚：現在這麼主張坐而論道，不如積極地跟學生和學生代表談一談。

戴晴：當然不是坐而論道。明天，明天諸位的名字出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內容是你們對時局的看法，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光明日報》領導：我建議，兩件事情，先討論這件事情，小王同志的事情待會兒……

溫元凱：對於第一件事情我有個臨時動議，明天報紙是來不及的。《光明日報》有沒有可能發一個《緊急號外》？一些人對時局的看法，只有一頁。而且我很誠懇的有一個建議：我個人是贊成的，我願意到廣場去而且《光明日報》緊急動員的話，帶著號外一起去。

戴晴：好啦！好啦！

溫元凱：……啊！結束絕食，我贊成王超華的意見。而且我們在這裡不是簡單地勸學生離開，而是有一系列看法的……

戴晴：對了！對了！

溫元凱：……這是一條，我們今天開會就擬出幾條東西，對不對？發社論，怎麼樣？我們要發表自己的看法（贊同之聲大起）我想我們這幾個人是能得到同學的……（蘇曉康詢問發言者的姓名）我叫溫元凱，溫元凱。（蘇：聞名已久！聞名已久！）

王超華：我的意思是，對於大多數學生是有可能的。絕食代表團中的幾位高級的……他們的態度和文字裡面寫的還是有區別的。我做過一些同學的工作，他們說，那你怎麼不跟北大的去說啊？眼睛都看著北大的。包遵信老師是前天下午到北大作過一次講演，北大學生覺得特別受鼓舞……學生現在有一種焦慮心情，他們在北大發起了一個簽名……已經有二百八十三個簽名了。內容把學生那幾條都包括了。其中「動亂」這條也包括了。有季羨林、謝冕、金克木、嚴家炎、曹文暄等。

（場內議論）

溫元凱：如果殺人的話，他也去絕食。我願意表這個態，那當然不能夠殺人！

王超華：……我來他們都知道……和王丹……是他們開車把我送到這兒來的。

戴晴：那要不，（微詢領導意見），怎麼樣？要不先擬一個文字，一個鐘頭？談完然後我們再說，好嗎？

李洪林：勸學生結束絕食的主要目的，是學生已經受到了鍛鍊，不要考試了。但問題是這個動員的人能否取消動亂，能否讓學生今後不受報復，讓他們得到保護。

×××：具體問題現在太多，扯不清。我來談一談，我們三位是自發來參加這個會的，也不是名人，也不是學者……我們牟其中先生是企業界人士，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的代表……這幾天，形勢發展到現在，從我們的心裡說也很焦急……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是過來人。我們知道發展到現在，必須有一些人出來做工作，來顧全大局。我們認為，紫陽同志的講話，就是從咱們改革開放以來，咱們可以想一想咱們中國的歷史，咱們國家領導人，出現了這樣的事，還能講這樣的話，我們認為是很開放的……

戴晴：您看這樣好嗎？讓學者們先談。

×××：不是談，你們主要是談，我們是這樣，我認為現在緊急的是，第一，咱們定下來，不要寫一篇挺長的文字，怎麼能勸他們？打動學生的心？第二，大家要有犧牲精神，要學生哄我們怎麼辦？像小蘇剛才說的，既然要去，要做學生的工作，打死我們也要去，我們盡到責任……

溫元凱：如果是這樣我反對！嘿嘿！

×××：爲什麼呀？我們是去勸學生去的。

蘇煒：如果這樣，那就毫無作用……你拿什麼勸他們呢？

×××：對呀，這下一步咱們再談，這兩條……

蘇焯：没法定，你剛才這個態度是没法定的，我不同意，没法理解……

（場內議論紛紛）

戴晴：你既然是來聽會的，還是以我們為主，好不好？（×××：行！行！行！）我提這樣一個建議，就是明天出現在《光明日報》報面上的，這是要發到全國的……作用就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的作
用，對吧！你們既然來了，而且現在還有一點時間，四點，那麼我們不能爭取在四點以前，把我們的見解，就是對時局和我們今天情況的見解，我們不對大家作任何要求，你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學者，你們有什麼意見就怎麼說，中間爲了節省時間，不要重覆……這樣行嗎？

領導：好吧！

戴晴：如果這樣，就開始。我作一個建議，因爲前天曉康他們起草了一個知識界對局勢的宣言（即《五一六聲明》——陳注），他就起草者，他又是很很有文才的人，他可以說得比較「整」，然後我們每個人，有歷史學家什麼的，再根據自己的，再說，我們作補充。

領導：可以。

蘇曉康：我就先說，我是這樣看的，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的遊行事件意味著中國歷史已經走到一個新時期，也就是說，中國的強人政治已經結束。學運最大的意義在於，他們在以現代民主的辦法來參與政治。但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說執政黨表現出極其無能，這才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我們不希望動亂，我們希望事情能夠朝著促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發展，我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心願，我們不想操縱學生，學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縱得了的。所以，我們就乾脆站出來說：

第一，中國共產黨應該吸取歷史教訓：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鎮壓五四運動；三、四〇年代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以及七〇年代後期，「四人幫」鎮壓學生運動，這三次大教訓，應該懂得這個基本常識：鎮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

第二，既然是按現代民主的辦法來處理危機，就應該承認大多數學生自己選舉的學生組織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認不承認的問題……

第三，動亂的根源，恰好是學生提出（要反對）的腐敗、官倒，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等問題，這樣的問題不解決，中華民族沒有辦法。

第四，防止動亂的辦法，必須有新聞自由，必須開放報禁，必須讓權力受到監督。

第五，執政黨也應該吸取「胡風事件」，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那種殘酷迫害和鎮壓知識分子的歷史教訓，不要把知識分子當成一種敵對的勢力和一種什麼壓力集團，能夠跟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坐下來，心平氣和地來解決目前這種政治問題。

我也覺得中國目前的局勢的確比較危險，那麼，政府希望學生理智，政府自己就應該理智。你們不希望天安門廣場產生這樣的狀態，希望蘇聯戈巴契夫來的時候學生不在此靜坐，那麼，你們向學生保證了什麼呢？為什麼在「動亂」這個問題上，到現在為止，不肯拿出一個意見來呢？……所以，我們在呼喚同學們要有理性的時候，更強烈的呼喚：政府和執政黨要有理性。

蘇煒：現在，中國歷史到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對於執政黨，對於全體人民和知識分子，都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機會。危機也是生機，如果執政黨能夠在全新的、現代的觀念指導下，他們應該是有能力走過這個危機的。但非常遺憾的是，在事件發生以來，特別是前半期，執政黨從面目到語

言，都表現出相當的陳舊。必須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論，是真正引起這場這麼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學生抗議運動真正的媒介……到目前為止，學生是相當理性的，而政府卻搖擺不定，政府並沒有表現出它執政四十年應有的成熟和足夠的理智。再重複一下，關於「動亂」這個提法必須改正，還有上海欽本立免職的問題。如果對這些非常具體、非常明白的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麼，我們還談什麼「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本質上是一次「護憲運動」。就是保護憲法賦予每個個人和公民的權利的護憲運動。共和國是一種現代的民主政治，對於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權威來證實、來認可的。如果一個執政黨，它對自己參與制定的法，採取一種為所欲為的態度，這本身就不符合憲法。那篇《人民日報》社論就充滿了違法的語言，這種違法現象（的糾正）如果不首先從政府本身做起，是沒有辦法取信於民的。

第三，遵守憲法的内容很廣泛，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一個最核心、最尖銳、和最緊迫的問題，就是新聞自由和輿論開放的問題……如果說，這次有可能引發一場動亂，動亂的一個廣泛的誘因，就是我們多年來傳播媒介的不溝通，不開放。在現代開放的信息社會，用新聞封鎖的方法來治理這個國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們還不面對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改革就沒有希望。而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是非常現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贊成今天的這場學生運動，他們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態度。所以，這場運動，應該說是一場「非常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改變了過去我們這個民族只能聽話，只能服從，（宣告了）這個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歷史中的一次覺醒，超越了五四精神。

現在勸學生回校，我表示贊成這個建議。但是，另一方面，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至少要做這麼幾件事情：第一，從四月十五日以來，我們的新聞媒介報導，你倒底打了人沒打？包括西安事件的報導。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論說這場運動是「動亂」，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鬥爭」，這些提法，必須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終有一把劍懸在頭上。

這個運動提的口號很多，我認為一個最核心的口號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還有，承認公民的結社自由……我覺得紫陽這個講話還是比較好的，但光提口號不行。你必須承諾幾樣東西，這樣你的誠意才表現出來了。

于浩成：我同意這次運動是一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還是一次護憲運動。對於民主和法制的關係，我們的領導人有一些錯誤的看法，認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來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員要合法。民主的基礎要合法，這是保障……有一句話說，現在沒有說真話的自由，而只有造謠的自由。我十七歲讀馬列，今年六十三歲……（打算）盡應盡的力量。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溫元凱：我是到北京來出差的。因為今天下午形勢比較緊急，所以，我希望就談今天下午的問題，也就是明天早上的問題。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中國政府將在全世界面前丟臉；第二個就是要清場。

問題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危險，可是又是機會。機會就意味着，我們希望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能夠大智大勇地利用學潮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把它變成為一種契機。這就是帶來的機會。過去不是講了嗎？新聞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這不就是機會？這不就提出要改了嗎？這次學潮，我目睹

了上海和北京的學生遊行，我是非常感動的。而且老實講，也是熱淚盈眶。我完全贊同剛才諸位同志的講話，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一個政治多元化，一個民主潮流的時代的到來。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我們在這樣的面前，是被動的，推諉的，是希望糊過去的，甚至把學生當孩子那麼哄一哄，騙一騙，嚇一嚇能夠糊弄過去的，不是真正地解決問題。這我們已經看到了結果。趙紫陽同志的講話（亞行講話），帶來了很大的轉機，我們看到那種殺氣騰騰的口氣已經得到了抑制，一個理性的聲音出現了。在法制、理性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人們看到了這麼一種希望。但是，理智在當前，尤其在今天下午這個情況下，我感到，我希望，我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向社會發出幾點呼籲。首先，我希望對政府發出三點呼籲：

第一，要理解學生，真正的、有誠意的理解學生。他們求什麼？絕食、罷課，損失的都是他們自己，他們的身體、學業。確實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府對這一點沒有充分理解，我認為是不夠的。從內部傳達的所有文件，都把學生說成是鬧事，千方百計地動員，怎麼樣來撲滅。趙紫陽的講話第一條就是：學生不是為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講話在校園裡引起了鼓掌，這是一個月來第一次。

第二，要保護學生。堅決反對任何鎮壓學生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會要重蹈天安門事件的覆轍。將來我們要在歷史上背一個惡名，要遺臭萬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遺臭萬年！

第三，應該引導學生。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希望幫助政府改革。我們希望顧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世界的面子。剛才曉康同志講，政府畢竟要有一個面子。我們希望顧全大局，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

我希望我們這批人，能夠用一個辦法來維持一個局面。

作為長者，我希望對學生方面也有三點呼籲：

第一，我希望學生要認清國情。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但經濟體制改革仍然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一季度三個「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學潮和盲流結合，可能會導致動亂。這是西安、長沙已經發生的事情。當然，學生這一次組織性、紀律性，他們的口號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種危險是不存在。

第二，要推進實際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種很空洞的口號。當前，非常現實的，就是要推動新聞自由。而且，首都新聞界的捲入，首都知識界的捲入，我感到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局面。而且新聞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包括像《光明日報》、《科技日報》、《中國青年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上海青年報》，都已經對學潮進行了愈來愈多的客觀報導。包括中央電視台，要進一步推動新聞自由。大家對學生的客觀評價，而且社會各界對學生的看法，都應該如實地報導出來。我們也不怕有人發什麼偏激的看法……不報導就變成「黑箱」，結果到處都變成「有鬍子的人」。另外就是對待學生（自治）會問題。學生（自治）會只要通過大部分學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說，他們否決了原來的學生會，而建立了新的學生會，我覺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說還不夠程序化，我們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進實際的改革。當前改革面臨一個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個人認為，改革十年應該打一個句號，新的十年應該開始。當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聞改革作為一個開頭，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對這個十年我們應該加以總結。而且，十年來的失誤，我們應該加以否

定。難道十年來的失誤，還是一、兩個領導人、召集一幫秀才來發一通議論嗎？十年改革的失誤，應該更廣泛地討論，要進行更深層的發掘，我個人認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還是在於決策，決策機制基本上沒有變。儘管改革以來，我們的決策比過去好了很多，但是機制沒有變化。包括對學潮的估計，這樣一種決策機制是危險的。這是導致我們四十年來非常多的失誤。包括給民族帶來災難（的原因）。我非常欣賞蘇曉康先生寫的《烏托邦祭》。每一個讀了《烏托邦祭》的人，如果你是一個正直的人，你就會想到，有廬山會議才有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廬山會議的劉少奇，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劉少奇。說得尖刻一點，所以，這是很深刻的。而當前，我國處在困難時期，國家的經濟處於困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顧全大局，為國分憂，度過難關……增加社會凝聚力，要增加四個意識，即公民意識，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國家意識。

我希望同學們認清國情，使當前學潮，當前社會危機，成爲一個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發展的一個契機。

嚴家其：我相信，有能力的政府，這個問題應該容易解決。但到中國就變得非常難解決。主要問題在黨和政府領導人沒有看到這些學生是他們的兒女，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我今天想講一個意思：馬上，立即制止對我們的學生，對我們的人民的一種無形的摧殘，同無形的鎮壓。對於絕食不加工理睬，我認爲就是鎮壓。一個人，時間長了，二十四小時了，現在，到了三十六小時，時間更長。如果今天晚上把他們架走，我想也會造成一些人的死亡。任何一個學生的死亡，我們的政府都要負責任。這就是一種政治責任，一種歷史責任……我認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面對學生的要求，認真地，或者馬上，或者在幾小時之後，發表電視講話或者廣播講話，一下子就解決問題。如果我

們的周恩來總理活在世上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會這樣做……我想只要做到四點就能解決問題：

第一，公開宣布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人民日報》要對「四二六社論」進行自我檢討，進行自我批評，批評、批判這篇社論。而且有必要追究這個社論產生的過程，追究這個責任（李洪林：這是真的罪魁禍首。）同時，我想，袁木、何東昌，他們應該承認錯誤，幾次對話問題的錯誤，他們造成了現在學生絕食的這種行爲。

第二，承認現在受到大多數學生擁護的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是一個合法組織。

第三，與受到大多數學生生命擁護支持的對話團，進行公開的、平等的、有誠意的對話。

第四，公開宣布不搞任何「秋後算賬」。

……我希望這個意見能夠馬上反映給中央。這樣一講，保證所有的學生全部撤離廣場。（場內七嘴八舌）

如果不能做到，他們就有政治責任，就要追究責任。這將造成嚴重後果。

我看了趙紫陽的一句話，他說：要自覺地維護國家尊嚴，有損中國人聲譽和形象的行爲，我們都不能支持，我想，我們的政府部門如果把我們的學生一個一個架走的話，那就做了一個最大的，有損國家尊嚴和利益，有損中國人形象和聲譽的行爲，這是最大的損害中國人聲譽的行爲，是絕不能容許的。如果這樣做的話，中國政府就沒有臉面在國際交往方面，同戈巴契夫打這樣的交道，它就會威信掃地。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公開地宣布這四條。

另外我想說明一下，爲什麼說我們學生的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呢？這個愛國性就表現在這個地方：我們的中國，確實是幾個人的中國，或者某一個人的中國。中國人民的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中

國，也不是上下的問題，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人民同政府的關係問題。人民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志，而且，人民有權利來影響國家的重大決策。這就叫民主政治。也包括制訂憲法和修改憲法。包括影響其政府領導人當選，這些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如果人民找不到這樣合法的途徑表達自己的願望，沒有新聞自由，只有訴之於一些不規則的行爲。甚至於，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訴之於絕食這樣的行爲。絕食行爲，是一個人到了最傷心的時候，才進行的。有幾千人這麼傷心，採取這樣一種行爲，政府居然能夠無動於衷！我認爲真是武斷到極點，是不能容忍的。

民主的道理很簡單，而法治的核心，是政府不能做任何法律不許可做的事情。法律保護人民的權利，而民主地解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而我們人民的呼聲，怎麼樣也沒辦法來感動我們的政府，說明我們的民主，是太……（此處不清楚）。所以，趙紫陽同志提出來，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我認爲首先要理解什麼叫民主。

另外，爲什麼說是愛國主義的行動呢？我認爲，只有那些維護個人的權力，爲了把這個權力看作至高無上的，爲了不惜鎮壓人民的人，那些人，才是人民的敗類。所以，我覺得愛國主義的定義，要重新加以定義。中國近代史上一次一次的羣衆運動。他們確實爲了使我們國家更加富強而進行的鬥爭。而不愛國的，是袁世凱、張勳，以及我們可以看到的，歷史上一個一個的罪人。

另外，我們現在要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按照憲法規定的程序，應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學生的全體的意志高於學生代表大會，既然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全體，它就有權力來修改它的章程，而確定新的行爲規則。這裡呢？新產生的組織就是合法的。人民的全體的利益高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利益高於它所產生的機構。這個關係是這樣的關係，一個團體的理事會，它要

服從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的權力，它應該服從全體……我感到這次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就是人治時代的結束；而開始了一個以建立民主與法制為目標的新時代。

但是，這個新的民主與法制的時代，要依靠全中國人民，要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設成功。

劉再復：剛從國外回來……基本看法：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對民主化進程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對我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已經展開了新的前景。可以說，對中華民族的二十一世紀……它結束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我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們將進入的這個時代，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結合的時代。另外，我覺得有人，比如袁木，把學生運動比作文化革命運動，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不是羣衆性的行爲，它是領導發動的變態性的羣衆運動，不是健康的羣衆運動。學生命在文革當中是盲動的東西，有很大破壞性；而這次學生運動是真正的羣衆運動，是健康的、理性的自覺。非常清醒，非常理性，它自己掌握自己。目的不是破壞民主秩序，而是呼籲民主秩序，它是富有建設性的，所以，我今天從道義上完全支持它。

我們這次學生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政治格局與政治方式。就從學生生命的基本口號來看，非常之尊重和擁護共產黨這一套。所以，趙紫陽同志確信中國不會動亂，這一點是對的。但是，學生要求改變領導方式。就是說，這種領導方式再不能通過一種長官意志的、命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也不能通過過去那種「聖旨」的方式，簡單攝入的方式，而應該通過對話的方式，協商、民主的方式，一種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我們尊重黨的領導，但是領導必須坐下來耐心地聽取意

見。所以，這次學生運動對政府，對人民，都是一種民主的嘗試。所以，它把民主的進程大大地推向前進。

我們常常講民主與法制，但是沒有民主就很難實行法治。當個人的權威大於法制的權威，當「刑不上大夫」的時候，還有什麼法治？這是第一點，我對學生運動的評價。

第二點，我對黨和政府的呼籲，希望我們的黨和政府，用積極的、真誠的、熱情的眼光來看待學生運動，把我們的學運視爲我們改革的偉大動力，偉大的愛國民主行動。所以，要收回對這次學運的錯誤評價，包括「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的錯誤評價和袁木、何東昌的錯誤講話。我們中央應該有一個重要領導人站出來表態。而且應該以學生運動爲契機，認真地反省一下十年來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十年來，我們黨和政府的歷史功績應該充分評價。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的失誤要正視，而且要習慣人民對失誤的批評，並且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所謂人權，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們黨四十年來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自我批評的時候還可以，但不允許別人的批評。比如大躍進，過熱，我們自己說說行，但彭德懷站出來批評就不行，知識分子站出來批評就不行。這樣我們黨就只有一個正反饋的機制，而缺乏一種負反饋的機制。沒有負反饋的機制，生命系統就會傾斜，政府和黨就會處於盲目狀態。到一定的時候就會發生大的震盪。由於我們不習慣於負反饋，我們就不斷地把批評當作異端，就會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這幾年，我們連續對政治界、文化界、理論界一些同志的處理，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最後連總書記也蒙受冤屈（眾笑，鼓掌）個人受冤屈，不能視爲小問題，不僅是對人的尊重問題。另一個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見的渠道，現在的問題就是缺少這種渠道。政協、人大、報刊，都沒

有真正提供發表不同意見的渠道，所以，逼得學生不得不走向……在反省自己思路的時候，我認爲有一點特別要重視，就是胡耀邦同志曾經說過的話，我們這幾年最大的失誤是什麼呢？是三中全會恢復起來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現在有失掉了。我們黨在三中全會以後，威信急劇上升。當時有個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地對待人，對待知識分子，對待歷史，給各界受打擊的人平反冤案，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冤案，恢復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而這幾年我們幾乎忘記了這一條成功的基本經驗，隨便處理人，隨便撤職人，開除黨籍；被處理的同志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他的申辯沒有發表的權利……我相信只要黨和政府對學生運動採取積極態度，中國不會動亂，而且會建立一種動態性的民主秩序。

最後我想說，這次上街遊行，是過去那種不穩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希望黨和政府從自身尋找不穩定的原因，探討消除不穩定的民主秩序的因素，不要再從什麼「長鬍子的人」身上去尋找原因。這種思路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我也呼籲我們的學生，用理性來對待我們的一切，當我們政府和領導人做出積極反應的時候，也應該相應做出反應。

李陀：對目前中國發生的這麼大的政治動盪，性質究竟應該怎麼看？我想提點看法。這場動盪的性質主要是兩個矛盾：一個是由我們的現代化帶來的民主進程和現有體制的極不適應、極不協調，所發生的嚴重衝突。這種衝突是造成學生上街的一個根本原因。而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裹足不前，甚至連蘇聯已經有的，比較現成的經驗，我們都置之不顧，反而出現了一種跡象，我們由於對文化大革命、對四人幫那個反思，所帶來的很小的進步，很可能要倒退回去的跡象，在政治體制

上的改革不但沒有前進，而且有一種倒退的趨勢。比如說，隨便撤人的職，比如說家長制，愈來愈嚴重；比如說，黨內民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實際上都倒退了。（倒退……胡耀邦下台……倒退。——大家贊同）胡耀邦下台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它說明民主進程與體制的衝突，是一個嚴重的例子。再一個，我們的經濟改革和民主改革不同步帶來的衝突。我們過去有一個想法，認為經濟改革可以脫離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脫離開民主進程，也能取得相應的成績。這，我覺得是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持有的一種幻想……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是我們今天經濟改革的停滯和經濟改革的危機。

這兩個衝突，就是我們今天發生這場偉大的愛國衛生運動（戴哈哈大笑；溫：也是「衛生運動」），民主運動和政治動盪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僅僅反對說：它不是動亂，它「不是」什麼，那麼，它「是」什麼？我覺得，我們的思想界、理論界，應該及時地給予總結，給予論述，這樣，我們才能馬上總結經驗，來提高認識。

第二點，我覺得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它從來沒有過的嚴重考驗，在這一點上，中共應有充分清醒的認識，兩種態度，一個是對人民，到底持什麼態度？一個是對民主，究竟持什麼態度？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在這兩個態度上跟國民黨相反，它才建立，才不斷取得進步的，才有了後來四九年的勝利……我們把學生當成敵人，不要說，一個事件如果有幾百人的話，我們都不能輕易地說誰是敵人。成千上萬，甚至上十幾萬人到幾十萬人，一個政黨，它敢說它面對的是敵人！我們這個黨的性质就要考慮了，究竟把自己和人民擺在一個什麼關係上？幾千名學生絕食，整個人類歷史上沒有過！什麼時候有過？甘地絕食才一個人！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考驗。

第二就是民主。說民主說了不少年了，但是正是在這場動盪當中，我們感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民

主意識非常之差！不知民主為何物！當學生用他們的具體行動把現代民主施之於我們的政治生活的時候，他們驚惶失措！……葉公好龍！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什麼別的東西，還有什麼民主？因此，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我們對這場民主運動究竟持什麼態度，是一個嚴重的考驗。是對黨的宗旨、黨的性質、黨章一個嚴重的考驗。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決策人、領導人都應該有充分的認識。

第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覺得這個運動和過去有一個不同，就是這是一個民主的大學習的運動。我們看一看學生把運動發動到推向高潮的整個過程，我們倒覺得在不斷的學習當中、不斷地在嘗試著，實踐現代民主。他們犯過錯誤，他們現在還在犯錯誤，他們現在很多行為是違反民主的。但總體來說，我們看到的種種跡象，看到種種事實，他們在學習民主，學習怎麼樣具體把民主實施到中國來。但是相反，我們看到了何東昌、袁木，這種根本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的人。他敢於同學生對話！（大家笑，七嘴八舌）……目前，是我們學習民主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我們不要丟掉這個時機。如果這個時機處理好了，可能從上到下，大家都慢慢明白，五四以來搞了七十年的民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

第四點，一個具體問題，知識分子能不能在今天下午起點作用？我說這需要一個前提，就是最高當局，最高決策人，要提出最起碼的幾點保證……我認為，三條保證：（1）否定「動亂」這一說法，肯定民主愛國運動，最起碼，我們不能後退一步；（2）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3）欽本立復職。如果有這麼三條，學生還在那兒坐著，我願意去和學生談。

溫元凱：這是不可能的。

李陀：爲什麼不可能呢？如果沒有這幾條，我們憑什麼去和學生談？臉皮有多厚？

溫元凱：你又不代表政府，誰會說你臉皮有多厚呢？

李陀：當然。我們能說什麼？你說我們能說什麼？……如果將來抓起來。孩子們如果將來分配受阻礙，孩子們如果挨了打……餓死了，我們負得起責嗎？

溫元凱：現在已經三點四十分了，你現在有什麼可能讓領導表一個態？

戴晴：四點鐘他們有人來，政府方面有人來。

麥天樞：中國政府和中共四十九年來面臨的一個最嚴重的危機，又是最大的機會。這個機會在於，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使用和學會在公開反對……（此處不清）另一個學習的機會是它在處理學生運動問題上，在觀念和行爲上都不能用統治的方法。現代民主在施政行爲上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個東西比較苛刻。過去我們在統治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大批政府的領導幹部，能力極弱、適應複雜局面的能力退化。他們只需要簡單運用權力：行和不行。需要鎮壓，這種簡單的方法。而用民主的方法，是需要智慧，需要聰明，需要理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中國政府領導人，應利用這種機會來展示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是對他們的考驗，是給他們的一次機會。第二，我想這次學生運動對當前的時局，對我們大夥兒，需要排除兩個誤解：第一個誤解是，認爲不後退才能保住面子，不讓步才能保住面子。現在其實是只有承擔責任，承認錯誤徹底愈能保住面子。（對！對！對！）

溫元凱：這是柏楊講的「死不認錯」！（大家笑）

麥天樞：看我們黨和政府處理問題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它能把我們過去的錯誤、失誤和當前對學生運動處理的錯誤和失誤，承認到什麼程度。這是現在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二個誤解是，學

生並不是要推翻誰。作爲一個年輕人，我們不說理論上是什麼，我們從實際當中是承認的。實際上我們是希望它要民主、要進步、要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化。這是現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第三點，在學生運動合法性，學生運動的性質上，要趕快做出認識和表態，避免事態擴大。更重要的是，對於一些大的問題，要做出具體的承諾。政府在一些問題上，要通過法律程序……簡單說，我們現在新聞自由不能沒有了、不考慮了。這不行的，怎麼這麼大個新聞自由？我們應該說具體的，不做具體的，我們將來做不到，會進一步失去民心。

溫元凱：袁木也講了很好的話，說「中國從來沒有新聞檢查，都是總編輯負責制」黨中央、國務院不是講了嗎？兌現就是了嘛！

麥天樞：當然新聞自由它是一個法律過程，不簡單地是一個人說一句話。但這些問題政府到底有機會，也有必要，也必須作具體的承諾。

李洪林：以上同志們講的我都很贊同。補充一點，「由少數人製造的動亂」，這樣一個顛倒的判斷，必須把它更正過來。我們有這麼一些官員，希望有這麼一些……（大笑。亂）……這不是覺醒，是官方單位的一個口頭語。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恥辱。這種人代表政府來發言，我覺得……（大笑。亂。來電話。于浩成、包遵信插話。李澤厚笑個不止。）……改革在十年裡面，始終是左右搖擺。雖然我們現在的領導人老是害怕，規定說我們黨內不要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誰都可以看出來，有兩種傾向性的東西……爲什麼這麼反覆呢？就是舊體制頑固地不退出歷史舞台。因爲改革會使許多人喪失他的職業，許多人會喪失他的特權，許多機關要變成精簡的對象。這樣龐大的一個上層建築，壓在這樣一個薄弱的經濟基礎上，怎麼治理呢？恰恰是用得病的原因來治理這個病，不是嗎？

用「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來治理整頓，什麼是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呢？加強集中統一，加強政府干預，加強行政管理，包括物價、派檢查部……農業不種糧食，工業，煤炭、能源、交通不賺錢，靠賠本弄，怎麼可能把自己的經濟結構調整合理了呢？要維持他們，非搞治理整頓不可，所以肯定愈治愈壞……

政治上，八六年下半年活躍了一下，變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藉口。所以八七年什麼政治體制改革？什麼民主改革？因此異常腐敗……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說什麼「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把羣衆說成豬了。（插話：對！好像是他恩賜的。）不能是這麼個關係。（給你肉吃，你還罵我。）人都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了！（主人思想）根本就是舊體制全面的回潮，整個改革到了危險的程度。

混亂，不滿，整個社會躁動不安，這已經到了大家不能忍受的程度。最規範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他們首先上街了。爆發了這場學潮。這一點不認識的話，我覺得大部分政黨都要犯歷史錯誤。

……它不光是個信號，而且的確是個機會。只要我們正確認識，加以因勢利導，推動中國的發展，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現在都在嘆息民族精神頹廢啦，社會風氣不好啦，確實社會上看起來到處一片混亂，衰敗，漠不關心，各種自私自利，對我們民族的出路……通過這件事看出了我們民族振興的一線希望……爲什麼把它看作洪水猛獸呢？共產黨一向是搞羣衆運動。我就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共產黨不就是領導學生運動的嗎？並沒有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並沒有提出要根本改造這個政府，也沒有提不要搞社會主義。要加快民主化進程、要改革、要反對貪污、反對腐敗，正是我們現

代化過程中非常可貴的一種動力，為什麼黨要如臨大敵？要動用軍隊呢？

……

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只能提高威信，不要等百年之後別人來糾正我們的錯誤。政府和黨的領導真正是通情達理，事情很簡單，很容易滿足學生的要求，會大大地提高自己的威信。這樣的提法羣衆會歡迎；共產黨所需要的，不是羣衆害怕的。共產黨的威信如果靠槍維持，這個黨的威信就完了。共產黨的威信，只能靠羣衆發自內心的真誠的擁護……

李澤厚：我不講了。四點鐘了，建議《光明日報》發表。

溫元凱：現在我建議討論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實際發生的可能性。

×××：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一下，提點建議，不光是這些，建議《光明日報》馬上給上面打個電話，要求上邊馬上出來見一面。

李澤厚：現在的問題是採取一個什麼方式，怎麼談，這個恐怕要議論一下。

溫元凱：剛才曉康、李陀他們提了些看法，我建議咱們趕快擬一個東西出來，沒有多少論述。這個道理都很清楚的嘛！三、五條就行了，五、六條也可以。作爲一個緊急號外，印它幾百份、二百份。這個就包括兩層，不是說簡單要學生撤離的問題。要學生撤離，是顧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面問題。但是同時對政府提出幾條。現在不要提太多，剛才李陀提三條我看就挺好，簡明的幾條。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願意出來做工作，剛才蘇煒也講了……

李陀：就是兩條，對話。

蘇煒：不對學生和學生領袖打擊報復。

戴晴：現在是這樣啊，政府無能，大家已經看到了，無能到沒有一個人敢出來，這時候已經完全不是別的東西在起作用，而是他們本人的素質和性格在起作用了。現在唯一的一個站出來的人就是閻明復。閻明復現在正在……剛才我喃喃咕咕在那打電話，我就是說，我們都在這兒，我們的大致意見是什麼，然後他說，他們原來說請大家一起到統戰部去交換一下意見，後來又說，他們可以派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聽聽我們的意見。總之呢，就是閻明復成了我們一個總指揮。現在一些學生正在統戰部。（嚴家其：現在學生成了統戰對象。）我覺得閻明復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冒著，其實他是一個翻譯嘛！不當統戰部長對他來講是一件舒服得很的事情，實際上他這樣做吧，我跟他接觸，我體會到他，剛才大家強調得不够充分，確實出現了一個和以前不一樣的一個，一支新的力量，類似的力量，就是「四二七」那個處理方式。這種模式能不能結束目前的這個局面，那麼，實際上是主張另外一種模式的人始終在緊盯著。（插話：對！）這個模式結束不了，那個模式就上來了。（對！）

李澤厚：我們這次要幫助……

戴晴：對！但是我又跟他說，對，我們是幫你啦，我們現在等於是替政府扛著，你政府要不幹了怎麼辦呢？咱們有什麼辦法，而且咱們現在的腦袋，也是在鋸刀上放著的啊！（現在反自由化不徹底呀！）我認為閻明復的情況也是這樣子的，如果這次閻明復他……他也就完了。

溫元凱：我們還有一個對歷史負責。

衆：對！

于浩成：剛才溫元凱的建議怎麼樣？

（眾人議論。）

王超華：學生對政府現在是不抱一點希望。學者簽名一點作用都沒有。學生覺得你們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是失望，根本不覺得有什麼作用。

嚴家其：一個是政府應該引導引導，但是公開講話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溫元凱：這就是加劇事態嘛！這個意思剛才戴晴已經講了。

蘇曉康：擬個東西。如果政府不答應，我們也應去做這個工作。這個責任是政府負的，我們現在是為政府……

蘇煒：我們不是為政府，我們是為學生（溫：對對對！）我是擔心學生出事情。

溫元凱：我們不要忘記，這種模式不行。另一種模式就要上來了。

戴晴：要是把學生架走，就絕對不是簡單地架學校去而已，那就是架到監獄裡去了。（眾笑：完全有可能。）

嚴家其：押走學生的話，中國的動亂就開始了。伊朗事件就是這樣開始的。（蘇煒：如果這樣，那就是動亂的開端。）伊朗就是打死了幾個學生，然後一次次把棺材抬出來遊行……

李澤厚：政府出來講話的可能性很小。趙紫陽已經講過了，還有誰出來？希望盡量避免今天晚上這一次。告訴他們，這個奮鬥是長期的，我們怎麼在這個時候起一點作用，這就行了，其它那些慢慢講可以。

溫元凱：發出點什麼聲音。（對！）

劉再復：剛才講，寫在前面有沒有什麼用？但是我們只能往好的方面爭取。

溫元凱：這些人的聲音，在天安門廣場的喇叭裡放出來，是不一樣的。其實晚上八點鐘、九點

鐘、十點鐘拿到中央去是一樣的。

嚴家其：那就只能起草一個東西，通過天安門廣場的廣播播出去。我相信這是有作用的。但是，我們沒有權力，我們沒有權力讓學生撤走……

（于浩成：要支持趙紫陽……溫：對！對！對！這個時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蘇曉康：反正，但是不是無條件的……×××：對！對！蘇煒：不是我們在為政府的面子，我們是在為學生，為歷史。溫：對！對！對！蘇煒：政府早就沒面子了。真的，它可不是貴不可言。×××：那行，那行，剛才講的那幾條行，清楚嘛！）

（戴晴接閻明復電話……）

嚴家其：……需要講兩點。第一點講學生的愛國主義，承認以前的手段是錯誤的……廣播演說……（此處不清楚）

戴晴：（放下電話）我覺得他把所有的責任都盡到了。我覺得他做得對！他找的是誰？

王超華：吾爾開希，所有的「招」都用光了。

戴晴：現在你們諸位是最後的一張牌，就是請李澤厚等人出來。（眾笑）現在而且，那邊對閻明復說：學生在對你要兩面派……昨天學生已經向他保證過。只要這個開始了，就把大家勸回去。（王超華：但是說的是盡力。）是盡力。那麼現在他知道。他們也盡力了，這種局面學生領袖也控制不住了。所以現在閻明復傳達的，學生現在提出來的唯一的一張牌，就是請大家，學生能聽誰的話呢？就能聽你們的話了……那你們能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他剛才這樣說還是比較瀟灑的。而不是說「你們都是敢死隊，趕快頂上去！」沒那意思。他說，你們試試……後來我說了，我們要發一個東西，他還是很支持的。

溫元凱：現在寫好了，我念一下：

……

李陀：我提個問題，第一條和第二條之間的聯繫是什麼？上面兩條和撤離廣場聯繫是什麼？這邊沒有講話，學生就要撤離，是這樣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

溫元凱：在第一、第二條的前提下……（改一下。）

蘇煒：不要用同樣的口氣。

王超華：我們需要的是把「秋後算賬」那個……（寫進去。）

蘇曉康：前面是對政府的，後面換一個口氣，加上「親愛的廣大同學們」（對！對！）「自從昨晚得知大家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但改革和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後面再接你下面的話。（好的！好的！）希望還要加強「希望你們保持這次運動中的……」（大家異口同聲：理性精神）……

李澤厚：去的時候光講這個我估計還不行。現在他們不是分析了一下情況嗎？有一部分非常堅決的……能夠把他們裡邊的那種人物找出來。找一個地方坐下慢慢談……不然我們談過去以後，他們的問題還是沒解決（對！）……通過他們找到那些……（死硬派）……這樣比較好。假使能夠做到，他們能夠聽我們的，那就很了不起了。（對對對！）

×××：但是北京市委已經宣布，趙紫陽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中央，這個不對頭的。

（互傳了一通關於鄧小平、趙紫陽的小道消息。蘇曉康和溫元凱又各將起草的文章念了一篇，眾人又提意見。）

蘇曉康：是不是把「學潮」改為「學生運動」？

包遵信：我認為「學潮」好，不一定是貶意的。

嚴家其：一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居然面對這樣一個事情而不能出來處理，他就沒有臉面代表人民很好地會談。我們的呼籲目標，應該是黨和政府領導人，公開出來宣布……前面我們講的幾點，而不是我們去勸學生撤離。我們不能做這個事！反正我不簽名……這是很簡單，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全場沉默三秒鐘。爭執。王超華不同意嚴的觀點。）

蘇煒：……為了解決當前的危機，這是對中央領導人說的，要求他立即發表（×××：做不到的。）

嚴家其：做不到他們怎麼能回去呢？做到他們馬上就回去了嘛！

李澤厚：我是一個和大家有分歧的人，我是想建議……不想整個地答覆。因為估計，我估計是有人想把事情……我是從這方面考慮……

溫元凱：趙紫陽下台……

李澤厚：不在於趙紫陽下不下台……

蘇煒：知識分子的立場在於……趙紫陽……上面誰是開明派，誰是保守派，沒意義！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不要再表現出我們要來安排人事那種……

李澤厚：對！對！對！

溫元凱：這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情，怎麼能不管？

蘇煒：你也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

溫元凱：中國就是這些人哪！當然我也管不了。（激烈爭吵）

蘇煒（平靜）：這幾天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缺乏一種緩衝的機制、緩衝的力量。這種兩極化的社會就容易出現問題。那麼緩衝的力量，緩衝的機制是什麼呢？我們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我們應該形成這樣一種力量。知識分子應該是獨立的。一方面我們可以對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對學生說說話，從我們獨立的地位來說這個話，和過去比，我們在這場運動中應該起這樣一種作用。這對我們整個社會向前推進，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應該起一種好的作用。

溫元凱（平靜）：我想是一種積極調解作用。

包遵信：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起這麼一種作用。就是公開的說，不能像過去似地，老在背後

……

蘇煒：我現在還是同意到廣場上去。我個人同意，但不是為誰。（七嘴八舌）

劉再復：你可以這樣想。但……支持我們黨內的一些改革派……

蘇煒：我不相信！（笑。笑）

蘇曉康：這樣，我們還是不要在本本之外……我是擔心學生（李陀：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是我覺得要保護學生……只好暫時，使這個坎過去，還可以再來（可以再來）怎麼保護呢？……

蘇煒：現在我們是下賭注。我們現在是把良心押在這個……說不定官方很願意利用我們這個來緩解他們的壓力……以為有糊弄過去了。但實際上也沒那麼容易讓他糊弄。

溫元凱：它既然能夠收，這就意味著它還能夠再來嘛！簽了名又怎麼樣？剛才我說了，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我也會走上街頭遊行……過去聞一多什麼的，多了！這種例子。

李澤厚：所以說，「暫時」兩個字重要。（笑）

溫元凱：大家給一次機會有什麼不好呢？我告訴你，我們根本不保誰，但是你要看到兩種模式在現實的討論中間。你三十八軍兩個師在北京，這很具體的，是不是？

……

嚴家其：應該加上這麼一句，假如你們幹什麼的話，我們幹什麼。（對！對！對！）不然我們就欺騙了學生哦！（七嘴八舌，笑；×××：對！我同意。王超華：希望和學生一樣，也能坐在這裡。）參加你們遊行示威，坐到一起，可以！

溫元凱（大聲地）：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條，我們將參加……（蘇曉康：堅定不移地）

嚴家其……：為中國民主政治而奮鬥到底。

李陀：我覺得嚴家其解決了我的一個非常大的包袱。真的！怕把學生騙了。如果騙了學生，我一輩子都活不好……

嚴家其：我們說的話要算數，我們就和學生站在一起了。

……

二十七軍某副政委關於 參加首都戒嚴與「平暴」經過的報告

陳小雅錄音整理

彙報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前十天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大氣候，小氣候」指示的感想；第二個，是戒嚴的經過；第三個，想彙報一下北京市政府和人民羣衆是怎樣對我們支持的。……

有人把這場運動說成是反官倒，愛國運動，這只是看到表面現象。我們認爲這是一次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爲什麼呢？我想有這麼幾點理由：

第一，「懲治腐敗，反對官倒」，只是他們用來煽動羣衆的策略手段。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政權。既然是「懲治腐敗，反對官倒」，爲什麼要採取靜坐、絕食這種非正常的方式？爲什麼要在天安門廣場豎起「自由女神像」？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黨的領導，全盤西化，他們堅持要在憲法當中去掉四項原則。大家知道，劉曉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自由化代表人物。他就說要用多黨制代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成立了許多非法組織，以至於在中國形成一個所謂政治上的反對派。他們有工自聯、高自聯、外高自聯，什麼敢死隊、飛虎隊、糾察隊；有的還成立了什麼黨派，有綱領，有宣言，有參加組織的登記表，這不是有

組織是什麼？所作所為已經沒有一點愛國主義的味道。他們爲什麼要國際紅十字會來干預？爲什麼專跟「美國之音」的指揮棒轉？他們爲什麼要攔截軍車？爲什麼要污辱我們的幹部戰士，並讓外國人照相？他們爲什麼要同國民黨特務勾結？方勵之之流爲什麼要逃到美國大使館？……一度時間，「美國之音」放個屁也是香的。有的人總是信以爲真。

有個謠言，說二十七軍和三十八軍在南苑機場打起來了……我想把我們和三十八軍的關係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兩家自從調到北京軍區以來，一直是鄰居，友好相處……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歷史上都是在膠東起家的。他們中的若干老幹部，過去都是認識的。在這次行動中，我們接到命令後出發，十九日在保定受阻，三十八軍幫我們聯繫、送水、送飯，到保定市政府幫助做工作，因爲他們比較熟。他們有一支部隊被圍在六里橋，被打了。我們知道後，派了二百多個人，戴著鋼盔，拿著手電筒開道，把人羣驅趕到一邊。我們怎麼可能在南苑機場打起來呢？……謠言還說三十八軍的導彈在建國門把我們的裝甲車打了。我們根本沒有裝甲車，而且一開始根本沒有到建國門橋這兒來嘛！

另外還有一個謠言，說我們軍的領導是中央某個領導的兒子，某個中央領導的女婿，（突然提高嗓門，似有憤怒地說）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們軍的領導都是貧下中農出身（全場轟笑）。我們的軍長，家庭出身於江蘇吳江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我們朱政委出自無錫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我們副軍長出自保定××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我們王參謀長是江蘇宜興縣的一個農民；我是江蘇揚州江陰縣的一個農民，還沒有本事攀上那麼高的大官（眾笑）。他們的家屬，在地方上都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幹部，或者教員……

有一次，我們一個戰士聽到一個小學生在校園裡說，我們的戰士見人就殺，殺了就笑（眾笑）。小孩子說，戰士都打了興奮劑。戰士問小孩怎麼知道。他說我在家聽我爸爸媽媽說的（一陣客不安的噓聲，笑聲）。你說可能嗎？我們過去和美國人打仗，和日本人打仗都沒有幹這種事情嘛！在老山前線一年多，用不著這樣嘛！我們奉命到北京來維持秩序，難道還要打興奮劑嗎？這是大笑話嘛！但是還有人相信。

所以，謠言造到一些單位，對我們很有抵觸情緒。怕什麼？我們都是貧下中農出身嘛！（眾笑）用不著害怕，人民子弟兵嘛！

……

二是從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十日的情況。

在這二十多天裡，對我們來說，是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特殊戰鬥。我們當時在老山，說老山是一個特殊的戰場，這個地方比老山還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國的首都，好人壞人一時難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驗，也有政治上的考驗，而且鬥爭的性質，更主要的是一場政治鬥爭，太複雜了！

這些天經歷了三個浪潮，可以說一浪高過一浪，一浪比一浪複雜。

第一個浪頭是我們從駐地向北京開進。我們感到時間太緊迫了，部隊來不及動員，準備工作非常倉促。十八日晚，我們接到上級命令，到北京來執行緊急任務，守衛首都的重要目標，維護首都的秩序。我們感到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務。從胡耀邦逝世起，我們就十分關注報紙和電台，對輿論上某些導向，我們指戰員還是有所警惕的。特別是我們軍的領導，感到有一場風雲要來，所以思想

上還是有一點準備，所以接到命令不是十分太突然，但是沒想到來得這麼急！

接到緊急命令後，我們馬上開會，统一思想。因為好幾年沒有復員，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復員了，剩下的幾乎都是新兵。爲了應付，我們打亂了全軍建制。臨時調集，有許多幹部都不認識自己的兵。二百八十名戰士休假迅速召回，二百七十九名官兵把臨時來的家屬送走，三百六十五名幹部戰士推遲了婚期。已經買到車票準備探親的幹部戰士，通知他們不休假。病房的幹部戰士聽說有任務趕回營房。僅用六個小時，全部準備就緒。

十九日上午八點多鐘，執行任務的部隊就開始啓程，向北京慢慢地開進。前面這個緊張還好說，因爲部隊適應了。但到了後面就難了！我們走的時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莊的幹部晚上都沒敢回家。有的電話都沒有來得及打，有的家屬都不知道丈夫到哪裡去了，怎麼一個晚上沒有回來？到營房裡也找不到。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攔住了。後來才知道，是趙紫陽身邊的人把這樣的核心機密透露給人家。北京學生打電話到河北保定，保定學生出動攔劫。說什麼也不願意放。後來不知道是什麼環節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聯來電話指示：不要管他們，讓他們走吧！

那麼就走吧！但走了一會兒又不讓走了。說是高自聯又來了一個電話，說剛才那個電話是錯誤的，不能讓走。嘩！一下又攔住了。攔住了六百多人。堅決不讓走。雙方談判，一直談到二十日的下午。後來是這個樣子。「你說不讓我們前進，我們後撤行不行呢？」他們說後撤可以，一直把你們送回石家莊。「好吧，你送就送吧！」結果就上來兩個學生，要把我們送回去。走了大約十來里地，我們說：「你真的把我們送回石家莊嗎？如果這個車子在路上出了事故，翻了車，你負不負責

呀？」他說：「算了，你們自己走吧！」那麼，我們說：「派個車子把你們送回保定，送到學校。」學生也同意。

這樣，我們的部隊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帶，又有四個青年在道上攔住。一個幹部向我報告，我一看，這四個人氣色不大對，搞不好又要打電話，通報情況，又要堵車。我就說，下車，找個地方吃飯，確實也沒吃飯，結果把那四個人甩了。以後我告訴先頭部隊，這個地方不能停留，趕快走。

這些情況，都是未預料到的，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這是第一個浪頭。時間是五月二十日。

我們五月十九日從家裡出發，到了十九日夜裡，部份部隊到了豐台、大興一帶。這時部隊來不及宿營，臨時也找不到住的地方。

五月二十日，部隊第一次進城，摩托化部隊還沒有來得及休息，就接到命令，要我們緊急向市區開進。因為二十日十時，國務院要發布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來不及開會，只能電話聯繫，結果在開進途中，遭到羣衆，部分青年的圍困。

我們一個高炮旅旅長，帶了三百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寶山，在那裡停了一下，剛開始很好的，才過了半個小時，嘩——！成千上萬的人上來了。我們被堵在了八寶山和八角村之間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車、公共汽車、垃圾桶、自行車，真是層層障礙，種種阻攔，使部隊無法前進，更談不上執行什麼戒嚴任務。

當時，我們也組織部隊，搞些宣傳。你再怎麼宣傳，他就是不聽，還搞反宣傳。部隊只好命

令：原地待命。如此，從二十日上午八點，一直到二十一日十八點，整整被圍困了三十多個小時……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風襲人。沒有飯吃，飯送不上來。在下面，我們有一千多斤的乾糧：饅頭、包子、餅子，送不上來。後來只能用救護車，讓一些戰士假裝虛脫了，用送病號的名義把乾糧送進來。我們的士兵也下來找些吃的，到飯店裡，一根冰棒從三角五角賣到二元、三元；早晨早餐賣油條什麼的啊，六元錢！（眾笑）有個青年推著汽水車來賣給我們。結果他哥哥緊趕過來，把他大罵一通：「誰要你把這拉來賣的？還不如送給大學生呢！」一些廠子裡的工人告訴我們戰士，他們廠裡有鍋爐，水開了，可以去打。我們的士兵三三兩兩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讓你出去，還得給他請個假，說「打開水」（眾大笑）。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學生給我們送來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們再說。

有些「飛虎隊」轟隆隆地就來了，打著旗子，後面還帶著個女的。他們來了，進行一些言語侮辱。看到一個胖一點的幹部，就說：「曄！這是鄧小平的兒子」，「那是楊尚昆的女婿」。（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部隊的戰士始終保持克制狀態。

……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部隊接到暫緩進城，在郊區集結休整的命令。但圍堵的人又不讓你回來。我們有一個工兵團，有一百來人，在大興黃村一帶，最後被趕到一個廠子裡去，然後把大門關起來。幾個學生守在門前，光席子，一個枕頭，睡在馬路上，也夠難為他們的。（笑）回不來，然後我們找到了這支部隊，說回來吧！我那天換了便衣，汽車也不得不掛上地方的牌子，老遠就得停下來，過關口時還得把兩個指頭伸出來（大笑），但我們還是被看出來了，雖然是便衣，一看就知道

是解放軍當官的。通過交涉，我們還是把部隊接了回來。

二十二日到六月二日，我們部隊廣泛地開展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的教育，積極為駐地羣衆做好事。

……

從六月二日晚七時，開始向大會堂開進。當時爲了防止再次進城受阻，避免和學生、羣衆發生正面衝突，根據上面的精神，部隊採取了化整爲零，行微棄服，不帶一槍一彈，全部便衣、徒手，不帶挎包，只提一個塑料袋，步行進入市區。

只有幾個領導同志有幾台車。我是晚八時到達大會堂的。這天晚上，因爲一輛中央電視台借用的武警車發出交通事故，一下軋死七個人，他不是成心，使進軍的意圖被重新激怒起來的人羣警覺了。原進城的戰士三、五個人一組，有一個人負責。這個辦法很管用，因爲進度很快。但交通車出事後，有人造謠說，是部隊開道的警車壓死了人，就不太方便了。再加上戰士經過訓練，作派與社會青年不太一樣（笑），有的也來不及買便衣，就穿著部隊的球衣、球褲或襯衫，還有的下面穿了一雙解放鞋。有的人晚飯沒吃，就給了點兒錢給他，讓他到街上去買點兒麵包吃。一些商店、飯館的人也發現，「今天晚上，怎麼小平頭這麼多呀！」（眾大笑）結果在虎坊橋、宣武門一帶，當時就給堵住了。大部分已經進入大會堂，外面還有幾千人，有些是迷路了，因爲出發前只是給每人畫了一個草圖：豐台↓大興↓大會堂西南，很簡單。有的戰士拐幾個彎就走迷了，有的直到六月三日還在釣魚台一帶，又不敢問人，怕被發覺。有的被困被打，仍高度忍讓。後來大家座談時，有的戰士說，當時的情況是身上在流血，心中在流淚……有的找到了大會堂也不知道西南門是哪個口，轉

好幾圈還進不去，往往要繞到廣場去。一個戰士到廣場坐下，結果，一個高自聯問：你，幹什麼的？他說，我是民工。有人轉了二十三個小時的市區……有的戰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屈，千難萬難，突然在路上看見了自己的團長，忍不住熱淚盈眶，上前大叫一聲「團長」（大笑），結果周圍的人一片震驚，怎麼辦？團長也害怕被圍住，跑吧！

六月三日七點鐘左右，我們一台送武器的彈藥車路過西單路口的時候，突然被攔住了。當時這個車上裝了一百多枝衝鋒槍、五挺輕機槍、七枝手槍，剩下的都是彈藥。被圍住後，市民蜂擁而上，我們一個師參謀長叫王小京，具體處理這台車的事。當時，許多人把槍抬到車頂展覽，有的人還照相。當時有一種說法，說車裡有菜刀，還有尼龍繩。本來，凡是戴大蓋帽的都有尼龍繩。他們說這是用來勒脖子的（笑）。一些暴徒還圍上來質問：「你們為什麼要穿便衣進城？」「為什麼還帶著武器？」後來這個參謀說：「我們又不隱瞞自己的身分。之所以穿便衣，是爲了避免和羣衆發生正面衝突。至於帶武器嘛，就跟學生帶課本、農民帶鋤頭、工人帶工具一樣。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他提出：「我要找你們高自聯的頭頭談判。」接著，他提了三條：「第一，你們的行爲，攔截軍車是違法的；第二，車上的武器一旦丟失，你們負不起這個責任；第三，你們展覽這些裝備，讓外國記者照相、錄影，對我們國家的利益是有損害的。」當時，有一位高自聯糾察隊的負責人說，我們願意幫助你們把彈藥車轉移到安全的地點去。後來，在廣大羣衆、部分學生的幫助下，很負責地把車押送到了海軍總醫院。這個大學生姓名，先攔後送，將功折罪。

三日下午，六部口又有一台彈藥車被圍了。這輛車是中央警衛團打了催淚彈，從人羣中搶出來的，未丟一槍一彈！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戒嚴指揮部授予我集團軍搗毀設在天安門廣場的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接到這個命令之後，幹部戰士情緒很高。根據當時廣場的情況，我軍領導經反覆研究，認為兵力不宜過多，決定用偵察兵，共二百零五個人組成一個特緝分隊。

我在窗上看了一下，天安門廣場情況仍是亂哄哄的。這一堆，那一堆，圍在一起。

四時二十五分閉燈，我們偵察分隊利用這個閉燈的時候，由大會堂東大門出發，直撲高自聯指揮部。爲什麼要閉燈？外邊現在有很多謠傳，說閉燈後輕重機槍一起掃射，坦克壓過去。其實，這是清場開始的一個統一信號。告訴所有部隊，現在要開始清場了。另外一種考慮，就是給這幫人心理上造成一種壓力。

……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八日「英模報告會」錄音整理）

柴玲對「六四」天安門廣場 清場前後情況的追述

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點。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

關於自六月二日到六月四日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我有責任把事實真相告訴大家，告訴每一個同胞，每一個中國公民。

六月一日晚上十點左右，最初的一個訊號是一輛警車撞了無辜的四個人。其中三個已經死了。緊接而來的第二個訊號是，一些士兵，他們整車、整車地放棄他們的槍枝、軍衣，以及其它一些器材，丟給堵截軍車的老百姓和我們的同學。對這種作為，同學們很警惕，及時把這些東西收集在一起，交給公安局。我們有收條為證。第三個訊號是，六月三日下午約三點左右，準確時間是兩點十分，六部口、新華門同時出動大批軍警，毆打我們的同學和市民。當時，我們的同學是站在車上，用著話筒，對他們喊：「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我有一個同學，他剛剛喊第一句話的時候，有一個軍人衝上來，對他的腹部就是一腳，罵他：「誰他媽的愛你！」迎頭又是一棍。這孩子當時就倒下。

從那以後，我說一下我們的位置。我是總指揮。當時，在廣場上設立一個廣播站。這個廣播站

叫絕食團廣播站。我一直堅守在那兒，通過廣播指揮全場同學的行動。當然，我們的指揮部也有其他同學，像李錄、封從德等。我們不時收到來自各方面的告急，同學們、市民們不斷有被打的消息、被殘害的消息傳來。那晚九點鐘到十點鐘，情況愈來愈惡化，這樣的消息已經傳來不下十次。當時，我們指揮部在當晚七點、八點左右，即時向記者舉行一個招待會，把我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訴在場的中外記者。外國記者很少，因為據說在一些天的飯店，外國人住的飯店，有軍隊軍管。而且，他們的房間也都被搜查。那天，只是零散的，有一、兩個外國記者進入了廣場。指揮部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提出的唯一的口號，就是打倒李鵬偽政府。

九點正，全體在天安門廣場的同學站起來，舉起了右手宣誓：我宣誓，爲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爲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爲了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爲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直到最後一個人！

十點正，廣場的民主大學正式開業了。副總指揮張伯笠任民主大學的校長。各界人士對民主大學的成立表示了熱烈的祝賀。當時的情形是，指揮部這邊連續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情況非常緊張，而在廣場的北部，我們民主大學成立的掌聲雷動。民主大學設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圍，東西長安街上已經血流成河。劊子手們，那些二十七軍士兵們，他們用坦克、衝鋒槍、刺刀、催淚瓦斯（在那個時候已經過時了）對著哪怕只喊一句口號的人，哪怕只扔了一塊磚頭的人，他們用衝鋒槍追他們打。所有在長安街上的屍體，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們的同學跑到指揮部來，他們的手上、胸上，他們的腿上流血。是他們的同胞生命的最後一滴血。他們氣憤，把這些同學抱在懷裡……

十點以後，指揮部要求大家……爲什麼要求大家？我們自四月以學生爲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以來，一直演變到五月以來的這個全民運動，我們的原則自始至終是和平請願。我們鬥爭的最高原則，始終是和平。很多同學，很多工人、市民，他們到我們指揮部來說，既然都這樣了，應該拿出武器來；男的同學，他們也很激憤，我們指揮部的同學告訴大家，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我們就是這樣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大家在《國際歌》聲中緩緩地從帳篷中走出來，挽著手，走到紀念碑的北側、東側、西側、南側。大家靜靜坐在那兒，用我們平靜的目光迎接劊子手的屠刀。因爲我們知道，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愛與恨的戰爭，而不是武力與武力的戰爭。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以和平爲最高原則的這場愛國運動，最後結果是同學手裡拿著一些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成爲武器的武器，跟那些手持衝鋒槍，坦克，這些已經發了瘋的無理性的士兵去拚搏的話，那麼，這就是我們這場民主運動最大的悲哀。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地坐在那兒。他們在等待著犧牲。這時候，在指揮部的小棚子裡，這裡有幾個話筒，外面有幾個喇叭的小棚子裡面，放著《龍的傳人》，同學們和著歌聲唱著，眼裡含著淚水，大家互相擁抱著，握著手，因爲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的一刻到來了，爲這個民主犧牲的時刻到了。有一個小同學，他叫王力，他只是十五歲。在那個時候，他寫了絕筆。我已經記不起那個絕筆具體的資料，我只記得他跟我說這麼一句話，說「有時候人生挺奇怪的，生和死，就是那麼一瞬間。」他說，有時候爬來一個小蟲子，他想去踩死它，那小蟲立刻就動了。他才十五歲，就開始考慮什麼是死亡。共和國，妳要記住！妳要記住！這些爲妳奮鬥的孩子們。

大約在凌晨兩、三點多鐘的時候，指揮部不得不放棄在紀念碑底下的廣播站，撤到紀念碑上面

的一個廣播站，指揮全場。我作為總指揮，跟副總指揮李錄等同學，環繞著紀念碑四周，向同學們作最後動員。同學們就這麼默默地坐著，他們說，我們就默默地坐著，我們第一排是最堅定的。同學們說，我們後面的同學也這樣坐著，哪怕第一排的同學被殺，被打，我們都靜靜坐著，我們不動，我們絕不會殺人。我跟大家講了幾句話，我跟大家說，有這麼一個古老的故事，可能每一個人都已經知道，有一羣螞蟻，大概有十一億，有一天，山上起火了，這些山上的螞蟻必須到山下去，才能整個家族得救，這時，這些螞蟻就圍著一團滾下去，這些螞蟻燒死，但是更多螞蟻活下來了。同學們，我們在廣場，我們已經站在這個民族的最外層，因為我們現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明白，只有我們犧牲，才能換來這個共和國的生還。

同學們唱起了《國際歌》，一遍又一遍地唱著。他們的手緊緊地挽著，直到最後。

四位絕食的同胞：侯德健、劉曉波、周舵等，他們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們說，孩子們，你們不要再犧牲。但是，每一個同學都非常堅定。他們去找軍方談判，找一個所謂負責戒嚴指揮部的軍方人士談判說：我們撤離廣場，但是希望你們保證同學們的安全，和和平地撤離。這時候，指揮部在徵求廣大同學的意見，是撤離，還是留？決定把所有同學撤離。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幫劊子手們，他們沒有信守諾言，在同學們撤離的時候，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也衝上了紀念碑的三層。

沒有等指揮部把這個撤退的決定告訴大家，我們設在紀念碑上的喇叭已經被打成蜂窩狀。這是人民的紀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呀！他們居然向紀念碑開槍。其他多數同學撤下來了，我們是哭著撤走的。市民們都說，你們不要哭。同學們說，我們會再回來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廣場。

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強行地把大家架走。他們太疲勞，還在帳篷裡酣睡的時候，坦克把他們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有人說，這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浴血奮戰，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

據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裝甲車把帳篷、棉衣灑上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然後用清水灑地，廣場不留一點痕跡。我們這次民主運動那個象徵——民主女神，也給他們輾成碎塊。

我們手挽著手，繞過毛主席紀念堂，從廣場南面走向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見紀念碑南側坐著大約有上萬的黑壓壓一片戴著鋼盔的士兵。同學們喊：「狗，法西斯！」「狗，法西斯！」在我們往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排排的軍隊，他們跑步向天安門廣場集結。市民們、同學們咬牙切齒地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們目不斜視，火速向廣場跑去。

我們經過六部口撤離的時候，指揮部所有全體成員站在第一排，經過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日下午，在那兒經過最初一場血戰的地方，瓦礫遍地，有燒毀的、砸毀的垃圾箱。我們從六部口一直走到長安街上，沿著一條血路走下去，只見有燒毀的車，地上是瓦礫、殘渣，可以看出剛剛經歷過一場惡戰，但是沒有一具屍體。事後我們才知道，這幫法西斯，他們在前用機關槍，在後就收屍。殺人的時候，後面就有他們的士兵把屍體送往公共汽車、三輪車上。有的人還沒有死，還沒有斷氣，可是已經被活活地悶死了。這幫法西斯，把他們的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遮蔽得無影無蹤。我們只有用我們的胸膛，我們要大遊行，再回到廣場上。這時候，所有市民都來勸我們，他們說，孩子

們，你們知道嗎？那邊架起了機槍，你們不要再犧牲了。我們只好從西單往北，往高校區走。

路上，有位母親嚎啕大哭，他的孩子已經死了。路上見到四具屍體，是市民的。這些屍體暴屍街頭，是他們打死的。

越往北走，越接近我們的學校，每一個市民，眼裡都含著淚。有的市民說，我們買國庫券，難道是換子彈來屠殺這些無辜的人民嗎？屠殺我無辜的孩子嗎？

我不斷收到消息，有同學目睹的消息，有市民告訴我的消息，這幫劊子手，他們真殺的呀！他們對著長安街兩旁的居民區發射火箭炮（應是夜光彈——陳注），有孩子、老人，統統喪身槍下，他們有什麼罪，他們連口號也沒有喊。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凌晨兩點鐘在長安街上堵坦克的，他親眼看見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揮舞著，站在坦克車的前面，車從她的身上過去了。她被輾成肉餅。我們這位同學，他右手挽著的同學，一個子彈過來，倒下了；左手挽著的一個同學，一個子彈過來，也倒下了。他說，我是死裡逃生呀！

我們回來的路上，媽媽在找自己的孩子。她說，我的孩子，他叫什麼什麼，他昨天還在，他還在嗎？妻子在找丈夫；老師在找同學。周圍的機關上還掛著「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政策」，同學們憤怒地扯下這些標語，燒掉了。

電台裡還叫囂著，軍隊開進北京是要制止一幫暴亂分子，是要維護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資格說，我們這些學生是不是暴亂分子，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把你們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想想，年輕的孩子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靜靜坐在紀念碑的下面，他們用目光迎接劊子手的屠刀的時候，他們是暴亂分子嗎？他們如果是暴亂分子，他們還會那樣靜靜地坐在那兒嗎？

法西斯到什麼樣的程度，他們可以厚著臉皮，昧著良心撒謊，撒天下之大謊，如果說，那些拿著衝鋒槍，槍殺無辜市民的士兵，是野獸、畜牲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螢幕前、照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什麼人？！因為，就在我們手挽手撤離廣場的時候，我們還走在長安街上的時候，一輛坦克車追過來，向同學們放催淚瓦斯。坦克車就在同學身上壓過去，在同學的腿上、頭上，許多個同學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屍首。誰是暴亂分子？！就這樣，前面的同學還是按照原有的步伐走著。同學戴起口罩，因為瓦斯刺得每一個同學的喉嚨乾死。那些已經犧牲了的同學們，還有什麼能夠收回他們的生命。他們永遠地，永遠地留在長安街上。

我們這支從天安門廣場被迫撤下來的同學們的隊伍，緩緩走過北大的校園。因為有很多外地的同學，北大已準備好了牀位接待大家。可是，我們非常非常難過，我們是活著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廣場，留在長安街上。他們永遠永遠回不來了！他們中有的很年輕很年輕！他們永遠回不來了！

……

（據《明報》一九八九·七月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陳小雅著．--初版．
--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臺北縣]新店市
：學欣總經銷，1996[民85]
面；公分．--(風雲歷史經典系列；2)
ISBN 957-645-778-5(平裝)

1. 中共政權-歷史-1970~

628.76

85004449

風雲歷史
經典系列

2

書名

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

作者

陳小雅

發行人

陳曉林

出版所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78號7F之3

服務專線

(02)7560949

郵撥帳號

12043291

主編

陳曉林

責任編輯

項懿君

封面設計

風雲工作小組

電腦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授權

陳小雅

法律顧問

永然律師事務所

印刷所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1996年6月初版

訂價

450元

總經銷

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

電話

(02)2187307

ISBN

957-645-778-5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2275993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退回本社更換。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n
Tien-an-men Square
1989



天安門之變

八九民運史

有人認為「八九民運」是失敗的，因為它打斷了現代中國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十年改革之進程。但必須指出：「八九民運」是有恆久意義的；它的意義不在於一時的得失，而在於運動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現代史上無法迴避的矛盾！

ISBN 957-645-778-5



00450



9 789576 457784

相傳回教主鄂瑪
下令焚毀亞歷山大圖書館時說：
「如果這種書籍與《可蘭經》相同，
則就無需這種書籍；
如果與《可蘭經》不合，
則這種書籍根本即應消滅！」

——摘自本書